

鄧中夏文集

邓中夏文集



邓中夏同志

目 录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

（一九二 年十一月七日）	1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一九二 年十二月十九日)	4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一九二二年五月)	9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的请愿书	
（一九二二年七月）	11
劳动界招待议员开会时的讲话(一九二二年九月)	16
我们反对劳工司(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19
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20
讨论本团以后进行的方针(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	29
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32
解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36
努力周刊的功罪(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37
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	
——工人、农民、兵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39
论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42
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45
论农民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50

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	53
银行公会反对收回粤海关主权之索隐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59
论兵士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	63
论劳动运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66
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69
上海的报纸(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72
中国青年应该与“少年国际”结合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78
黄仁同志之死(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83
赤色职工国际之东方策略(一九二四年十月).....	87
我们的力量(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89
海员宣传问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103
穆藕初只觉悟了一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107
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一九二五年四月).....	108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九二五年五月).....	115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海员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135
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140
工人阶级与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146
勸国民政府(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	149
在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151

怎样实行工农联合？	
——马上组织“农村宣讲队”到农村去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155
呜呼廖仲恺先生之死！（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156
对苏俄全总机关报编辑瓦克索夫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158
吊陈锡烈士（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161
三个月的胜利（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163
罢工政策及其胜利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168
我们对于东征的责任	
——在广九铁路工人联合会演讲（一九二五年十月）	174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联席大会上的演讲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	177
工会论 上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79
作者启事	179
第一章 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180
第二章 工会要怎样组织呢？	182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时的答词（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	197
戴卓民同志出狱（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	200
革命的方法	
——在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202

悼韦德并论暗杀(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205
在中国海员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207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211
香港之又一幻梦(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220
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	223
在全国总工会欢迎刘少奇同志出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226
欢迎英国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十万大兵 (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	227
评广州工会之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	232
今年五一的目标(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236
工农商学联合战线问题(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239
光荣的纪念日(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	245
中英谈判中的我见(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247
中英谈判总评(上下篇)(一九二六年七月)	251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八月)	266
新努力(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297
工人与国民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299
“二七”与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301
“年初二”问题解决的途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	306
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311
上海总罢工的意义(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315
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一九二七年).....	318

一、为什么发生工潮？	318
第二次潮流	318
改良生活运动	319
并无政治意味	321
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	323
二、劳资的纠纷	324
工资问题	324
工作时间问题	327
征收买卖佣问题	328
征求会员问题	329
任免职工问题	330
罢工与封锁	331
三、工会的纠纷	333
行会组织、职业组织与产业组织的冲突	333
新的生产技术与旧的生产技术的冲突	334
东家工会与工人工会的冲突	334
政治势力的挑拨	335
封建思想的余毒	335
失业问题为其总原因	336
四、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	336
新经济论者之观察	336
新经济论错误的证据	338
几个旁证	342
五、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	343
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	343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可幸免的悲惨命运	344

与其说是工潮关系,毋宁说是政治关系	345
时机不可错过	347
六、一年来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	348
广州产业概况	348
广州工人阶级之组成	349
发展的原因	350
发展的经过	351
发展中的表现	352
七、怎样解决工潮?	356
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	356
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	360
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	364
解决工潮的方法	366
八、工人阶级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367
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	367
巩固自身组织	368
拥护中国国民党	369
争取革命领导权	371
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	372
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	373
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建议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九日)	375
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一九二八年).....	377
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 发言提纲(一九二九年).....	380
(关于职工会新策略的讨论)	

苏兆征同志传(一九二九年).....	392
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一九三 年).....	405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一九三 年六月十九日)	423
著者申明	423
第一章 原始的职工运动	424
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	424
最早的罢工	426
辛亥革命后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	427
欧战后自发的罢工斗争	428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	428
南方工会的发生	431
第二章 职工运动黎明期	433
世界革命高潮	43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34
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435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	437
罢工运动之蔓延	438
罢工运动中最早的思想斗争	439
第三章 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	441
高潮的总形势	441
海员罢工潮	442
铁路罢工潮	443
矿山罢工潮	448
武汉罢工潮	449
湖南罢工潮	450

上海罢工潮	452
广东罢工潮	454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455
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	456
工会组织的内容	458
工会与党	458
第四章 香港海员大罢工	459
海员的生活状况	459
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	461
香港政府的恐慌	463
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	464
调停与破裂	465
双方的鏖战	468
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	470
沙田惨杀	471
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	472
外界的援助	473
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	474
罢工的解决	476
庆祝罢工胜利	478
这次罢工的教训	478
第五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	479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召集	479
大会情形	480
大会决议案	483
这次大会的成功	485

劳动立法运动	485
劳动法大纲	486
劳动立法运动之扩大及其影响	488
第六章 开滦五矿大罢工	489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489
罢工的爆发	490
矿局门首的喋血	491
罢工工人的坚持	491
最后的失败	492
这次罢工的教训	493
第七章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	493
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493
军阀吴佩孚的处心积虑	498
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前夜	499
悲壮激昂的大会	500
总罢工之决定及其宣言与要求	501
总罢工的经过	504
“二七”惨杀	506
惨杀以后	508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509
这次罢工的教训	511
第八章 职工运动消沉期	513
“二七”失败后之残破局面	513
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	514
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	516
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	518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与挫折	520

流氓工会的招摇	523
困苦难难中的工会工作	525
职工运动之转机——沙面罢工	526
第九章 职工运动复兴期	528
北京政变	528
恢复工会运动	529
罢工斗争蜂起	530
国民会议运动与工人阶级	531
第十章 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附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	532
日本在华的纺织业	532
日本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压迫	533
罢工的爆发	534
罢工的蔓延	535
日本帝国主义的胆战心惊	536
罢工的战术	537
调停与解决	540
“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42
青岛日本纱厂罢工	544
第十一章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549
大会的发起与召集	549
空前的工农兵大联合的示威与会议	550
大会的经过	552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	553
经济斗争决议案	556
组织问题决议案	560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564

铲除工贼的决议案	565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566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570
大会宣言	570
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	573
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	574
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到来	574
“五卅”屠杀的直接导火线	575
血肉横飞的“五卅”屠杀	576
霹雳一声的罢工罢市罢课	577
上海总工会乘时崛起	578
帝国主义继续屠杀	579
反抗运动继续飞涨	581
全国各地的狂飚运动	582
帝国主义者的策略	585
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反动	586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594
罢工策略的变更	597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	601
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	
——上海总工会的被封	604
戴季陶主义之出现	607
此次运动中的教训	608
第十三章 省港大罢工	610
罢工的准备	610
罢工的爆发	612

沙基惨杀	614
罢工工人的组织	614
封锁香港	617
香港经济上的空前损失	618
国民政府的成立	620
罢工的中心策略	621
工商联合	622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625
香港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与广东政局	627
罢工与北伐	631
中英谈判	632
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634
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	638
要求改变二军团向武汉进攻等问题给长江局并转	
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	640
关于整顿红二、六军等问题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	
报告(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九日)	645
附录 邓中夏同志传略	653
编后记	657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 《劳动音》呢？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今天是我们与各位见面的第一次，我们怎样的喜欢！我们愿时常得与各位亲近，来大家谈天谈天，但是我想各位心中一定发生两个疑问，(一)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二)这个《劳动音》里面的文章，又说些什么话呢？我要使各位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第一篇文章，不得不先将这两个疑问详详细细的讲清楚，请各位且瞧下去就明白了。

我们相信“劳动”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第一个要件。因为人类是进化的，一天比一天不同，天天变动，天天进步，由旧的变为新的，由不完善的进为完善的，所以能达到这新的完善的，就是由人类“劳动”的结果，那末，我们就明白，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

但是我们试放开眼光，瞧瞧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所有的人类，都人人能从事有益于人生的劳动吗？我们知道今日各国社会上都有一种最不好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从事

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唉！世上那里有这样便宜，这样没道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的做来，他们安安乐乐的拿去，使我们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

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

更进一层讲，各位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你瞧英、美、法、德、意、荷、俄、日等国今日的现象，那一国不发生罢工问题，以实行劳动运动，那一国劳动者不有坚固团结的工人团体呢！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

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

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场的规则等，和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我们出版这《劳动音》的本意，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你们既然明白了，我们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了，请了，第二期再见吧！祝你们努力！前进！

原载《劳动音》第一册

署名：心美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今天因为长辛店的工人，所组织的劳动补习学校，开筹办会议，请我们去帮忙，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和太雷、仁机、郭淘三位同志跑出前门西车站，坐火车往长辛店去。长辛店距离北京四十二华里，约一点钟火车就到，是一个很大的乡村，有三个大工厂，共有工人二千五百多人。这些工厂，都是归京汉铁路局管辖的，按铁路的组织，共分三部，一是车务处，二是机器处，三是养路处。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谈谈笑笑，觉得很快乐，严酷的冷气，都退避了三舍。车过永定河，我望芦沟桥在晨曦的底下，趁着——一座破塌的古城，有两三杆布帘随风飘摇，刹是好看，真一幅绝好的天然图画。那时就引起了我的画兴，我的手就痒了，可惜当时没有带写生器具去，且不在芦沟桥停，所以不能画。车愈走愈远，我的心愈记着他。车到了长辛店，而芦沟桥的风景，还在我的心头。

在长辛店下车的时候，我见了许多灾民——男女老幼的麇聚在站边的地方。那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

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是社会上最不公道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

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今天刚是长辛店的一位工长邓寿亭先生,因他热心办了一间女子国民学校,几年来成绩很好,长辛店的居民送了他一个“乐育英才”的匾子,所以今天他摆酒请客。男女老幼的来宾很多,大半是工人,我们躬逢其盛。一尝乡村社交聚宴的风味,觉得很有乐趣。见他们那种平民的生活,亲热熙攘的风习,非常羡慕。

我们食完了饭后,就开筹办会议,首由一位工长明科先生布告筹办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经过情形,和现在进行的方法,今天会议的事项。大概是这个劳动补习学校是由长辛店工人自行组织的,款项是由捐款来的。(他的捐款启事和章程附录在下面)次由郭淘君说明创立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大概说,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温饱,而那班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那里来的,他

们的衣食住那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的血汗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得享受，弄到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先有智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而且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独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该享同等的教育和幸福。当他演说的时候，在座听的工人，个个都点头象有点感动的觉悟的意思，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开成立大会，于五日开课，那天想必有一番热闹。

会议后有几位工长带我们去参观各工厂，今天因是星期，所以各厂的工人多数停工休息，有少数工人，因特别的情形，如生计困难或不明白休息的意义，所以仍然作工，按工人每日冬天约作工十时，夏天约十一二时，工钱每天因工程或个人而不同，约自三毛至一元不等。晚工往前作一小时加一刻都计算，但现在却一小时了（闻唐山南厂的工人，因这个情形，已于十六号罢工了）。工人的生活费约每月三四元至十五六元（指有家庭者）不等。我们到一处，贮有许多砖头放在地面，我问他是预备建筑的^哪。他笑笑地答我说：“这些砖已买来了六年的工夫，说是为我们工人起医院的，你看那座小房子不是盖好了吗？但是其余的房子，不知他们六年了也没盖呢，”我笑说，那不是很方便你们害病吗？他说，“你那里知道个中的黑暗？好在我们不害病，倘真个害病，他们也不医，不说是没有病，就说没有药，除非有脸子才得到一点药呢！”我听了很气，敬告铁路总办，千万要关心下工人的幸福才好，不要开了一笔大公款，难为了贫苦的工人。

长辛店的工人智识很高，团结力很大，他们已组织成有很强

固的团体,他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叫做“劳动音”,每期销售二千多本。

我可惜对于机器学没有研究,所以参观了工厂,也没有什么心得能写出来,光记得一个是专修整气锅的,一个专修理机关的,一个制铁条的,入了总发动机,只见无数皮带和电线而已。各位工人向我指点说明,我真感谢他们增长了我许多智识。五点五十分,我们再坐车回北京。经过芦沟桥时,那幅天然好画图已被黑沉沉的幕烟罩住了,我不能再见那样失望。

我再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单预算案抄在下面:

(一)募捐的启事。我们为什么办这个学校呢?看下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费辞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子”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样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

(二)简章及预算案,(甲)简章(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二)凡身体强健

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七）本校设驻定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乙）预算案：（一）开办费（1）制桌凳三十张，洋五十元，（2）修理校舍洋二十元，（3）杂费洋十元，共洋八十元正。（二）经常费（1）校舍房租每月约十三元，全年约一百五十六元。（2）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元。（3）校役一人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4）书籍文具等费全年四十元。（5）杂费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共七百 六元。

原载 1920 年 12 月 21 日《晨报》

署名：心美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五月)

提案人：长辛店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

理由：工人阶级斗争力的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比如工会是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织而成，则罢工运动每至一行业的工人陷于孤立，而容易失败。产业组合则不然。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职业的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斗争力就异常雄厚了。故我们组织工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但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各种职业的工人，则仍不妨沿用职业组合法以为着手之起点。又，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合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了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

办法：

(一) 凡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都应一律采用产业组合法去组织工会。

(二) 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不妨用职业组合。

(三) 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人，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

(四) 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

原载 1922 年 5 月 25 日上海《民国日报》

署名：邓重远

《民国日报》记者在该句后，原记有“第四项为公众临时动议议决，非原案本文”字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 邓中夏等的请愿书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为请愿事，窃劳动问题早已发生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沿至今日，百有余年，中经无数大政治家及政治学者苦心殚虑，日夕钻研，而卒未获一根本解决方法。惟欧美诸先进国积多数之经验，遂获莫大之教训，于是保工条例，律有明文，而从前贫苦无告之劳工，亦得渐与普通人民立于平等地位，而国运亦得赖以苟且粗安。最近如苏维埃俄罗斯，更完全由劳动者建设劳农政府，掌握政权，国内宪法，悉由劳动者手定，即此可知一国劳动者立于建国上重要地位，此乃世界自然进化公例，无容置疑者也。挽近我国工人，亦颇有觉悟，国内工业稍发达之区，所有工人纷纷结合团体，冀借群策群力，以改良自身地位，减轻自身痛苦，于理甚属正当。更有时因劳资问题不得已而出于同盟罢工，在正当防卫上立论，工人同盟罢工确是工人应有之权利，毫无可訾议。无如我国士夫素有贱视劳工恶习，而工人设立团体又因未有相当法律保护，故国内一般操政权者，对于工人得任意摧残，且对于工人设立团体及一切正当行为，尤为十分嫉视，所以近年来往往有因劳资问题而竟闹成劳资极不平等之举动者，是皆在于今日操政权者不知世界大势，昧于立国根本，遂以为工人易欺，

其余实甚，而曩昔立法者，亦囿于成见，未尝观察及此，此我国之劳工界所以依然痛苦呻吟，莫可申诉，诚可哀也。殊不知国内工人亦是中华民国人民一份子，律以凡属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旨，国内工人亦当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歧视。且以全国人民而论，工人实占最大多数，依据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原则，岂能舍弃工人而不顾。况立国基础，全凭国内生产者为之柱石，而消费者不与焉，此稍知近代政治社会经济诸状者，莫不异口同声，共畅斯旨，而工人在社会完全为生产者，在国内各阶级中用力最多，境遇最苦，而对于国家社会功绩又最巨。曩昔立法者，对于少数之特殊阶级及社会之消费而不生产者，则加意保护，而于占全国人民最大多数，且用力最多，境遇最苦，功绩又最巨之工人，则竟忍心摈斥，不齿诸齐氏之列，在国民应有权利义务上岂得谓平。故依以上种种立论，无论从何方面说来，今日劳工法案皆应有成立之必要，尤应规诸根本大法之内，俾一般操政权者以后不敢巧立名目，轻于尝试，或借特别法治安条例等，以售其压制工人之伎俩，斯诚目前制宪最急之务也。但今日之论者，动谓我国法律未尝歧视工人，何必无病而呻吟。不知罢工骚扰有罪，明文规定于刑律，（暂行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袁氏治安条例，迄今尚未取消，（民国三年三月北京政府教令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所谓我国法律未尝歧视工人者，是直自欺欺人之语耳。然推原其故，由于国家根本大法尚未成立，而临时约法又无保护劳工明文，所以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两项，虽经国会在广州非常会议时议决取消，但此关于变更法律案，权限上当时已发生问题，效力上尤未能发生于全国，此益足以证明今日劳工法案应规诸根本大法之刻不容缓者也。方今国会重开，国

人希望急于制宪,而众议院常会议员李庆芳君已有保护劳工法案之提出,吴子玉氏亦有保工规条应付诸根本大法之主张,虽陈义各有不同,条文尤未易强合,但海内士夫渐有易贱视劳工为尊重劳动之趋向,不可谓非差强人意。同人等素从事于劳工运动,连年来亲睹国内劳工饱受暴力摧残之惨状,深知国内劳工无法律保护之痛苦,加以感受操政权者之巧于舞文玩法,益觉得劳工法案规诸宪法之重要,用是为全国劳工请命计,为国家立法前途计,理合拟具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依法请愿

贵院尽量采纳通过,规诸宪法,并转暂行新刑律之第二百二十四条罢工骚扰罪及民国三年北京政府教令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正式提出议决取消,以甦工人之困,全国劳工幸甚。为此依法请愿贵议院提出大会议决施行。此上
众议院议长

计开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统祈

钧鉴

劳动法案大纲

- (一)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
- (二)承认劳动者之同盟罢工权。
- (三)承认劳动者之团体的契约缔结权。
- (四)承认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
- (五)日工不得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过六小时,每星期连续四十二小时休息。
- (六)十八岁以下的青年男女工人及吃力的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 (七)禁止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如有特别情形,须得工会同

意才得增加工作时间。

(八)农人的工作时间虽可超过八小时,但所超过之工作时间的工值须按照八小时制的基础计算。

(九)须以法律担保一般不掠夺别人劳动之农人的农产品价格,此项价格由农人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十)吃力的工作及有碍卫生的工作,对于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绝对禁止,超过法定时间绝对禁止女工及十八岁以下之男工作夜工。

(十一)体力的女工产前产后各八星期休工,其他工作之女工产前产后各六星期休工,均照常领取工资。

(十二)禁止雇用十六岁以下之男女童工。

(十三)为保障工人适当以至低限度之工钱,国家须制定这种保障法律,当立此项法律时,须准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无论公私企业或机关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此项法律保障的至低限度。

(十四)各种工人由他们的产业组合或职业组合保障可选举代表参加政府经济机关,及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十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均须设立劳动检查局。

(十六)国家保障工人有完全参加国家所设劳动检查局之权。

(十七)一切保险事件须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有在政府的公共的私人的企业和机关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保险费完全由雇主和国家出之,受保险者决不分担。

(十八)各种工人和雇用人一年工作中有一月之休息,半年中有两星期之休息,并有领薪之权。

(十九)国家须以法律保证男女工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请愿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林育南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袁大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谭平山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王尽美

介绍人 :童启曾 杜凯元 张秉文 赵金堂 岳云韬

孙镜清 李肇甫 刘 纬 萧湘 廖希贤

蒲伯英 吕 复 骆继汉 姚桐豫 周继濛

万 钧 彭学浚 孙 钟 邓毓怡 汤松年

张国浚 胡鄂公

1922年7月

劳动界招待议员开会时的讲话

(一九二二年九月)

(一)

今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各地工会代表为劳动立法事招待议员先生,承议员先生惠然肯来,我们十分感谢,而且很荣幸的。我们为什么要招待议员先生呢?诚恳的来说:中国劳动阶级法律上向来是没有保障的,约法上未订,天坛宪法上也未定,我们认为极不满意。幸此次议员诸君来京重新制宪,十分可庆,但是我们必定要要求为劳工规定权利。这个有种种理由。简单来说:中国既为民国,所谓实行全民政治,当然全国人皆有权利。即退一步讲,根据“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劳动阶级实占人民的绝对多数,如只少数人得利益,实在不平之极。而且,劳工是社会的柱石,没有劳工,也就没有社会了。这还是就理论上讲。即按人情来说,劳工每天作工卖力气而视同牛马,未免太不平等了。没有劳动阶级,便没有社会,世界全由劳工造成,利益当然要定。况且工人每天作工十余小时,困苦不堪,工资甚少,养己且不足,甚且家困以至于死,此就更事实上看。于正义人道方面,对于规定工人权利不能说不是应当的。不论说理说情,都应该为我们规定劳动立法。但是也许有人以为照劳动法所定,八小时工作,在工业未发达的中国,未免反使实业不能发达,

而且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之中国无聊代表,且曾言中国不适宜于八小时工作,实在不对。因为时间减少,未必出产减少,且依照欧美往事记之,反见产品精良,因人在疲倦时候作工,总是作不好的。又有人以为工人利益太多,资本家自然损失太大,于是他们不愿拿钱出来办实业,岂不更为害工人,实在也错了。资本家有钱,决不愿不使之生利,更不能由工人利益稍多于他们,只有些须损失,而不取生利,欧美便是前例。但在此我们希望应有极大觉悟,就是我们中国在此国际资本主义掠夺与压迫之下,想照欧美资本家那样发达,是不可能的。所以不但是劳工之苦,实亦中国资本家之苦。故中国资产阶级,亟应觉悟非与本国劳动阶级携手,即不能使中国产业发达,因非如此不能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否则便是自杀政策,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与劳动阶级携手,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要求,在各方面来看,都是应该的。诸君七八年来,为国奔走,饱经忧患,我们希望诸君不愧为人民代表,把中国绝对多数人民的幸福,切实制定一下。我们的请愿书,想早已在洞鉴之中,我们要求的要点是:第一要求工人集会言论的自由,因各界都有会社,而独于工会禁止,实为不平。第二要有同盟罢工权,这也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年来国务院、参谋部、教职员——均有罢工,而独于工人罢工,视为骚扰罪,殊非合理。第三要有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因工人个人与资本家结的契约多吃亏。第四要求国际联合权,资本家可以有国际联盟,我们就不可以吗?第五要求八小时工作,此在欧美已通行,且有六小时者,我们此举,并不过分。第六要求增加工资,因为物价贵了,不如此不能维持生活了。第七要改良待遇,如卫生法、工厂法均须规定。第八要有

参加工厂管理事务之权。第九工人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大体如此,我们希望并相信议员先生,肯本良心的主张,达到我们的期望。并乞赐教。

(二)

最末主席希望议员先生们真诚的援助我们,不要欺骗我们。我们已觉醒了,知道何好何坏了。赞助的我们知道,当感谢;不赞助我们或欺骗我们的,我们也知道,当有相当方法对待。而且还有一层:劳动法即能成立,可否实行,实不敢言,约法便是前例。为其阻碍的,便是军阀,我们打倒军阀,我们费千辛万苦幸而成功的劳动法,必为军阀不费气力的推倒。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做外资的奴隶,军阀,依为护符,以致内乱迭次延长,至无已时,所以国际的资本主义不打倒,军阀也难打倒,而我们劳动立法上的幸福,也实难享受。最后主席请大家起来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劳动万岁”!

原载 1922 年 9 月 4 日《晨报》

记者记录稿

我们反对劳工司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好呀，“七零八落”、“东倒西歪”的北京政府又要添设一个吃饭机关了。吃饭机关他们这几年来添的倒不少，什么“经济调查会”，什么“统一善后讨论会”，什么“财政讨论委员会”，……一口气都数不尽，无非是安置这些官僚和他们的家奴门客。咳，中国弄到今日的民穷财尽，就是这一般烂官僚谋夸饭碗的结果啦。

他们现在更妙想天开了，他们想在我们劳工身上设立一个什么劳工司。哼！怪哉怪哉！你们要找饭，千万的方法可以做，为什么想到劳工身上来啦？

他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他们的饭碗，并不为了我们的利益。请看他们设劳工司之目的所列举的三端：“（一）为提高工人人格、道德、生计上之程度；（二）为调解工资纷争之机关；（三）则与资本家以保护”。哼！我们知道我们工人的人格、道德、生计上的程度之提高，是要我们自己来做呀，靠着你们吸吮劳工的血汗的这一般官僚。我们知道我们工人和资本家发生纷争的时候，是要我们自己来直接交涉直接解决呀，用不着你们这一般为资本家昧心钱所豢养所购买的官僚。哈哈！第三项，他们竟老老实实的说“与资本家以保护”。哈哈！这倒是你们要设劳工司的真心呵。既如是，何必硬叫“劳工司”，何不改叫“资本家司”到为名实相副呢。哈哈！该杀的奴才！我们须要反对你们到底！

原载《工人周刊》第 57 期

署名：中夏

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说来真是可悲、可愤、可痛、可耻哟。北京政治自从辛亥革命以还，差不多没有清明之一日。这期间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只要我们国民不患健忘，没有不记着的。谁知“一蟹不如一蟹”，到最近更是弄得不象样儿了。今请说一个大概。

奉直战争以后，直系军阀势力更是突飞猛进。在中国罪恶上占有位置的一般无耻政客，群聚北京，打算继续他们“谤张为幻”的工作。谁知不幸碰着那孚威将军偏不做美，无处不抑制他们，妨害他们，所以便激动了他们的怒。他们于是乃异想天开，施其纵横捭阖的手腕，将保曹、苏齐、津王、益友社、政学系、全民社、新民社、交通系以及帝制罪魁，复辟余孽，结下了一个反动势力的联立战线。他们共同的目的，不消说是“争政攘利”四个大字。他们进行方法的原则，便是将曹大军阀拥进三海，做“终身总统”或“传世皇帝”。他们便在曹大军阀势力之下，垄断政权，宰制人民，可以为所欲为，毫无忌惮。他们进行的步骤：第一步是推倒王宠惠内阁，建立自己御用的内阁；第二步是进行“最高问题”。现在他们第一步算是成功了，正在聚精会神做第二步，红罗厂是交易场，内务总长是经纪人，议长是卖主，议员是猪仔，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贿，耳目所及，报章所及，不是

令人心惊,便是令人发指。不过在这进行“最高问题”之中,最为他们所认为劲敌的,一个是革命先觉的孙中山;一个是比较进步的吴佩孚(因为他颇有爱国与反抗外力的思想);一个便是我们这些新派人物。他们对付孙吴的办法,首先便是破坏孙吴之联合,再一面援闽助陈(炯明)以扼孙,一面通奉联交以制吴。他们对付我们的办法,首先便是扰乱北京教育界,自军阀走狗彭允彝登台之后,更换法专校长,更换农专校长,是其见端。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北京各学校是要一网打尽,完全造成反动派“清一色”的势力。他们不这样,便恐我们这些真心爱国的教育界,为他们垄断政权宰制人民的障碍,他们不能不认为是眼中钉,不能不处心积虑把眼中钉拔去呀!总括说起来,现在北方的政治,是反动势力的政治,即是军阀政治。

在这样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下,我们那一个可以幸免。蔡先生之走,表面上是为不屑居于破坏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彭允彝之下而走,实际上确是为了北京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压迫而不得不走。请看他的辞职书中,一则曰:“数月以来,……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再则曰:“痛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三则曰:“然国家大政所关……亦不敢放弃天职,漠然坐视”。可知蔡先生完全是北京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逼走的。况且蔡先生未走之先,即有他的朋友把反动势力那一方面如何如何作免蔡的进行,不断的告知蔡先生。蔡先生在这种逼迫之下,安得而不走?即令不是彭允彝,或是温世霖,或是杨度……蔡先生终归是站脚不住的。推广来说,所有北京教育界,终归都是站脚不住的,除非降伏在他们脚跟底下。由此看来,反动

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一日存在,教育界即一日要被摧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得一个结论,断言此次运动的真因,并不单纯是一个校长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教育总长问题,乃是一个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压迫我们的问题。我们如再不放大眼光,看清这一点,便是自杀。教育界诸君呀!学生界诸君呀!“五四运动”你们做下了空前的光荣的成绩,可是你们那时叫出“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错误口号(虽说是那时别有苦衷),现在请你们莫要一错再错,又叫出“只问教育,不问政治”的口号呵!我们应该要叫“要问政治,不忘教育”的口号呵!全国工商各界的同胞呀,你们要知道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不仅是北京教育界被蹂躏,被摧杀,他们既有胆子这般对待北京教育界,他们亦会有胆子这般对待你们呵!你们要和“五四运动”时代一样有休戚相关的精神,与北京教育界一致行动,大家起来推翻这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呵!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国民,便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呵!

由上边看来,我们此次运动,不是那一校的运动,也不是北京一隅的运动,实在是全国国民共同的运动。因为受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压迫,是全国国民共同一律的。所以我向国人尤其是北京教职员和学生建议,我们此次运动的目标,不要特别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别注重“驱彭”。因为这些都是枝节问

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清朝举人,曾留学日本。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一九一四年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议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一九二九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题,只要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根本推翻,这两个小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况且推翻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是全国国民同情的,若“挽蔡”只北大一校同情,别校便难得同情了;“驱彭”只北京一隅(且只限于教育界)同情,各省便难得同情了。我们如果不将全国国民同情的政治问题,做我们此次运动的目标,而将北大一校同情的“挽蔡”问题,及北京一隅同情的“驱彭”问题,做我们此次运动的目标,便是自杀!便是自杀!

是的,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是我们所要决心去根本推翻他的。不过要推翻他,不是说句“浪漫式”的空话,可能济事,所以我们要寻着他们的要害在什么地方,我们便在这要害上,施以猛烈的无情的攻击和打翻,俗语所谓“打蛇要打七寸”,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所谓“法统重光”以后的国会,便是他们要害所在。因为现在的国会,实质上已不是人民代表的国会,乃是军阀收买的国会,是完全进行“最高问题”的国会,是他们假借以强奸国民的武器。我们便要把他们这副武器打碎,便可给他们一个“致命伤”。所以我们的目的物,就是“否认国会”。国会既给国民的意志否认了,如果他们依然悍然不顾,进行“最高问题”,则由国民否认的国会,选举的总统,是非法的总统。万一军阀挺身而出拥护,这国民否认的国会,那就更妙了。因为我们平常高叫打倒军阀,还是不直接的,这样一来,便可使军阀与国民两个壁垒,四目相向,短兵相接了。所以否认国会,是一个很切实的、具体的推翻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的工作。

代议政治在今日已成“强弩之末”,这是另一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不去管他。现在我们就事而论事罢。我们中国的国民真老实呵!现在的国会根本上就是非法,我们却一声不响的默认他

了。十年前召集的国会,论理不能代表今日之国民,我们也一声不响的默认他了。这莫非是我们国民创痛钜深,厌乱心殷,以为只要国会能有根本觉悟,图功赎罪,将全国所希望的宪法制定出来,或可纳万乱于法轨之中。现在呵!这个所谓“法统重光”以后的国会,在昔时固然是做下许多滔天的罪恶,令我们痛心疾首,谁知他们的牛性依然未改,野心仍然勃炽,“所有最卑污的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没有一样不躬行实践的作了。“廉耻道丧”可谓极矣。我们姑不光举“光园拜寿”这一类关于道德问题的事实,做他们罪恶的证据。我们且提出一件关于刑法上的受贿案,和一件关于约法上的违宪案来说说罢。

第一,受贿——买卖总统

国会受贿原来不止一次了,买卖参议院议长选举票是一次,买卖张内阁总理及阁员同意票又是一次,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行贿受贿,这是何等吓人听闻的事。谁知他们“习与性成”,既无国民的抨击,又无检厅的起诉,所以无法无天连总统也买卖起来了。请看一月十六日《京报》高凌蔚谈话一则所载:

“(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号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致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众院副议长张伯烈之字)之新报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

银钱谢绝 ,几为亚农所恼 ,何厚之有 ?”

除了此段记载之外 ,国会议员黄攻素在国会提出一个质询书说 :

“自本月起 ,每议员支车马费二百元 ,限制投票价不出五千元 ,此种买卖 ,专由高五接洽……以堂堂阁员 ,竟明目张胆为之 ,作行贿经理也 ,成何政象 ?”

这种行贿受贿的事实 ,如果是在欧美日本 ,由报章披露出来 ,检厅便可起诉 ,将一干人犯拘押起来了。由此可证明在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之下 ,行贿受贿是可以肆无忌惮的 ;由此可证明现在的国会完全是军阀所收买而进行最高问题的。试问我们国民还要他何用 ? 我们国民还不推翻他要待何时 ?

第二 ,违宪——打请愿团

毫无人格毫无学识的军阀走狗彭允彝来长教育 ,这是谁也不能忍受的 ,何况乎他是禀承军阀意旨安心来破坏教育界 ,学生向国会请愿勿予通过 ,这是何等合理的事。乃国会不特不予受理 ,而且嗾使军阀殴打学生 ,受重伤者五十余人 ,受微伤者三百余人 ,各报均有记载 ,我们且不具引 ,只引国会议员李素“致同人书”的话作证 :

“象坊桥畔 ,学生请愿……乃警士横加干涉 ,学子倍受赶击 ,刀砍杠伤 ,如捕盗犯 ,人孰无情 ,何能堪此 !”

人民请愿的权利 ,载在约法 ,学生亦人民 ,岂有不准其请愿之理 ? 今日学生请愿被打 ,他日商人工人请愿亦可被打。在世界各国绝没有看见过国会打请愿团的事 ,只有中国却是“破天荒”开下一个倡例。国会的职责 ,是保障人民的 ,谁知我们国的国会却是残杀人民的。试问我们国民还要他何用 ? 我们国民还不推

翻他要待何时？

国民呵！国会“助桀为虐”的罪恶，已是“罄竹难书”了，我们还有容忍之余地吗？我们还可不斩钉截铁的推翻他吗？

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推翻国会呢？这一层却不能不让我们仔细思考。

有人主张用炸弹手枪扑杀议员，这个方法未尝不可用，只是在意义上稍微差一点，因为不能具足表示全体国民的公意。

有人主张放火烧毁两院，这个方法亦未尝不可用，只是烧毁两间房子，他们还是可以另觅两间，于国会根本上仍不发生动摇。

有人主张电请各省召还议员，这却在事实上是不可能，不过可废一些电报费罢了。

有人主张劝告各议员激发天良，相率辞职，以谢国人，这更可令人牙齿笑脱了，这些军阀收买的猪仔们还有良心吗？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然则上述各种方法，都不能与国会根本上施以打击，到底怎样才好呢？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虑，与同学长时间的讨论，定出两条方法。我相信这两条方法，在客观上有绝对可能性，决不是主观上的浪漫思想，今请条举如后：

(一)以各省民众的国民大会否认国会

现在的国会已是为全国所深恶痛绝，否认国会差不多是没有那一个不赞成的，除掉国会议员（或许有少数明白议员亦赞成）和反动军阀及反动政客。我们派出的代表已经散布各省，联络各省，召集各省国民大会，一致在大会中当场表决否认北京国会，通电中外。国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民的身上，各省人民既不

承认他为代表,他还代表谁呢?如经过各省国民大会否认国会的方式,即令他们有军阀豢养与保障,亦成为非法的国会,尽管尸居余气存留北京,与国会人民丝毫无关。他们所议决各案固然无效了,由贿赂选出的总统亦是无效了。

(二)以全国代表的国民会议代行国会职权

由各省民众的国民大会否认国会,并在国民大会中表决一项,召集全国各职业团体遣派正式代表组织国民会议。其派出代表的标准,与召集的地点等等,另行商定,此地暂可不谈。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皆在国民会议中解决。印度、土耳其已有前例,可备参考。

中国人民有麻木性是毋庸讳言的,不过最近一两年以来,却是精神焕发起来了。请举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两大民众便可知道:(一)商人。从前的商人总被军阀那样摧残,那样压迫,然而他们总是墨守“在商言商”的古训。可是他们现在觉悟了,觉悟要干涉政治了。去年在汉口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便决议组织一个政治委员会,推蒋梦麟、聂云台、黄炎培、余日章为委员,此一例。最近上海商会又组织一个“裁兵理财制宪会”,闻已准备实力,以与军阀搏战。此又一例。从前商人的报章上,绝口不谈政治,现在谈了,而且热烈的有主张的谈了,此又一例。(二)工人,工人在两年之内,已组织了三十余万人。在两年中罢工勃兴,总说向经济的奋斗比较的多。然而在中国这种军阀政治所属之下,工人们感受痛苦实巨,向政治的奋斗,亦已趋向激烈。由此看来,中国政治改造前途是极有希望的呵!智识阶级在本身是没有势力,然而如果相率加入商人工人的民众队伍去,却可增大无限的势力。教职员及学生诸君呵!工界诸君呵!商界诸君呵!民

主革命派诸君呵！中国目前的大敌，便是北方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我们应该大家振作精神联合起来打倒他呵！我们先要做攻击军阀的武器，所以我们要先做“否认国会”一步工作，再议其余呵！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国人呵！起！起！起！

原载 1923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

《北大学生新闻》第 9、10 号

署名：邓仲澥

讨论本团以后进行的方针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

存统同志：

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之主力军，其重要不特不减于共产党，实有过之。弟有意见数项，简约写在下面：

(一)政策须与共产党绝对一致。

(二)组织须保持独立。——在前此一年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糟，无庸讳言。糟之原因，固然办理者办理未善，应负相当责任，然组织未完全独立，亦其一大原因。从前同志皆认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加入共产党第一道门槛，几乎是共产党附设的预备学校，凡好一点的分子，皆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挑选加入共产党去矣，所余者多未成熟之分子耳。以未成熟之分子而欲使团势扩张与发达，宁非梦呓。况且一个团体必有一种威严，如认为共产党附设的预备学校，威严何存？无怪乎加入者鞅鞅缺望，工作不力。故弟主张前此这种误谬主张应力矫正，凡年长者直接加入共产党，年少者直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非俟年龄逾限或有特种原因，不得挑入共产党。又凡已加入共产党者，势不能受两方之指挥，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准予除名，必如此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分子方可统计也。换言之,必如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方固定,组织方独立也。但弟此地之所谓独立,乃指组织,非指政策。并且共产党乃兄,社会主义青年团乃弟,两者关系须异常亲密一贯,决不可因误会独立之义,而断决亲密关系也。闻兄在京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是何异封建督军向中央政府宣告独立一样,谬误荒唐,莫此为甚,望兄力改之。高明以为如何?

- (三)须绝对注重青年工人运动,相对的注重青年学生运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主张与工作,都较共产党为左,而中国乃适与相反,此何故哉?因无多数青年工人在内故也。学生因无经济与阶级的背景,故利害观念不一致;而且所受教育,皆资产阶级的教育,其观念为“德谟克拉西”主义,为“自由主义”,为“安那其主义”;其心理为“发展个性”,为“反对束缚”,为“好名”,为“趣味”,为“怯懦”,为“怕死”,五光十色,无样不备,这些皆与吾人主义与革命精神根本冲突,无怪共产党的主张原不算左,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犹望尘莫及也。若青年工人则无青年学生之病,故弟有此绝对的与相对的之主张也。

(四)须极力注重教育与训练。

- (五)须注重体育与娱乐——关于体育须注重,理由甚明,无庸絮说。至娱乐亦为必要,青年人当此身体发育之际,如无娱乐,往往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枯燥无味的结果,不是发神经病,便是自暴甚至自杀。墨子以自苦为

极主义 ,其道犬彀(音胡) ,超人或可为之 ,非所语于一般群众也。

(六)须组织一健全有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以上六端 ,不过稍引其绪 ,特写出供 兄等之采择。

弟中夏白六月三日

原载《先驱》第 22 号

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国新式工业下的劳动者,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即令这一百万劳动者通通能够组织在一个权力集中的统御之下,恐怕在四万万当中还是一个小小的数目罢,何况这些劳动者或为了宗法思想的浸润与遗传,有许多尚无阶级的意识与觉悟;或为了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摧残,有许多尚无斗争的胆力与勇气;所以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单靠一个劳动阶级孤军苦战恐难济事。

但是中国目前受军阀与帝国主义两种惨酷之压迫,急切需要一个革命。我们在目前这个革命程途中,应该怎样办呢?固然一面仍集注精力继续为劳动运动筑下一个坚固不拔的深厚基础,然而又一面却不能不分出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兵士运动、甚至于商人运动为革命战线上添加几个有力的援军。

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谁也承认还是农业。新式工业不过在几个通商口岸与铁路矿山及其附近有些罢了。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那有希望。所以我们要积极分出精力来做农民运动,是不该有疑问的,是必须充分了解的。

曾记得前年远东民族大会远东部长萨法洛夫同志说：“中国农民是被外国资本家，日本官吏，中国督军和地方上放债人抢掠剥削。现在第一件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班群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中国柱子，若不唤醒这般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

他接着又说：

“假如不唤醒农民群众，不告诉他替代这些毁坏国家的并为未来中国人民掘着坟墓的苛政重税而设立一种一律的税则并且设立被人民选出和为平民负责政府，单是几个劳动小团体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急进分子是成不得什么事的。”

他又说：

“劳动阶级决不可自己与中国农民阶级隔离。他非去和他们携手，给他们光明，教育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不可。”（以上见《向导》第九、十两期）

萨法洛夫同志这一席话是说得何等恳切的呵！有人疑心农民的经济地位模糊不清，不象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明，故不容易唤醒起来，而且农民太散漫了，不容易组织起来。我说不然。中国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农民比前更是痛苦不堪，他们把最后所有物送给村上的盘剥者，由这盘剥者把他们的血汗送给外国资本家。于是失掉他们经济的根本，只得过一种穷苦无告的生活，成为一种无产阶级，成为一种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不能改良他们的贫苦人们。又加上连年水旱兵三灾并进，更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他们在此时不是流为盗匪，便是投身革命。本团是不可不特别注意的。

现举两桩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农民并不是不可以唤醒与组

织。

第一桩事实，是广东东江之农民联合会。兹摘录香港华字日报如下：“去年八月海丰组织农会，后来推及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海丰，陆丰，惠来三县全县农民加入农会，其余三县亦大半加入。人数达十余万人。……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者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面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今年‘五一’，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者万余人，手持小旗，呼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多，组织亦日渐完备。……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飓风大水为灾，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空前之巨灾。该会召集大会议决减租问题，输纳三成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田主勾结陈军围攻农会，捕去职员二十五人，并分兵四出布哨，如临大敌。现尚在相持中。”云。

第二桩事实，是湖南衡山白果之岳北农会。兹摘录湘报如下：“农民因水旱兵灾齐来，而地主官府及劣绅与衡山之皇族贵族（按指赵恒惕族戚）均尽力压迫自耕农，而佃农及雇工更是忍饥挨饿，苦楚不堪；再加上水口山工人多半是此地农人，颇受工潮影响，于是此地农民团体还自动的发起矣。闻筹备之时，只数百家加入，现已开成立大会，到者三千余人，于今加入者共六千余家，人数在毛数上已达四万余人以上。现做平余及阻禁谷米棉花下河出境运动，有数十宣传员每天四乡演讲。……地主现见农会人多，极其恐慌，奔走破坏，……但无大碍，因农

民在两小时内立呼可有三千多壮丁到会。……”云。

由此两桩事看来,更证以前年浙江萧山农民,去年江西萍乡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农民,山东青岛盐田农民之种种剧烈的减租抗税运动,可知中国农民都已动了,只盼我们同志投身其中去做有计划宣传与组织运动,不愁不成功为我们革命的一个有力的军队。所以我们盼望有可能做农民运动的地方,须赶快的特设一个“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应目前迫切的需要。

原载《团刊》第2号

署名:中夏

解 惑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有人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过激派的口号，不是主张国民革命的人应当说的。我说：朋友！你错了。过激派的口号是“推翻资本制度”和“劳农专政”；“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才真是主张国民革命的人所应说的。现在从事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他的党纲和宣言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项下所注释的，不便是这个意思么？

偏有一位国民党员说：反对帝国主义便是反对国民党，因为现在国民党尚欲与英、美、日亲善。他甚至于说：反对军阀亦是反对国民党，因为现在国民党正与皖段、奉张、浙卢携手。广州政府为了或种原因要与英、美、日亲善，要与段、张、卢携手，若这只是一时采用的政略，我们是可以原谅的。倘为这处在两个魔鬼惨酷压迫之下的国民，居然忘了党纲宣言中间所包含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我真不知他怎样称为一个国民党了。

原载《中国青年》第3期

署名：中夏

努力周刊的功罪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美国博士胡适先生等所主办的努力周刊停刊了(见十月二十四日民国日报专电)。我们此时正不必苛责胡先生等并未实践“干干干”的宣言,我们也不疑心他们是投机派:我们还该哀矜勿喜认识在现在反动势力登峰造极的政局下,凡是国民皆无言论出版之自由权,这是多么可羞愤的事呵!

努力周刊出世后,也曾博得一部分人的叫好,同时又博得一部分人的痛骂,平心的说,它最近几月把张君劢梁漱溟的东方混乱思想打倒,究竟值得我们表同情。可是它不知分析实际的政治(虽说胡先生曾充过什么政治研究会会长,和得过什么政治论文的奖章),最可惜的它公然与美国花了三千万银子雇派的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一鼻孔出气,武断的说“中国现在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公然认定封建军阀局势之下有实现好政治的可能,高唱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空漠无涯的什么“好政府主义”;公然唱出破坏民主革命的论调,请孙中山下野,并恭维陈炯明驱孙中山是一种革命行为。这样言伪而辨,未尝不麻醉一部分人的神经,紊淆一部分人的观听。其所造罪恶并不在梁启超章行严之下。

聪明的胡先生 这次得的教训总算够了 ,胡先生亦有一点悔
意么 ?

原载《中国青年》第 3 期

署名 :中夏

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

——工人、农民、兵士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中国今天内外交攻的反动政治势力,算是登峰而造极了,社会心理趋向革命,企图革命,算是热烈而且普遍了,论理,瓜已熟,蒂该落,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陷于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境地呢?青年们!我们想想!

打倒满清的“辛亥革命”,是我们青年干的;打卖国贼的“五四运动”,也是我们青年干的,当时我们青年尚无全省和全国的大组织,现在我们总算有了(组织是否强固有力,乃另一问题。)用这种大组织的力量推翻现在反动的政治势力,论理,摧枯拉朽,毫不费力,为什么我们青年也和各界一样陷于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境地呢?青年们,我们想想。

据我看,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的工夫。

关于中国这三个群众的实际状况,我拟分期在本刊介绍,现在先说这三个群众何以为革命主力的原因。

与其空谈,不如实证,我今只举出一个例子来。

俄国一九一七的十一月革命,不用说是这三个群众的力量了。我们且说同年数月前的三月革命。

俄国三月的革命,谁也知道是始于资产阶级要求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二月二十七日,三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对于政府行了有抗议意义的总罢工,到了三月行了要求解放政治犯人的一个大示威运动,接连着到处的工人农民都暴动起来了。俄国遂陷于紊乱危急的形势,政府于是下了戒严令,由战线上把大队兵士调了回来,指挥军警把机关枪架满市街中各要所的屋脊上。三月十一这一天,就用机关枪向民众开炮。谁知指挥官命令开炮的时候,兵士反把指挥官枪毙,加入民众运动,许多联队都干起来了。民众于是得占领兵器厂,占领秘密警察本部,……政府由此推倒。他们这时组织了劳农会。

资产阶级对于要求立宪政治是赞成的,即至军队加入民众作乱,革命已成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开始改变态度了;如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和代表大地主的“十月党”,他们还愿意维持帝制,主张“米哈尔大公”即位。在革命以前,“米留可夫”说:“若为胜利而必须革命,我们宁可不要胜利,”即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一班。但是“劳农会”此时却断然的反对帝政势不反顾,他们也无可如何。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使我们坚信而无丝毫怀疑。此外如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独立运动,都没有不靠这三个群众为主力的。此类例证,举不胜举。为什么这三个群众革命的精神格外富足格外坚决呢?自然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

格外比人厉害,谚所谓“狗急跳墙,人急反噬”,他们不能不断然的趋向而且硬干起来。资产阶级虽能革命,然而他们总不免为了身家,瞻顾却虑,如印度资产阶级不论如何受英国政府的压迫和摧残,他们总想和英国政府妥协,调和,以希冀其产业经营之安稳和万分之一的进步。若这三个群众从事革命,他们所损失的,真是除掉锁链一条外,别无什么。所以他们易于坚决些。

青年们!俄国这三个群众所以能够革命,实因革命前俄国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群众间去;实因青年学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识一套一套送予这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所以俄国革命便成功了。我们处在这内外交攻的反动政局之下,我们所受的压迫和苦痛已是无以复加了,我们有没有人心?我们有没有民气?我们如不甘为曹家狗,亡国奴,我们便该迅速的从事这三个革命主力的群众运动。我们便应该大家转相告语着,成群结队的,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青年们!去罢!

原载《中国青年》第8期

署名:中夏

论工人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问了。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问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

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

目前中国因为产业还未发达,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在数量上看,实在是四万万全人口中的少数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比方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和

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 ;开滦一罢工 ,可以使铁路轮船及用户的煤炭蹶竭 ,洋船都要鳞次栉比的停在秦皇岛 ,开不出渤海口去 ;码头工人一罢工 ,可以使洋货不能登岸 ;市政工人一罢工 ,可以使全埠扰乱 ,这是何等伟大的势力呵 !所以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轻视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虽无力发展实业 ,外国的资产阶级终会挟其金钱武力来作越俎代庖的事 ,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 ,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呢。故我们这些真诚做实际活动的革命青年 ,除做别种群众运动外 ,尤应特别注重工人运动才是呵。

中国的工人运动 ,原是最近三年的事 ,可是在这三年之中 ,工人却做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光荣事业来。如罢工 ,从香港海员罢工起 ,到京汉路工罢工止 ,其间差不多没有那一处那一路那一矿那一厂不罢工 ,固然罢工之中不少失败 ,然而胜利的总占多数。如组织 ,除各业小规模“工会”“工人俱乐部”而外 ,关于总联合的大组织 ,海员有“中华海员联合总会” ;铁路京汉、津浦、京奉、京绥、粤汉、正太、陇海、都有总工会 ,而且共同企图“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 ,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汉冶萍三处联合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 ;湖南、湖北、广东都有“全省工团联合会” 。固然组织有些不免幼稚或涣散 ,然而在中国民族向来缺乏组织性的当中 ,总算比任何群众团结得结实而热烈 ,总算是矮子当中的长子。这是何等不可轻侮而可宝贵的革命势力呵 !

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 ,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 ,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总而言之 ,不论革命的政策为了应付时局的必要而要如何变更 ,然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

可变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势力犹不注全力使之更强固，更发展，而漫然高唱什么样式的革命，终归是建屋于沙土之上，恐怕墙壁未立，屋瓦未覆，已是歪歪斜斜的坍塌了。

固然工人运动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有时进攻，有时保守：如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罢工止，是进攻时期，从京汉罢工失败以后，是保守时期。但是保守是固守阵垒，仍不忘厉兵秣马，静以待时，若阵垒也不固守了，厉兵秣马的工作也抛却了，象这样，不是保守，乃是销灭。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我们固应分队到各种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的群众我们不可轻忽了呵！

原载《中国青年》第9期

署名：中夏

中国工人状况及 我们运动之方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期我的《论工人运动》一文里，已把工人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约略说了。但是中国的工人状况是怎样呢？我想青年们一定要急于知道，所以我接着为此文；不过为篇幅所限，也只能说个大概罢了。

要明白中国的工人状况，先要明白中国的产业状况。我们分段略述于下：

(一)江苏区—在中国，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要以此区首屈一指。此区除上海之浦东、杨树浦、吴淞外，尚有南通、无锡、苏州等处。此区以纺织为主要工业，烟草次之，余如铁工、电气、火柴、玻璃、化学制造、印刷，……又次之。以上各业，大半为英、美、日本和中国的资本家所办。此外就是官办的兵工厂、造币厂、造船厂、以及电灯、电话、电车、自来水各公司了。

(二)武汉区—此区以铁工为主要工业，纺织次之，其他工业亦有。湖北大冶县之铁，不仅是中国许多大工业，惟他是赖，就是日本也要靠他。汉阳的钢铁厂是中国唯一的大铁厂。纺织工厂除武昌官办之四局外，尚有十余家。汉阳的兵工厂规模亦大。扬子机器厂，可以自造轮船。

(三)津榆区—此区从天津起至山海关止,皆包括在内。以煤为主要的工业,纺织次之。开滦煤矿,包唐山、林西、赵各庄、马家沟、秦皇岛是中国有名的大煤矿。天津纺织厂约有七八家,均为官僚资本所办。唐山尚有洋灰窑公司,大沽尚有造船厂。

(四)其他各地—都只有零星的新式工业,而且是矿山居多。如山东之淄川、博山、峰县;山西之阳泉;河南之六河沟;湖南之水口山;江西之安源;奉天之本溪湖、抚顺:都有极大的煤厂。至于广州,以及沿长江一带各口岸,虽有工厂,并不多,故不能各划分为大工业区。

(五)交通—交通事业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凭借。可是中国的交通事业却不是“发展产业”,不过是运输洋货罢了,可叹!交通约分为二:(1)铁路。铁路已经筑成的,有京汉、京奉、津浦、京绥、陇海、沪宁、胶济。沪杭甬(只沪杭竣工,南段只成宁绍一小段)。粤汉(南北各成一段,南为广韶间,北为武株间)。此外短路尚有直晋之正太,河南之道济,江西之南浔,湘赣之株萍,广东之广九潮汕。余如南满、滇越则为外人所筑。(2)轮船。海运由上海南至香港,北至天津、旅顺,东至日本,东北至海参崴。江运由上海至长江上游之重庆、叙府、嘉定,鄂湘川赣皆有小火轮驶入内地。广东东西北江亦可行轮。天津至道口镇及东三省不冰冻时亦有许多河流可以行轮。在此可附带提及的,便是各通商口岸有不少的码头搬运夫,和通都大邑有不少的人力车夫。

中国产业的大致状况,略如上述。我们可以进言工人状况。但是要叙述中国的工人状况,可以成功一部大书,亦只能说一个大略。

中国工人的苦况,可以从外国人赞美“中国人勤苦耐劳”声

中反衬出来。外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便是中国的“劳力廉售”。所以我们可不须列很详细的表,便可知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点钟以上;“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一生一世,见不着太阳。便可知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不过数角;“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一生一世,替人作牛马。就以铁路工人生活比较优裕,海员和市政工人(指电灯电话等)次之,纺织及其他工人又次之,矿工、码头工、人力车夫为最苦。工人知识,亦约略与生活程度相等。

中国工人运动原是近两年的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胜利时期—亦可称为进攻时期,从前年十二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起,至今年二月京汉大罢工止。(二)失败时期—亦可称为退守时期,京汉大罢工失败以后至现在。工人运动所表现的只有两事,一是罢工,一是组织工会。有先组织工会然后罢工的,如安源,长辛店等(大多数)。也有先罢工然后组织工会的,如上海邮差等(少数),也有一面组织工会一面罢工的,如开滦煤矿等(次多数)。罢工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有香港海员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辛店罢工,陇海罢工,汉阳铁厂罢工,粤汉北段罢工,安源路矿罢工,水口山罢工,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开滦罢工,京汉全路罢工,前八次罢工都胜利,后三次罢工却失败了。组织工会,已形成完全产业组合的,有“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筹备将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地方组合的,有“湖北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广东工会联合会”。其余差不多各厂,各路,都有“工会”“工人俱乐部”等,举不胜举了。不过尚有两种有力的工人,或者组织尚少,如矿工,只安源、水口山、焦作组织了;或者始终没有组织,

如各口岸的码头工人。这以上都是工人运动胜利时期的大概。失败时期是怎样呢？自从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被外国资本主压服以后，紧接着便是开滦煤矿罢工被天津警察所长杨以德和英国的印度兵压服，最后便是京汉全路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等和某国领事秘密协商压服了。京汉此次罢工失败，被杀死三十九人，被捕入狱二十四人，被开除失业数百人，还有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枪毙了。此次失败，军阀乘机将京汉全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一律封禁，于是影响所及，各地工会除粤湘外，皆由公开的而变为秘密的了。虽然秘密，尚有几处工人猛进，曾联合组织了总工会，月费照收，常会照开，只差悬挂一块牌子。我们在此可告慰青年们的，就是（1）工人复仇的心极切，精神仍团结凝固，一旦时局变动，可以大举；（2）工人受了这两年新式的教育与训练，知识与技能已经增高，现在并秘密的不断的买看出版物和社会主义者往还交谈，通讯质疑。由此看来，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应是极抱乐观，认为工人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一种势力。

现在我要把我对于此后工人运动的两项意见贡献在青年的面前了。

（1）我以为此后工人运动在反动政局没有推翻以前，不可放弃了公开的工会运动。公开的工会在有时虽不可能，而且即令可能，亦有“投降军阀”，或是“劳资妥协”，徒然引导工人走上堕落的道路的危险；然我们不提倡公开的工会运动，工人最容易被引到工团主义，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结果是工人运动于中国革命完全不相干涉。这却是一重危险。所以我主张应使公开的工会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不

断的输送小册子给他们看，保存并激励他们愤慨之气，团结之力，一旦有事，庶可乘时而起。

(2) 我以为工人种类繁多，固然只要是工人群众我们便当去活动，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精力亦有限，我们应就中择取几种有力量的，于革命事业有大帮助的工人群众去活动，较为经济。我以为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市政工人五种工人特别重要，应多下功夫。

亲爱的青年们！我上次说过：“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但是我现在再找足一语：“我们挑着不可放下呵”！

原载《中国青年》第 10 期

署名：中夏

论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认定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运动说过了,现在说农民运动。

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农业,那么,中国农民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不须统计,我们可毫不犹豫的断定了。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是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的吗?

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何时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国的革命,列宁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玛尔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这些为我们眼面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的相信和断定没有丝毫的错误。

就是中国向来带兵的,都愿意招募乡间的农民为兵。他们以为只有农民的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

比口岸上的无业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国藩从练乡团到平洪杨止，和他同辈幕僚说起，必殷殷以募农为兵可靠为嘱。现在高明一点的军阀，如冯玉祥等，亦颇知此义，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这利用农民为他们挣扎高官厚禄的工具，固然是惨无人道，违背公理，但是农民潜藏革命性和有种种特长，已是给他们证明无余了。我们为什么让农民给军阀召募去当炮灰？为什么不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奋斗？即此一端，可证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况且中国农民年来因为上文所述的种种环境的逼迫，发生了不少的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这样的知能与勇气，恐怕进步的工人也不能“专美”罢。这些事实，都是在全国报纸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当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来的。

由此可证明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象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

有人说，“中国农民不能和俄国农民相提并论，因为俄国有大地主，实行农奴制度，后来政府虽下令把农民解放了，实际上不过由大地主的锁链中，改套在政府的锁链里，仍然是得不到面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罢工，农民便全国风动附和着，烧杀

地主，捣乱官廨，无处不骚乱暴动了。若中国则不然，想要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的愤激和奋斗，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农民能革命是很难的”。是的，此话不差，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土耳其亦无农奴制度，却全国都跟着国民党首领基玛尔起来革命，把希腊军队驱渡君士但丁海峡，把英、法势力排出本国领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复成整个儿民族独立的国家？所以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况乎中国虽无农奴制度，然而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经够受了，并不比俄土农民所受苦痛的分量还轻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呵！至于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应取的方针，我下次再和诸君一谈罢。

原载《中国青年》第 11 期

署名：中夏

中国农民状况 及我们运动的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

在向来不曾重视统计的中国,要解答这一类的大问题,真是“戛戛乎其难矣”。所以国中出版界关于这一个问题,简直绝无仅有;就是仅有的不是“捕风捉影”,便是“隔靴搔痒”。只有《前锋》第一期陈独秀先生《中国农民问题》一篇文章,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读者可去参考,我这里不再重述了。我这里只说中国农民运动的状况。如这一层明白了,我便可微测农民觉悟程度如何,能力如何,及其在革命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如何。

中国农民运动在现时只可说是萌芽时期,当然不能象工人运动一样可有编成数十万言专书的资格。虽然,即此萌芽时期所表现几桩运动的事实,已可令我们惊异,已可证明农民革命的潜在性逐渐发泄出来,是各种群众中“崭露头角”新兴的伟大势力。

我上期《论农民运动》文里已说过萧山,萍乡,马家村,青岛,海丰,衡山六处的农民运动都是很剧烈的,可惜我手头只有海丰衡山两处较完备的材料,现在只能把这两处介绍一番,其余四处暂行从略。

先介绍海丰农民运动。

其实这里的农民运动,并不止海丰一县,其邻县的陆丰,惠来,普宁,紫金,归善五县都组织在一个农会里,几乎把广东东江各县都包括起来了;这里只提海丰,不过是求简明易记的意思。兹摘录香港《华字日报》如下:“去年八月海丰组织农会,后来推及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海丰,陆丰,惠来三县全县农民加入农会,其余三县亦大半加入。人数达十余万人。……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者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今年五一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者万余人,手持小旗,呼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飓风大水为灾,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空前之巨灾。该会召集大会议决减租问题,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田主勾结陈军围攻农会,捕去职员二十五人,并分兵四出布哨,如临大敌。现尚在相持中云。”

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运动呢?因为他们有完善巩固的组织。现在把他们的章程摘要如下:一、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二、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关。省大会为最高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分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三、会务——(一)防止‘田主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致

生产力日下。(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地主请减租额。(三)会员如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自行排解,以免讼累。(四)禁止会员吸鸦片赌博等事。(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教育事项。(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七)办理疏濬河流湖塘修筑堤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之借用。(十二)办理民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

再介绍衡山农民运动。

其实这里的农民运动,也不止衡山一县。因为这里的农民运动是发生在衡山岳北的白果。白果是衡山、衡阳、湘乡三县接壤的地方,周围数十余里的农民差不多都加入农会了。这里只提衡山,也不过是求简明易记的意思。兹把各报所载摘录于下:

湖南衡山岳北地方有名白果者,其地与湘乡、衡阳接壤。田亩大概为赵恒惕及其亲故所购置,逐渐形为大地主,其虐待农民甚酷。此地农民多往水口山矿坑作工,故工潮颇影响于此地,一般有觉悟的农民,遂奔走相告,进行组织农会。于本年旧历八月初六日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万人。成立后,四处讲演,将农民如何受大地主及劣绅种种苛待压迫不堪忍受的情状合盘托出,农民大受感动,加入农会者突增至十余万人之多。该会会员限于雇农,佃农,自耕农三种;但无上三项资格而得农民多人之介绍,认为确可为农民谋利益者,亦得酌量准其入会。该会组织,

每十家烟火，公举一十代表；百家公举一百代表，全区各十代表公举一总代表，由总代表联席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委员会，内互推委员长及财政，交际，调查，交通，宣传，教育委员各一人，为农会最高机关，一年改选一次。闻八月初六日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议决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议决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并发表宣言，兹抄录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甚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余！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拖夫，明日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并喊道：“不买洋货呵！”“打倒洋鬼子的走狗军阀和洋奴们呵！”“中华民国独立万岁呵！”“农友们联合起来万岁呵！”农会成立后，该地的大地主闻之大骇，于是贿请县知事及驻在军加以压迫。其时适谭军占衡山，农民乘机活跃，声势愈振。此时并做平籴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口等

事。原谷价每洋一元,买谷三斗,后通行四斗半,农民阻禁甚力。地主痛恨入骨,合集万金贿赂县署请以土匪办理农会。阴历九月初七夜,县署派兵包围农会,枪声隆隆,逮捕委员谢怀德等八人,其余银钱什物,劫掠一空。农民大愤,翌早聚集数万人,拟夺回逮捕诸人,军队开枪,击毙农民胡仁二,受伤者不计其数。随后又将该会首领刘东轩捕去。该会稟吁谭总司令,谭派人到县查办,提交总司令部办理,方得全数释放。闻被捕释回时,沿途八十里农民爆竹喧天,对联数百付,其兴致可知。及谭军失败后,地主又大肆活动,十一月二十五日,赵恒惕调大军一营到该会放火焚烧,杀死六十七人,内小孩一人,伤千余人,捕七十余人,烧民房百数十栋,尸体遍野,哭声震天,可谓惨矣。

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青年们!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就是这两处的农民运动,听说实在有不少青年含辛茹苦的在其中活动,所以他们能够知道组织农会,知道进行罢税抗租的方法。假如各省的青年都能象这两处的青年一样,那么全国的农民大联合运动,可说是指顾间的事了。

不过做农民运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针,我现在把我的意见简单写了出来,以便青年们的参考:

(一)组织方面——最要紧的自然是组织农会(或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并须在这农会之下,设法组织“消费协社”;“信贷机关”;“谷

价公议机关”等,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农民才感觉与自身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而拥护农会。至于是先组织农会或先组织消费协社等机关,那就看各地的情形而定了。

(二)教育宣传方面——能多设补习学校或讲演所固然很好,如一时力量来不及,利用现成的教育机关亦可。至于其他如露天讲演以及新年大节休暇时聚会娱乐尤应利用时机宣传,方法愈多愈好,不细说了。但是中国纯粹农民劳动者(雇工)究不及自耕农佃农之多。所以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因为一般农民私有观念极深,真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如果我们用那样多高的口号,不是反而把他们吓跑了吗?我们的宣传口号只能用“限租”、“限田”、“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这一点极其重要,运动家不可不特别注意。

(三)行动方面——分为两项:一是经济的,如要求减租,改良待遇等。一是政治的,如要求普选,改良水利,组织民团,集会自由等。就中组织民团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人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招募的民团,一方固然可以防御兵匪,而他一方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如此层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如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

原载《中国青年》第13期

署名:中夏

银行公会反对 收回粤海关主权之索隐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收回粤海关事件，广东革命政府因忙于“国民党改组”和“筹备组织建国政府”，故现在除掉外舰仍然能集广州，游弋江面示威；和广东的工学商绅各界不断的举行群众示威运动，抵制美英货物，广大的向各国国民宣传，以及各省公团和海外华侨函电纷驰，督促广东政府坚持到底，誓为后盾之外，其余交涉消息是没有什么可纪的事，一时表面颇为沉寂。不过此事为中国主权生死存亡所系，收回自管，可说是只要是稍有爱国心的人民，主张完全一致。故广州政府以全国人民意思为依归，仍未改变其从前期在必行行在必达的强硬态度。这是可以告慰于读者诸君的。

咄咄！谁料在此国内外爱国同胞一致赞助广东政府收回海关主权的浓厚空气中，乃有什么银行公会通电反对，这亦所谓是别有用心罢。

考中国所以贫乏的原因，即因产业不发达；产业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即因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查关税有单一关税则（完全国定）与复式关税则（国定与协定并行）之别。前者不论对于何国都以同一的税率待遇，英国就是这样。后者则稍

有不同，为对于某国感情较好，课税率就较低些；对于某国感情较恶，课税率要较高些，所以其中有一部份系自定的，有一部份系协定的，日本就是这样。总而言之：世界产业先进国的关税权是可以自主，丝毫不受外人之束缚与挟制。可是我们贵国就不是这样了，完全为协定制，甚至乎出口税亦在协定之内；不但出口税，甚至乎内地税也要和各国商定。关税主权既不为我所有，所以外国货物收税反而要轻，本国货物收税反而加重，我们亦无法更改。比方外人自通商口岸运货至内地，除照章缴纳值百抽五之进口关税外，再加子口税二·五，共计不过百分之七·五，其货物就可以通行内地，畅行无阻。本国商人从内地输送至海口，其间经过冬处厘卡，平均计算，非纳税费二十七成不可，若再加上出口税五成，几乎是与外货成了四与一之比。照这样情形看来，我们把成本若是之重的国货而与成本若彼之轻的外货相竞争，谁胜谁败，不卜可知。假如说关税完全是由我自主的，假如说关税至少是国定与协定并行的，那么关税是可以增加，厘金便可以裁撤，何至象现在这样协定制受外人之束缚与挟制呢。何止因关税不得其平，反致本国产业受阻抑，商业受损失呢。所以我们不欲救中国则已，欲救中国，必先收回关税主权，这是爱国同胞所宜做而且应急做的事呀！

广东政府早见及此，此次毅然决然要收回粤海关；全国真诚爱国的人民亦见及此，故此次亦毫不犹豫奔走呼号誓为广东政府作后盾。谁知银行公会却另持异议，说是与公债基金有关，丧心病狂，通电反对。但是银行这种举动，我们是不可不加以注意。诸言其内幕。

原来自辛亥革命以后，国内银行业颇形发达。这些银行完

全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所经营的固然也有几个。可是大部分的银行却是官僚资本和军阀资本。我们打开银行年鉴一看，京津沪汉……各处银行的什么董事，什么经理，什么协理，几乎十个里头有八九个是官僚和军阀。这些官僚和军阀他们当权时括地皮得来几千万几百万几十万的造孽钱，知道银行事业有利可图，相率而做这种买卖。所以我们不要把银行分子和工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一体看待，说银行公会反对广东革命政府收回海关，便认为是中国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意思。是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也不免有目光短浅为了私人小利而忘了国权大计的，也不免和官僚军阀结托而同一鼻孔出气的，不过这种人总是少数中之少数罢。因为关税所给予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痛苦，已经不少，亦不止一日，只有他们对于关税协定制的痛苦，愤怒，是比任何人民尤为亲切尤为深刻。所以他们对于收回海关良心上是极表赞成的。所不赞成的人，仍然只有官僚和军阀；因为官僚和军阀是革命政府所必须扫荡无遗的，官僚军阀对于革命政府收回海关之必居于反对的地位，又何足怪。

十数年来，中国的银行为中国做了一些什么“功德”呢？不借；最大的是一方面替外国银行承销钞票；一方面从外国银行里借来的钱高利贷转借予北京卖国政府，暗偷明劫，无所不为，这些都是我们国民数年来一件一件的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外国银行更是利用他们，以为实践其“中国不统一不借款”宣言的掩饰，暗中却以中国银行借款与中国政府的一个摆渡，在其中得到不少的优越利益。旷观世界，各国的银行是为国内产业开发而设，中国的银行却几乎全体是为“搜括国库”和“承销外资”而设，这样祸国殃民的勾当，是我们国民所能容忍的吗？

现在他们已经把北庭国库搜括尽了,变成公债了,于是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着指定中国的关余,盐余,烟酒税,交通收入为他们公债的基金了。他们把国家的收入统统朋分了,这种罪恶,岂在杀人放火的军阀之下,又是我们国民所能容忍的吗?

不过我们这些真诚爱国的人民(特别是受关税协定痛苦最亲切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要大家起来赞助广东革命政府赶速收回粤海关主权,攻击勾结外资的银行资本,打倒蔑视中国主权的外国暴力,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产一个新生命才是呀!同胞们!起!起!

原载《新建设》第1卷第3期

署名:中夏

论 兵 士 运 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

兵士运动和军事活动在字面上看似无多大分别,在实际上看确是判若鸿沟,这是我们所不可不注意的。兵士运动是在军阀军队中暗中的宣传,联络,煽动,以至于组织;军事活动则纯乎是在军阀军队之外的列一军队整个的或半个的招收,改编,以至于统御。所以兵士运动是从士卒及下级军官下手的,军事活动是从长官及上级军官下手的,前者绝对秘密的,后者大半公开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处所。

一个革命党专靠兵士运动以企图革命之成功与拥护,已经是作梦了,若是专靠军事活动,更是梦中之梦。国民党向来是做此梦中之梦的,所以他们的革命还没有成功,他们手下的悍兵骄将早已造成特别势力,变为新兴的军阀,与北洋军阀实是“二五等于一十”、“半斤等于八两”并没有什么两样。现在国民党觉悟了,觉悟专靠军事活动“打平江山”是没有指望的了,所以此次毅然决然注全力于党的本身之改组。其首领孙中山先生痛快淋漓的把从前的错误,尽情昭告于全体党员之前。这却是中国革命前途一线最光明的曙光啊!

但是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不过如平时

把普遍的国民运动置之不理,而一味专靠军事活动,那就革命的方法未免太简单太幼稚了。至于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是何理由?听我道来:

第一、中国数十年来,因受外资压迫,生活益窘;天灾流行,饥馑荐臻,无业无食的人民救死不赡,除去当兵吃粮尚有什么路儿可走呢?中国有两句最流行而普遍的格言道:“好铁不打钉,好崽不当兵”,可见一般人民的心理是不愿当兵的了,何以现在整千整万的人民明知“兵凶战危”而要去当兵,并以当兵为一种职业呢?实因肚子饿了,眼睛花了,为解决面包问题,虽欲不当兵而势有所不能。所以他们也不能象一般志行高洁的大人先生们,从容审定出处进退的态度,有择业或择主的余暇了。故我们可断定兵士大半是或全体是失业者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比任何阶级为丰饶为伟大,只有无产阶级为生活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比一般为人道为义愤基于伦理观念而革命的人要可靠要坚强。如果革命是促进政治的改革,经济的改造,人民经革命便皆可到平等的机会与境遇,兵士明白了,岂有不乐于赞成之理?固然兵士不免有“有奶便是娘”的普遍现象,但兵士与军阀并非亲若父子,谊如弟昆,如军阀的罪恶暴露无余,兵士明白了,岂有不返戈相向之理。所以兵士可以革命并不在工人农民之下。

第二、军阀所恃者唯兵,打倒军阀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兵士运动。两军对垒,胜负之数,难以预卜。若我们简直从敌方的内部痛下功夫,岑楼虽高,基础动摇了,不倾自倾,倔汉虽强,手足剪断了,不死自死;军阀虽横,兵士变动了,不倒自倒。所以我们打倒军阀的唯一妙诀,与其多用功夫自造党军(这自然是革命时所必要),毋宁多用功夫向敌方做兵士运动。况且中国现时军队已

超过百余万人,而且是有组织与训练的习惯(虽说他们的训练与组织与我们革命党不相同)。我们何可轻忽视之,使他们为军阀作炮灰,而不抓过来为我们主义作前锋呢。

原载《中国青年》第 14 期

署名:中夏

论劳动运动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国劳动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可说是最近三四年的事。不幸这么一枝刚刚含苞发蕊的劳动之花，却经前年冬间和去年春间几阵狂风骤雨，摧残得零落殆尽了。虽说他的根蒂现在还是孕育滋长着，不免有含苞发落以至于尽情开放的一日；但是，无论如何，终不是一日二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了。

中国现在陷于军阀与外力双重压迫之下，不论何人——只要是尚有良心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国民革命”。实行国民革命的方略，经过长期的讨论与考量，不论何人——只要是没有神经病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要“组织民众”。中国的民众，最大部份是农民，其次便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便是劳动者了。所以这些民众都应该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竭力的一齐组织起来。

中国的劳动者的数目，据民国五年农商统计，不过六十一万余人（到现在充其量一百二三十万）。在各民众中所占的数目似乎是很小，似乎势力还远赶不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客观的事实却刚刚与这个结论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数目虽小，而他在社会里所占据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一举手，一投足，皆可使社会蒙受极大的影响。你不看吗？香港海员一罢工，可以使

欧亚的交通断绝，开滦煤矿一罢工，可以使秦皇岛的轮船都开不出渤海口，京汉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交通隔阻，使军阀胆震心惊。这一类的事实，皆可证明劳动者的势力比任何民众为伟大，为雄厚。凡诚心为争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而实行国民革命的人们，何可不大注意而特注意呢？

这种注意，或者已经成为一般明白事理的革命家的普遍意识，所以在最近的三四年中间，有不少的人从事于劳动运动。不过他们所抱持的见解和所采用的方法，实亦不免于太幼稚太急躁的一句批语。所以几年来的劳动运动皆因此而失败，以至一蹶不振。我们要免除幼稚和急躁这两个弊病，我以为我们抱持的见解和采用的方法都有重新估定的必要。现在就我个人意见，简略说明如下：

第一、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口号，唱得呱呱的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使压迫阶级见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这种高调，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哩。原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状况，以目前而论，实在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民主国家，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所以现在凡做劳动运动的人，应把从前那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暂为收藏起来，把目前切实有用的口号代之，方于实际有益。

第二、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只做两种工作，一是组织工会，一是援助罢工，完完全全是引导劳动者向纯经济的斗争的道路。固然这种工作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不过经济的斗争如不

先得到政治的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等,何能顺利的达到目的。请看这几年内所有的工会解散与罢工失败,那次不是受了政治的压迫。所以现在有些头脑不佳的人,说:“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实在是有害于劳动解放的。况且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论,我们如从全般着眼,不论任何民众,都应先做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成功了,独立的自由的真民主国成立了,我们的特殊问题才能有相当的解决。所以现在做劳动运动,应视文化之提高和政治之宣传为唯一的工作。

原载 1924 年 3 月 22 日《民国日报》

副刊《平民周报》第 2 号

署名:中夏

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国的经济基础,几乎完全是农业。中国有实力的民众,或者首屈一指的要算农民。中国的国民革命,必要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方能成功。这些大道理,时贤著论说明的,已是屡见,无须我再在此地复说一遍了。

不过中国幅员太广,故各地的农民状况皆不一样,因此,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当然亦不一样了。据我接触各省的朋友所得到关于农民状况的报告如湖南一省,至少可分为三种形式:一为湘西,二为湘南之衡阳衡山一带,三为湘南之郴州宜章一带。这三处以第一处的为最代,第二处为最劣,第三处介乎上两处之间。第一处雇农长工工资每年五十元至百元,吃饭在外,饮食常常有酒有肉,而且丰腴,与雇主同桌用膳,否则,雇农必掉头而去。第二处雇农长工工资十八元至五十元,吃饭亦在外,惟不能常有酒肉,不能长与雇主同桌,甚而雇农有不能上桌而在灶边用膳的。第三处雇农工资同第二处,惟饭食待遇同第一处。有此三种不同的形式,所以第二处的农民对雇主颇怀念恨之意,如上年衡山白果之组织农会,一呼而集者十五万人,并有种种过于

* 原题是论农民运动,为了区别于前一篇,加“的政略与方法”六字。

激烈的反抗行动,余二处的农民就寂寂无闻了。又如广东一省,比湖南的农民状况又有不同。广东的农民,有时荷锄为农,有时又揭竿为匪,故农与匪往往分不清楚,自然广东全省不都是这样。因此,广东乡村间的民团特别发达。我们由这两省的农民状况来推测各省,可断言其绝不一样了。农民状况既不一样,那么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又岂可以一样吗?

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衡山和海丰两处农民运动的失败,可给予我们许多的教训。这两次的农民运动,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可说是“左派的幼稚病”。他们引导农民做纯经济的奋斗,所采用的政略与方法过于左倾,以致与地主结下生冤死仇,结果是地主假借官厅和军队几阵炮火把两个崭新的农会打得烟消火灭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现状之下做农民运动,应该以立下农民团体的基础为第一要义,如果于这个基础有损害时,应该对于对手方之冲突,力求避免,不然,逞一时之气,鼓一时之勇,结果自己的组织,根本断尽,有什么用处呢?

我现在把我对于农民运动的几项意见写了出来:

第一、教育方面——多设法设立或参加农村学校和书报社,作农民之识字运动,由此把农民间的文化提高。关于时事之演讲,唱本之改良,新戏之革新,幻术影戏之添置,亦当尽力推行。农民教育是我们一条最稳便而有效的道路,如果把这一层办到了,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踏进去了。在此尚有两点,须连带一说:第一、对于各省的初级师范学生和小学教师须特别向之宣传,与之连络,因为他们是与农民接近的。第二、对于办设农民学校(学校名称可酌定。)不妨和比较好的乡绅与地主共同发起,因为可得到他们经济的和政治的各方面的援助与保障。

第二、自治方面——鱼肉农民的恶劣官绅，固然是我们在所必斥。不过如果农民的势力还未加大和巩固的时候，应取慎重的态度。所以此时我们应设法插入乡村间的自治团体，又利用这个地位为农民在政治上得到许多的便利与自由。固然这种方法，不免有些官僚行动的色彩，但是如果这于农民运动有裨益，我们又何苦徒务清高之虚名，而弃置切身之实利呢。关于筹办武装乡团，宣传排斥教会之类，亦当慎省酌量进行。

第三、经济方面——完全引导农民作纯经济的奋斗，为时尚早，已由衡山海丰的农民运动给我们证明了，不再细说。不过群众如果没有经济的利益作中心，要他们团结与组织，比在石田上播种要他生长出嘉苗良穗尤为难能。所以我们不论做何种的民众运动，对于经济的利益这一层，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可忘记的。我以为我们此时应设法在农村推行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必这样，使农民得到廉价物品及解除高利借贷，于是农民自不期然而然会相信我们以至于团结和组织了。

这是我偶然想到的几点，暂写出来，备国内做农民运动者的一个参考。

原载 1924 年 3 月 29 日《民国日报》

副刊《平民周报》第 3 号

署名：中夏

上海的报纸^{*}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吴君又说：“现在的报纸多极了，我们青年们如不明了各报的底蕴，往往受其反动宣传而不自知。你能为我一道上海报纸的详情吗？”我说：“能。但是我还不知道十分详细。”

上海号称大报纸的有十家。

(一)《申报》——上海报以此家资格为最老。总经理史量才，总编辑陈冷。开办至今已五十一年了。销数约四五万份。

他原前是一英国人名叫美查的所办。光绪末年归国，方辗转落于席子佩之手。当时上海道蔡乃煌承江苏总督端方之意旨，出资约六七万元收买此报。后来被某御史向慈禧太后前奏了一本，慈禧大怒，命端方查办，端方不得已令蔡乃煌退还于席子佩。但蔡后虽去任，而收买费仍未注明缴还。入民国元年，被史量才发觉，席无资偿还，史扣蔡任数目外再找补六七万元以买之。席不得已允许。《申报》从此就归于史量才手，后来便成他们这一派的喉舌机关。其资本号称八十万，据人说，不免吹牛。惟何东来沪时，有人说何东投资二十万，观其为何东鼓吹比各报卖力气。或可信。

* 这篇文章是邓中夏写的《北游杂记》的第七部分。

他表面上虽标榜不带党派，系纯粹营业性质，实际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不仅是苏社的喉舌机关，而且暗中常与各实力派相结托。不过他编辑新闻的方法颇巧妙，故虽对实力派帮了忙，外人亦不十分看得出来。他的社论是模糊的，模棱的，而自诩为“老成”，其实是滑头。但有时亦含了不少的暗示作用，如对上海警长问题，尤其显例。

(二)《新申报》——总经理许建屏，总编辑孙东吴。开办约八年。销数约一万二千份。

他原为老《申报》旧主人席子佩所开办。先是民国初元时，某英人因老《申报》帮助西门子德商，恨之入骨，但又无法取缔，于是怂恿席子佩创办此报，中美合资，并帮席控《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以为报复。后果席胜诉，得赔款二十四万，时民国七年也。后英人以目的既达，又以此报无利可图，退股。席胜诉得来的赔款又为讼累耗去，遂不支。于今年五月卖与“新申公司”，闻得资四万。“新申公司”为许建屏关云龙等所组织，闻与浙卢有关。许建屏名为总经理，实权系在关云龙之手。

他的态度，现在反直。

(三)《新闻报》——洋总经理福开森，华总经理汪汉溪，总编辑李浩然。开办约三十一年。销数约六万份。消息以此报与《申报》为最多。

他为一美国商人所开办。后归福开森。福为总统府顾问。汪为小官僚。

他的态度，因福为总统府顾问，故历来都为公府帮忙，有“府派报”之称。近来颇为直系和赵恒惕陈炯明说好话。章行严近在此报作文，呜呼哀哉得很！

(四)《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伦。开办约九年。销数约一万份。

他的前身可说是《民立报》。先是革命党人麇聚日本，气势益厚，欲向国内进行革命运动，知日报为宣传利器，于是有《民呼报》之设立，主笔政者为于右任氏。因《民呼报》旋被封，乃将呼字之两点去掉，改为《民吁报》，赓续出版，又被封，方改为《民立报》。此时宋教仁氏加入为主笔，政论新颖透辟，上海各报几乎一致响风，群相仿效，故彼时之《民立报》隐然为各报之领袖。到癸丑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令上海商家不准在该报登广告，并电令邮局不准递寄，《民立报》不得已停办。（辛亥前尚有《天铎》，《警钟》，《苏报》等，革命后尚有《民权》，《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亦革命党人报纸也。皆至癸丑失败而辍。）癸丑而后两三年间，党人在上海无报纸，有的逃亡海外，有的沉溺于醇酒妇人，异常消沉。虽民三有一《生活报》，亦不旋踵而停版，民国四年十二月，陈其美在沪建议办报，继续鼓吹革命，《民国日报》遂因之以诞生。

他因为革命的国民党的机关报，自然以反抗反动政治为唯一职责。因中国政治不过由君主专制变为军阀专制，北洋军阀，虽叠为废兴，而军阀专制政治仍未稍改，故该报反袁，反段，反直，始终未离开他革命的地位。自“五四运动”而后，极力提倡新文化，惜因发行不善，故销路不甚广。

(五)《时事新报》——总经理汪某(?)，总编辑张东荪，开办约十八年。销数九千份。

他闻前清系立宪党汪康年所办。大约民国二、三年研究系方接手。听说梁启超做过一次财政总长，当时将各海关常关多

换用本系人，搜括了数百万。督军团独立时，梁启超得贿十七万。并闻川汉铁路债券内，研究系鲸吞的不少，故蒲伯英等至今还交不出账来。怕是他们所以有钱办报的原因罢！研究系的前身为保皇党，反对革命，赞成立宪，至今他们的旧性根还未全改。入民国后，他们始终与军阀相结托，联袁，旋又叛去；联段，旋又离异。态度变幻，反复无常。即如当此全国反曹及否认伪宪时，该报虽不敢明目张胆的捧曹，却大唱其“休养十年，预备三年，”之论调，又鼓吹“宪法付国民投众解决”之主张，欲以变更国人观听，“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了。当新文化风动全国时，该报记者张东荪亦曾为新文化运动大卖其力气，并鼓吹社会主义，当时青年颇为向往，谁知从他的老师梁启超自欧归国后，态度突然一变，仍然回复从前的样子，今则有识的青年皆不为其所欺矣。

(六)《商报》——总经理李征五，总编辑陈步雷。开办三年。销数不到一万份，有人说只五六千。

他的历史，民国九年双十节开办。原为迎合“六三运动”新潮流而起，故其编辑颇罗致“六三运动”之得力人物。闻开办时，系一美籍俄人代为筹划。其时总经理为汤节之，乃一有头脑政客式的商人。当时上海新兴资产阶级颇为帮忙，惟因汤节之自私心太重，故不久遂相离异了。去年汤因命案下狱，转于李征五手。李，宁波人，曾隶籍民党。

他可说颇能名副其实。其社论往往有真能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见解及要求，论议颇为严肃警策，在现在上海各报中当居首要地位。反直，反帝国主义，赞成国民革命，亦空谷足音也。可惜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太幼稚，实际还赶不上，未免空费记者一片苦心了。

(七)《时报》——总经理狄楚青，总编辑戈公振。开办约二十年。销数约一万份。

他自戊戌政变后办起。据说狄当时实系保皇党人，并闻开办此报，实系康有为等的力量。不知何故，该报开办后便与保皇党脱离关系了。民国元年，他颇为学界欢迎，远在《申报》之上，后因退化了，闻前与“安福系”“己未俱乐部”等皆不无关系。曹锟贿选以前，颇有反直色彩，据说系与浙卢有关之故。然他又作怪，近来又趋向于直系了，他对陈炯明亦有好感。《时报》原有极好地位而不善为保持，以致反落《申报》之后，论者惜之。现在反对白话，学界之根据渐失。

(八)《中华新报》——总经理殷汝骊，总编辑张季鸾。开办约九年。销数约二千份。

他自民国四年双十节开办。为政学系机关报。政学系之重要人物为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杨永泰章行严等，其所拥戴的首领即岑春煊宫保。政学系在南在北的政绩颇为人诟病。总之：反革命的心理并不在研究系以下。政学系与研究系为中国两凶，至今则其势寢微。该报社论近亦颇有严肃警策之作，要不可以其党而废其言也。新闻编得极好。上海报新闻编得好的，以此家为第一，《商报》次之，其余皆不及了。

(九)《神州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余毅民。销数大约不多。

此报资格颇老，尚在《民呼报》之前，亦为革命党人于右任所发起。故于有“神州旧主”之称。惟于不久被排挤，故另办《民呼报》。此报易主甚多，亦无态度之可言。在上海各大报中当是“自诩以下”矣。

(十)《中国晚报》——总经理沈卓吾。总编辑未详。销数约二千份。

原载《中国青年》第 19、20 期

署名：中夏

中国青年应该与 “少年国际”结合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读者必会发生几个疑问,第一要问:“什么是少年国际”?第二要问:“为什么要和他结合”?第三要问:“怎么样去和他结合”?我现在一一的解答出来。

第一,什么是“少年国际”?

什么是“少年国际”简单一句话,他是全世界少年被压迫者——不分种族和颜色——的总组织。

原来西方的少年运动,经过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七年)是萌芽时期。这时期不过是各国一些富有革命性的少年自动的起来组织和奋斗。他们那时的口号是:“反对军国主义”!“经济生活的改良”!他们那时是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因为那时社会民主党还是与资本主义取决战的态度的,卖劳动阶级和当资本家的走狗的堕落行为还未表演出来。

第二时期(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四年)是消沉时期。这时期各国青年受了社会民主党的迷惑和妨害,使他们忘了政治的奋斗,只仅仅做了文化运动的提高,几乎把原有的革命性完全消失殆尽了。

第三时期(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是发皇时期。欧洲大战开始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他们组织的“第二国际”通通变节了;不惜抛弃他们“反对战争”的决议而赞成帝国主义的战争了;卖劳动阶级和当资本家的走狗的真面目尽情的显露了。各国青年潜在的革命性从新燃烧起来了;看过社会民主党这样卖阶级的堕落行为,于是脱离这些叛贼的羁绊而奋勇出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了。并在一九一五年在瑞士召集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的国际大会。他们那时的口号是“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社会革命万岁”!他们在这些革命奋斗里,有好些被捕拘禁了,有好些被屠杀了,有好些在狱里困死了。但是他们还是继续不断的进行,终于帝国主义以最大的打击,而留历史上以最可纪念的光荣。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后,他们的口号改成了“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万岁”!“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苏维埃俄罗斯”!一九一九年又在柏林召集一个少年国际大会,因为此时各国社会主义少年的团体,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了,于是大会决定改“社会”二字为“共产”,新的国际便称为“少年共产国际”;“少年共产国际”由此便与“第三共产国际”巍然耸立于世界了。

第四期(从一九一九年至现在)是组织扩大时期。这时期的经过,上面士畸君一文说得详细,我不必复说。总之,现在的“少年共产国际”,他是一个“全世界少年被压迫者——不分种族和颜色——的总组织”。他原前的职任:(一)为了要改善青年工人的经济地位,所以断然做经济的奋斗。(二)为了要反对青年服兵役和改善青年兵士的待遇,所以断然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三)为了要免除资本家所施汨没阶级性的伪善的文化和教育,也以断然做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提高和反对宗教。他

现在的职任更扩大了,他不仅是要“完成列宁的志愿”不仅是领导西方青年“反抗资本的反攻”!“反抗泛系主义与反动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柱石——社会民主党”他还要领导“西方青年和东方殖民地青年结合”!领导东方青年“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战争”!总之,他是要联合全世界青年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他组织的成份,不仅限于欧美,简直遍及于全球了。他本年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国际大会,到代表一百三十余人,代表五十余国。他的基本总人数现已达二百余万人。总之,他是现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而庄严的青年总组织。

第二,为什么要和他结合?

上文说过,少年国际现在的职任不仅是要领导西方青年做反抗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种种奋斗,还要领导东方青年“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战争”。即此我们便可认识我们要和他结合的深切意义了。

原来自从欧洲资本主义发达之后,人类社会便发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很显明对抗的壁垒。自从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形式而变成帝国主义之后,人类世界便发生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两个很显明对抗的壁垒。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剥削掠夺的是剩余价值,殖民地民族被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是剩余利润。他们所被剥削掠夺的东西虽不一样,然而他们所被剥削掠夺的苦痛初无二致。所以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如要解放他们自己,只有对资产阶级实行社会革命。同理,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如要解放他们自己,亦只有对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形式虽异,可是两者之间相需为用的关系却非常巨大,非常密切。因为资产阶级尚能尸居余气要倒不倒的原因,即因资产阶

级尚能在殖民地掠夺许多剩余利润以苟延其残生，故无产阶级要根本推翻资本制度，除援助殖民地的国民革命成功，予以重大的打击，很难完成他们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尚能飞扬跋扈、深固不拔的原因，即因帝国主义本国内未能发生剧烈的革命运动以动摇其营阵，故殖民地民族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除促进产业先进国的社会革命成功，予以根本的动摇，亦很难完成他们的国民革命。由此看来，产业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应该结成联立战线，实行世界的大革命，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得到真正的解放。

世界革命的形势是如此，除此之外，别无出路。青年在各国革命场合中是一支最有效的别动队，生力军，在这种形势之下，除了西方青年与东方青年结合起来共同革命，尚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少年国际”便早就看到了这一层，所以大声疾呼：“西方青年与东方殖民青年结合起来呀！”并且早就看到日、美、英、法不免的冲突，早迟便要为了东方问题能发生新帝国主义战争于太平洋上，所以向东方殖民地青年大声疾呼：“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呀！”“反抗新帝国主义的战争呀！”中国为国际帝国主义公共殖民地，中国如求得民族之解放，国家之独立，政治之自由，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封建军阀。中国青年们！你们要为了这些而革命吗？你们须增厚你们革命的力量。你们要增厚你们革命的力量吗？你们须与各国青年革命势力联络。你们要与各国青年革命势力联络吗？你们必须与这代表全世界青年革命势力总团结的“少年国际”结合。

第三，怎样去和他结合？

现在我们说到和他结合的方法了。我把我的个人的意见说说。

(一)我们要与他结合,不是用一个空洞的团体名义,是要这团体实际上拥有广大的革命群众。所以第一个先决问题,便是这团体的基本单位。基本单位是将各种青年群众,如工人,农民,学徒,学生,兵士等,分别紧严的组织起来。究中特别是青年工人农民居首要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有重要经济地位而且最富于革命性。中国学生虽有全国总组织,不过是名义罢了,实际并没有得到群众,应极力加强整顿使之名副其实。其他如青年工人,农民,学徒,兵士等,假如有可能亦应同学生一样有全国的总组织,否则,可先从某省某市某县或某地着手小规模的组织。名目暂时不必务求统一,或叫社,或叫团,或叫俱乐部,或叫联合会,均无不可;总之只要有真正的群众充实团体的内容便可。

(二)上一步工作做好了,我们可联合各种青年群众团体开一全国大会,商议全国各种青年群众的总组织,决定这个总组织的纲领和计划。名目现在亦不必预拟,又由这个全国大会共同商定。总之不能脱掉国民革命性,因为这是目前中国要求解放所需要的。

(三)第二步工作做好了,我们国民革命性的全国青年群众的总组织成功了,我们方可派遣代表赴“少年国际”要求正式加入为其一员而开始于国际之联合。这样,我们的革命势力方能增厚;方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封建军阀;而得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政治自由的最后目的。

青年们呀!社会之花呀!努力!努力!这是你们生死关头所在。打破这一关,前途便有无限的光明。

原载《中国青年》第44期

署名:中夏

黄仁同志之死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黄仁同志死了！他为何而死？他死于何人之手？

本年双十节，由国民党右派党员童理璋（著名租界巡捕房侦探）、喻育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调查部干事）等在上海天后宫召集国民大会，他们受了安福派军阀的指使，作反直的宣传。他们亦知道这种片面的主张和重重的黑幕，必大招觉悟群众的反对与揭穿的，遂勾结了大批流氓打手以对付反对者。大会开后，主席喻育之随时都禁止反对者出声，流氓打手更是寻衅殴打。全国学生总会代表郭寿华演说：“我们当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话犹未了，童理璋即上前拦阻，黄仁帮同上前理论，台后便拥出流氓打手数十人，向黄仁、郭寿华等拳足交加，并将黄仁从高数尺之台上推下，均受重伤，黄仁当即人事不省。童理璋、喻育之又勾通警察将黄仁等受伤者十余人（均系青年学生）拘闭一小屋之内，诬为“齐燮元的侦探”，旁观者不平，始行救出，而行凶之流氓打手均已从容散去。黄仁于翌日因伤毙命。

所以黄仁之死，是死于拥护他对于时局的政治主张，是死于国民党反革命的右派党员童理璋喻育之之手。

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最显明的有两派：一派主张拥护反直

派军阀打倒直派军阀,对于帝国主义不加过问,甚至于与之勾结联合;一派主张国民革命,打倒一切军阀(不论直与反直)及一切帝国主义(不论英美法日)。这两派主张究竟是那一个可以彻底解决中国时局呢?直派军阀诚然祸国殃民,罪大恶极,是非打倒不可的。不过不用国民自己的革命力量,而依赖或利用别一派军阀,其结果“换汤不换药”,国民依然是践踏于另一军阀铁拳马蹄之下,前几年“皖直之战”“奉直之战”,当时国人对吴佩孚的迷信是怎样?吴佩孚后来如何了?这不是很显明的教训吗?再则事实告诉我们:军阀不能一日离帝国主义而存在;军阀无帝国主义不能有作战之可能。这次的战争,在直派方面: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道济借款一百五十万镑,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军火买卖步枪一万枝,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美国人替吴佩孚训练飞机队,美国与齐燮元进行导淮借款,最近英国管理中国财政经手人安格联保证曹吴发行库券四百万元。在反直派方面:法商购与张作霖快枪三千枝,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法国人替奉浙训练飞机队,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谋取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最近法国又运大批飞机售与张作霖,而遭曹吴严厉之反对。这都可以证明中国军阀的内战,无不由于帝国主义之援助与操纵。所以打倒一切军阀,尤非先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不可。此次上海国民大会,黄仁等一般有觉悟的青年,拥护他们“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主张,国民党右派党员童理璋喻育之等因要拍皖系军阀的马屁,做个人升官发财的买卖,竟敢打死破坏他们买卖的青年,可谓凶横极了!

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跟我革命的党员，并非来革命，是来升官发财罢了！”这是何等沉痛的话。本年一月该党改组，发表新宣言，建立新政纲，引“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己任，当时全国属望，以为领袖国民革命的责任非该党莫属。于是凡热心革命的新分子（特别是青年）纷纷加入该党。谁知该党有些党员每每仍是倾向于妥协的反革命的。他们看见新党员勇猛激进，力谋振兴党务，扫除党内以前积习，从事革命的实际行动，生怕对于他们借党营私的目的相妨碍，于是他们说新党员阴谋破坏国民党，同时到处活动，结成反革命的右派，专谋对付他们。这种右派，一方勾结军阀，一方依附帝国主义，厉行种种违反宣言政纲的行动：在广州援助商团压迫工人罢工，援助地主破坏农民组织农会，仰承帝国主义的鼻息抑压“圣三一”教会学校爱国学生的罢课，中伤沙面爱国工人的罢工，在上海纵容坏党员攻击新党员，殴打执行部职员和民国日报编辑邵力子，对丝厂女工罢工坐视不理，对南洋烟草工人罢工不特不援助罢工党员，而且暗为资本家的臂助。对江浙战争，党报护卢的宣传，比较卢永祥机关报《新申报》等更为出力。此次上海国民大会，童、喻等是该党党员，黄仁等一般觉悟青年亦是该党党员，童、喻等竟敢不拥护该党的宣传主义的同志，而且阻止他们，甚至指使凶殴他们，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呢？国民党的明达领袖，如不及早觉悟，不立即彻底肃清所有反革命分子，不切实拥护新宣言新政纲，开始实行国民革命的真实工作，贯彻打倒一切军阀和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国民党将怎样能担负国民革命的使命呢？

全国青年们！我们的勇敢同志黄仁死了！他是死于拥护他的对于时局的政治主张，死于国民党反革命的右派党员童理璋、

喻育之之手。我们要怎样替这位模范青年伸冤复仇，我们要怎样勇往迈进的继续这位模范青年的未竟之事业呢？

原载《中国青年》第50期

署名：中夏

赤色职工国际之东方策略

(一九二四年十月)

我们的领袖赤色职工国际已于八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大会。对于东方问题曾有正确的决议。现在先把我们的同志希里做的报告摘录于下：

“略谓一年以来，东方劳动运动屡遭厄运，原因在东方各国本地资本发生重大经济危机，欧洲各国经济危险，影响其东方殖民及半殖民地。欧美资本东侵愈甚，帝国主义势力复张，在东方市场中互相竞争，东方各国本地资本主义，以前乘帝国主义大战之时机，发展甚盛，现则欧洲各强国之资本重行东来，各地本地资本主义莫不失势。民族运动，数年来颇进步，现因已夺去本地资产者之后援，资产者为自卫计，勾结欧洲帝国主义，故民族运动一时甚形失势。而东方劳动阶级之命运，遂入于阶级与民族自由之两重争斗中矣。赤色职工国际今后在东方事业，即从事东方无产阶级之阶级与民族自由的奋斗。而在此新形势之下，应实行新战略，此即少数城市无产者，应与多数小技术工匠及无产农民联合，在一党或同盟或联合委员会之一定组织下，共同合作：盖日本中国埃及等国中，无产农民及小技术工匠为数较多也。总之，东方劳动运动之初期已过，目前所需者，乃一巩固之革命组织，以争集会权罢工权为农工共同战之具体及实际口

号。故赤色职工国际在东方之事业，乃运作无产农工一切可用之方法，使此革命团体与大多数国民愈为接近云云”。

在这个报告中，指导我们重要的意义是：（一）现在是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联合进攻；（二）东方无产阶级须从事阶级与民族自由的两重争斗；（三）新战略要联络农民手工业者在一定组织下共同合作；（四）需用一个巩固的革命组织。

原载《中国工人》第1期

署名：中夏

我们的力量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

自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新式工业经济日益发达，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在这当中也就随之日益发展而成长壮大了。

在初，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不过只欲销售商品和取得原料，本不欲中国新式机器工业有大规模的增进与发达——因这会引起殖民地的工业对宗主国的工业剧烈之竞争对抗，以至于排斥的。所以那时帝国主义只容忍中国本国的“商业资本”之存在，至于本国的“工业资本”，那是他们所引为隐忧、引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国的商业资本家渐渐学会组织生产，发展了所谓“家庭工业”（如商店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其织腊帽手套等）和“工厂手工业”（如手机的小工场等），这些小小生产因与帝国主义无多大的妨害，亦为它们相当的容让。

但是，自从鸦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那时帝国主义者间亦有互相倾轧的裂痕，中国政府得利用这些机会购入机器以制炮造舰，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的“军用工业”。

再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货,还要投资,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故当时铁路投资为各帝国主义者所垂涎欲滴,争先恐后的。此外,它们还有采取煤铁和将商品输入内地的需要。故借款官营,中国得以兴修铁路及开掘矿山。于是又成就了中国的“交通工业”“煤矿工业”。

随后因机器既已输入,又引起中国本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而兴工制造;并且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劳力的低廉,原料取携的便利,运输周折的免除,海关定税的减轻,亦宜于在华设厂制造;因此而本国资本的和外国资本的各业制造工厂也就如云而起了。于是终于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

中国的工业是在这些原因上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虽不能容忍,然而为投货,投资,掠夺富源,又不得不使中国建立相当的工业。谁知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长成壮大成正比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公然因三、四十年来工业之进展而组成一个雄厚而伟大的队伍,掉转头来便向帝国主义举行“背叛”,举行反攻。这那里是他们始料所及的事哩。

现在且把我们的力量,先来检查一下。

二

首先检查我们的总人数。

说到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无穷困难的,就是没有精确而完备的统计可资依据。现在只好把比较可靠的略为说说。

先前我们说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六十一万人,这是根据农商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的统计估量而定的;可是民国七年到现在又是六年了,这六年之间,工厂增加不少,故我们

有时鼓着勇气大胆猜度说：总加至八十万人了。其实这是错的。农商部统计所指六十一万人完全是制造工厂工人，而铁路工，矿工，海员，市政工，码头工，车辆劳动者，农业工人，以及政府直辖的造币厂，造船厂，兵工厂等工人和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均不包括在内。

据我们最近的考订，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一百八十五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当然不在其内，合手工业工人总人数据农商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的统计，是一千余万人）。兹分述于下：

制造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因其时南方护法军兴，川、湘、粤、桂、滇、黔六省无从调查，所以缺而不全。我们现在还是根据民国四年的统计较为完全。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制造工厂工人总数是六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五人。民国四年以后，工厂增多无数，现在总人数当然还有增加。

铁路工人 交通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的统计，所有国有各路人员总共是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人（外有建筑人员二千二百七十四人未算在内）。现将非工人如会计处九百四十人；车务处的管理员，巡查员等一百六十人，站长六百三十八人，副站长，电报生，车站司事等二千二百七十二人；机务处视察员，段长，工厂工头三百九十七人；养路工程处视察员等七百零七人，共五千一百一十四人除外，加上建筑人员，铁路工人实数总共是七万零八百一十一人。但有数点须注意的：（一）这里数目仅限国有铁路而言，其余省有的江宁路，民有的潮汕路等和外国建筑的如南满路，滇越路等尚不在内。（二）就是这数目恐有不尽确实之处，就中如机务处工匠（即铁路附设工厂的工匠）据该表细

数长辛店机器厂工人仅填七百四十五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三千人数以上的数目相差太远;又该表江岸机器厂工人仅填三百七十二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二千人上下的数目又相差太远。以此类推,其他各项数目当亦有不尽确实的。(三)铁路附设工厂和修路有采用包工制,这些包工,路局是无法按名注册的。所以铁路工人如果一人不漏,当然还有增加。

矿山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是以工数计算,探矿采矿工数总共是四千二百九十八万余人。工数是以一人一日为一工,然而究竟不好从工数推定工人人数。现在是根据该统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填注的人数为准,探矿工人人数是一万六千七百一十一人,采矿工人人数是五十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四人,合计总人数是五十三万零八百八十五人。矿山采用包工制的尤多,这些包工亦未计算在内。

海员 无统计可查。因为远洋轮船固然完全为帝国主义者所有,就是沿海及内河轮船亦百分之九十五六是帝国主义者所有,我们何从调查呢。中国远洋轮船只中国邮船公司一家有三艘,现在已卖去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轮船亦只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三家有数十艘,可惜都无从调查。据深悉海员情形的人说,外国轮船航行远洋的,华籍海员,宁波人约四万以上,广东人约六万以上。此话若确,那么加上沿海及内河的海员,总人数当有十五万人。

市政工人 指邮差,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清道夫而言,

按民国四年五年云南省均未报矿工人人数,所以这个全国矿工总人数里不包括云南省的矿工人数。如以民国三年云南省矿工八万六千六百二十一人计入,则民国五年全国矿工总人数应为六十一万七千五百零六人。——编者

然而均无调查统计表可考。惟邮差一项，交通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总计，全国邮局共为二千四百所。邮局有管理局，一、二、三等邮局暨邮务支局五等之分，我们假定邮局最低数为五人，那么全国邮差总人数当是一万二千人。码头工，车辆劳动者（人力车在内）这两项如果有统计可察，其数目之大，当更使我们吃惊。

农业工人 指用新式机器的农场工人而言，现在亦无从考查。惟据海关册机械类输入农业机器额逐年均有增加，虽然一部分是用之于各省农事试验场及农业学校，其他一部分确为农业资本家用于垦荒及种田，可推知中国农业工人当亦有一个相当的数目。

政府直辖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合计是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人。除交通部所管辖之各铁路附设工厂一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已算入上面铁路工人项下之外，尚余总人数为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人。此外由各省政府设立的工厂工人还不算在内。

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 这种工厂自然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有，本国资本家扯洋旗的亦有一点在内。可惜无从调查。惟自“马关条约”订立以后，外商在华设厂逐年增加，据“最近支那经济”所调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其数已达一百六十六家。民国二年到现在已是十一年了，所增必争无疑。兹举一例证明，如该书所列的纱厂民国二年共是十家，但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民国十年所调查，外商纱厂已达三十六家。又举一例证明，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津浦增厂甚多，单就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已为一百三十九家。并且外商工厂，资本皆极雄厚，规模亦

皆宏大，其所用的工人往往比华商工厂多。我们姑且假定外商工厂工人总人数只有华商工厂总人数之一半，那末亦当为三十二万余人。

三

再检查我们的组织。

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们开首组织还不到三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公然能够组织二十七万余人，在向无组织习性的中国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惊的事。虽然自京汉路“二七”失败以后，各地的组织不免受了些重大的打击和连带的影晌，然而大部分还仍旧存在，不过存在的形式，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秘密的罢了。兹分述于后：

铁路 铁路工人运动是一九二一年才开始进行的。不到一年，京汉路组织一万三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每站满五十人以上成立一分工会，计全路有十六个分工会。此路有一特色，就是全路工人概行组织在一个工会之下。不幸“二七”失败，受打击不小，现在只能秘密的存在一部分罢了。京奉路最先组织的是唐山，其次是山海关，再其次是天津、丰台，现共组织有八千余人，并有成立总工会之活动。津浦路最先组织的为浦镇、浦口，随后蔓延至徐州、泰安、济南、德州、天津，共组织有三千五百余人。京绥路全路概行组织起来了，共有七千余人，微有欠缺的就是机务、车务，大厂分成三部分，尚未统一。正太路全路完全组织，共二千余人，有一总工会。道清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焦作煤矿工人亦有不少加入，原拟附入京汉路总工会之内，后因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不果。陇海路先亦全路完全组织了，

因有监工工头参与其中,任工会高级职员,后来这些工贼出卖工人的事实层见叠出,工人很气愤,遂分裂,现尚保存一千余人。粤汉路北段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株萍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附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胶济路组织二千九百余人,以四方大厂为中心,青岛港工亦加入在内。粤汉路南段组织一千四百人。广九路组织一千三百余人。广三路组织三百余人。沪宁、沪杭两路因帝国主义防范厉害及工人工资较优,虽有组织,系司工、监工、工头、工人共同组织,惟最近有四百余纯粹工人秘密另组之活动。南满路最近组织四百人。中东路俄工早已完全组织了,华工组织的已有六百余人。全国铁路工人已于今年一月在北京举行各路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共计全国路工已经组织的为四万四千八百余人。

海员 海员以广东人宁波人为最多。大概从上海以南至欧美各国,粤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三,甬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二;从上海以北至天津以及长江一带,几全为甬籍海员,粤籍海员甚少。先前甬籍海员有小组织,名叫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等;粤籍海员亦有小组织,名叫联益社,群义社等。此外还有关帝会,同心会种种名目。人数少则五百,多至数千。然而这些组织不离同乡主义和秘密结社的性质,故无甚大用。颇有新式意义的组织,要算是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据说前年大罢工后,会员增至四万五千人。其组织稍差,近因与印度、日本、菲律宾、爪哇以及西欧各国运输工人颇有联络,感观所激,已有改进之动机。

矿工 中国矿山虽多,惟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安源组织有一万二千余人;水口山原组织三千余人,惟去年遭赵恒惕惨杀后,归于停顿了。其余只山东之

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组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人。

湖南 城市工人依产业组织而公开存在的,只有湖南。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纺纱厂以及机械、电气、印刷、陶器、碾谷、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笔业等各行业工人组成工会十五个;并共同组织一个湖南工团联合会。合计组织人数二万六千余人。

武汉 武汉新式产业工人约十余万人,在全国中居第二位。当时已组织的,除京汉,粤汉路工和大冶矿工外,还有铜铁、水电、造船、造币厂、煤油栈、染织、棉花、香烟、缝纫、皮鞋、蛋厂、洗衣、电话、牛皮业、人力车、轮驳、调剂、杂货等各业工人。他们共有工会二十个,并组织一个工团联合会,合计人数三万二千三百人。惟因京汉路大罢工失败的连带影响,有一部分亦归停顿了。

上海 上海原为中国工业第一位发达的地方,然而劳动组合却比其他各工业区落后。其原因有二:一、帝国主义防范周密,压迫残酷;二、劳动界失业众多,生活恐慌。因此,工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前。上海劳动运动最盛时代,要算一九二二年之下季。那时浦东纺织工组织了一万余人,烟草工组织了八千余人。华洋两界金银业工组织了一千余人,但不久皆因罢工先后摧残殆尽。此后虽有二、三十个工会,多半是一块空招牌罢了;就中只南洋烟草职工会有七千人,机器工会有三千人,粤侨工界联合会八百人,机器工人俱乐部五百人,算是有群众。最近新生的劳动组合,颇有雨后春笋之观,虽多系混合制而非产业制,然已有组织的不下五千余人。总共约一万六千三百人。

粤港 广州和香港工会数目共有二百以上之多，广州原来新式工业甚少，工会多至如此，则他们的组织未脱旧式“行会”性质可知。在政治上比较自由之地，而不利用时机作统一的劳动组合运动，当地有觉悟的工友不能不负其责，该处组织虽旧，虽软弱无力，可是所有工业及手工业工人概行组织起来了。组织人数总共约五万余人。

其他各地 济南组织八千余人，太原组织三千余人，重庆组织六千余人，成都组织一千余人，天津组织五百余人，九江组织二百余人，青岛组织二百余人，大连组织三百余人。合计约三万余人。

列表于下：

铁 路	四四，八	人
海 员	四五，	人
矿 工	二六，二	人
湖 南	二六，	人
武 汉	三二，三	人
上 海	一六，三	人
粤 港	五 ，	人
其他各地	三 ，	人
总计	二七 ，六	人

四

我们的总人数和组织既如上述，由此，我们现在的力量固然可以征验，就是我们将来的力量亦不难推测了。至于我们力量的试验与表现，在此数年内已经有许多战斗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絮

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罢。

不幸自去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以后，不仅是同情者对于我们的力量加以意外的轻视，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亦抱过分的怀疑。那时我在《中国青年》一节《论工人运动》的短文里，曾这样说：“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又这样说：“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话便是对他们说的。我并且指明：“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我又大声直呼：“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不外两点理论，兹分别指出及纠正于下：

（一）从数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他们并没有举出实际的数目，仅持一种形式的理论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这种理论用之于产业先进国是对的，用之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和外国的之分。有少数地方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比外国的资产阶级强壮，但是多数地方却反而是外国的资

产阶级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或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均势。在中国的外国资产阶级，虽在无确实的调查可断定它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我们至少可推测其必为均势。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不用说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强壮，就以工业资本举数例来讲：

一、如铁业。中国铁的产额最近几年（一九一八年）约共三五五， 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产额是三三六，五六一吨，外人在铁业中简直占全数。二、如煤业。中国煤的产额最近几年约共二 ， ， 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山东淄川以及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就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外人在煤业中，几乎占一半。三、如纺织业。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左右，外人在纺织业中亦占一半。四、又如烟草业。中国烟草业之三雄：一为英美合办之英美烟草公司，一为日本之东亚烟草股份公司，一为华人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汉口、奉天三处均设立工厂，东亚烟草公司在营口、天津、上海三处亦设立工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在香港，上海二处设立工厂，可见外人在烟草业中又几乎是垄断独登了。由此种种例证，我们说中国工业资本本国的和外国的处在均势的地位，总不算近于夸张罢。既是如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

举工人的总数目便可见得这个结论是不错的。

(二)从质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论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有国家觉悟的是少数；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理论近乎说“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心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今姑且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能解释的，然而亦应有平时心理和战时心理之分。无产阶级平时心理尽管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尽管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然而一到战时（罢工），他们的眼里却清清楚楚认识资本主义了，他们的心理却完完全全表示出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了。如以平时心理来断定无产阶级质量之幼稚，我们同样以平时心理来检查资产阶级是如何？上海新兴的资本家不是办了什么同乡会吗？不是仿刻什么“太上感应篇”、“袁了凡四训”赠送亲友吗？不是还有佞佛茹素的吗？这些是否可说他们已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但是资本家一到战时（应付工人罢工）却和工人一样的将阶级的意识与觉悟表示得显露无余，压迫工人甚至残杀工人起来了。我们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以罢工条件来做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罢工次数是四十一次，提出的条件是九十七项，其内容如下：一、要求增加或维持工资三十七项；二、反对管理规则十五项；三、承认工会十一项；四、给假休息十项；五、养老抚恤金六项；六、恢复革工五项；七、反对工头五项；八、响应他处五项；九、减少工作时间三项。试问这九十七项之中除反对工头五项似为对人问题而近于所谓“宗法社会思想”者以外，其余的哪一项不是具体表现阶级的意识和觉悟？原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掠夺的地

位反应出来的，它的觉悟程度是随它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断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会心理而能阻止它的觉悟。所以以心理断定它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况乎是拿了平时心理而非战时心理。

五

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何以呢？兹分别言之：商业资本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即官僚资本）是买卖公债及政治投资，又与军阀有深厚之关系，并受外国资本之操纵，试问他们能革命吗？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的动机，然而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亦不过只有动机罢了；即或有时动机见诸行为，亦不能坚持到底，终出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之一途。这是事实，去年上海资产阶级不曾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吗？后来又如何？又不曾做什么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吗？现在又如何？这些和平的运动尚且如此，若采用革命的手段，并进行革命到底，他们哪里有此大胆和魄力呢？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别言之：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因竞争而致企业之崩坏，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比总商会急进，便是一例。可惜他们终

因资本微小，而且组织亦甚为纷歧，不能集中其势力，是其大病。农民（雇农除外）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如广东，湖南，陕西，直隶，江西，山东等省往往发生抗税罢租运动及组织农会，最近广东甚至成立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可惜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也是其病。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便是其证。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们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

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原载《中国工人》第2期

署名：邓中夏

海员宣传问题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海员是中国重要产业工人之一。他是最先表现中国民族性和阶级性的斗争的。如一九二二年相持五十六天之大罢工，在世界上亦是不可多得而最有荣誉的事。

可惜自那次大罢工以后，到现在却寂寂无闻了；据深悉内幕的工友说，内部亦涣散得不堪了。这是我们所引为隐忧的。所以现在海员工会应加倍努力作一番宣传工夫，以为重新整顿之预备。我把今天和林伟民君说话贡献他宣传的几个口号，分述于下：

(一)打破帮口——海员以粤籍甬籍人为最多，向来有“广东帮”“宁波帮”之分，彼此漠不相关，甚或互相嫉妒。漠不相关是乡土的言语和习惯不同的关系；互相嫉妒却是职业的位置和利益相防的关系。同是中国民族，同是无产阶级，这些缺点，都应当极力改正。不然，徒然予资本家有机可乘，分散我们的势力，破坏我们的营垒。所以“打破帮口”这一句口号是海员运动中首先要宣传的。

(二)统一工会——海员内部组织，从前异常复杂，如宁籍海员有“焱盈”、“均安”之分，粤籍海员又有“联义”、“群益”之别，此外还有什么“关帝会”、“同心社”、“慈善会”……等名目。香港大

罢工前后,方有“海员工会”之组织,于广州,香山,汕头,上海设分部,这算是大有进步了。不过加入海员工会的十分之八是粤籍海员,而甬籍海员未能尽量吸收,是一大缺点。此后海员工会亦应极力矫正。要知道我们的组织是宜合不宜分的,合则势力雄厚,分则势力薄弱。最好是采用产业组合的原则,这样,固然不为籍贯所限制,而亦不为职业所分割。只要是海员,籍贯上不论是广东人也好,宁波人也好,福州人也好,天津人也好,总之,一律加入。职业上不论是司机也好,烧火也好,西崽也好,厨子也好,水手也好,总之,一律加入。如把所有的海员集中组织在一个总工会之下,你想这种力量是何等坚固而伟大!所以“统一工会”这一句口号是海员运动中也要宣传的。

(三)建立基本组织——海员工会的最大毛病就是忽略了这一点。你想一个几万人的团体,仅仅只上层有一个工会组织,而下层没有基本组织,这个工会不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悬了空吗?比方军队,光有总司令部是不行的,必得有“连”有“排”有“棚”的基本组织。工会也是一样,上面固然要有个总工会以总其成,下面必得有“支部”有“小组”的基本组织。最好每条船上设一个“支部”,由全船海员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负执行本船一切事务及对外交涉之责;“支部”下可分设若干“小组”,五人至十人为一“小组”,每组举一组长,负传达消息分送出版物及收集会费交纳干事会之责。“干事会”每周至少要开会一次。“小组”每两周至少要开会一次。此外又要有一个“全体大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于必要时,亦得召集“组长联席会议”。这样,每条船上都有了基本组织,那才上面的总工会不至悬空。总工会每年择适当时期和适当地点召集一次“代表大会”,每船出代表一

人或二人,检查前此一年内总工会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好,讨论此后一年内总工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并改选总工会的职员。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会才能够象军队一样紧严和坚固。所以“建立基本组织”这一个口号,又是海员运动中应当宣传的。

(四)民族平等——同是一条船,同是一样工作,并且同是一样时间,然而外工的工资却与华工独多。又如吃饭,外工有五个菜,又有酒喝;华工却只三个菜,无酒喝。又如住处,外工二三人一间房,并有人司洒扫之劳,华工不论数十人只住在两间房,无人洒扫,污秽不堪。外工做错事至多斥责几句,华工做错事至少拳足交加。船上游戏场跳舞会,外工可以去,华工不能。船抵外国各港时,有许多地方不许华工登岸,西贡海防虽准登岸,一至晚间,如无随身护照,即便捉去。由此种种,可见外国资本家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野蛮民族,所以不应该有与白种人同样之待遇,你看可恶不可恶。但是又要知道外国工友也是我们同阶级的兄弟,我们对他们并不是嫉妒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待遇要和他们一样。所以我们所反对的是外国资本家,不是外国工友。

外国工友我们还很亲密的和他们联合哩。我们并且要告知外国工友,我们要求民族平等,于他们不特无损害,而且有好处,因为这是使我们势力壮大,可为他们同阶级中添上一得力的援军。再则,中国之所以弱亡,表面上是军阀为恶,实际上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作祟,我们要中国好,只有打军阀和资本帝国主义这两个恶魔。所以要求民族平等,便是海员为保存国家保存民族尽了责任。“民族平等”这一个口号,又是海员运动中应当宣传的。

(五) 联络世界无产阶级——我们从前的眼光实在太短浅了。我们从前只看见几个中国人，甚至于只看见几个同乡，决不注意和外界联络。我们海员固然要和国内的铁路工友码头工友联络，我们也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络。你看现在的俄国不是无产阶级专了政吗？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年十月不是起了革命要打倒资本制度吗？英、美、法各国的无产阶级不是公开的组织大规模的工会和随时乘机进行社会革命吗？他们现在都团结得铁桶一般，而且都成立了一个国际的组织，叫做“赤色职工国际”，设在莫斯科。这些便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援军，我们的先锋。我们务要和他们紧密的联合起来，然后才有打倒资本制度之希望。外国资本家常常造谣，说“赤化”是如何如何的危险，“过激派”是如何如何的可怕，自然啦，他们要根本打倒你们资本家，解除我们工人的锁链，你们虽然认为他们是“过激”，我们却认为他们是“过善”哩。再则，各殖民地民族，不论是马来人也好，是印度人也好，是波斯人也好，是埃及人也好，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受外国资本家之压迫和蹂躏，他们亦是和我们同一阶级的人，我们也要联合他们。这样西欧、东亚、美洲、澳洲，我们都联络成一气了，那怕资本帝国主义不倒，所以“联络无产阶级”这一个口号也是海员运动中不可不宣传的。

这五个口号，如果海员明达的领袖都能细心体会，都能彻底懂得，都能切实的不畏劳苦的尽力向所有海员宣传，我敢说，不到数个月，海员工会便有整顿之希望，海员不难为世界上最有力量最有光辉的主力军。

原载《中国工人》第2期

署名：中夏

穆藕初只觉悟了一半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工业资本家穆藕初最近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大陆报》的国庆日增刊上发表一篇“现×中华民国国民之第一要事”的大文章,他说曾悬此问题征求答案:“主张振兴教育者十之五,振兴实业者十之三,提倡道德者十之一,提倡革命者亦十之一”。他说:“这些答案,皆是也,亦皆非也”。他认为第一要事,是另外一事,他说:“此事不解决,则所谓教育所谓实业所谓道德,皆以此事而延搁而摧残而无立足之地。然其事又非革命”。这事是什么呢?他说是“对于政治之改进运动”。所以他主张“宜集全国人民中之有知识者有职业者,组织一中华政治改进社”。他以为只有这样,“吾中华民国前途,其庶几乎!其庶几乎”!由这篇文章看起来,穆藕初真算是资本家中之最有觉悟者,他知道政治重要,他不知道要有政党。但只可惜只觉悟了一半。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宰割的中国,可以不革命而改进政治吗?是的!我们知道殖民地的资本家因其与外国资本有关联故不能使他取决然的革命手段,这是客观的经济条件使他不得不然。所以穆藕初只觉悟了一半,乃当然,非偶然。

原载《中国工人》第2期
署名:重远

上海日本纱厂罢工 中所得来的经验

(一九二五年四月)

上海日本纱厂这一次的大罢工,参加的厂数至二十二个之多,人数至四五万人之众,相持至十八日之久,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所有一切详情,拟编专书论述,这里且把几项所得来的经验先写出来。

我们一说到罢工,便会想到“时机相宜不相宜”、“组织坚固不坚固”这两个先决问题,因此,不能不先把这次大罢工的时机和组织略略叙说几句。

(一)时机——当酝酿罢工的时候,工人领袖们,也曾经想到这个问题,也曾经打听目前纱花的行情怎样,也曾经侦查工厂存货和交货的日期是怎样,然而都不过是一个模糊影响的概念罢了,但在又一方面,工人群众愤于一百余工友的开除,愤于领袖被捕被打,群情异常激昂,恨不得立刻就要下手,领袖们在这种紧张情势之下,那里还有你选择时机的余地呢?虽然此时正当纱价高涨之期,是在罢工以后四五天才从报上证实。所以这次罢工,老实一句话,时机是碰巧的,并不是选择得来的。

(二)组织——在罢工以前,小沙渡方面,虽然进行过秘密的

工厂小组，实际上人数不到千人，而且并不是各厂平均发展，有些厂一二百人，有些厂数十人，有些厂一个也没有；并且训练期间亦不长久。在杨树浦方面，工厂小组有一千数百人，训练期间比较的长久。虽然两方面都有一个混合的工会雏形，实际上基础并不稳固。所以这次罢工，老实一句话，组织是不完备的，坚固更说不到。

“时机是否相宜”、“组织是否坚固”，都被资本家暴虐的高压和工人群情的愤激这一个紧张环境逼迫得没有丝毫考量的余地了，工人领袖当此时只好“背城借一”，只好“死里求生”，只好在万分危急的当中，竭诚尽力运用种种战术，以求万一的补救。因此善于运用种种战术，终于得到相当的胜利，总算是侥幸极了。这些战术是很可宝贵的经验，也就是这次相当胜利的主观原因，现将其条叙于下：

(一)事先领得工钱——内外棉第八厂粗纱间开除工人，是二月一日的事，这消息传布后，工人奔走相告，群谋对付。同间的夜班工友，迫不及待，便先行罢工起来。工人领袖们见此情形，极力劝告“莫乱动”，劝告“领得工钱再举”，百端解譬，方才稍稍安贴。并在此时期中极力联络各厂工农。至八九两日领取工钱完毕，突于九日的下午四时宣布罢工。这样一个长的时间和大的数量之大罢工，假使当日不领得此项可以支持半个月生活的工钱，那么不到一星期，工人便要因生活恐慌而归于失败了。所以事先领得工钱，是罢工时要注意的。

(二)临时组织得力——群众平日既无完善的组织，又无相当的训练，自然一到罢工，就显出一种原始状态，乱如纷丝，不可疏理；狂如怒马，不可羁勒。幸而工人领袖们，当罢工酝酿时，秘

密的组成了一个“总指挥处”，又确悉杨树浦方面之大康纱厂，亦因裁减工人而酝酿罢工，于是索性于小沙渡和杨树浦两方面各设一“分指挥处”，皆听“总指挥处”的命令。“总指挥处”之下：设一“书记处”，内分“文书”、“宣传”、“新闻”、“印刷”、“交通”五股；又设一“联络处”，负接洽社会团体之责；又设一“护卫团”，负保护工人领袖之责。“分指挥处”之下，只设组织员，宣传员和交通员。指挥机关既定，所以罢工发动后，一切措施才没有慌张。一面于大会中宣布“工会”成立，由各厂择其勇敢能干者为该某厂代表，组织“代表会”。再一面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安慰人心，并劝导不明白的工友莫上工。并提出“要听工会的话”的口号，利用种种机会，极力解释，极力宣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把数万群众部署在工会的指挥之下。工人要有战斗的组织，才能战胜资本家，即或平时没有，临时也应用神速的手段组织起来，这也是罢工时要注意的。

（三）口号适当——九日下午四时罢工发动后，五个厂一万余人蜂拥出厂，当有旗帜引导到一个大坪里开露天大会，台上一面大旗，便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斗大的七个大字。这个口号可说是将工人身受的隐痛简当明了的描写出来了，自然刚刚打在他们的心坎上，所以一经传开出去，不特是已罢工的工友看到眼底，至于心酸涕零，就是未罢工的工友听到耳里，也不觉深深感动，而一致同情的罢起来了。就是后来颇得社会上之同情援助，以及官厅起初之不大压迫，和反动派（如工贼，研究系，国民党的一些所谓“护党党员”）之稍存顾忌，这个带有民族性的口号都是有相当的力量的。其副口号如“中国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工人抱工人的义气”；“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大家一条

心,反对资本家”。又都是工人自己的俗语所构成,自己的意识所凝集,自然一听得就风靡一时勇气百倍了。其后由内外棉五个厂,扩大到内外棉全部十一个厂;再扩大到日华,同兴,丰田;并扩大到杨树浦方面之大康,裕丰,未尝不是这些口号有所感动(自然被虐待的经济条件是主要成分)。

(四)传单得力——应付有对内对外两方面。这次大罢工,对内尤难于对外。因为罢工的群众既这么大,平日的组织和训练又那么欠缺,不能安内,何以攘外?虽然工钱领得,目前生活不生问题,然而一时激于义愤而随众罢工起来了,及至回家蒙头一想,人人心目中不免引起一个“罢工期间取不得工钱”“罢工失败停掉生意”种种的恐慌,况乎家人的交谪,厂家的恫吓,走狗的挑拨,更是纷至沓来,怎不人心惶惶。到此时,“镇定军心”和“鼓励军心”是当前的大问题了。固然此时工会每日要将消息和办法揭条宣布,并要寻事给群众做(群众是不甘寂寞的,故必有事做,但切忌天天雷同,不知变化),使群众不致因无指望或无事干而怀疑、冷淡以至于颓唐,然而关于道理的解释,谣言的揭破,消息普遍的流传,厂方弱点的露布,……都靠文字的传单。(但传单要注意简当明了,最好用工人自己的话。)所以传单可说是罢工战线上的子弹,一日没有他,人心便恐慌起来了。(但发传单要注意盖章,和命令纠察向群众说明,以免敌方有传单来时,鱼目混珠。)

(五)准对敌方弱点猛攻——讲到敌方的弱点可说甚少,因为日本资本家的组织太完备(如此次发动的内外棉,在上海十一厂,青岛三厂,日本二厂,在一个株式会社统辖之下,还有政府资本,势力已不可侮。这还不算,日本在上海不论是公家资本或私

人资本的纱厂已有同业的组织。这还不算,日本不论在国内的或国外的纱厂并有同业总会的组织,设在东京。)资本太雄厚(日本纱业资本雄厚,简直不可预测,在此纱贱花贵的长期恐慌中,就是英国纱厂也只有仅够维持现状的力量,不久以前,英商的老公茂纱厂股东大会还有收盘的消息。至于幼弱的中国纱业资本更不用说了,数年来倒闭者五六家,其余亦仅足自保。日本怎样呢?恰恰相反,不特可以维持,而且还有扩充,时常有收买中国纱厂的事,最近宝成纱厂亦被收买去了。大家疲敝不堪,而日本独游刃有余,可见其资本之雄厚。中国纱业资本亦正因被日本雄厚资本所挤,故陷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境。),行动太一致(此次大罢工消息传到东京后,该地纱业总会立电上海日纱厂嘱其“严厉对付,誓为后盾”。除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社长阿部彦太郎立即渡海来华外,该总会亦派出代表多人跟踵而至。扩大罢工后,资本稍弱的纱厂,颇有单独解决的进行(如大康),但旋即联合一致了。)后援太强大(他们不特有同业实力的援助,而且利用他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传统政策,利用政府外交,提起国际交涉,利用海军舰队,声称登陆示威。这还不算,英美帝国主义者扶植中国军阀构成内乱以各遂其私欲的政策上虽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剧烈之冲突,而在压迫中国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压迫中国无产阶级势力的政策上,却完完全全归于一,而采取联合战线。此次罢工,英美帝国主义一面在报纸上捏造许多谰言,摇惑社会观听;一面指使租界巡捕不断的捕拿工人领袖,调遣马队践踏工人群众,对被捕者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这还不算,又胁迫无耻的中国官厅执行与租界同样的残酷行为以摧残穷而无告的苦同胞。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武力的种

种后援无一不备。),工人在此种严重的高压之下,几乎无力抵抗,无法应付。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一方面激励军心,坚持到底,以博最后胜利;一方面扩大民族宣传,运用机会,引起其他日本纱厂工人之同情,相率罢工,以增厚其战斗力;并扩大民族宣传,取得社会上同情为有力之声援。再一方面,见到日本资本家最恐惧的是怕打坏厂中机器,于是工人又准对着这一个弱点猛攻,罢工的第二日,便乘其不备,率队打入第九厂第十三厂第十四厂,捣毁一些机器,以为暴力的示威,其后工人领袖暗中虽极力制止群众不继续“打厂”政策,而在外仍然扩大并普遍“打厂”的宣传,而以“里应外合”“从里面打出”做口号。日本资本家听闻之下,那得不魄散魂飞,心惊胆落?最后虽明知工人方面日就疲敝,只须再忍痛一星期,工人便须失败,然而亦不得不容纳调解者之请,与工人开对等会议,作相当的让步。苟不如此,工人愤气尚是填满胸臆,进得厂来,难保不再生暴动,后患在在可虑,前途不堪设想,这是日本资本家胸中雪亮的。

(六)有自卫的特殊组织——罢工起后,因为工人的大本营在纱厂的对门河中国地界,为租界权力所不及的地方,这个地方荒僻得很,仅有小小茅屋数十家,起初并未为中国官厅所注意。租界内的巡捕包打听和厂内的一切走狗,虽欲过河来摧残工会捕拿领袖亦不可能。于是想尽方法,则有收买大批流氓打手以求一逞之企图。再一方面,上海著名以破坏工人事业取得资本家津贴的工贼和国民党中所谓“护党”党员,又欲从中挑拨破坏,大发其传单,大肆其狂吠,无非是想破坏罢工,好向帝国主义请赏。工人在此四面八方破坏压迫之中,不能不有自卫的特殊组织,除总指挥处已秘密组织“护卫团”外,又公开组织“义勇队”。所有领袖

和加入做队员的,都要插血为盟,宣誓,其誓词如下:“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占面子不上工,保卫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这有此组织后,一班破坏奸徒,相戒不敢过河,于是大本营得以相安无事。

此外自然还有许多:如领袖到紧急时勇于牺牲,运用种种方法使有意破坏罢工的分子软化;善于收拾罢工;对军警煽动以减少他们被驱使来压迫罢工的愚蠢行为;利用民族口号抵制中国官厅之压迫……等等,限于篇幅,暂行从略。

惟有一事不能不再略为述及的,就是开工之后,资本家如不履行条约,如条约承认恢复工人工作,他虽不明白揭示开除,他却谢绝工人入厂,借此以探试工人的态度。工人在此时怎样呢?再罢工吗?“在一罢工胜利后,不宜紧接着惹起新的冲突”;不反抗吗?条约便从此宣告死亡。这次大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对于罢工中出力分子便是谢绝入厂,而且甘言厚币,使人啼哭不得。工会在此时唯一的方略,便是怠工。大家都入厂,只是不工作;表面上虽然机器开着,实际上没有半点出货。资本家也无法,终于不能不履行条约。这也是这次大罢工开工后对付资本家毁约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原载《中国工人》第4期

署名:中夏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 的几个重要问题

——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

(一九二五年五月)

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过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正是中国劳动运动发生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大会，影响所及，更使中国劳动运动更激成奔腾澎湃的怒潮，震撼一世，莫之与京了。不幸九个月，京汉“二七”惨变发生，而劳动运动为之一落，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随后虽随时因利乘便，企图改守为攻，究因外界的强暴压迫太甚，终未能恢复旧观。去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者亦因政局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说了。这个第二次大会，确实是一个中国最神圣最光荣超越一切的会议，比之军阀分赃丑声四播的什么善后会议，真是有一朵金花和一

团狗屎之别了。我们在这第二次大会里面，自然要把这三年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

鄙人不敏，且把我个人的见解，写在后面，贡献于大会之前。

一 组织问题

在我们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用说是“组织问题”。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是最少数，我们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我们向资本家反抗奋斗，往往是我们失败，资本家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旁的原因固然有，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好。

这是有许许多多的实例可以证明的。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事件，但是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乌合之众，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容让屈服，但这种“纸老虎”，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上海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所有罢工，十次就有九次失败，就是因此。所以我们人数虽众，我们如不紧紧的组织起来，组织得象军队一样，那么向资本家作战，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了。

这里分三段来说明。

(一)组织的性质与作用——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我们的

组织，决不是什么同乡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帮口的组织，他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是同一阶级，便应该不分籍贯性别老少都组织在一起。因为同一阶级的人，所受的痛苦是一致的，要求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组织是一个斗争的组织，显明些说，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本家作战的组织。只有我们的组织发展与坚固，才能战胜资本家，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之获得并保障。我们并且要从此种组织去促进我们所有工友更深切的觉悟力，去训练我们所有工友更勇决的奋斗力，在另一方面，故这种组织又是教育工人群众的。

(二)组织法的原则——组织法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产业组合”。什么叫做产业组合呢？比方一条铁路，是一个产业，所有机务处，车务处，工务处，养路处等等，都属于这一个产业。在这铁路产业底下做工的人，不论是在那一处，开车升火也好，打旗挂钩帮扎也好，修车擦车也好，火车上卖茶的也好，车站上帮运的也好；总而言之，都要组织在一个铁路工会里，这就叫做产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一种是“职业组合”。什么叫做职业组合呢？北方机器匠是同一个职业，于是各个产业中把机器匠这一部分的工人，分了出来，不论是在那一个工厂，铁路上的机器匠也好，轮船上的机器匠也好，纱厂里的机器匠也好，自来水厂的机器匠也好，造船厂的机器匠也好；总而言之，都组织在一个机器工会里，这就叫做职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

我们现在把两种组织法的得失来比较一下。(一)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因为他是以产业机关为本位的，并且是以产业类别而有全国组织的。反之，职业组合则完全相反，因其每一产业机关里的职业，少者数种，多者数十种，那

么以职业来区分,不是每一产业机关要组织数个或数十个工会吗?虽有以职业谋全国组织者,但是新式产业发达的结果,资本家的营盘(产业机关)是整个的,我们却由整个中划分出来,零零碎碎的结合,这不是破坏工人的营盘吗?何能损坏资本家势力之毫末!(二)产业组合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比方罢工,假如是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动作,资本家把它没法。反之,职业组合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贴,施以小计,便可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三)产业组合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因为厂中有熟练工与不熟练工之分,然而产业组合则不分熟练与不熟练,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组织在一起,所以不致再有等级发生。反之,职业组合却恰恰相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他们两者的工钱与地位是不同的,自然发生熟练工瞧不起不熟练工的坏现象。不熟练工依然是工人本色,依然谨守阶级战线,而熟练工却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了,却离去工人地位而附属于资本家甚或为资本家的走狗了。

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既如上述。但是职业组合在目前在有些地方亦有相当的用处。如手工业中就可采用它(裁缝店,理发铺,泥水作……等)。因为手工业的小工厂作坊采用职业组合,是没有害处的。并且可借此去改善那些“行会制度”,“公所制度”,引导它们从原始组合到阶级组合来。总结一句话,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若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合。若新式工业里亦用职业组合,直接是破坏产业工人整个的势力,间接

是帮助资本家,那是我们要彻首彻尾的觉悟的。凡新式工业中之已采用职业组合者,要赶快改变过来才是。

(三)组织的系统——一个军队,三棚(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才便于指挥,才能够和敌人作战。资产阶级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一天不倒,我们一天受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和他们作战。我们亦是一个阶级的军队呀!假使我们的组织系统,不与军队相仿,那么何从指挥呢?何从指挥去和资产阶级作战呢?我们因受不了暴虐的待遇,无情的压迫,天天高叫“打倒资本家”,如果组织不严明,不是放空炮吗?

工会组织的系统应该是这样:“支部”设“干事会”;干事会之上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之上有“工会执行委员会”,便成为某个产业机关的工会。再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支部”为基本组织,也叫做基本单位。依工作部分而分(如纱厂之粗纱间,细纱间,摇纱间,打包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等)。支部之下,可组织若干小组。人数不必拘定,少则五人,多则十人,均可(类似十人团)。由各支部下之小组代表大会(它是该支部之最高机关)选举三人组织支部的“干事会”,执行某一间或某一部的各项公务。由各支部代表大会(它是一厂的最高机关)选举五人或七人组织某厂“工厂委员会”,执行这一厂的各项公务。再由各厂代表大会选举七人或九人组织某产业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一个产业机关的各项公务。更进一步,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代表,召集全国大会,选举若干人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的“中央执行委

员会”，执行全国某产业的各项公务。

这里对于“支部”的作用须得解释一番。“支部”这样东西，它在组织上是有严重的意义，我们不可忽略看过的。因为新式产业的工厂里每一工作处是它的单位，我们就在每一工作处组织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便是工厂的核心。其职能有数种：（一）“支部”是工会的基础。只有支部组织好，然后上层构造的工会才不至于发生动摇，我们看见许多工会或是软弱无力，甚至逐渐解体，就因没有做建立基础——组织支部这一步工夫哩。（二）“支部”是训练工友的养成所。全体大会因客观情形之限制，是不容易开的，所以使个个工友都得着训练的机会，只有支部有可能，因为每日同在一处，人数也不甚多，所以开会是轻而易举的。（三）支部是便于战斗的武器。发生大罢工，固然要靠各支部羸勒部伍以听工会之指挥；如发生小事件，此小事件又仅限于某一工作部份（如管工打人或开除一二人等事件），那就犯不着小题大做，举行全厂大罢工。只由支部当工友入厂的时候，向工友说明事实，并决定本工作处举行若干时的罢工或怠工，这种威力是可制服资本家的。这种手续也不要多少预备，只数分钟便可以实现。所以“支部”在组织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工会公开的地方应该进行，就在严重压迫的地方亦极其适用。因为在严重压迫之下，工会即令不能进行，然而支部是潜伏于一工作份的小组织，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非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

关于组织的系统，我们还有两点要说：

一是“地方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个产业的工会，只要是

在一个地域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地方的“工团联合会”。二是“全国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种产业的总工会或那一地方的工团联合会,只要是在一个国境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业的“全国总工会”。

工人阶级要有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的理由,是很明白的。“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我们团结,不能存狭隘的眼光,以为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就满足了,我们还要扩而大之,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是整个的,我们工人阶级亦是整个的,我们如要推翻整个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须有整个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才有可能。你不看见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吗?不仅一个公司的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还有地方的全国的世界的组织。比方上海,纱业一项,日商华商各有“纱业联合会”,其余类推。此外各业联合组织的,外商华商各有“总商会”,各国联合组织的,又有所谓“万国商会”。工友们!试想:他们这样的严密组织,用这样严密组织压迫我们,我们已是难以抵抗,况且他们还有国家、政府、法庭、警察、军队,种种的组织,来重重压迫我们,我们如不有大规模的统一组织,以与之对抗,以与之搏战,试问我们工人阶级那能战胜资本家而得到解放之路呢?

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至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法及章程,我此地不能细说了。

二 经济斗争问题

其次，我们这次大会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斗争问题”。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人阶级的经济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确信而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此时亦应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奋斗，奋斗到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为止。

我们现在提出经济斗争的几个大的目标来：

一、八小时工作制——四十年来，欧美工人阶级即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至欧战后，资产阶级为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在所谓“国际联盟”里，规定各国皆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独日本与中国说是特别情形，规定十小时工作制。什么特别情形呢？真是日本中国工人的身体比欧美工人格外强健些，可以做十小时工作吗？不是的。不过因为中国日本工人的组织没有强盛，革命的潮流没有高涨，他们以为可欺，这就是所谓特别情形罢。可恶呵！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不能行，就是十小时工作制又何曾做到？请看国内工厂普通不是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吗？甚至还有十八小时的工作哩。而且都是整天的站立着作工。

孩童与孕妇亦然。一个人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疲倦辛苦为何如？无怪工人要得脚肿病肺结核病了。无怪工人死亡率要逐年增加了。至于工人因工作时间无教育，无娱乐，犹算小事。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第一要事，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二、最低度的工资——中国工资至不齐全，大概的标准是这

样：粗工：纱厂每月平均九元，钢铁及机器十五元。精工：纱厂每月平均十六元，钢铁及机器二十五元。女工童工，其工资更为低下。由此可知中国工资比世界任何国家为少。以日本资本家所办的纱厂做个例：在日本国内的纱厂工资，平均男工日币一元五十四钱六厘，女工一元二十二钱五厘。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工资，平均四十九钱五厘，女工四十六钱一厘。日本一工可在中国雇佣三工有零。中国工资如此之低下，何怪洋资本家不在华遍地设厂呢？当此百物腾贵，十年以来，物价均超重过数倍以上，然而工资并未增加，独身工人所得工资已有不能糊口之虞，若五口之家更何能免号寒啼饥之苦？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就是要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工资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此数。

三、反对一切虐待——中国境内不论是洋商的或华商工厂，厂家对于工人待遇异常残酷，克扣，罚工，非刑拷打，开除……种种暴虐行为，罄竹难书。工人的身体既遭涂毒，工人的人格亦被侮辱，言之伤心，思之下泪。工人出卖劳力而吃饭，竟受此惨无天日之虐待，真奴隶牛马之不如。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反对一切虐待，务要将厂中不合理之管理苛章与无人道之管工人员，尽行撤废及驱除。

（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资本家之喜用女工和童工，自然是因为他们工资极低，可以多得利润；体力较弱，可以任意欺负。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苦况，除掉受男工一般的苦楚以外，还有其他不可计数的痛苦。工资比男子成年工为低，而工时却是一样。此外女工遭管工之调戏侮辱，妊妇之无休息时间，不准携儿入厂哺乳；以及童工做笨重工及危险工，不仅妨害身体

发育,而且危及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中,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亦为必要。做同样的工作,必加至同样的工资,其厂中并为女工童工设置特别之设备与教育娱乐等机关。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只能作六小时工作,工资仍旧。

(五)劳动保险——劳动保险的范围,有健康保险,残废保险,失业保险,老年恤金,死亡恤金及遗族恤金等种种。试问中国工厂有实行者否?我们经济斗争,对此点亦宜注意,应限令资本家对于工人因工作上及其他故障,不能做工的时候,给以经济上的补助,以维持工人本身的疗治和生活,并减少工人家属生活的困难。此项保险金或抚恤金皆应由资本家完全负担。

以上为我们经济斗争之较大事项,其他暂缺不录。但是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些要求呢?据历来的经验与教训,磕头请愿是无半点效果的,惟有靠我们的组织力,利用时机实行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才能强制资本家屈服承认而执行。

至于互相援助的方法,则第一次大会“罢工援助案”所定者虽然简约,还可供参考。兹撮录于后:

“ (一) 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按此项条文现在当然要全改)。

(二) 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未了,我们须得郑重一说的,就是一个经济斗争,同时也是

政治斗争。我们千万不可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须知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之可能。所以我们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这是我们不可一时忘记的。

三 争自由运动问题

再其次，我们这次大会里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是“争自由运动问题”了。

我们工人没有自由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中国的临时约法，明明规定“凡是中华人民”的种种自由权，我们工人却被驱逐于“中华人民”范围之外，是不能享受的。你看，商人可以组织商会，银行界可以组织银行公会，教育界可以组织教育会……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组织会，只有工人不可组织工会，不是禁止，便是封闭。又看，官厅的小官僚可以罢官，学校的教职员可以罢课，甚至警察也可以罢岗……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罢，只有工人不可以罢工，不是捕人镇压，便是派兵打散。此外如开会，言论，出版，都是一样，只有工人没有自由。不但如此，他们还定了什么罢工刑律，什么治安警察法，以及什么取缔工会的种种条例，唯恐其不多，唯恐其不密。重重网罗，啼笑皆罪，你看压迫阶级是何等毒辣横暴呀！

我们历年来所受不自由的痛苦不少了，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阶级所迫切需要而不可少的东西，简直和菽粟水火一般。

有些朋友,以为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倒了,我们的敌人去掉了,我们从此可以自由了,北方不是逐渐恢复了工会吗?各处罢工的运动不是多半得了胜利吗?”其实这不过是这些朋友久困复苏后一种直觉的快感,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怎样呢?直系军阀的势力诚然颠覆了,杀我们的刽子手吴佩孚诚然倒了,但是我们在此时能够稍为发展,不过是继承的军阀尚有剧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发生新的变化,而国民革命势力亦有相当的增进的缘故。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安福军阀段祺瑞,以及其他新兴的军阀,能够好过于吴佩孚吗?帝国主义相互间在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尽管冲突,而对于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势力之伸张,是他们所能容忍的吗?我们真自由了些吗?请看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奉系军阀的爪牙(上海警察厅)是如何帮助外人压迫同胞?英美帝国主义的报纸和巡捕房是如何帮日本压迫中国人?工友们!我们仍旧没有自由呵!我们仍然要继续“二七”争自由的壮举而奋斗而牺牲。我们争自由的大目标是三个:

- (一) 组织工会的自由;
- (二) 集会言论的自由;
- (三) 同盟罢工的自由。

我们怎样去争得这些自由呢?我们这次大会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我以为下列几项是必要的:

(一)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它的总工会而起,然而它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

悼为我们争自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

(二)要求政府废除罢工刑律及治安警察法。可以联合各界表同情的人士共做。北京曾发生了过“废止治安警察法运动”，我们要连络各地各界做此项运动，同时并举。

(三)参加废止出版法这一类的运动。上海租界还有印刷附律，华人全体反对，我们亦应表同情并参加之。因为这些东西虽不为工人而定，然而于工人自由的剥夺，是与各界一样的。

(四)反对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工人协会法以及工会规程(湖南有)这一类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制定对于工人的法律，不出两个大原则：一、根本不愿意纯粹工人的团体成立(如会员要劳资合组或工人与高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合组之条款)。二、成立的可以随意由政府取缔和解散。所以这种法律有不如无。

(五)政府如制定劳动法或保护劳工法时，须准全国各地总工会代表出席，共同订定，否则，绝对无效。

(六)如政府制定何项选举法时，我们工人应发起争选举的运动。因为争得选举可以使我们的代表出席，可以将我们取得自由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议案提出，可以揭破压迫阶级的黑幕并监督其行动。此次军阀的善后会议通过之国民会议条例，不依孙中山先生之职业选举，我们不能承认。

四 参加国民革命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加国民革命

问题”，我们这次大会应加以详密的讨论，确定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态度。

“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各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目的各有不同：封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

就国民革命要求的本身上说，它虽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等）；虽只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并不没收国内一切生产机关；虽只主张建设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并不主张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制”；然而我们无不参加在国民革命中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之压迫，固然已可得到一部分的利益与自由，若是我们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表现独多的力量，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度工资的规定，以及取缔苛待，改善待遇，劳动保险等），不断的去奋斗，亦可

一步紧一步的去取得。就目前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它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所以我们可以大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国民运动如不顾及工人的利益要求，那便是假国民革命，不是真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是为了阶级利益而参加的。

复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达而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都给他们把持了，垄断了。政府、国会、法庭是他们的；工厂、机器、铁路、矿山、田地、船舶也是他们的；军队、警察、侦探和一切军需用品枪械、大炮、飞机、军舰都是他们的。他们有了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施行横暴无比的压迫与残杀。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因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阻碍而尚没有充分的得势，然而已经开始了。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末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所以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争斗，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争斗，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缘故，目前固踏踏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籍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现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就是国民革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一)固可使我们目前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得到若干的自由与机会，能够更使之格外发展，格外稳固；(二)并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

的取舍。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复次,更放大眼光来观全世界,我们又知道自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直接的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与政治,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之统治成了整个的,我们无产阶级对付他们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随之而异,如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虽然这两种革命之性质不同,而革命之目的却有一共同点,就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成熟的国家,同时却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一)可对帝国主义施以最大的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是维持帝国主义生命的源泉,国民革命把此源泉断绝了,帝国主义的江山去了一大半,不倒而自倒。(二)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势力更加扩大。各国无产阶级虽有国籍的不同,而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则一致。须得全世界联合起来,准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攻,并根本推翻之,然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三)即从消极方面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他们的老板就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老板打倒,擒贼擒王,那末国内的资产阶级亦容易连带的推翻了。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又是为的实行世界革命得到全

部解放而参加的。

总而言之,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它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它自己阶级的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它并不放弃阶级斗争,而且必要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它历史的使命。所以这次大会里,对于参加国民革命问题,应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决议,以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指导。

五 工农联合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要在大会里讨论的,就是“工农联合问题”。中国自从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一途。近年来如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已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而进入于经济组织与政治斗争,已表示他们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广东已有组织之十六万农民群众中可以看得出来。

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

我们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中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数量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本年(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与本会同在广州省城举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本会应与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彼此间结合之方法与互助之计划。

六 国际联合问题

末了,我们这次大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联合问题”了。

这里我们随便举出一二件极浅近的事实,可以证明国际联合之必要:

从经济斗争上说:比方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日本资本家破坏罢工之一手段,便是想从日本国内的纱厂中,调一批日本工人来华,替代中国工人;幸而日本工人深明大义,起而反对,于是资本家的鬼计遂不得逞。现在中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日本国内纱厂亦举行同情罢工,不是更足以制资本家的死命吗?

从政治斗争上说:比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劳农政府成立,于是各资本家帝国主义国家,大惊失色,调遣军队去打,特

别以英国政府为尤烈,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家起来反对,事遂终止。那时英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并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同时英国亦起革命,不是更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伤吗?

由此可见国际联合之必要了。我们不仅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而且扩而大之,全世界各国间的无产阶级要有总联合,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们掠夺无产阶级的方法国际化了。在经济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托拉斯,星迪加;在政治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国际联盟”。这些是它们集中力量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工具;在这样组织的下面,这国的资本家与那国的资本家连成一气,不分彼此的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假使我们工人阶级不越过国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我们真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欧美各国的国际联合,数十年前便已实行了,至一九二二年更有进步,各国组成一个“国际工会书记部”,此外各种产业还组成一些产业国际(如纺织工人国际,五金工人国际等)。不过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的影响,被出卖阶级的工会领袖们所破坏瓦解了。至一九一七年欧战告终,俄国大革命,于是国际运动又勃然而兴。

现在世界的工人国际有两个:一个在俄国之莫斯科,叫做“赤色职工国际”;一个在荷兰之亚姆士丹,叫做“国际职工协会”。这两个国际,我们究竟应该加入那一个呢?我们加入的标准,最好看它们那一个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原来亚姆士丹的“国际职工协会”,现在尚在社会民主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换句话说,主张维持资本制度,要工人忍耐着吃苦,好好替资本家作工,不要说话。社会民主党这种勾当,简直

是资本家的走狗,出卖工人阶级的蠹贼。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却不不然了,刚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反。它是主张工人要革命,因工人不革命,资本制度不倒,工人的幸福是绝对得不到一丝半缕的;工人如不欲解放而已,如要解放,除了革命,并且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绝不可能。所以它只主张工人统一的联合战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由此可看出谁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显明的路途上,我们是毫不犹豫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

我们这次大会固要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且对于与国际结成亲密的关系之种种方法,亦要有具体的规定。

原载《中国工人》第5期

署名:中夏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与海员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轰动一时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已经开过了。我想国内外海员全体同志对于此事一定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把这次大会的经过和成绩做一个简约的报告。

原来中国的劳动运动在三年前曾发生过一次高潮,发生的罢工,大小不下二三百次;组织在工会中的会员,共计已超过二十七万余人,在中国历史上放了万丈光芒的异彩。那时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代表一百五十余人,通过议案九件,并由大会决议翌年五一节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大会,不幸翌年二月京汉铁路发生争集会结社自由的大罢工,被直系军阀及驻汉帝国主义联合破坏了。是役被杀者四十余人,被捕者三十余人,被开除失业者千余人,影响所及,不仅北方所有铁路工会皆遭封禁,就是武汉、上海及其他各埠工会亦遭波及,幸免者,仅只湖南、广东、香港几处工会而已。工人阶级在此种严重压迫与摧残之下,不能不改攻为守,于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亦不能不归于停顿了。

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既倒,新兴的军阀与帝国主义皆

各发生新的变化，各在相持之中，工人阶级基于自身更严厉的痛苦，以及历年所得更丰富的经验，于是又乘时崛起，卷土重来。北方铁路工会也恢复了，上海又发生五万纱厂工人大罢工了，胶济铁路，北京印刷，汉口人力车夫与烟草，青岛纱厂，广东粤汉铁路，都先后继起罢工了，这就是说，中国劳动运动第二次高潮的潮信又到了，所以先觉的工人领袖，以为时不可失，以为我们工人阶级已进于复兴时期，实有重谋全国大联合大团结之必要，故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仍于本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

此次大会，计到代表共二千七十八人，代表的工会数有一百六十五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有五十万四万余人，所有重要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纺织等，皆加入；所有重要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长沙、青岛、济南、大连、北京、太原、郑州、九江、潮汕等，亦皆加入，总而言之，所有真正的工人团体，几乎全体加入，开会前后约十天，预备会议二次，正式会议九次，工农联合会议一次，五一大示威一次，五七工农兵联合大示威一次，行俄民授旗礼一次，公祭黄花岗一次，其余赴各界欢迎会十余次。通过正式议案十三件，其余临时案如援助罢工等约二十余件，各代表皆能抖擞精神，到底不懈，故能获得最圆满的结果，究其中成绩，尤为优美者，如下列数案：

(一)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决议案——中国的劳动运动虽有数年的历史，各产业及各地方虽有总机关的组织，然而全国工人的总组织，算是在此次大会才告成立。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解除工人的痛苦，要推翻敌人的特权，要造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唯一

的武器，就是团结。只有团结，才能集中我们全部的力量，才能统一我们全体的战线，才能一致向敌人进攻而立于不败的地位，所以这次大会决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谓深知当务之急了。

(二)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从前我们中国人的毛病，就是各自为战，彼此很少关切，姑不论全国工人的大团结，甚至在同一地方或同一产业，还有帮口之分，省界之别，此次大会算是更进一步，不特工人阶级要团结一致，还要与农民兵士联合起来。因为农民经济生活的痛苦，与工人完全一样，就是兵士亦多是从工农中失业出来，其痛苦并不在工农的痛苦以下。所以工农兵是自然的同盟者，应联合一致向我们的仇敌——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进攻，以完成中国革命。

(三)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赤色职工国际”，就是“万国总工会”，他成立已经六年了，会址在俄国之莫斯科，所有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完全都加入了，现在会员人数已达千余万。

(四)铲除工贼议案——资产阶级破坏工人势力的手段，一方面是利用他们的政权、军警、法庭监狱，以摧残我们；再一方面是豢养一班走狗，即所谓工贼，从我们工会中，以陷害我们。现在工贼几乎全国皆是，这几年我们工人的事业，如罢工，如工会，给他们破坏不少。此次大会，各省代表皆言各地深受工贼之痛苦，于万众愤怒中通过一铲除工贼决议案，其办法，一面将工贼姓名事实宣布全国；一面由各工团会组织“工人自卫团”以武力对待之。

除此四案以外，其余各案亦有极正确的决议，如：

如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是说明“工人阶级何以

必须作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工人阶级目前争自由运动的必要”。又如：

经济斗争决议案——是说明“经济斗争的意义”；“目前最急要的要求，如八小时工作，最低度工资，反对虐待，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劳动保险等”，以及“罢工互助的方法”。又如：

工会组织决议案——是说明那一种组织法好，产业组织是最好的，所有铁路、海员、矿山、纺织以及其他新式工业，皆绝对宜采用产业组织法。职业组织是不大好的，新式工业绝对不宜采用，只小工厂和手工业可以相当酌量采用。行会组织是最坏的，应该改造，才能真为工人利益而奋斗。此外关于工会之基本组织，以及政治压迫的地方之变相组织，亦有规定。如：

工人教育决议案——是说明工人教育是阶级的教育，以及一切办教育的大体方法。

此外对于广东香港工会之不统一，上海工贼工会之扰乱，大会亦有专门的决议案，指示其方针。最后一次的正式会议，通过一重要的宣言，并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这是此次大会的大概情形。

海员同志们：你们看了此次大会的成绩，一定要格外兴奋起来，我今将己所见，为我亲爱的海员同志告者，就是海员为重要产业之一，他掌握水路交通之权，他是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势力，他在1922年，曾有一段最光荣的奋斗历史，所以海员在此次大会后，尤应根据大会决议案加倍努力，并广为宣传，以完成在革命中的使命。究中有三点，尤是我海员同志的责任：其一，即须整顿本身的组织，我们海员从前的组织实在太涣散了，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的组织，往后应着手将每条船都组织一支部，

支部下每五人或十人组织一小组,以造成一个有系统而严固象军队一样的组织,夫然后才能作第二次的大奋斗。其二,即须与各国海员联合,一国的海员团结,力量固已伟大,然为求力量更加伟大起见,与各国海员联合就有必要了。虽然外国海员经济地位比较高,并不免有人种的界限,然而他们终是一样受资本家之榨取与剥削,他们自欧洲大战后不少已有觉悟而左倾了,所以与外国海员联合在现今实有可能,只看我们努力如何罢了。其三,即须帮助其他工人组织。海员因交通便利,来往全世界各大城市,眼界广,见识广,是别的工人所不能及的,然而正因此故,所以他应尽他的力量,帮助其他工人组织,特别是与海员密迩之码头工人和造船业工人要赶快帮助他们组织,所有的工人组织了,这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即须成功了,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可以完全达到了。我们现在高呼:

海员工会万岁!

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

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原载《中国海员》第2期

署名:邓中夏

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回想起来，三年前我们是何等幼稚啊！三年前我们曾在广州开过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但是那时候得到些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也议决了九个议案，究其中只有四个议案颇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罢工援助”；第二个是“八小时工作制”；第三个是“组织原则”，第四个是“惩戒工界虎伥”（即现在所谓工贼）；老实说，这四个议案都不完全，不能满足我们工人阶级全部的要求。然而那时候我们的知识经验，实在太缺乏，所以我们也只能得到那样的成绩。

现在却不同了，并且是大大的不同了。我们历年从种种的斗争中，得了许多正确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所以此次全国劳动大会，各地代表把所有得来的知识经验汇合起来，于是便成功了一个光华灿烂的好成绩，比之第一次大会，真是有天壤之别了。现在我提纲挈领的把他指明出来。

(一)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使命——关于这一点，第一次大会是没有说到的，不特没有说到，恐怕还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们如没有一个很明白很正确的决定，那么我们的斗争就失掉了意义了。此次大会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把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使命确定得很明白，说“帝国主

义及军阀统治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生路”；“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

(二)工人阶级的组织——第一次大会对于组织问题只不过确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自然现在还很适用，然而太简而不全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而且往往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三位一体”联合着进攻，我们工人阶级对付他们的唯一的重要武器，就是团结，所以组织问题在我们斗争中是再重要没有了。此次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不仅将工会的意义，组织的原则，说得非常确切，并且对于工会基本的组织，政治压迫地方的组织，工会统一的必要诸要点，亦有明确的规定。不但如此，我们又知道各业工人固要组织他本业的工会，以为保障自己利益的斗争武器，可是，仅仅本业团结，各自为战，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谋全国各业的大团结，结成统一的战线，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此次大会又通过一个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并且选出了二十五位同志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为大会闭会后全国最高指导机关。我们的各路司令部（各业工会）完成了，从此又有了总司令部的大本营（全国总工会）了，我们的队伍更是严整，步骤更是一致，战斗力更是伟大无比，这样，我们工人阶级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不是可以计日而待吗？

(三)工人阶级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也是第一次大会没有

说过的。所说到的仅只“惩戒工界虎伥”之一点。此次大会却通过“工农联合”，“工农兵大联合”“加入赤色职工国际”“铲除工贼”四个决议案，都是我们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策略。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一方面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必须扫除维持现存制度的一切反动势力。关于前者，在国内，应与经济痛苦相等的农民兵士联合，因为农民所受大地主的剥削与工人所受资本家的剥削是一样的，兵士多从工农失业出来，其痛苦亦不减于工农，或且还有过之，至受帝国主义军阀之压迫摧残，更是完全一致，所以工农兵是天然的同盟者。在国外，又应与经济痛苦相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因为各国的无产阶级亦受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残酷无情的剥削，至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更使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民众同受他们横暴无比的压迫，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民众又是天然的同盟者，此次大会议决工农联合，而且实际上举行两次工农兵联合大示威巡行，便是建立全国被压迫革命势力之统一战线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因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总联合机关，加入它，便是建立全世界被压迫革命势力之统一战线。关于后者，维持现存制度的反动势力，最与我们切近接触的就是所谓工贼。工贼受资产阶级之豢养与嗾使，专以破坏工人事业为职务，所以我们要先迎头痛击，铲除净尽的，也就是工贼。铲除工贼，便是剪除了资产阶级爪牙，清荡了我们进攻的道路。此次大会，决议铲除工贼，并列举最著名工贼之姓名就是为此。工人阶级的策略，我们在第一次大会时，只想到惩戒工贼一点，今则想到不仅要惩戒工贼，而且要铲除工贼，并且更进一步想到工农联合，工农兵大联合，以至国际工人大联

合,这不能不说此次大会有惊人的进步了。

(四)工人阶级目前部分的要求——第一次大会说到“八小时工作制”及“罢工援助”,仅限于经济方面的要求,而且只是经济要求中之一小部分,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则毫未提及。此次大会则更为扩大了。关于经济方面的要求,通过了“经济斗争决议案”,提出六项大纲:(一)最低限度工资;(二)八小时工作制;(三)反对虐待;(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五)劳动保险;(六)取消包工制。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则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之第三节,说明工人要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权以及普通选举。这些虽不是我们工人阶级最终的目标,但却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实现这些要求,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长我们的战斗经验,树立我们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的必由之路的第一步。

此外关于工人教育以及广东香港上海的特殊问题,亦有很切实的决议案,总而言之,所有的议案都是很精密的,切实的,正确的,比第一次圆满得多,进步得多。此次大会的真价值就在此,中国劳动运动前途的新生命也在此。

说起来中国劳动运动的进步,总算是很快啊。欧洲劳动运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有近代意义的革命的劳动运动,还不过近十年来的事。并且除掉俄国以外,其余各国恐怕还没有及上中国的。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很短,发生于四年前,勃兴于三年前,其中因外界政治压力太大退守两年。可见中国工人阶级之觉悟,革命之要求,奋斗之英勇,组织之进步,恐怕还有为各国所梦想不到的。如上所说各种决议案,无一条不充满了阶级

性,国际性,和革命性。就以奋斗而论,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铁路罢工,今年的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罢工,共计不下二三百次,然而却无一役不具足表现他们阶级斗争的精神,以致前仆后继,百折不回,没有屈服,没有妥协。又以组织而论,第一次大会时,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仅只二十七万,此次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已超过五十四万了。曾几何时,而有如此的进步,而且是经过政治压迫很盛时期得来的进步,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于前途抱无限的乐观了。

我还记得在审查组织问题的会里,我提议“这个议案中应该对于‘产业组合’‘职业组合’‘行会组合’加一种解释与批评”。国际代表奥君亦为审查员之一,他表示“恐怕中国此时还不懂得”。我对他说:“这些观念在中国已逐渐普及了,特别是北部和中部。”又说:“有一例于此,欧洲铁路工会往往是分开几个,然而中国却有一特殊佳像,所有机务、车务、工务各处工人几乎不分等级不分省界都组织在一工会里。就只有一路还未统一,反而是例处。”我又笑说:“列宁同志说‘落后的欧洲,先进的亚洲’,恐怕就是指这些罢。”他亦承认我的话极对。这不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故意引列宁同志的话以自饬自诩,这实在是一件不可磨灭的事实。我们把这次大会全部来看,更使我们不能不相信列宁同志的话是有正确的真理了。

诚然,此次大会通过这些决议案,都是很精密的,切实的,正确的,比第一次圆满得多,进步得多,但是也要看大会后我们执行得如何。我敢说,如果我们全国各工友不普遍的了解他,极端的信仰他,努力的应用他,那么他不过白纸上写上黑字罢了,有

何用处 所以希望全国各工友 ,要把此次大会决议案当作神圣一般 ,并且要把他一字一句都在事实上表现出来 ,那才可以继往开来 ,那才可以由此“ 奋斗 ,奋斗 ,奋斗到底 ”(大会闭会时齐呼的口号)以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 ,达到最终的解放。

我们在此高呼 :

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

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 !

中国革命万岁 !

工人解放万岁 !

原载《工人之路》创刊号

署名 :邓中夏

工人阶级与革命政府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革命政府就只有广东一个。

现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要把革命政府推翻,广东有几个不肖的反革命的军阀准备内应唐继尧作乱,革命政府现在已见儻然不可终日,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

革命政府既然势在垂危,我们工人阶级对于他应采取如何的态度呢?中立呢?拥护呢?我们说:绝对不应守中立,并且绝对应该拥护。

我们拥护革命政府的观点是这样,在消极方面说,革命政府虽然不是工农政府,虽然不是完全为工农谋利益的政府,并且还是宽纵军队、封船拉夫、抽税杂捐、苛虐工农的政府,还是宽纵资本家大地主无情剥削及压迫工农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何以我们要拥护他呢?简单一句话,就是革命政府虽然没有积极的替我们谋切身的利益,然而他却消极的给了我们应有的政治自由。全中国无一处不是对我工人阶级加以横暴无比的政治压迫,组织工会有禁,同盟罢工有禁,言论出版有禁,甚至捕之下狱,施以枪毙,我工人阶级实在疾首痛心极了。只有广东革命政府之下,我工人阶级,有组织工会的自由,有同盟罢工的自由,有言论出版自由,只此一点,算是我们对革命政府差堪满意

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对于他表示同情,愿出全力予以援助。

再就积极方面说,革命政府一旦消灭,起而代之者就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所御用的反动军阀。那时反动政府成立了,于是日英帝国主义可以教唆指使他们以压迫工人,买办阶级陈廉伯可以重组商团以报复工人,广东工人在此时一切政治自由固然剥削殆尽,而且还有肉刑之惨,杀身之祸。再则“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机关,他有重大无比的责任与使命,他原应设立在地点适中的上海,只因上海是帝国主义窃据的地方,当然不容许与他成为劲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存在,所以才孤悬于交通太远之广州。一旦反动政府成立了,则“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不能在广州生存。这样一个与全国工人阶级有切身利害的领袖机关,如不能在广州生存,则是全国工会皆须受不可思议的影响与损失。我们为广东工人生命安全与全国工会地位稳固计,认为保护革命政府,是我们唯一自救的出路。所以我们对于革命政府要出于断然的拥护政策。

我们拥护革命政府的观点既如上述,我们愿意率领着全国总工会之下所属的五十四万工人群众,提携着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之下所属的二十一万农民群众,协同革命政府,以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所勾结之军阀唐继尧及其党羽之反革命派,决一死战。

不过,我们在此对于革命政府不能不说几句话。就是军队的封船拉夫、抽税杂捐以苛虐工农的行为,和资本家大地主无情剥削与压迫工农的行为,虽然不是革命政府的意旨,虽然革命政府还有尾大不掉威令不行不能以制止彼辈暴虐的苦衷,然而既为革命政府,则应为最大多数的人民——即工农——而出于决

然的奋斗与牺牲，不能借故而为自身推卸责任的掩护。往者已矣！我工人阶级愿出全力，以拥护革命政府，亦望革命政府事定之后，不要仍蹈故辙而取消极不顾工农疾苦的态度，听所有一切反动势力之横征苛待犹然留存。

原载《工人之路》创刊号

署名：邓中夏

勸 国 民 政 府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

国民政府已于昨日十二时正式宣告成立了。昨早省港罢工委员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通知罢工工友一体前往表示热烈的庆祝。但是我们工人阶级明知现在的国民政府，并非工农自己的政府，为什么要表示热烈的庆祝呢？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讨好献媚于衮衮诸公，我们是认为在帝国主义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积极屠杀情形之下，中国被压迫的人民需要一个真正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谋中国民族解放之国民政府。北方政府只知媚外卖国，当然负不起这个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只希望于昨日所宣告成立的国民政府了。

国民政府首先要知道他何以能够产生？一方面是靠与我们经济生活相等的兵士兄弟们之勇敢善战，流血牺牲，把假革命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打倒；又一方面就是得我们工农阶级最大的帮助，“粤汉”“广九”“广三”罢工，尤其予假革命军阀致命的打击。因工农兵之联合努力，把杨、刘打倒了，国民政府就应运而生了。这是很显然而不可磨灭的事实，我们料想当政诸公是不能不绝对承认的。

既如此，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应怎样呢？我们提出两个要点，请国民政府注意：

第一，应立即实行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全国国民之共同的迫切要求，如果国民政府不立即实行宣布废除，特别是不立即收回沙面，便不能代表国民的真正意思，便是假国民政府。

第二，应诚恳为工农阶级谋利益——工农阶级占国民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号称国民政府自应以此占国民人口绝对多数之利益为前提。如果国民政府不为工农阶级谋利益，特别是不以政治的物质的援助这次省港大罢工，便不能代表国民的真正意思，便是假国民政府。

我们将此两事以勸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是否代表国民的真正意思而努力奋斗，不久自然有事实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此刻不愿预猜。假使国民政府真能完全如国民之所希望，那么，我们绝对多数之国民——工农阶级——自然愿出死力为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国民政府的后盾。我们在此高呼：

庆祝国民政府成立！

打倒帝国主义！

永绝反动势力！

民族解放万岁！

国民自由万岁！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9号

署名：邓中夏

在省港工人代表 联欢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诸位工友：今天省港工友开联欢大会，是很难得的，兄弟很高兴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形报告各位知道。全国劳动大会已开过了二次了，第一次是前三年的五月一日，第二次是今年的五月一日。为什么隔三年才开呢？我们知道，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共同压迫的国家，我们时常受他的摧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决议翌年在汉口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幸翌年便发生最可痛心的“二七之变”，京汉工友为了要成立总工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不准，京汉路举行大罢工，为争自由而奋斗，结果被汉口英国帝国主义嗾使军阀吴佩孚打灭了。是役被枪击毙四十余人，斩首数人，法律顾问施洋同志亦遇害。从此次罢工以后，京汉及武汉的工会完全被封禁，北方各铁路各城市亦连带受其影响，由公开变为秘密。我们经过二年之严重压迫，到今年才能继续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去年冬北京政变，军阀吴佩孚曹锟倒了，曹吴倒了不算什么一件事，就无人压迫我们了吗？不然。不过曹吴倒了，(一)新兴军阀的势力尚未稳固，无暇压迫我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在政治上的势力也发生变化，无法压迫我们；(三)国民运动的势

力却高涨起来了,中山先生北上更使北方的民众觉醒。有此三因,我们工人阶级于是利用时机,重振旗鼓,又由保守的状态而变为进攻的形势了。北方自北京政变后,今年春北方铁路工会完全恢复,上海纱厂发生五万人的大罢工,北京武汉山东各处也发生罢工,证明我们到了复兴时期了。但各自为战,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全靠工人大联合,共同作战。第二次劳动大会就应时而生,就是为了完成工人阶级大联合的目的。这次大会开了十多天,各重要产业以及各城市都有代表参加,总共到代表二百七十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五十四万。这次大会是很有成绩的,通过议案十三个,个个都是重要而切实的。这次大会的几个大结果,一是全国工人大团结,组织成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二是工农兵大联合,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阶级一致起来,共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中国工会一致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一种策略,我相信人家都很赞同的,因为他实在是解放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出路。其中还有为了广州问题与香港问题的两个决议案,决议的意思是第二次劳动大会听了香港广州的工友代表报告,工会很不统一,所以要混灭门户之见,统一起来。但从大会到现在已二月了,仍未能实行,希望今天的会是实行决议的第一步。如果不去实行,决议案不过白纸写成黑字,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我要不客气的将不能统一的原因说说:广东最不好的最可痛心的现象,就是工会与工会之争,如土木建筑之争,茶面粉之争,锦纶机织之争,油业机器之争,中山县鲜鱼之争,果菜之争。为什么工会与工会发生这么多的争执呢?第一原因,是工人不明白工会的组织,第二次大会明白规定工会是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斗争的团体,不是工会内自相争斗的。其组

织原则如下：

(一) 凡新式产业，须绝对采用产业组合；

(二) 小工厂手工业，可酌量采用职业组合。

平心而论，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何以呢？如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车务、工务、养路各处的工友，都加入铁路工会，这就叫做产业组合。若以职业分组，则铁路上之木工、电器工、机器工、与轮船纱厂船厂之木工电气工机器工，各组织木匠工会、电气工会、机器工会，乃叫做职业组合。我们比较一下，如系产业组合一致起来罢工，一定可致资本家的死命，职业组合则因势力之分散，就不可以了。不过职业组合，也有相当的用处，如小工厂手工业，他们若是每一个机关组织一工会，力量就小了，一定要联合起来，按地方组织一工会，如理发工会，铁匠工会等。试问几个建筑工会为什么不可联合，茶居面粉为什么不可联合，这都是因为不明白组合的道理。第二原因就是广州有政治自由，工人谋自由组织工会，资本家无可奈何，所以资本家只好利用或另组别的工会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工会内的领袖，论理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工人谋利益，不要为谋自己个人的利益，然而有些工会领袖，却不是这样，专门为了个人地位，用工会打工会了。第三原因就是无工会统一的机关，如是一班官僚从中偏袒播弄，引起工人自己打自己，前几天工人打死自己工人，这是如何不幸的事，如果我们工人被资本家打死，是很快活的，现在却自己打自己，同是被压迫阶级的苦兄弟，而自己打起来，无怪资本家在那里狞笑道：“请看！神圣打神圣，好呀！”工友们！你们听了惭愧不惭愧？痛心不痛心？现在有二件事要希望各位不可忘记的。

第一,广州有政治自由,我们要更加努力去整顿我们的组织,统一我们的组织,你们想北方各地工友,没有政治自由,是何等痛苦呵?你们为何还要自暴自弃。

第二,罢工是对付敌人的,今则以罢工对付自己兄弟,不要被全世界的人笑死。

最后,我希望从今天起,大家彻底觉悟,痛改前非,整理工会的组织,促成工会的统一,然后今天的联欢,是永远联欢。联欢者,联合则欢也,反面就是离苦,分离则苦也。工友们!大家努力!我在此高呼敬祝:

广州工会统一万岁!

香港工会统一万岁!

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原载《省港工人代表联欢大会特刊》

怎样实行工农联合？

——马上组织“农村宣讲队”到农村去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工农联合”这一个口号，自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已经是普及于全体工友，个个都认为是我们解放路程上所必要采取的策略了。

农民真是我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他们是受大地主的剥削与压迫，我们是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所以他们经济痛苦与我们原无两样。至于受军阀官僚之无情蹂躏，帝国主义之肆意侵略，他们与我们的政治痛苦更是一致了。

农民是我们的助手，我们须得亲密的联合起来，以打倒一切压迫我们的特殊阶级。

可惜这一次我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农友们因为地理上有限，尚不十分明白，间或有少数农友为了些微私利，偷运粮食出口情事，所以我们必得要派人到农村去宣传，自然可借以纠正少数农友之错误行为，也可以从此结成工农阶级之联合基础。

所以“农村宣讲队”有必要了。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有见及此，要我们派出工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两周，即便出发，这实是一件很急切很有价值的事，热心的工友们，幸勿轻易放过！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34 号
署名：邓中夏

呜呼廖仲恺先生之死！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廖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遵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政策、遗嘱而奋斗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这样一个意志坚决一往无前的革命者，自然是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反革命派之军阀政客官僚的眼中钉。这样一个尖锐锋利的眼中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反革命派，要置廖先生于死地，乃是自然的结果，决非偶然的事实。

不幸前日上午九时廖先生果然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派帮凶刺死了。我们听到这个噩耗，只觉得有无限悲哀！但并不觉得十分可怪，因为廖先生早为帝国主义走狗必欲得而甘心的人物，一旦被杀自在意料之中也。自省港罢工发生后，廖先生尽其力之所及以援助罢工工人，香港帝国主义百计破坏无效，于是乃变计，而收买反革命之军阀，包庇粮食出口；挑拨一二个商人，破坏运输限制，犹以为未足，又勾结反革命之政客官僚，用最下流无耻的手段，杀死我帮助罢工之重要人物。帝国主义者聪明绝顶极了，采用“以华制华”的政策，只略为施展手段，“蠢尔”华人便要“窝里翻”，好破坏我们罢工的战线。只可恨这些反革命之政客官僚，只知自己的私利，决不顾全国家的大计，甘受帝国主

义之嗾使，竟为其刽子手亦所不辞，呜呼！人心之不同有如是耶？又何怪廖先生终因此而死。

廖先生死矣，但是廖先生的奋斗精神不死。国民政府以及各界同胞援助我们罢工者大有人在。我省港罢工工友应毫不灰心，应为廖先生复仇，打倒杀害帮助罢工最力的廖先生之主谋者。我省港罢工工友应继续努力，应本廖先生奋斗精神，坚持罢工到底，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后目的。我们高呼：

廖先生奋斗精神不死！

我们为廖先生复仇！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

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59 期

署名：邓中夏

对苏俄全总机关报编辑 瓦克索夫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苏俄全国总工会机关报编辑瓦克索夫特访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邓中夏谈话。兹纪其问答之一部分于下（瓦君问，邓君答）：

问：你们为什么罢工？

答：为上海、汉口、青岛各处同胞被帝国主义屠杀，故我们为民族生存计，不能不举行罢工，对帝国主义野蛮残暴之行动，实行严重之抗议。

问：罢工的目的是什么？

答：根本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之侵略。帝国主义凭借此不平等条约，为侵略中国之凭证，吾人不根本取消之，则吾人连初步解放亦不能达到。吾人此次罢工宣言，亦曾简单叙明过，对于上海惨案，绝对须援助其达到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件，对于沙基惨案，绝对须达到革命政府所提出之五条件，对于香港本身，绝对须达到我罢工工人所提出之六条件。其详情请阅吾人罢工宣言。

问：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计划如何？

答：本会自本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为时甚暂，

在刚成立时,曾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格拉同志商量本会目前的进行计划。在理本会当设在上海,因上海为一大实业区,有纯无产阶级五十万余人,况彼处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对于北方中部的职工运动容易指导。惟上海无政治自由,故暂时不能不设在广州。虽然,吾人亦虑及北方中部之指导工作,乃有设立上海办事处,鄂湘及北方铁路,设特派员之两种补救方法。并决以宣传部移往上海。此外因职工运动人才缺乏,拟在广州开办工人班二班,郑州一班。惟因本会刚成立时,广州遂有刘、杨之战争,旋又有省港之罢工,本会全副精力专注于此,故所谓目前计划尚未完全实现。俟省港罢工终了后,最先实现前定之目前计划,一面扩大宣传;一面整理及统一组织。如有可能,本会终须移沪也。

问:中国工潮正盛,贵会是否有使所有工人加入工会之计划?

答:然!吾人虽当千慌百乱中,仍不忘此点也。惟省港与上海稍异,上海工人多未加入工会,省港工人未加入工会者甚少,故本会对上海则注意工人加入工会;对省港则注意整理统一工会。所惜者,人手太少,力有未逮耳。然而吾人亦尽其可能以图之。

问:工人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责任如何?

答:我们自从受赤色职工国际指导后,我们确信赤色职工国际所指导的是绝对的对的。赤色职工国际指导中国工人有两重责任:一是参加国民革命;二是不忘阶级的经济斗争。我们现正根据此两原则从事奋斗,我们明知工人阶级最后之解放,是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明知国民革命不过仅仅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非根本推翻资本制度;然而我们确信在半殖民地的

中国,国民革命实是工人阶级最初步之解放,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参加,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我们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责任,不仅只是帮助,我们还须领导。这不是我们自夸自大,请看此次上海惨杀发生后,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然而最先妥协软化的就是商人,学生亦有疲倦的趋势,只有我们工人却坚持到底,至今未屈。所以我们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事实上已成了主力军、领导者了。但我们决不想包办,仍想尽方法,务督促联合各阶级一致奋斗,因为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共同努力才容易成功的。

问:你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目的认为是什么?

答:简单一句话:是联络全世界工人阶级,实行世界革命,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社会。

问:你对于赤色的职工国际“统一战线”的意见如何?

答:我认为是绝对的对的。阿姆斯特丹的黄色职工国际,坏的是领袖,然而其下广大的工人群众都是需要革命。我们不能因为他的领袖卖阶级,不好,于是把他所统御下之革命工人群众也憎恶而不齿了。我们正要用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方更易使世界革命得到成功。这个政策固是工人群众所需要的,然而也是卖阶级的黄色领袖们不敢反对或不能反对的,所以好。自此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后,乃有英俄两国职工之携手,其前途真可乐观了。但以交通断绝,英俄职工之详细经过情形,以及条约内容,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请作一文交《工人之路》刊登。(瓦君答应在途草好寄来。)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68 期

吊 陈 锡 烈 士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纠察队队员陈锡在深圳前线被英兵开枪打死了。他之死,在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有重大的价值。

人谁无死?自省港罢工以来,我罢工工友病死者已有数人,除亲友外,其余多不知其姓名;可是陈烈士之死,全体工友都表示震悼!其价值可想而知是重大的了。

陈烈士是直接死于帝国主义者枪炮之下,与上海沙基等处诸烈士同,我们旧仇未复,新恨又来,帝国主义者之肉其足食乎?

我们明知香港帝国主义自海道断绝以来损失已快到三万万了。“香港变臭港,臭港变荒岛”,乃计日可待之事。我们罢工,便是一种不必开枪发炮的战争,这种战争比开枪发炮的战争尤其利害。香港帝国主义无可如何,但损失之痛苦与日俱增,其必欲寻衅与我开枪发炮一战,不知有多少日,多少次了。我们知其诡计,力求避免,并非示弱,诚以我们攻打敌人另有利器在,这利器就是罢工,已足制帝国主义之死命而有余哩。

前数日,香港西商又开什么公民大会议,电请英国首相致哀的美敦书于我国,要求开战,以为恫吓;从此可知香港帝国主义者已陷百无聊赖的可怜之境,所谓“黔驴之技已穷”,挑衅已为开战之地步,又何足怪!

虽然！陈烈士因此而牺牲了，我们一面请求政府提出国际交涉，一面另筹替烈士复仇的必要手段，决不因其故意挑衅而与之战，以上其当。即战，我们决不作一时血气之战，而必为大规模有准备之战。

呜呼！陈烈士死了！我们哀悼！然而这并不足使我们灰心，反足增加我们的勇气。诸位工友呵！我们继续陈烈士之精神，奋斗到底！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69 期

署名：邓中夏

三个月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们罢工三个月了。但是我们在三个月内已经得到的胜利是什么？举其大者有五：

第一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打击”。

据海关贸易册，香港进出口货价值每年一十五万万。自从我们罢工，海运断绝，每日损失四百万，每月损失一万二千万，三个月损失共是三万六千万。这一个数目是很可惊的，自然要使得香港帝国主义恐慌万状，神魂颠倒，而有电请英伦向广东宣战以求一逞的荒谬举动。可是英伦政府一因本国社会革命与所属殖民地民族革命之触机即发，二因与美日法帝国主义种种利益冲突之不能协调，终于不能让香港圆成宣战的好梦，这已不能不说是可怜到极顶了。看呵！香港政府财政方面，到了破产的地位了，未罢工以前在银行存储的一千七百万都用得精光了，各种税收因罢工没有丝毫收入，不能不出于裁员减薪之一途了。又看呵！香港商务方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位了，银行一家一家的不稳了，商店关门的，据拍卖场确实报告已有三百七十余家了，报穷案一天一天的加多了，据老于商务的人说，到中秋节至少要倒闭一千余家了。可怜呵！罢工工人一拳打中

帝国主义要害处，你说痛楚不痛楚呢？使帝国主义受一个空前未有的经济大打击，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

第二个胜利，就是“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

我们还记得，在未罢工以前，要打就打，要捕就捕，要驱逐就驱逐，要开除就开除，他们何曾想得到中国工人有什么可怕呢？他们更何曾想得到中国工人有反抗他们的勇气与力量呢？好！上海惨案发生，全国民众一致崛起，霹雳一声，他们的顺民香港沙面的中国工人也起来与他们对垒了，到现在已打了无数回合了，而且在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当中，做冲锋陷阵的先锋者与不屈不挠的决死队了，从前被人所奴视的工人阶级，到此时一跃而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从此以后，恐怕帝国主义再不敢象从前以无理的态度以对待中国工人罢！恐怕工人此后如有要求，帝国主义也不能不要加以一番考虑了罢！使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增高了地位，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胜利。

第三个胜利，就是“世界工人同情的援助”。

从前我们中国工人不知受了帝国主义多少的剥削与蹂躏：比方我们工钱不论是如何的少（只抵得外国工人三分之一。）工作时间不论是如何的多（普通十二小时，甚至有十八小时者，外国工人普通八小时。）待遇不论是如何的坏，（工厂卫生丝毫没有，多有因此而疾病死亡。）总之，不论是过如何非人的生活，世界工人是一点都不知道的。我们为解除这些切身的痛苦，不知起了几百次的反抗运动，终于因为电报通讯机关都在帝国主义的手里，不能使这次运动真相传播于世界。所以世界工人都不知道，对于我们同情的援助也没有了。此次罢工，雄鸡一声，天下皆白，全世界工人皆了然中国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如何的虐

待与残杀，皆了然中国工人是如何勇敢与牺牲，于是风起云涌都起来援助我们了。工农立国的苏俄，不用说是全国工农大声疾呼，或举行示威，或开会讲演，或散布传单，或募集捐款，用全力援助我们。就是英国的工人也组织“勿侵略中国会”向他们政府抗议，不准压迫中国，更不准以武力压迫中国，否则，当举行罢工或即起革命以对待之。又如日本的工人，他们的全国总工会（叫做劳动总同盟），亦一样对中国表示同情，向他们的外交部（叫做外务省）提出严重的警告；并一面招待在神户登陆之中国海员回国，制止日本海员代替工作。英日两帝国主义因本国的工人工会工党群起援助中国，并反对其侵略的残暴行为，于是不能不稍有顾忌。其余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对中国工人表示无限之同情，更不用说了。我们此次罢工，四海闻名，得到世界工友同情的援助，真不难从此与各国无产阶级携手，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呢。这便是我们的第三个胜利。

第四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

固然上海惨杀案，沙基惨杀案，帝国主义还未肯承认我们的条件，不过帝国主义见我国民气如此的兴盛，罢工工人的态度如此的坚决，也不能不寻找一个方法，表示相当的让步。比方关税准附加百分之二五，乃四年前华盛顿会议决议的，论理关税应由中国自主，仅仅加一点入口货税，实在不合理之至。然而就是这一点最低限度的二五附加税，帝国主义就推三推四，不肯实行。中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官老爷们不知在帝国主义跟前陪了多少小心，说了多少乞怜的话，鞠了多少躬，可是帝国主义睬也不睬，此事迁延四年了，现在帝国主义忽然记起来了，准开关税会议了。然我们明知道帝国主义准开关税会议的用意，是在以一点小小

的利益,软化中国的军阀阶级大商买办阶级和高等知识阶级;并以此一点小小的利益,为换取扑灭中国国民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交换条件,实在帝国主义已不存好意。然而我们不能不说帝国主义这一个相当让步的关税会议,实由我们罢工力量所得来的。假使没有我们罢工,不怕外交官老爷们,再在帝国主义跟前,陪小心,乞怜,鞠躬,恐怕终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罢。由此可见我们罢工力量是如何的伟大!这便是我们的第四个胜利。

第五个胜利,就是“国民革命势力的稳固”。

这一个胜利更重要了。我们都知道自从孙大元帅凭借广东举行革命以来,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是如何的恐慌,于是千方百计谋破坏这一个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如勾结陈炯明造反,便是一个显然的例子。孙大元帅便因此被陈逆急死了。幸而大元帅死了未久,东江一战,把陈逆势力打碎。随后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又勾结刘杨,幸而六月一战,把刘杨势力根本铲除。但是反革命的军人政客官僚,仍栖息于革命政府旗帜之下,直接阻碍军政财政民政之统一,间接破坏省港之罢工,受帝国主义之运动,日谋推翻国民政府,首先便刺杀主张财政统一与帮助罢工最力之廖仲恺先生,幸而觉察得早,八月二十五日以来,逐渐把反革命的势力解散,领袖捉拿,于是反革命势力乃消灭一大半。这虽然是政府之心灵手敏,可亦是我罢工工人之极力帮助,所以肃清反革命势力才有如此容易。从此国民政府稳固得多了,如果我们人民与政府合作,不难统一广东,完成一个崭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稳固了,我们罢工更不怕动摇了,我们一定得到胜利,并且胜利一定可以保障。这便是我们的第五个胜利。

上述五个胜利是从这次罢工得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此

次罢工有相当的成绩。假如我们再继续努力,使帝国主义屈服,承认我们提出之要求条件,那便是我们完全胜利。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89—90 期

署名:邓中夏

罢工政策及其胜利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各位工友，现在我们罢工已得到很多的胜利了。得到胜利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政策好。譬如打仗，政策好的必可以打胜，政策不好的必要打败。我们这次罢工，所以能坚持三个月，一些都不动摇，第一个原因，可说是我们工友的齐心，第二个可说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好，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政策。

各位工友！我们的政策，自罢工到现在，究竟有多少呢？

第一个是封锁港口，截留粮食。大家都知道香港这个地方本是不毛之地。所以我们当罢工之时，第一个政策，便是用截留粮食方法围困香港。譬如深圳方面，有一百六十里地方，我们便派二大支队出防，同时政府也派军队帮助我们，于是深圳的粮食不能到香港去了。前山方面，与澳门接壤，香港虽然断绝，澳门如不封锁，则香港食物仍可由澳门运去，所以我们也派纠察队去防备了。其次如容奇，江门，石岐，我们也派人去截留。海口既然封锁，粮食又不能去，香港当然发生恐慌了。我们自施行这计划以来，香港什么东西都没得卖。猪肉从前几毛钱的，现在非一元以上不可得了，牛肉则简直买不着。什么食物都没有了。从前香港猪肉本是市场卖的，不到街卖的，现在港政府却

使人担在街上叫卖，表示香港尚有些猪肉卖，其实香港困苦极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第一个政策“截留粮食”已得到胜利了。

第二个政策，就是香港因为没有东西吃，于是勾通琼崖邓本殷，请其包运粮食，其次则勾通反革命军队，如江门的梁鸿楷，包运粮食出口，这是香港政府的补救方法。初时我们看见帝国主义的破坏政策，一定要用方法抵制他。怎样方法呢？就是把许多反革命军队解散，所以我们从前的口号是肃清内奸。大概我们工友，还可记得在公园开会，请愿政府肃清东江陈军余孽，及琼崖邓本殷，其实便是肃清内奸。我们所以要肃清内奸，就是对付帝国主义。那时政府还没有决心，但是我们工农已看到了。政府于人民请求之后，即下决心，要实行我们的要求，不料那时广东政府尚有许多反革命派在内，政府虽然想肃清，但是做不到。那时我们的廖仲恺先生，他做财政部长，和财政厅长，出兵要五十万元方能出发，廖先生知道此事的重要，必要扫清反革命派，罢工方可以得到胜利，所以马上将筹到的二十五万元，交到许总司令那边了，但兵未有发。我们试想政府讨伐命令下了，钱亦到手了，为什么兵还不发呢？就是因为广州有许多反革命派，不让政府去肃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政策还没有成功，自从廖先生被人打死之后，我们知道只有将反革命派解散才有办法，所以前月二十五号，那晚解散梁鸿楷林树巍反革命的军队，将魏邦平一般人悉数拘拿。我们问一问反革命派究竟肃清了没有，还没有。那是许总司令的错处了。这些反革命军队都是许总司令的部下，他不想完全解散，后来致发生莫雄邦润琦的叛变，图谋推翻革命政府。政府没法，只有再下决心，将邓莫军队再行解散。现在我们可说肃清内奸已成功了！革命政府

稳固得多了！罢工也稳固得多了。“肃清内奸”，我们便胜利了。

第三个政策，我们大家都记得，发出特许证的一事。从前为什么要发，后来为什么要废除，最后又为什么工商联合呢？那时我们看得很清楚，香港帝国主义破坏广州罢工，一面是勾结反革命派，一面很想唆使广东商人反对罢工。不错，商人很容易被帝国主义鼓动，因为商人因罢工影响，没有生意做，有两条路常摆在他们前面，爱国好呢？做生意好呢？后来一想，爱国固好，做生意更好。其次广东地方很多东西要外国来，亦非与外人通商不可。所以我们订立一种特许证。就是说不是英货英船不经过香港澳门的都可以来省。这样一来，香港更加恐慌了不得。这个特许证，一方面便利商人，一方面保障罢工。但是商人反对，一定要取消，他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过说手续太麻烦。我们说手续可以简单，手续费也可以取消，但是特许证不能取消。但是一部分商人还不谅解，拚命反对。我们当时觉得反革命派未肃清，不能取消，后来廖先生死了，反革命派肃清许多了，从此没有人可以掣肘，可以取消。取消之后仍有法子可以保障罢工。不但取消，我们顾念商人痛苦，而且提出“工商联合”口号。商人于是很高兴，愿意与我们合作，从前商人不高兴捐钱，捐了也不交我们，自从工商联合提出之后，感情好了，愿意加入反帝国主义战线了。各位工友，国民革命固然要工人阶级作先锋，但也要其它各阶级都加入来合作始可。买办阶级固然卖国，但是小商人中等商人是爱国的，我们应该一致联合他们去奋斗。特许证取消之后有“工商联合”，此政策是对的。从前帝国主义想利用中国商人反对我们，现在商人也帮忙我们反对他们了。前天各界大会有四商会打起旗子与我们游行，有商会代表到大会演说，这是

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是非同小可的事,因为广东商会从来不参加群众运动呀!从前帝国主义想利用他们,这一次反与我们联合了,这是我们政策好,这是第三个政策的成功。

第四个政策是怎样呢?帝国主义的政府很想把广东脱离中国以外,要单独来解决广东的事,他们的政策,是使广东孤立,使北方同胞不来援助我们,他便可以用武力对粤。我们知道了,于是组织“北上代表团”,要代表到上海,汉口,天津,联络全国的代表,在北京开会,要求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帝国主义承认上海沙基各处惨案的要求。北上代表团是很好的,是团结全中国人民对付帝国主义一个大的力量,从此北京政府不敢任意卖国,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各地惨案也可以解决,这就是我们第四个政策的成功。

现在再讲目前的情形,我们得到胜利是什么?

(一)使香港经济受一大打击。好久以前,我们说过香港罢工一日即损失四百万元,一月即一万二千万元,三月来已三万六千万元了。我们要注意,英国在南方货物每年不过销三千万,现在罢工三月,损失三万六千万,可说是我们已抵制英货十二年了。香港政府财政已破产了,未罢工以前,尚存一千七百万,现在则用得精光,一文也不存,只有出必裁员减薪之一途。商务一方面,据闻自罢工以来,已倒闭三百七十余家,天天有报穷的案子。银行都不稳固,要做生意也没有,轮船公司船没有开,每天都要拿几万银子来开销。现在有个美国轮船公司叫“大来”的,他想直接驶船来往广州,不经过香港。现在香港商务可说是破产。这一个大打击,比日本大地震还利害,这是我们罢工工人一拳打中英人要害,痛苦非凡,这是我们的大胜利。

(二)是使广州革命的基础稳固。从前广州政府是摇摆不定,危险万分。东江有陈军,南路有邓本殷,还有一些反革命在广州,都想推翻政府。这一回却稳固了,东江的陈军,现在已不值一击,南路邓本殷,也容易打下去,刘杨事变后已削去许多障碍,至于梁鸿楷林树巍莫雄邦润琦肃清后,广州政府千稳万稳了。广州政局稳固,罢工就可以胜利。为什么说广州政局巩固,是罢工工友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工友极力帮助政府肃清反革命派,更因自罢工以后,他们反革命派的罪恶完全暴露出来了,于是被政府解散了。为什么我们要政府稳固呢?就是政府曾极力帮助我们,接济我们的粮食,三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很优裕的生活,但也不致饥寒,其次截留粮食,政府派兵帮助,东园政府派兵保护,纠察队无军事学识,政府派黄埔学生训练,政府帮助我们,所以罢工如此之久,政府指导我们,所以政策不致错误,所以我们罢工工人,必定要拥护政府,政府巩固,我们才能胜利,即将来条件解决,亦要政府做后盾,才有保障,所以要使罢工胜利与保障罢工之胜利,都必须巩固政府。

其次尚有许多小胜利,如罢工之后,工人阶级地位增高,全世界工人同情援助,关税会议之得召集,(其好坏系另一问题,)刚才陈公博先生说,“罢工条件此时可以提出”。我们要知道从前回省罢工时,如提出条件,必定没有效力,因为那时时机不好,帝国主义尚有方法可以破坏我们罢工,他们想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罢工,如勾结反革命军阀政客推翻我们的政府,如想利用商人反对我们,现在他们的政策着着失败,我们的政策着着成功,罢工营阵日益稳定,日益坚固,帝国主义者已慌到不得了,但他虽尚不出口,我们一提出,他必要接受,不象从前他们尚有方法可以

破坏罢工的时候，可以不理我们，我们现在提出条件，他们只有承认，政治委员会知道时机已到，我们也知道时机已到，时机一到，不可放过，就要提出条件。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沙基案子，有北上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自然全在北京提出解决。他如承认我们解决罢工的条件，我们可以暂时休战，以准备第二次新斗争，因为他如承认我们条件，我们已是完全胜利了。如果不承认，则我们可以宣传英人的罪状，必可以得到全世界报纸的帮助，所以提出条件是与我们的利益很有关系的。这个时机很好，因为中秋节来，经济恐慌，所以他们很想解决。有的人说，为什么北上代表团还未取消不平等条约，我们就先解决吧，我们可以老实说，北上代表团至少去北京要六个月，在此六个月中我们要准备第二次新的大斗争。

有一个很确实消息，就是德国在六月后必有一个革命，英国工人也准备起来作一个很大的罢工，六月后必有一大变动，这是受了我们中国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原来我们此次大运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原是很表同情的，不过因准备不及，所以没有立时革命，闻现在德英两国正从事准备了，六个月后必有新的大变动，那时我们要准备大斗争，与世界联络一气，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提出解决条件，是很好时机，成不成我们没有损失，只有好处。政治委员会的眼光很远，他们所指导我们的，都得到胜利了。现在的政策，也必定可以使我们得到胜利。我们放胆做去。

我们高呼：

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我们对于东征的责任

——在广九铁路工人联合会演讲

(一九二五年十月)

诸位工友：今天兄弟得参加这个会是很高兴的。我想各位工友对于有一件事是很想知道的。是一件甚么事呢？就是省港罢工情形怎样？我们可以说：罢工情势是非常稳固的。各位一定在近来报纸上看见：香港中国商人派代表来省调停罢工。此种调停当然香港政府有意的，但香港政府是否就死心塌地来调和呢？尚早，因为香港政府从前虽用了许多政策失败了，可是尚有一个政策未曾失败，所以他还不能死心塌地调和。前者香港政府的政策：第一个就是利用广州反革命派，意图推翻国民政府，暗杀廖仲恺先生，便是他们阴谋之开始。结果反革命派被国民政府平定了，拘捕了许多反革命的官僚政客，还缴了许多反革命军队的枪械。这是香港政府第一个政策的失败。第二个政策是想利用广州商人来反对我们罢工工人，后来我们“工商联合”，广州商人非常明白，高兴与我们携手，不独不反对我们，而且帮忙我们，所以香港政府第二个政策又失败了。这些政策虽失败，可是他尚有最后之一政策，就是利用东江陈炯明来打广东。他这一个最后政策不用一用，他是不能死心塌地承认我们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省港罢工之能否胜利，要视我们能否

收复东江打倒陈炯明。东江的胜利，就是我们罢工的胜利。所以我们罢工工人现在正做帮助打平东江的工作。

诸位工友！这次省港罢工，要知道不独是罢工工人的问题，实关系广东存亡问题，再推而广之，实关系全国民族存亡及革命运动之生死问题。所以我们各界同胞（特别是工人同胞）都要以全力援助他们得到胜利，兄弟特地提出来讲，就是希望各位工友全力援助罢工工友的意思。国民政府明白这个原故，故此决意出师收复东江打倒陈炯明。

但是，诸位工友！政府此次出兵东江，非特为了省港罢工，实为了救援各界人民。刚才谭平山先生所说，汕头地方商场被陈军百般抽剥，又发行军用票，商民敢怒不敢言。假使来到广州，广州商民不要与汕头商民同一命运吗？所以出兵东江可以说是救援商民。再则东江农民又被陈炯明压迫，农民协会被封，农会职员被捕，或遭杀戮，东江农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出兵东江，又可以说是援救农民。并且汕头工友因反对帝国主义之残杀，亦举行爱国的罢工，但是陈炯明报酬香港政府，把罢工压迫下去，罢工委员会被解散了，职员被拘捕或赶走了，香港汕头交通已恢复了，陈贼已破坏罢工了，而且汕头工会完全被封。他一到省城，广东工会何能保存？罢工何能维持？所以出兵东江，又可以说是救援工人。总括起来说：此次出兵东江，实在是援救农工商各界人民。打陈炯明，是打反革命的罪魁！是打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打卖国贼！

东征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意义，是使国民政府财政军政统一之计划不至破坏，是使苛税杂捐不再发生，总归一句话，是使政府能够有一个平

安局面，得以实行建设事业。

第二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全工农的组织。因为帝国主义者告诉陈炯明说：“如不把工农团体破坏，你的势力是不能稳固的，”所以陈炯明敬谨承教压迫工农了。这样，陈炯明如不打倒，不独东江工农受苦，即广东全省工农都要被他摧残。

第三个意义，是巩固革命的势力，巩固革命根据地。孙总理遗下这一个革命政府，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日夜设法推翻他，至再至三，连年未已。我们知道广州革命基础稳固，必须统一广东，然后才能出师北伐，会师武汉，打破北京，扫清全国的万恶军阀，谋全国之统一，打倒世界万恶帝国主义。

有这些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非收复东江不可。所以收复东江，不仅是为了东江，也不仅是为了广东，实是为了全国，为了国民革命的成功，为了反帝国主义的成功。诸位工友：我们又要知道这种责任不独政府要负担，就是我们人民大家都要负担。所以收复东江唯一成功的原则，就是工农兵大联合与政府军队合作。现在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农民也帮助党军做向导或内应，工农兵大联合此次可真是完全实现了，工农兵大联合不特可以打倒反革命派！还可以打倒所有一切的军阀及帝国主义！

诸位工友：广九铁路是到东江的铁路，故应特别努力帮助党军。东江胜利，即人民胜利，即国民革命胜利。东江战争关系既如是重大，我广九铁路工友在打反革命杨希闵、刘震寰的时候，曾出过力，立过功，我想诸位工友在此次东江战争必更努力！使东江战争早日胜利。（下略）

原载《罢工与东征》
林昌炽笔记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 联席大会上的演讲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

今天兄弟乘此盛会，亦拟说几句话。此次反对帝国主义罢工实力的宏大，无论是谁，都已知道。即才来省之港商代表，亦都知道。兄弟今日以同胞的资格，与港代表说几句话。我们很欢迎港商同胞到这里来和我们联络一齐救国，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得的，其中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同是中国人，应该同爱中国，方可以恢复国家自由平等的地位。在此时期，我们的势力，已非常发展。现在我们有三个大目的：第一是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二是解决上海、沙基等处的惨杀案；第三是解除我们目前的痛苦。现在我们已有了办法，对于第一、第二两项，已交托北上代表团联络全国人民共同做去，这当然可在北京提出解决。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省港罢工的条件，罢工以后非独工人受尽痛苦，即商人亦然，但是有什么方法使省港罢工工人解除痛苦呢，那就要得到这个条件的胜利。今日到此，已可见得各界同胞之切实拥护这个条件，我们又很希望香港代表能够召集大会一致来拥护这个条件，如今日之情形一样，我以为这就是港商代表之第一的任务。其次我希望港商代表回去之后，应该压迫香港政府承认此条件，如果香港政府不承认，则我们另有对付的方

法。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最惧怕的就是我们的大团结，所以港商代表回去后，要很好的团结商界同胞，一致进行，开一示威大会，压迫香港政府承认我们所提出的条件。或者有些人觉得在香港政府势力压迫之下，不易做到这地步，其实不是的，只要我们同胞能团结一致，便可以做到。香港罢工的工友，亦是如此。我们已经有绝大的决心，所以便不恐怕他，而有此次的大罢工，弄得他们无法可以压迫我们，港代表明白了上述的意思，则可大着胆放心做去。我们知道，工人有很大的势力，即商人亦有与工人同等的势力，在此反帝国的罢工中，已表现的很明了了，所以很希望港代表回去之后，亦设法表现出这种势力来。香港政府的内容，我们已经很明白，我们无庸去重视他。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以前英国商人曾请其政府派兵来压迫我们，但到了现在仍不能做到，那么这个纸老虎被我们看穿了。他们的本身，如各处殖民地，亦迭起革命了，所以这个纸老虎，并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商人联合的力量很大，若工商联合起来，则其力量更大，将所向而无敌。所以很希望港商同胞，能联合以压迫香港政府，如果香港政府复敢压迫我们的港商同胞，我工人全体当出死力以为帮助。我们知道港商同胞以前所受的痛苦太甚了，这些痛苦，不敢向纸老虎诉说，只有自己暗中忍受。现在应该改变方针了，即要向这纸老虎反抗了。港商本有很大的力量，务须利用这个力量以压迫香港政府，此即是兄弟小小的意见，敢贡献于我很亲爱的旅港同胞。我们高呼：

工商联合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工 会 论

上 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者启事

本书原定计划,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的叙述,下编为事实问题的研究。上编本已讲完,惟后四章记录不甚洽意,又因粤港罢工事忙,实在无暇修改,朋友们催此书出版甚亟,不得已先将前两章印出。其余四章,只好俟粤港罢工解决后再行补出了。对不起!请原谅!

目 录

- 第一章 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 第二章 工会要怎样组织呢?
- 第三章 工会应否过问政治?
- 第四章 国际工会运动的情形如何?
- 第五章 工会与农会的关系应该怎样?
- 第六章 结论

第一章 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工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是保障无产阶级利益,以至于图

谋本身的完全解放的机关,所以工会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武器,固然不单单是工会,但工会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工人要想打倒资本家,一定少不了这个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才可以与资产阶级作剧烈的斗争,才可以致资产阶级的死命。比如两个人互打,如果专用拳头打,是不容易打死人的,一定要用刀或枪等武器来打,才容易打死人。工会就如两个人互打时所用的枪刀一样。

本来工会的作用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无产阶级未革命之前,它的作用是一个样,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它的作用又是一个样。现在只说明无产阶级未革命以前工会的作用。无产阶级未革命之前的工会,是工人作战的机关,是对付他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资本家的。所以我们说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炮台,无产阶级有了这个炮台,可以用来打敌人。现在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几乎是不能生活,工人如欲免其剥削与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的表现就是工会,所以工会凡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都应该加入,工人有团结,便可以与他的敌人资本家开战。

想大家都记得,没有好久以前,北洋军阀曾派了几艘兵舰来援助陈炯明扰乱广东,但这几艘兵舰抵香港后,何以只是在香港附近一带海口巡驶并不敢驶来广州打国民政府呢?香港也有许多好兵舰,这次我们罢工与他断绝经济关系,何以他不敢开来广州打我们呢?这因为要开驶兵舰来打广州,一定要经过虎门和黄埔两口岸,虎门黄埔都已设有炮台,如果他开来广州,我们必开炮轰击,所以北洋舰和香港舰都不敢驶来广东。我们有工会就如有炮台一样,资本家压迫我们太利害,我们必开炮打他。

由此可知工会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斗的机关。

有人说：“工会是如俱乐部一样，是工人娱乐的机关”。又有人说：“工会是如救济会一样，是工人互相救济的机关。”还有人说：“工会是如研究会一样，是工人互相研究技艺的机关。”这几种说法，我们在工会的章程上就可以看见，如“联络感情”，“交换智识”，“互相扶助”等。但这些话究竟对不对呢？可以说对，但不大对。因为娱乐、救济、研究等，只是工会中的一部分工作，不是工会整体的事务，即是说工会对于工人娱乐，互相救济，互相研究，这一类的事，是可以做的，但不是专门来做这类的事，因为专做这类的事，并不能使工人得到很多利益，得到完全的解放。比如俱乐部，固然是工人娱乐的机关，但在资产阶级未打倒以前，工人有什么娱乐之可言。又如救济会，固然是工人互相救济的机关，但在资本家未打倒以前，工人的痛苦是无穷的，是救不胜救的，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吧！又如研究会，在资本家未打倒以前，对于工人亦毫无益处，因为工人在现在资本社会里作工，完全是资本家的奴隶，纵使好的手艺，也是不能赚到很多的钱，得到很好的生活。所以俱乐部、救济会、研究会等，只是工会中的一部分。

工人如果想要得到解放，唯一的出路是打倒资产阶级，建设工农国家，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工会第一个责任，就是要与资产阶级斗争；第二个责任，就是教育和训练工友，使他们有阶级的觉悟，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如何冲突；第三个责任，就是要养成工人有管理生产机关之才能，因为打倒资产阶级后，工人阶级便是社会的主人翁，社会

上一切生产机关，都要由工人自己来管理。这三种责任，便是无产阶级没有革命以前的工会所必须负担的，亦即工会在没有革命前的主要作用。

但是工会的作用既如此重要，既是工人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既是工人阶级的炮台，然则工会要怎样组织呢？下一章我们就讲了。

第二章 工会要怎样组织呢？

（一）两个重要观念

工会组织问题是很重要的，假如详细的说，不是今天几点钟可以讲得完，现在只可以提出重要的几点讲一讲。首先我们应该弄清的，有两个重要的观念，这两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一、工会是群众集体的；二、工会是阶级斗争的。

什么叫群众集体？集体两个字，就是把许多东西集成一个东西的意思，即是说将所有的群众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许多朋友有种种错误观念：工会只限定男子加入，女子不能加入；年纪大的人加入，年纪小的人不能加入；再有限定宗教徒——如基督教徒之类——不能加入；再有因手艺之不同，限定某种手艺人可以加入，别种不能加入；再有分省界的，如广东工会只有广东人可以加入，别省人不能加入；再有分国界的，如中国工会只有中国人可以加入，外国人不能加入；再有因政党之关系，不准加入；这些限制是不对的，假使如此，工会便不是群众的集体了。工会应该不分男女，老少，宗教，党派，省界，国界，总之，只要是卖劳

力赚饭吃的工人,统统都可以加入,那些分别要不得。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相同的,我们统统都是被资本家压迫,被资本家剥削的,我们一定要统统联合起来,不留一人在外,工会才有力量,才能打倒资本家,推翻资本制度,我们组织工会,第一要认清楚这一点。

第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永不相容,永远冲突,这两个阶级好象油和水一样,油和水永久是不能合拢的;又象狼和绵羊一样,狼看见绵羊是毫不客气一定要吃的。我们工人想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才舒服,资本家便不如此了。我们要减少时间,他们是想增加时间,我们要增加工钱,他们是想减少工钱;两边恰恰相反,因为资本家知道减少些工钱,自己便多赚些钱入荷包;工作时间长些,可多货物卖钱。由此看起来,劳资两阶级何能相容?不相容便要争斗,此乃自然的结果。如果不斗争,据经验告诉我们,资本家是不会替我们加工资减时间的,是不会好好生生把我们应得的权利给予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发慈悲心,顾念我们的痛苦,给我们的好处,因为资本家自己知道一发慈悲心,荷包便要空了。他们已做资本家,资本家就是要赚钱的,荷包空了,他们是不愿意的。现在有一位国民党党员戴季陶,他说:“资本家是有‘仁爱’的性能(即慈悲心),只要启发他这种仁爱的性能,他便会给工人的利益。”这话对不对?好比一个人对老虎说:“你的皮很好,可以给我们做衣服。”老虎肯不肯?恐怕不但不肯,反要把人吃了罢。凡是说资本家有慈悲心的人,便是帮忙资本家欺骗工人。又有人说,“劳资妥协”,“劳资调和”,这些都是资本家走狗所说的昏蛋话,我们决不相信。老实说,工会组织是阶级的,它的职责也是阶级的,它的

行动也是阶级的，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奋斗到底的。这是这二个重要观念。

我们组织工会，这两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不可忘记。某工会少了这两个条件，便不是真正的工会了。

(二) 产业组织与职业组织

工会组织原则里头有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为产业组织，一为职业组织。

什么叫做产业组织？譬如一条铁路，不论车务、机务、工务，……等等都在同一产业之下的，所有一切工人，不论司机升火的也好，不论卖票打旗的也好，都加入铁路工会，这就是产业组织。又如一个纱厂，不论粗纱间细纱间也好，不论打包间电灯间也好，在纱厂里的工人统统加入纱厂工会，这也是产业组织。其余可以类推。

什么是职业组织？如铁路有木匠，自来水厂也有木匠，轮船也有木匠，这些木匠职业相同，统统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工会，便是职业组织。又如机器工人，铁路上有机器工人，自来水厂也有机器工人，轮船上也有机器工人，将这些机器工人职业相同的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工会，这便叫做职业组织。其余类推。

这两种组织究竟那个好呢？当然是产业组织好。为什么呢？有二个理由：

第一、产业组织可以使战斗力增加，职业组织战斗力便要减少了。如我们罢工，一个产业工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同一产业之下，马上可以召集开会，如果组织好，指挥机关好，指挥机

关下一命令下去，即可全体动作。职业组织便没有这样好，因为一个工厂至少有两种或多至数十百种的职业，如按一厂职业来组织，不要有两个或数十百个工会吗？这样七零八落，行动便不一致了。况且职业工会不限定一厂，是与许多别厂同职业的工人共同组织起来的，但我们知道各厂情形不同，自然利益也不同，有些待遇好点，有些工钱多点，假使我这厂发生罢工，别厂不赞成，怎么办呢？又罢工贵乎神速，职业组织如要罢工，动经许多时日，又罢工贵乎秘密，如职业组织势必容易泄露消息出去，如资本家知道了，先发制人，可以借端压迫我们，这未一来，罢工不是要受打击吗？所以在战斗方面，产业组织好，职业组织不好，这是一点。

第二点 产业组织可以免除工人中间发生等级的界限 职业组织便不能够。工人中有熟练工人 与不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工钱多些 不熟练工人工钱少些 如职业组织那样势必熟练工组织在一起 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 熟练工变成工人中间的贵族 他们的组织也变成工人贵族的组织了。这么一来 贵族工人与穷苦工人离开 贵族工人常与资本家接近勾结 于是工人不止受资本家的压迫 又受这般工人贵族的压迫。产业组织不论工钱多少也好 工作熟练与不熟练也好 统统加入有一个工会。以多数贫苦工人可以监督少数贵族工人 工人中的等级 界限可以不生 既可免除工人中间的冲突 又可免分散工人阶级的势力 所以产业组织好。

但是有些朋友一走又走得太左了，走到极端去了，他们说产业组织怎好，职业组织不值一钱，平心而论，职业组织虽然不好，在某种状况之下，也有他的用处，尤其是在中国有特别用处，假如产业发达的国家，如德国英国——等，自然可完全采用产业

组织；中国产业不发达，多是手工业和小工厂，假如这些手工业的工人，和小工厂工人，如果要按产业来组织工会，未免太小，如理发店每间十数人，如果每间理发店组织一个工会，广州市至少有五百间理发工会，这有什么用处呢。在此情形之下，只有将广州所有理发店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广州市的理发工会，这才有力量的。又如打铁铺，广州也有数十间，如果每间打铁铺要组织工会，至少数千个，这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要把广州全市打铁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广州市的铁匠工会。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我们说小工厂手工业里头职业组织是有用的。

现在我们来下一个公平的判断。凡是新工业之下的工人绝对要产业组织（如铁路、海员、纺织、矿山等），假如是手工业小工厂可以用职业组织（如理发、裁缝、印刷等）。

（三）组织的系统

先画一个图，我们看了图，再加解释，就容易明白了。

从下图，我们知道工会是一个单位组织。就某市各工会联合起来，组织某市的总工会（如“上海总工会”）；亦可就某省各工会联合起来，组织某省总工会（如“河南全省总工会”）。市或省总工会都系地方组织。不过如省总工会成立时，市总工会亦须加入之（如江苏若成立“江苏全省总工会”时，“上海总工会”须加入）。全省总工会所在地，可不再设市总工会。

某一产业可组织全国总工会（如“全国铁路总工会”），各地设立分会。这些分会在各地亦可加入各地方组织（如“京汉铁路郑州分会”可加入“河南全省总工会”；“京汉铁路江岸分会”可加

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产业工会与别个工会不同的地方 ,只是他可依其产业的性质 ,而另立一个系统的全国总工会罢了。

某产业总工会 ,某省总工会 ,及某市总工会联合起来 ,共同组织全国总工会 ,这是一种常轨 ,不过在中国须得变通办理 ,因为有许多产业或地方并未成立总工会(如山东虽有“淄博矿工工会” ,然而全国的矿业总工会并未成立 ;又如大连虽有“印刷工会” ,然而大连市的总工会并未成立) ,或是地方的总工会并未统一(如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和“广东总工会”两个总组织 ;香港有

“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及中立之各大工会),在此情况之下,如不变通办理,则势必有许多工会不能加入全国总工会,所以须得准此类未加入产业或地方总工会之工会,得直接加入全国总工会,以免一部分工会在外,有孤立之感和向隅之叹。图中有两根虚线,就是表示变通办理之意。

每一工会,必有工厂支部做他的基本组织,否则,这个工会便是空的,其详下面有一节专讲。

再说到一个工会内部之组织系统,为容易明白起见,亦先画一图。

每一工会它必有一办事机关,这办事机关,叫做“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视会之大小酌定之。执行委员会之下,必分设各部办事,设部多少亦视会务之繁简的定之(上图不过聊以示意)。如必要时,尚可得设各种特别机关,如仲裁委员会,介绍失业所之类,惟此项特设机关,必隶属于执行委员会之下。工厂支部仍俟下面另一节专讲。

这里我们要连带说一说的,就是会长制与委员制的优劣问题。会长制是一人做主专断,一切事皆唯他一人之命是听;委员制就不然了,是几个或十几个人会议处断,不听命于个人,而听命于机关(即所谓“执行委员会”)。这两个制度,那一个好呢?我们以为委员制好些。为什么?因为(一)会长制容易由一个人专制把持,会长得人还不要紧,会长不得人那就糟了。往往有会长不好,暗中把工会卖给资本家做御用机关以鱼肉我工人的危险。委员制因互相监督,则没有这个危险。(二)会长难得有一个全智全能,一人的知识有限,思虑难以周密,一人的精力有限,做事难以件件俱到,所以往往有使会务错误或延误的危险。委员制因会议讨论,分工互助,则没有这些危险。(三)会长制往往几年不选举,因此会长一人容易专权自恣,有变成官僚或变为酋长的危险。委员制则一年一选举,又可免除这个危险。由此看来,委员制比会长制好得多了。

组织的大概我们讲过了,但是各位要注意,上面所讲的,不过聊以示意而已,自然到应用时,你必须斟酌情形,以定取舍,不可太死板。

(四) 工人会议

工人会议，外国名字叫做“工人苏维埃”。苏维埃即是会议之意。工人苏维埃制度，只有劳农俄国实行了。他成了一种最新式的政治组织。

以前的政治组织，所谓“议会制度”，我们都知道那是于我们工人阶级不相干的。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选举，不是以财产之有无和财产额之多寡做议员资格的标准吗？例如有十万元以上财产的所谓“公民”，可被举为省议员，由省议员选举国会议员。诸位想想，他们以财产做标准，我们工人阶级是没有钱的穷光蛋，那有资格去做什么省议员和国会议员呢？好了，一切议员都被有钱的资本家大地主垄断了，他们在国会里所订的什么法律，商量组织的什么政府，自然是为了保护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都是帮忙资本家压迫我们工人的工具。那里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呢？

苏维埃制度，就不然了，他不以财产做标准，他是打破私有财产制度的，自然不以财产做标准。他怎么办呢？凡是做工的人都要开会，在开会时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每一工厂有工人大会。并由此会议选举你所相信的代表开地方会议或全国会议，订立你所需要的法律，商量组织你所相信的政府，完全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法律和政府。选举代表只以产业机关为标准，以人数多少为比例。（假定五十人举一代表，你厂中如有二百六十人，你这里就可选出五个代表。）并且决定凡是资产阶级及其附属物如牧师之类，都没有选举权。总之，苏维埃制度，是

工人专权 ,工人专政 ,工人统治的世界。

现在说到我们中国工会要怎样实行这个制度了 ,先画一图。

全国劳动大会每年必开一次 ,由全国各工会工人直接选举代表到会 ,每一千人得选一代表。某产业全国总工会得派十人

以下之代表到会 ;某省总工会得派八人以下之代表到会 ;某市总工会得派五人以下之代表到会 ;自然此种总工会还要看他统辖之下人数的多寡 ,再有伸缩之余地 ;再则此种总工会派出之代表有无表决权 ,也要待全国大会之决定。全国劳动大会为全国最高机关 ,他有绝对的权力 ,他的责任 ,大概为(一)检查前此一年全国工人运动之总成绩 ;(二)确定后此一年全国工人运动之新方针 ;(三)选举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他得全国大会之付托 ,亦有绝对的权力 ;他的责任 ,大概为(一)执行大会决议案 ;(二)谋国际之联合 ;(三)统一全国工会运动 ;(四)指挥全国工会从事阶级斗争 ;(五)宣传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理论 ,并指导一切实际运动之方针 ;(六)仲裁各工会之纠纷 ;(七)救济事项 ;(八)其他随时发生事项。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 ,驻会办事。

某产业工人全国代表大会 ,每年二次 ,由各分会工人按二百人或五百人直接选一代表 ,这要看当时的情形来决定。讨论关于本产业工人运动一切事项 ,并选举本产业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某省工人代表大会 ,每年二次 ,由各工会工人按五十人或一百人直接选一代表 ,其不足五十人或一百人者亦得派一代表。讨论关于本省工人运动的一切事项 ,并选举本省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某市工人代表大会 ,每年四次 ,因在一地 ,故易开也。其选派代表标准与赴省大会同。讨论关于本市工人运动的一切事项。并选举本市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某工会全体大会 ,每月一次 ,所有会员 ,全体俱到 ,讨论

本会一切事项。惟亦可开代表会议。至于工会职员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可酌定之。

以上所定选派代表之标准，自然不可死板，自然要看当时情形加以变通，此亦不过聊以示意而已。

由此说来，工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工人职员又由自己或其代表选出，这才真是民主的精神，外国话叫做“德谟克拉西”，中国所谓“民主主义”。资本家的议会制度，也说是民主主义，其实是资本家的民主主义，于我们大多数的工人不相干，因为议员都是资本家的。所以资本家口中的民主主义，是假的，不过欺骗我们工人罢了。我们绝不相信。

(五) 工厂支部

工厂支部这个东西重要极了，大家必须懂得，他是打倒资本家最好的一个好武器。

譬如一个军队，有了总司令部，他下层必有团营连排层层的组织，然后才能指挥如意，否则，仅有总司令部，有何用处呢？工会也是一样，虽然没有军队那样复杂的组织，然而下层必有组织才好，否则，仅有执行委员会，下层没有工厂支部的组织，何能指挥如意？有何用处呢？

工厂支部好像是工会的柱子，一间厅堂，没有柱子，是顶不住的，工会没有工厂支部也是顶不住的。从前工会摇动不定，往往被资本家一打便完了，就因没有工厂支部的原故。如果有了工厂支部。那怕资本家竭雷霆万钧之力也是打不下来的。

工厂支部怎样组织呢 就是按照工厂中之每一个工作处，如

纱厂中之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弹花间、电灯间等处，每间都组织一个支部。支部之中可选三人或五人组织一个干事会，负接受工会命令并指挥支部会员之责任。如果有政治自由的地方，（如广东）假如有可能，支部之下，尚可设立小组，约十人为一小组，每组置一组长，那就更完密了。

工厂支部的好处：

第一，工会会员全体大会，事实上是难开的，就是在政治自由的地方，至少也要每一个月才开一次。开会训练工人的绝好机会，会越开得多，工人越有进步，为什么？因为工人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也可以训练发言的口才。工厂支部因为在一工作处，人数又少，容易集合，每星期可以开一次，这样不是使工人更多训练的机会吗？

第二，当罢工的时候，如没有支部，群众好象一盘散沙，不相统属，有了支部，便有了约束，如军队一样，工会下一命令，在几分钟之内，便可由支部传达全体工友知道，或进攻，或退守，都能步调一致，丝毫不乱，这样不是使罢工更容易胜利吗？

第三，每一工作处，必有他的特殊问题，或者为工会执行委员会所意想不到的，如有支部，开会时，谁也可以发表出来，经大家同意，可提交执行委员会去办，这样不是使会务越发增进吗？

第四，往往有些事，是很小的，而且只限于每一工作处，如管工打了一个工友，这怎样办呢？请求工会宣布罢工吗？未免小题大做，有了支部，由支部干事会，在入厂作工的时候，临时宣布罢工两小时或三四小时，怠工亦可以，怠工就是照常入厂，机器尽管开着，我们只是不动手作工。这样一来，资本家不能不赔礼了，下一次再不敢打我们工友了。

第五,在政治压迫的地方,工厂支部尤其有作用。因为那时工会封禁了,我们在工作处秘密组织支部,工人同在一处,人数有限,随时可以集合开会,用最神速的手段,只要几分钟便可把会开完,等到资本家知道来压迫时,我们已散会了。并且有了支部,一切秘密出版物,可以秘密分散,“二七”失败以后,北方铁路工会全遭封禁,北方铁路工友不曾涣散,全靠工厂支部之力,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

(六) 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有些朋友,常常把它弄错。他们把工厂委员会认成为工会组织系统中之一个中间机关,如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会,它管辖十三厂,于是每厂设一工厂委员会,其下于每一工作处设一支部。其实工厂委员会另有一种严重的意义,就是工厂委员会是管理生产的,它在革命时特别发达,俄国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后,各工厂此类组织如云而起,然而其目的均为管理生产,至十月革命成功后,工厂归工人,于是工厂委员会普及于全俄。试问我们之所谓“工厂委员会”,是不是此种意义呢?不过是变成了一个承上接下的中间机关罢了,不特未做管理生产的事情,并且连参加管理也未有,这是我们用此名称一时不小心,所以错误了。

再则工厂委员会即使不管理生产,至少也要有一种这样的意义,就是某一工厂,一部分工人加入工会,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还没有加入;或者某一工厂,组织了几个工会;或者是工人以职业关系而分别加入了与别厂合组之职业工会,这怎样办呢?在

此种情形之下,就用得着工厂委员会了,因为在同一工厂之中,利益相同,问题必也相同,应该大家不分彼此,共同解决,这必有一特殊的形式,这个特殊形式,就是工厂委员会,他不一定要隶属于某工会,他就仅仅以讨论解决这一工厂的特殊问题为止也可以。

所以朋友们如用工厂委员会的名称,要注意上述两个意义。

但是现在工厂委员会已经有些地方用了,生米煮成熟饭,还有什么话说,只好将来管理生产时,另起一个名字好了。

(七)政治压迫下之变相组织

上面几节所讲的是工会的常轨,但是在政治压迫的地方,一定有难于完全适用的。比方工会这一个名称,在北方有些地方简直不能用,怎么办呢?我们不是呆汉,自然可以用五花六色的名称——可以不被敌人注意的名称,如俱乐部、学校之类,甚至于很腐败的名称,如进德会、崇俭会之类,也可以用。只要是这个机关,事实上可以聚集工友,训练教育工友,指挥工友一致动作,便可以了。这类变相组织,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时候,亦得召集它,不过要经过大会郑重的审查罢了。(上编未完)

原载《职工运动丛书》

署名:中夏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时的答词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

刚才承各位代表赐教一切，我们是非常之感谢的。我们一定遵照各位赐教的，更加去努力奋斗。

在各位代表演说之中，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说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

是的，这一点，我们一年以前曾经这样说了。不过那时还只是一个理论，没有事实证明。所以一般大学教授听了此种说话，无不嗤之以鼻，说是工人阶级自己吹牛。现在经过刘杨战争、五卅运动，种种实际的争斗，果然证得明明白白了。事实还是事实，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加以抹杀的。所以一般大学教授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紧急的时候，也变更态度，说工人不错，工人很有力量，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也不能不在事实上很恭顺的加以承认了。

既然如此，既然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刚才有几位代表提到国民革命不应反对阶级争斗，使我联想到一块，发生一个深切的感想，也不能不略为说说。

国民党中有一位负过盛名的先生另创新说，劝工人阶级不要“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我们对于这位先生说话，只有表示惋惜，表示遗憾。为什么？我们即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就是站在国民革命的观点上，认为这位先生的说话，是太欠考虑，太欠明了。国民革命原是要联合各阶级的力量，共同作战，但是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各阶级因为经济地位的关系，不是妥协性极重，便是战斗力极弱。中国不言国民革命则已，若言国民革命，只有靠革命的工人阶级提携着农民阶级加入战斗，才有成功的可能。

大凡一个军队，都要给养，才能作战。既然要工人阶级这一支军队，加入国民革命的战线，做国民革命的主力队伍，岂可不善其给养，即提高其地位，改善其生活？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痛苦或是舒泰？大家都是知道的。枵腹露体是可以作战的吗？只有容许改善经济条件的阶级斗争，可以使工人运动更加进展，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更加雄厚，就是说使国民革命的势力，更加强旺。阶级斗争是妨害国民革命的吗？今乃反对工人阶级，为稍稍改善经济条件，增加其组织力，战斗力的阶级斗争，老实说就是不愿意工人运动之发展，不愿意工人运动之发展，老实说便是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国民党中那位先生说，“为了阶级斗争，打破了国民革命”。我们得了一相反的结论，却是“为了反对阶级斗争，打破了国民革命”。

但是那位先生的反阶级斗争论，工人阶级决不受其欺骗与迷惑，这是可以担保的。工人阶级很明白他自己历史的使命。对于此种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只有表示惋惜，表示遗憾。他并且很明白，决不因国民党中那位先生个人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而

减少他对国民党之同情与帮助。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只要国民党是革命的,他必同情到底和帮助到底。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199、200 期

戴卓民同志出狱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

别 来 无 恙！

戴卓民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兄弟落港接洽罢工的时候，就是住在他家里。罢工发生了，稳定了，兄弟离港返省，不二日戴同志与杨匏安同志即以被捕闻。

自然，我们既与各方面接洽，住址无论如何秘密，终难保住，所以结果终于被敌人侦出了，兄弟先走，于是戴、杨两同志就被捕入狱了。

戴同志判罪六个月苦役，于本月七日期满，昨晚反省，我们相见之下，真是喜极欲泣。

我们由此更证明资产阶级(包括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处优越地位，并且在政治上还有特别权力，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都是他们宰制工人阶级的武器。假使我们要得到完全的解放，只有夺取政权，把他们宰制我们的武器，变为我们对付他们的武器，这一点是工人阶级在种种实际经验中得来的教训，不可忘记的。

末了，我们再说，本来一个为群众谋利益的革命党，他对于入狱，甚至于杀头，视若“家常便饭”，本不足奇。戴同志此次入狱，在此次罢工中，只有吴荣、冯北海、叶寿、徐垣、田西河五位同

志有同样的久与同样的苦 ,我们对于此等同志表示欢迎 ,并不以为奇 ,而去欢迎他们 ,—— 与其说是欢迎他们 ,毋宁说是激励他们 ,激励他们的革命精神与行为 ,比从前还更要发扬 ,更要猛进。我们现在敬祝

出狱同志诸君健康 !

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196 期

署名 :邓中夏

革命的方法

——在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
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各位农友！各位工友！今天的大会许多重要的话既由先头许多先生说过了。我现在再来同各位说的，就是“我们革命的方法”。这个题目是由欢迎词中联想到的，先头欢迎词中，讲及两位同志，一是韦德烈士，他是用手枪刺杀了军阀洪兆麟，如是自己也牺牲了。一位是戴卓民同志，戴同志因运动香港罢工，坐监坐了六个月。

我现在说一句，暗杀的手段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杀了一个帝国主义，还是有无数的帝国主义。杀了一个军阀，仍有无数的军阀。杀了一个资本家，仍有无数的资本家。杀了一个大地主，仍有无数的大地主。我们个人是没有多大的能力，能将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一个一个用暗杀手段来结果他们的性命。韦德烈士杀了一个洪兆麟，但是东江的小军阀陈炯明、林虎、杨坤如等仍然生存。民国初成立的时候，袁世凯便想做皇帝，我们当时以为杀了袁世凯中国便可以安宁了，但是后来又有段祺瑞继他而起。安福专政时我们以为杀了段祺瑞中国便可以安宁，但是段祺瑞倒后继起者又有吴佩孚，及后我们以为杀了吴佩

孚便可得安宁,但是后来又有张作霖。由袁世凯到张作霖,一路走来许多国贼,或是自己死了,或是倒台下去,但是一代一代终是不绝的传统下去,由此可知我们要暗杀军阀是杀不胜杀的。而且军阀官僚,出入便有摩托车、卫兵几十人,我们要去杀他是不容易的事。倒是我们革命党被他们买凶暗杀却非常容易,因为我们没有卫兵,没有摩托车,以资保护。你看,我们可以暗杀洪兆麟,他们也可以暗杀廖仲恺。我们要知道此次东江之肃清不是因为韦德烈士刺杀了洪兆麟个人之功,却是东江革命的农民,省港罢工的工人,和革命的兵士,工农兵大联合,才能把陈系军阀推倒,才能把他们赶走,这种功劳是在革命的军人、工人、农人努力奋斗造成的。

讲到这里,各位一定很怀疑。为什么中国革命初起时不是有许多革命党都是施行暗杀的手段吗?是的!但是暗杀只可在无可如何的时候用的。辛亥革命以前,清廷压迫非常利害,无可如何,当时的革命除了暗杀是没有其他方法,所以很多人便去实行暗杀。及后辛亥革命,我们知革命手段不是单靠暗杀可以造成了,如是便改而为运动土匪军队。这可谓革命的方法进一步了。但是到后来,民国成立了十五年,而革命仍未成功,才知道革命不是单靠运动军队土匪可以成功了,如是又更进一步了,去组织工人和农民,一定要工农通通组织好了,工农阶级的力量扩大了,然后革命才能成功。这个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要使革命成功,也一定要这样做去。

革命方法的进步既如上述,我现在再告诉各位一件事,就是各位要知道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他们是同一阶

级，叫做资产阶级，他们是专来剥削人压迫人的。我们工人农民，是同一阶级，叫做无产阶级，是被人剥削压迫的。我们要解除本身的压迫，一定要联合我们阶级的力量去打倒压迫阶级。我们替他取个名字，叫做“阶级斗争”。各位一定要记清楚，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不是仅仅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个人便了，我们是要把他们整个阶级消灭——把资产阶级消灭，也就是资本制度消灭。

我们起初只知道用暗杀方法，去同敌人斗争。及后只知道运动军队土匪方法，去同敌人斗争。现在更知道组织工农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同敌人斗争，我们革命的方法，是一步进一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明白暗杀的方法，不是使革命能够成功的方法了。韦德烈士，不惜牺牲生命刺杀反革命军阀，我们虽非常钦佩他的勇气，但是他这种暗杀的方法，不是使革命成功的方法。我们不可不知。

革命成功的方法，只有阶级斗争，我们应高呼：

阶级斗争胜利万岁！

工农阶级解放万岁！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200 期
署名：邓中夏

悼韦德并论暗杀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昨日挽韦德烈士写了四句话：

“韦德烈士牺牲精神虽足取，
韦德烈士暗杀方法不足法，
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只有靠民众组织力量根本铲除其制度之存在”。

这四句话，言简意赅，不须加以详细解释，只要你是有脑筋的人，一看便可明白。

有人疑问：“暗杀方法虽不能成功革命，但是至少可以帮助革命，因为可使贼人胆寒，不敢任情为恶”。

这一片话，初听去似乎有理，但是仔细想却大谬不然。在革命初起民众尚无觉悟的时候，暗杀诚然有个相当的影响，如温生才刺杀孚琦，汪精卫谋杀载澧，给予民众的兴奋却是不小。但是后来如何呢？有人谋杀过袁世凯，袁世凯胆寒了没有？不特不胆寒，胆越发大了。杀革命党更利害了。民国二三年被袁世凯杀死者不知其数。宋教仁被暗杀了。不久陈其美也被暗杀了。

古话说“我能往。寇亦能往”。暗杀方法，我能用，寇亦能用。而且往往是我用之无效，寇用之有效。宋教仁、陈其美被刺是前例，廖仲恺、陈秋霖被刺是现例。暗杀何曾帮助革命！

再进一层讲，暗杀不特不帮助革命，而且破坏革命，何以呢？我们要知道革命的对象，不是革某一个人的命，是革某一阶级的命。如某一阶级不倒，则此一阶级的恶魔是相继不绝的。恶魔张三死了，恶魔李四又起。恶魔赵大死了，恶魔钱二仍在。如资本的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军阀为一阶级，是压迫阶级；我们民众为一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我们不用我们自己阶级组织的力量，完全打倒敌对阶级的壁垒，仅仅打倒敌对阶级之某一个恶魔或数个恶魔，我们的革命何能完全成功？如果提倡暗杀就是引导民众去对付某一个人，不去对付某一阶级。再则便是引导民众相信了个人狭义的力量，忘记了阶级组织的力量，这不是我们革命政策之自杀吗？

我们钦佩韦德烈士的牺牲精神，反对韦德烈士的暗杀方法，其理由即在于此。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201 期
署名：邓中夏

在中国海员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代表！各位工友！今天是海员第一次大会，这样的工会从前海员是没有的，今天可说开一新纪年，得了新生命！

今天兄弟做政治报告，把海员与政治的关系说一说。

我们说到政治，首先想到的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就是资本主义的化身，资本主义发达最后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当资本主义发达到帝国主义的时候，不得不向海外找殖民地，来推销自己本国的货物，吸收殖民地的原料来制造商品。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得不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加以侵略和压迫，他这种侵略和压迫就是维持其资本主义。

现在讲一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怎样侵略？

他们在政治上的手段，就是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军阀来捣乱，来镇压人民。他们为什么扶植军阀？因为军阀能将国家权利卖给他，他可以得到许多利益，如财政，邮电，统统都落在他手里。在经济方面，豢养买办阶级，代销售商品，代采买材料，代承销过剩资本，帮忙他来剥削人民，帝国主义要海关管理权，矿山开采权，铁路建筑权，种种所有与经济有关系的一切权利，都想拿在他手里头。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都用这种相

同的手段,对于中国也是一样,所以中国受压迫到不得了。中国在表面上看来是军阀扰乱,其实,骨子里就是帝国主义作祟,他们利用军阀,愚弄军阀,所以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要打倒军阀。首先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自然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倒了,买办阶级更不用说也连带的倒了。

现在再讲到海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可说海员可以制帝国主义的死命,因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定要用轮船为他们运输,假如海员罢工,帝国主义便不能运兵士,运军械,以及工业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海员地位有这种重要,所以不但中国国民革命要海员参加,即世界革命海员也要参加,只有海员参加能真正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只全中国海员一九二二年的大罢工,给帝国主义一个要害的打击。这次五卅运动,天津、上海、山东、香港、广州以及各地海员罢工打得帝国主义不得了,就可知道了。别的工人固然有力量,但却没有海员这样大,只有海员偕同各大产业工人在国民革命中做领导地位,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亦即打倒资本主义)中国革命成功,即世界革命成功的一部分。海员的责任这样重大!海员的使命这样伟大!所以这次大会应该决议种种好的议案出来。

在此次海员大会中,我提出几个重要观念说一说!

一、把海员的组织弄好。想把组织弄好,首先要打破地方主义,乡土观念(即帮口观念),如果不能打破地方主义,乡土观念,即不能一致团结,广东人说“细佬”,宁波人说“阿拉”,终没团结一致,海员不论是广东人,不论是宁波人,不论是山东人,总之,只要是海员便应该团结一致。因为海员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资本家的剥削,我们的痛苦是一样的,势必要联合一致才能打倒我

们的敌人,解放我们自己。所以在此次大会组织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帮口的观念。

还有一层是组织改良。从前组织不十分好,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差不多还有照老行头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好的。要把组织改良,在各船上组织支部。这次大会对于各船组织支部,应好好的确定。如果各船有了支部,就是有下层组织。所以此次大会第一要打破帮口,注意下层组织。

二、海员不但自己要组织得好,团结得好,还要把全国运输工人团结得好,我们要联合所有运输工人,使海员的力量更大,我们不但联络本国运输工人,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运输工人,我们不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只要是运输工人就要联合,现在已有这种联合的组织,我们海员应领导中国运输工人加入国际运输工人,一致团结,才能实行世界革命。所以全国组织全国运输工人联合,并且要加入国际联合,这点在此次大会也应该规定的。

三、海员生活太苦了,一定要决定对海员经济斗争的态度。我们要使山东、宁波海员薪水与广东海员一样,并且要使中国海员薪水与各国海员薪水一样。对于这点我们一定把它规定,以为斗争的方针。

四、我们还要讨论怎样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我们知道反帝国主义是各阶级的责任,不过工人阶级负的责任特别重要,海员尤为重要中之重要。只有海员加入斗争,革命才能成功,我们对于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态度,在此次大会也应该确定的。

海员的责任多么重大!只有尽你们的责任,中国才能得到解放!只有尽你们的责任,世界无产阶级才能得到解放!我们

高呼：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资本主义！

中国海员工会万岁！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207、209 期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却有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可以显明的表现出来。现在把五卅屠杀后的几种新现象指出，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种新现象，工人阶级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在一年以前，我们曾说：“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不消说是领袖，就在国民革命中他也是领袖。”当时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此理论一出，一般所谓“高等华人”和大学教授以及短见的知识界青年，无不嗤之以鼻，以为工人阶级又在吹牛。可是经过此次五卅反帝国主义之空前大运动，我们的理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件事实在上海、广东两地罢工证实得格外明白。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总指挥机关，其中有“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中等商人的组织，一般大商买办阶级，另有其团体，叫做“上海总商会”，是未曾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的。大商买办阶级简直没有诚意和勇气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运动初起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然而他们参

加不是自动的,是受工人和学生用恐吓式的乞求才做的。在“工商学联合会”中,“上海总工会”做了中坚势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总工会”定的,商人、学生及一切民众都只跟着走。此次运动维持数月,其中表示最有力量的,只有工人;学生罢课,不能给帝国主义以要害的打击,就是教会学校学生罢课也不能使帝国主义受何等重大的影响;商人罢市虽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然而仅仅二十三天,他们就开市了,半途退出战线了,软化而妥协了;只有工人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誓死奋斗,奋斗到援尽粮绝,方忍痛罢休,因而失业者数千人。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革命精神是何等猛勇而坚决。广东方面尤其显然了,省港罢工中,香港全体工人罢工,学生只有一部分罢课,商人则漠然不动。在广州只有沙面工人罢工,教会学生没有声息,商人更不用说了。工人差不多孤军奋斗,至今七个半月,始终不敢言疲。举此二大例,便可证明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已经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从前一般高等华人、大学教授及短见的知识青年笑我们理论为吹牛的,现在也很小心的恭顺的在他们的报纸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地位了。因为事实还是事实,虽有百喙,是抹杀不去的。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我们敢担保此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当益见崇高而巩固。

第二种新现象,各地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五卅”以前,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湖南、湖北各有一个工团联合会,广东、香港虽有总组织并未统一。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事实上无处不一致行动,于是团结二字在工人群众中已无形中承认其必要,而要求一个地方的总组织。如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

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的，都是在“五卅”后才发生的。就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余个，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十二万余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河南、天津、济南、北京各地的总工会，亦皆名实相副，有许多新旧工会为其基础。就是广东、香港亦有一种新气象，大家都知道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广东总工会”之分，香港有“工团总会”、“华工总会”之别，而且香港还有许多大工会还未加入总组织。各树一帜，互不相谋。但自省港罢工后，而统一工会之呼声随之而高，异口同声要求一个统一的地方总组织。由此可知工人群众不仅要一个自己产业的或职业的组织，而且要一个联合各业工会的地方总组织，集中势力，谋全国的大联合了。

第三种新现象，资产阶级更深刻觉悟而向无产阶级进攻。本来资产阶级在争政权或反对国内外压迫势力于他们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会与工人阶级携手的，如法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曾利用无产阶级，可是一达到自己阶级的利益或工人行动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则压迫无产阶级之事便发生了。再则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共同携手反抗外力的时候,如果无产阶级同时要求自己经济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他们就立刻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如印度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次五卅运动,资产阶级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抵制日货、英货,抵制外国轮船,都是于他们有利益的,所以开始时赞成罢工。后来发现工人阶级势力膨胀了,又且工人有为改善经济地位向中国资本家罢工的倾向,所以他们越发害怕起来了。论理,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争斗,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即就国民革命的观点说,亦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此一层道理,资本家因为于他自己荷包有损失,固然不懂得,就是大学教授也不懂得(如北京《现代评论》),国民党右派也不懂得(如戴季陶之反对阶级斗争论)。他们这些“对外好了何必对内”、“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幼稚得可怜荒谬得可惊的议论,却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而压迫工人则愈演愈凶了。河南豫丰纱厂罢工,穆藕初公然用武力打杀工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罢工,也出其酷辣手段摧残工人了,资本家“仁受的性能”那里去了?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有更深一层要求政治势力的觉悟,譬如上海华界政治势力向在军阀手里,及奉张败退浙孙入沪之时,上海大商买办阶级因利乘便,不仅拥有保卫团的武力,而且居然取得警察厅长,又握有警察的武力,一朝权力在手,于是对于工人之集会、结社及一切爱国运动,压迫得比奉系军阀在沪时尤为利害,尤为惨酷。一方面扣着各处为罢工寄来的大批捐款不发给工人,以经济困之;一方面又利用权力公然暗中枪毙工人领袖刘华,不宣布其是何罪犯,以政治势力

压之；再一方面又招集一班流氓组织暗杀团，专门伺击工人领袖及捣乱工人集会，以法西斯团摧残之。资本家比军阀聪明得多，利害得多呵！

第四种新现象，工人阶级战术进步已有压迫不下的战斗力。“五卅”以前中国工人组织固然薄弱，战术亦极幼稚，什么是政策，在工人脑筋中是没有这件东西的。如京汉“二七”之役，一经严重惨杀，遂至无法再与军阀斗争，差不多经过一年才渐渐复苏。自前年北京政变曹、吴倒台以后，工人阶级乘时为恢复工会之运动，应用他们已有之经验与知识，于是而战斗力突增，经此次五卅运动，他们的战斗能力更为充分表现出来了。如此次上海与省港两地之大罢工，他们不仅知道紧严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势力，而且知道应用一切于罢工有利的政策，并且应用政策亦极适当而完满。在上海方面，开始便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一致胁迫大商人共同参加爱国运动，并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反帝国主义之总指挥机关。随后大商人中途妥协而反动，工人能密切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以作对抗。当时工人所最感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加以政治的压迫；大商买办阶级把持各处捐款加以经济的窘困；以及走狗、流氓、工贼捣乱总工会暗杀工会领袖加以暴力的胁击，然而工人对于此等横逆之来，皆能应付裕如，终至维持战线迄三月而不溃。随后江、浙战起，奉军被孙传芳赶走，大商买办阶级随联孙而攫取上海政权，起而代之。一班人总以为孙传芳反奉通电，曾以奉军压迫爱国运动为奉张之罪，孙军到沪，人民爱国运动当可自由，孰知适得其反，而且变本加厉。大商买办阶级是很聪明而精细的，地方情况既周知无余，压迫方法亦推陈出新。禁止示威巡行，禁

止派散传单,禁止当街讲演,禁止聚众开会,这是军阀亦想得到,不足为奇,不过大商买办阶级更为厉害些严厉些罢了。最出奇的,是组织法西斯团狙击工人领袖,严拿共产党,确系大商买办阶级的拿手好戏。但是工人却并不因此而畏缩,再接再厉,屡仆屡兴。上海总工会被封一次,又要求启封一次,甚至副委员长刘华被杀,同时他们却自动启封总工会,继续办公。一个重要领袖之死,是如何可以惊心动魄的事,若在“五卅”以前,工人处此险恶情形之下,早已豕突狼奔纷纷溃散了,然而现在他们并不如此,一面因为领袖被杀抱无限之悲愤,一面却努力恢复总工会作从容之应付,泣血饮恨,待时复仇。这是何等沉毅勇决的工夫,岂无训练的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在省港方面,工人所用政策皆根据特殊环境规定出来,自工商联合善后条例出,而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乃破,日、美轮船直来广州,商店迁出沙面。自经济独立沪航沟通之策定,而工商之联合战线愈固,广州商务遂见畅旺,黄埔开埠指日可期。自肃清反革命派之议起,而工人与政府之合作益密,东江收复,南路救平,广东统一,北伐有望。种种政策,不仅稳固了罢工营阵,而且大有造于广东发达,这岂是“五卅”以前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无怪香港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广东之恫吓政策,勾结反革命派之谋乱政策,欺骗中国商人之挑拨离间政策,著著归于失败,而罢工维持八月而不疲。其余如天津、湖北、北京等处,工人皆有同样的表现。根据种种事实,可断言中国今日之工人,决非昔日之工人可比了,越加压迫,越起反抗,况乎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日就崩溃,要想扑灭工人势力如“五卅”以前一样,黄河西流,白日东逝,那里有可能哩。

第五种新现象,工人阶级需要政党。从前中国工人不仅听着

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就是听着“国民党”三字也要掩耳而走(自然广东除外)。自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国民党算是不令国人那样可怕了。然而共产党仍然令人可怕。帝国主义者诬蔑共产党为“过激派”。一般人心目中想象过激派不知是如何凶猛的怪物。况且在西文报上往往看见过激派的影片,大抵蓬首垢面,胡须鬃鬃,与原始时代的野人相差不多,一望不禁令人生畏。其实这些照片多是所谓过激派出狱时所摄的,被捕下狱,动经十年八载,须发不加修剪,西人故多须,年长不剃,自然毛松松一个了,一般人见此类似照片,以为过激派皆是如此(其实过激派固不少美秀而文的少年哩,一笑!),乃其错觉之过。并且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对于所谓过激派,故以神来之笔,加以灵动描写,真是过激派不知是什么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般人为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宣传所迷惑,分明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战士,对之反表示深恶痛绝的样子。从前一般工人自然亦不免有此错误的见解。但是自经共产党近年来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兼且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京汉罢工杀了施洋、林祥谦,此次五卅运动,上海杀了何秉彝、刘华,青岛杀了李慰农,安源杀了黄静原,其余被杀被捕者尚难指数。共产党是革命前线的先锋队。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是很可亲爱的,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所以不论“反共产”的潮流是如何高涨,然而愈坚定工人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你不看见现在反共产党的癩菌弥漫了全中国吗?帝国主义为反共产之指使人,不待说了。军阀方面,在南方,杨希闵、刘震寰反共产,陈炯明、邓本殷反共产;在北方,张作霖反共产,吴佩孚反共产;买办阶级大地主方面,广东陈廉伯、陈恭受反共产;上

海张謇、虞洽卿、穆藕初反共产；官僚政客方面，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反共产，国民党内反革命派如邹鲁之流反共产；知识阶级方面，北京一部分大学教授反共产，上海一部分遗少的国家主义派反共产。论理在这种四面包围严重压迫之下，共产党早应摒诸四彝，绝迹于中国了，然而此种反共产之呼声，不仅无损于共产党的毫末，而且增进了共产党的信用，特别在工人、农民一方面。工人群众从前觉得毛松松的过激派可怕，现在他们自己也很兴奋的要毛松松的一个了，相率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关系之亲切，简直超过他的家庭以上了。

第六种新现象，中国工会与各国革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此次五卅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势力，而且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上海总工会直接指导之下，以致造成震动一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帝国主义受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原来工人阶级由经济关系悟到政治关系，这期间有一个长距离，很不容易跳过的，只有一九一五年之俄国革命有过一次。况乎由工厂的经济关系悟到国际的政治关系，尤其不容易了。中国职工运动历史虽短，然而他却跳过这一个长距离。此次五卅运动，起因于上海日商纱厂里之经济事件，打死工人顾正红，不久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遂急转直下变成国际间之政治事件（民族事件），于是而引导全中国人民一致作反帝国主义广大的剧烈抗争。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确实表现了它的惊人的能力，亦因其有相当的组织与训练，和有全国联合的集中的总组织，所以它的能力才能这样充分表现。这一点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表

示同情和欣赏的。此次五卅运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都曾有过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不用说了。赤色职工国际为全世界革命工会之大本营，曾为中国此次运动对所属各国工会发了一道训令，其文曰：

“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团与苏联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和日本回来后，报告云：‘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已大有进步，而且已有政治的成熟，与赤色职工国际，完全相同。’代表们又报告许多事实，皆足证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尽力压迫这种幼稚的职工运动。

本执行委员会以为苏联全国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两者近来的密切接触，即是使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职工运动的大进步。所以本执行委员会想要所属各国的工会，与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联合，并预备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幼稚的工会运动，给以敏捷的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者！……”

这一篇短短训令，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一个最可宝贵的纪念。因为中国职工运动已有数年了，从未得过赤色职工国际这样使各国工会与中国“直接联合”的训令，由此可以证明中国职工运动自“五卅”后确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赤色职工国际训令各国工会与某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定要它那一国职工运动确有相当成熟的能力，才能与各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中国工会从此经常的与世界革命工会相见了，这也是“五卅”后发生的新现象。

原载《人民周刊》第1期、第3期
署名：中夏

香港之又一幻梦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香港最近的态度，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值得注意与惊惧的：

第一，你不看见金文泰在定例局的演说吗？是何等强硬！何等斩截。一则曰“广州政府应负责任”，再则曰“本港政府在原则上永不承认补回罢工时期之工金，或赔偿不能复业之损失”。

第二，又不看见英国兵舰公然在白鹅潭追捕罢工委员会电船吗？每日如是，而且加以恶骂，欲以激怒罢工工人，这不是故意挑衅是什么？

由此两端事实看起来，于是有人疑心香港态度如此突变的原因，便联想到北京意国公使馆各国军司令之所谓“联合保侨”会议，推而实之，更联想到罗加诺各国之所谓“联合保约”会议，以为英国的外交成功了，帝国主义者的暂时联合成功了，以为香港态度突变而为强硬与挑衅，恐其以武力政策盾其后，恐其即为帝国主义暂时联合成功之表征，这不是一极可值得注意与惊惧的事情吗？

不错，在压迫中国国民革命势力之一点上，各个帝国主义都是一致的，然而，究因各个帝国主义间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却决不会一致的，所以帝国主义联合多年未圆之幻梦，终归是一

个幻梦而已。所以香港态度突变的原因，固与罗加诺会议无关，亦与意使馆会议无关。

香港态度突变的原因，是极容易明白看出的，只不过是香港政府对于解决罢工最后的一种恫吓政策，据探报系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某英人向金文泰所献的计设，这位先生新近由沪到港，他既号称“中国通”，他以为中国人的脾气，是怕硬不怕软的，只要香港一硬，便可引起他们所谓“稳健派”的中国人的惊异震慄，而强迫他们所谓“极端派”的中国人马马虎虎把罢工解决，——便宜条件下解决。其用意不过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但是，这种恫吓政策有什么用处呢？一则广东人民领教过香港帝国主义的恫吓政策不止一次了，罢工初起不到两三月，香港不曾两次电请伦敦武力干涉广东吗？曾忆我们广东人民宣言欢迎之。黔驴之技，广东人并未瞎眼，何至不能戮穿？再则广东人民比以前更团结一致了。特别在东江南路反革命派肃清以后。广东人民并未忘记沙基之屠杀，并未忘记香港以饷械帮助陈邓进攻广东之狠心辣手，大仇未报，国耻未雪，上自国民政府，下至各界人民，意见是一致的，这一致的意见就是拥护罢工得到最后胜利，——使香港帝国主义俯首贴耳承认全部条件之胜利。

最近援助罢工周之猛烈进行，便其显例。决不象帝国主义者所想象那样有所谓稳健派与极端派。老实说，广州无所谓稳健派，你们帝国主义的走狗却难保没有，他们或许暗中承受你们帝国主义者的意旨，想以罢工便宜卖给你们，不过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革命的广东人民万目炯炯严重监督之下，走狗又何敢出头呢。

香港这种最后恫吓政策，仍不过是帝国主义之又一幻梦而已，我等只有等待他们幻梦之醒。

原载《人民周刊》第2期

署名：邓中夏

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

(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

香港此次罢工，首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印务，最后响应的是机器工人。机器工人知识程度原来比其他工人要高一点，何以此次罢工独落人后？原因在那里呢？简单一句话，因为领袖作梗。

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算不得一个中国人了。他入英国籍，并且在香港警厅充当职务，衣袖上有数道金边，月薪数十镑，这种人早就背叛了中国，与中国断绝关系了，只电话簿子上还存留着“韩文惠”三个中国字，其实就将韩文惠碎尸万段，在他的任何一片肉一块骨上，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一一点中国的质素哩。

以这种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做机器会的会长，无怪对于此次反帝国主义之爱国罢工，他要拚命反对了。反对罢工就是尽忠老番，尽忠老番他可以得不资之赏。此次香港罢工机器工人落人后的原因，就是工贼兼国贼“韩文惠”不肯下罢工命令之所致。

可是机器工人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都是很高的，他们见香港各业工人大家都纷纷罢工返国了，大义所在，于是不管韩文惠有无命令，不约而同自动的罢工，这种自动罢工的价值，与发难罢工的价值，并分别不出谁高谁低。所以我们对于机器工

人之罢工虽嫌稍后，然而我们对于他们仍表示敬佩的意思，和其他罢工工人是一样的。

此次罢工的机器工人是革命的工人可以无疑了。他们返国之后，新组织的机工联合会是革命的工会也可以无疑了，但是那些留港未罢工的工友，到底是革命的呢？或是反革命的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和判断。

我以为未罢工返国之工友还是能够革命的，只不过他们当时受了韩文惠的欺骗，所以未曾返国参加此次爱国之大运动，我们料定他们大部分甚至全部份以未罢工返国为耻辱，痛恨韩文惠不置，随后他们也很想乘时再罢，与省城取一致态度，可是又被韩文惠造谣所迷，说在省机工很嫉视他们，说他们反革命，如果返省，必被机工凌辱。其实机工在省欢迎之不暇，同是爱国，同是反对帝国主义，何有先罢工后罢工之分，只不过留港机器工友不知道罢了。然而他们仍未死心，如最近第二次罢工之议起，留港机器工友一致赞成，又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愿意革命的了。最可恨是韩文惠之破坏，和香港政府武力之压迫，以致他们有志难伸。所以我们不能认未罢工之工友为反革命，我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是大错特错的。正中韩文惠的计。因为逼得他们站在韩文惠一边，听韩文惠之愚弄把持。

我们于此下一断语，留港机器工友，还是能够革命的，反革命的只是韩文惠及其爪牙。

但是留港机器工友尚未加入机工联合会，尚仍存留在华人机器会。同是产业的工人，是应该联合在一个工会之下的不能分处，成为两个工会，然则将来机器的组织，是保全机工联合会呢？抑是保存华人机器会呢？这就是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了。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呢？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现在把我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做各位工友的参考。

我以为我们机工在原则上应绝对要联合一致，不能分开两家。不论已罢工返国的机器工友，或是未罢工留港的机器工友，我们要想尽方法团结在于一个组织之下。如果机工联合会信用增高，留港工友完全要求加入，这是再好没有，如果华人机器会把韩文惠及其牙爪完全赶跑，执行委员根本改组，改成为真正为工人谋利益，并且不受帝国主义及资本家指使的工会，那么我们机工联合会即便归并进去，也不失为办法之一个，总之问题尚得将来之解决，不过我提出来，请各位注意，大家想想。

我敬望在省的机工联合会的领袖和工友，大家努力，增高机工的信用，整顿下层的组织，加紧工友的训练，扩大联合的宣传，务使罢工得到胜利，将来返港，解决此一问题也是不难的。

原载《机工会会刊》第3期

在全国总工会欢迎刘少奇同志 出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刘少奇同志,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湖南总工会就系刘同志所组织,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曾率领工友罢工一次,提出条件十三条,卒使资本家屈服,得到胜利。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及大会闭会后,他回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刘同志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地方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最厉害,工人组织,因之以前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刘同志能将幼稚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却因此而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入狱五十二日,经全国民众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现在已来省城,此后有机会与各工友一齐奋斗。

摘自《工人之路》特号第 249 期发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副委员长刘少奇出狱盛况》的消息报道

欢迎英国帝国主义 进攻中国的十万大兵

(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

去年香港因受罢工之损害与打击，曾经呼号咆哮，发过一次愤怒的毒狠的热狂，要求英伦政府进兵广州。我们呢，曾经大无畏的表示欢迎。

日前据《字林西报》转载伦敦消息，大意是说英国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用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北京二月十九日专电，又言英公使向北廷质问，“究竟是否有力制止粤省排英，否则，英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每日对粤军费一百五十万。”我们现在呢，仍然是大无畏的表示欢迎。

我们只恐英国帝国主义十万大兵进攻中国消息之不确，如其确也，到是帝国主义举行葬礼之日，世界革命必将因此而早日成熟与完成。

英国诚然为天字第一号的帝国主义者，诚然兵强马壮，绰乎有余有进兵中国的力量，因为宣战的三个必要条件：(一)先要自己国内的人民完全赞成，或是完全不理；(二)先要敌国的人民很孱弱的，没有组织的，或是完全没有民族观念的；(三)先要国际间没有冲突，交战国没有别国的仇视。这三个必要条件，英国似

乎都具备了。请看下列种种客观的事实：

(一)英国现在失业工人,日日增加,而且日日觉得危险可怕。商务很受滋扰。减薪的工人又时时暴动,罢工相继。即如英国海员不断的罢工,日益扩大而凶猛,内务部已筹备一个很严密的计划,来应付革命的祸乱。就英国现在而论,同盟总罢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海员路工和矿工,成立三角同盟,共工人三百万人,约定如某一个同盟者罢工,须要帮助的时候,则其他两个同盟的也要罢工。矿工和铁路工人并有铁路矿山收归国有的企图。最近英国又有无线电的罢工。

由以上所述看起来,英国似乎已经具备第一个条件了。英国向中国宣战,势必为战费而减薪加时,对于本国无产阶级施以巨大之征收与剥削,一定会为本国无产阶级所赞成的;前次欧洲大战无产阶级所受战争的痛苦滋味,一定又会为无产阶级所欢迎的;英国工人普遍全国所组织的“不干涉中国会”,也必定会抛弃原来宗旨马上宣布取消,赞成英国政府出兵中国的;前几年英国政府拟武力干涉俄国,英国工人曾群起反对,大约现在情势变迁了,用武力干涉中国,英国工人一定会改变态度乐于赞成或是置之不理的。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宣战的第一个条件确乎具备了。(?)

(二)今日的中国人不是从前——十年前——的中国人了。从前帝国主义的野蛮举动,还没有现在五卅惨杀、沙基狂屠之显明。从前中国人的“文化”,还没有染着许多无辜同胞的血。从前还没有革命的先例,象德国和俄国的一样。从前也还没有组织的工人和农人。现在呢,即就广东而论,除却革命的学生,有二十万组织坚固的工人,和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此外还有许多革命

的兵士——身经百战所向无敌的兵士，还有一个革命政府——肯和人民同患难共生死的政府。他们曾经联合着肃清一切倾向帝国主义者的军阀及反动势力。

由以上所述看起来，英国似乎已经具备第二个条件了。对中国人民如果加以铁血镇压，一定会和八十年前鸦片之战一样闻风逃溃的；一班有组织的并惯经训练战斗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一听外国兵到，一定会束手就缚或听其统统杀尽的；中国人民一定不如埃及、爱尔兰、摩洛哥各弱小民族那样勇敢的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的。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宣战的第二个条件确乎具备了。（？）

（三）八十年前鸦片战争的时候，法国帝国主义还没有占得安南，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占得高丽台湾，美国帝国主义还没有占得小吕宋。当时国际帝国主义还没有在中国竞赛争夺。所以当时大不列颠帝国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形势变迁了，英国若把广东征服了，不独有碍法国在南中国的发展，而且——广东在这边，印度在那边——将来安南腹背受敌有从法国手中被英国夺去的危险。沪案调查法国公使提出异议，就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嫉忌英国在扬子江之势力，又无日不思与英国争夺南中国之市场，据海关贸易册所载英国在南中国之货物额数逐年减少，日美货物额数却逐年增加，又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美国帝国主义为后起之秀，各国在华都有市场和特权，现在想过剩之商品金币而在国外投货投资，那有会再助长英国势焰的道理，在欧洲，美国尚思篡夺英国百年不衰的霸权，何况在未知鹿死谁手之远东？美国前时有发起不平等条约会议的意思，不是他爱中国，爱公理，而是另有作用。

由以上所述看起来,英国似乎又已经具备第三个条件了。英国单独出兵中国,各帝国主义一定会一声不响的;英国战胜中国垄断市场及政治权、经济权、财政权、交通权,各帝国主义一定会以为天命在英莫可与争的;或者英国战胜中国后各帝国主义在华已得之权利被其胁迫时,一定会心悦诚服拱手让之的。宣传已久之太平洋大战,一定会因虚伪的华盛顿罗加诺种种会议而消灭,不致因英国进兵中国而引起爆发的。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宣战的第三个条件确乎又具备了(?)。

英国诚然为天字第一号的帝国主义者,兵强马壮,诚然绰乎有余有进兵中国的力量,因为他向中国宣战的三个必要条件都具备了(?)。

不过英国帝国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计算,却不大一样。

忆去年香港要求英伦政府攻打广州时,据美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大陆报》,却有这样的议论,大意是说因广州一隅局部之事而引起战争,似乎不是良好办法。因为征服中国至少要二十万大兵,而且要继续占领至五年以上。又说:恐怕因此局部战争,会引起日本之参战,引起俄国之参战,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该报的结论又说:此不幸事情最好不要发生,美国应调集兵舰在南洋及中国沿海一带巡弋,如果此不幸事情发生,应作武装调停。

由此看来,英美两国的计算不一致了,英国说十万大兵足够,美国却说要二十万。英国说二年可以征服中国,美国却说要继续五年以上。究竟不知那一个计算的真确?或者英国计算的真确些,因为他言明这是“经专家们预算的。不过是否引起第二

次世界大战,可惜《字林西报》并没有说,英国公使也没有说。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仍然是大无畏的表示欢迎。因为我们多年所打的只是他们的工具——军阀,现在能像摩洛哥一样直接与帝国主义——而且是天字第一号的英国帝国主义——战,到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不过英国帝国主义十万大兵进攻中国只是一种恫吓政策罢了。由此恫吓政策使中国没有脑筋没有常识的人们恐惧而软化,以致于逼迫省港罢工与一切排英运动之让步甚至于屈服,这倒是英国帝国主义一相情愿的事,可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凶残险恶的真面目,又经这么一次使中国革命的民众更深一层的认识了。

原载《人民周刊》第4期

署名：中夏

评广州工会之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

中国的工会，要算广州和香港两处最多了。但是我们衡量某地工会运动之进步与不进步，决不在工会数量之多，而是在工会质量之好。苏联六百万工人，仅组织二十三个产业系统的工会，便是明证。假使工会失掉了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与对资本制度下攻击的重要意义，虽多有何用处。不特无用，并且徒然引起工人本阶级的纠纷而受巨大的损害。广州工会与工会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广州工会之争，一年来不只发生一次了。先是机器工会与油业工会之争，次则集贤工会与海员工会之争，茶居工会与面粉工会之争，锦纶工会与织造工会之争，土木建筑与建道联合之争，目前又有集贤工会与同德工会之争，最近又有普贤工会与乐声工会之争，中山县还有终年未决的什么鲜鱼之争，果菜之争。……哎！太多了。但是工会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战的机关，何以广州工人阶级不用工会力量去打他们的敌人，而却用来打自己呢？这由于有以下的几种原因：

(一)广州工人因有政治的自由，可以自由组织工会，资本家无法摧残，既不能象北方一样用强硬手段对付工人，便不能不改换和软方法希望支配工人。所以资本家或是自己拿出钱来组织

工会,收容一般不觉悟的工人,做他的走卒;或是收买工人中的腐败领袖,罗致一班不觉悟的工人组织工会,做他的保障。或有自己原本是一工人,且曾做过工会领袖,现在升格做了小资本家,仍然把持工会,资本家便与之深相结托,利用他做走狗。这类资本家及其走狗所组织的工会,当然是用来捣乱我们工人阶级的阵营的,是与我们工人阶级为自己利益所组织的真正工会作对的。这样,资产阶级的工会与工人阶级的工会,自然免不了发生冲突,发生争斗。比方某某工会进行工会统一运动,同业原应联合,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反对的,然而同业之某某工会却因此而发生纠纷,甚至杀伤数命。这正因一方面是工人自己的工会,一方面是资本家御用的工会,资本家知道工会统一了,工人势力愈扩大而团结了,对于他一定不利,所以他必拼命反对,甚至斗殴杀人,亦所不惜。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一个原因。

(二)广州有许多工会并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领袖自己的荷包。因为广州产业尚不发达,工人找工作极为困难,于是一般狡黠之徒,形同土霸,利用此点,以介绍职业为号召,吸收一班工人组织工会。介绍职业原来是很好的,是工会应有的职务,可是这班荷包主义者介绍职业,其唯一目的只在克扣工钱以自肥,这样,会员愈多,则克扣愈增,自然发生争夺会员的事情了。如某某两工会因争会员而致于械斗,杀伤三命,其实这两个工会职业大致相同,界限很难分清,依理合并为一,纠纷就可免去,然而他们并不如此着想,可见其居心何在了。尤其甚者,某某工会办一与工会同名之公司,承办包工,如不加入其工会,就不能做工。比方公司包来一种工作,原来工价可得十元,但是公司须克扣四元,并扣二元为行贿官吏之资,实际工人只得四

元,然而工人为保全职业打算,明被克扣,亦只“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则该公司往往假借工人名义,要求雇主方面给以每项权利,实则完全鲸吞,工人分文未得,一方面侵蚀公款,一方面剥削工人。这种买卖,又何怪不争夺会员,要多多益善呢。有一次因其会员自动的改入某一进步的工会,该工会遂以罢工对待,罢工是对待资本家的,今乃对付工人阶级自己,真是上下古今罕见罕闻的奇谈了。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二个原因。

(三)国民党中不容讳言有左右派之分,左派是真正帮助工人的,右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然而扶助工农是国民党党纲所明定,而且客观上近年工人阶级势力日益澎湃了,积极压迫,固所不许,消极反对,又无济于事。于是他们遂变计勾结几个腐败领袖或著名工贼,使为己助,这些领袖或工贼依靠右派政治的势力,乃敢行凶作恶。如某某两工会之争,就因有右派从中挑拨,乃至杀毙人命,主谋者得逍遥法外,就因有右派暗中庇护。又如某某两工会经年方决之争,亦因前时有右派在后指使。廖案发以后,右派势力一落,以后广州工会或有一线的统一希望罢。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三原因。

(四)广州工人本身亦少阶级觉悟,如果真有阶级觉悟,则上述三种原因,皆可以群众力量使其扑灭。但为什么广州工人没有阶级觉悟呢,因为广州新式产业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对于阶级之认识很难,他们的心理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他们的思想还未脱离封建时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广东旧有械斗的风尚,他们受其熏染甚深。所以无论个人与个人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偶有意见不同,即便出于斗殴。他们以参加斗殴为快事,斗而胜,认为“占上风”,斗而败,认为“失面子”,然

而他们失败了,却只自责无能,准备下次再来。所以资本家有一讥笑之语曰:“看呵!神圣打神圣”,原来工人的拳头是用来打异阶级的敌人,广州工人却用来打同阶级的兄弟,又何怪招人之窃笑讥评呢。如某某两工会相约到瘦狗岭比赛一场,某某两工会申言到凤凰岗见过高下,都完全是古时械斗习性之表现。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四原因。

有以上四种原因,广州工会之争所以特别的多了,这实在是广州工会运动中最可痛心的不幸事情。应如何免除此种不幸事情再发生呢?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以为只有从速组织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之一法。广州工人代表会,仅有其名,实际只有执行委员会,而无代表大会。应按人数为比例,由工人自己选举若干代表,组织伟大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关于组织问题,统一问题,立案问题,纠纷问题,以及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与工人阶级自己的问题,不要仰赖官厅或法律解决,工人阶级应有自决的精神。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
第 252、253、254 期
署名:中夏

今年五一的目标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五一运动虽起源于争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他的意义并不限于争八小时工作制,所以他的目标必须参照当时政治环境和工人迫切要求而定,然后纪念五一,才不致悬空不落实。

八小时工作制,四十年来,欧美各国工人以血肉与资产阶级相搏,经过不断的奋斗,算是争到一部分而且推广成为国际的运动了;可是中国工人却仍然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各国资产阶级为缓和革命起见,曾在华盛顿召集世界劳资会议,决定各国均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可是中国日本却被认为有特殊情形,须采用十小时工作制。中国工人也是一样气力有限的血肉身躯,并不是可以昼夜工作不息的机器,为什么可以认为特别情形,要作十小时的工作?况且实际上多是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我们纪念五一,自然对于争得八小时工作制,一步不能放松。

如何才能使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关于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达到,唯一只靠我们自己的一致团结,团结的表现就是工会。有工会才能谋得及保障我们的利益。所以工会组织自由权,是我们当前的需要。现在除广东外,北方及长江各省,尚没有这种自由权。我们纪念五一,自然对于争得工会组织自由权,也

是一步不能放松。

但是今年的政治局势非常险恶，我们须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然后才能脱出这个危险地位。所以特地郑重提出“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这一个重大目标来。

去年五一运动确是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中各阶级性的存在,当然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永远是另一个问题)向帝国主义进攻。聪明的帝国主义者却懂得这一联合战线之可怕,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采用分离这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赂军阀政府,使他们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欺骗中国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小资产阶级(学生及小商人),使之离开这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压迫罢工,压迫工会,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降落下去。

同时,聪明的帝国主义者,不仅破坏我们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建立他自己需要的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即所谓“反赤的联合战线”。如:扶助奉直军阀以打败国民军;勾结上海买办阶级以杀害工人领袖及扑灭工人运动;并收买一般高等知识分子及官僚政客努力作反赤之宣传与组织,这一联合战线反而有蒸蒸日上之势,最后则指使其老走狗段祺瑞,于三月十六日对北京民众加以非法残杀,而反动政局,遂以开始。

据目前形势看来,工人阶级似陷于孤立的地位了,工人阶级为获得他目前的要求和终极的解放,首要打破这一险要局势——即帝国主义一手造成之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即所谓“反赤”联合战线。只有打破他,然后才有第二步

的话可说。因为不打破此种局势，则工会万难公开自由恢复及存在，八小时工作制更不用说了。并且此种局势，不仅于工人阶级不利，实是于全国被压迫各阶级民众大家的不利，换句话说，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即国民革命运动的不利，因为帝国主义的利，就是中国民族的不利。所以凡是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同胞，均应脱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迷惑与欺罔，重新继续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精神，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自然要本其历史的使命，在这一联合战线上为民族利益努力。

今年五一节，全国工会代表群集广东开第三次劳动大会，一方面固然是检阅及集中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要扩大及巩固各阶级联合战线，这是我们当前的生死问题，也便是今年五一的特殊目标。

我们高呼：

力争八小时工作制！

力争组织工会的自由！

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的战线！

一致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攻！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307 期

署名：邓中夏

工农商学联合战线问题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一)

工农商学联合战线这一个问题，从前是没有人注意和懂得他的重要意义的。其原因即在于五卅运动以前之中国革命运动，参加成份只不过限于某一阶级或某两阶级，如鸦片战争，还只封建阶级。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变还只农民阶级；辛亥革命还只小资产阶级与流民无产阶级；五四运动还只小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最近数年之海员罢工、开滦罢工以至京汉罢工又只是无产阶级。每一种反帝国主义或反军阀之运动，并没有工农商学各阶级一齐参加这一事实，因此自然不会发生工农商学联合战线这一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以为从前老革命党没有注意和懂得这一问题是他们的愚蠢，我们现在开始注意和懂得这一问题是我们的聪明。

一直到去年五卅运动发生了，工农商学各阶级不约而同的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了，各阶级一齐参加革命，这算是破天荒之第一次。因在反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之下，有意的无意的而自然成立联合战线。所以此时国民革命的潮流，顿见高涨而澎湃而狂舞，开中国革命历史上空前未有之新纪元。

帝国主义者懂得这联合战线之可怕,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便采用分离这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购买北京政府,使他们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小资产阶级(学生及小商人),使之离开这一战线。于是在反帝国主义之战线上,仅仅剩余一整个工人阶级和一部分学生,孤军奋斗,终至不能支持而失败。

这一个教训是很大的,有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增大而高涨,无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削弱而衰落。

并且聪明的帝国主义者,不仅破坏我们反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更进一步组成他自己需要的反“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即所谓“反赤”的联合战线,如扶助奉直军阀以“反赤”口号扑灭郭松龄,打败国民军;勾结上海买办阶级以“反赤”口号杀害工人领袖,摧残工人运动;更以六十万镑宣传费收买一般高等知识分子,及官僚政客作大规模反赤之宣传与组织。这一反“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反而有蒸蒸日上咄咄逼人之势,而中国革命运动遂受高压陷于孤立与危险的境地。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的策略,孤军奋斗呢?联合奋斗呢?假如我们不忘去年五卅运动事实所给予的深刻的教训,应该回答:恢复并巩固工农商学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反攻。

(二)

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正当解释,是各阶级为了某一共同目标即共同利益而应该出于共同行动,故在某一时期结成此联合战线。

我们虽明知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之不同，各阶级各有其本阶级特殊的利益，因此有人疑心此一种联合战线之建立，必受若干之限制与障碍而难于成功。但是，假使我们从另一方面观察，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一面摧毁中国的手工业与农业，一面又阻止中国实业的发展，工农商学各阶级均受其困，各阶级因其民族境遇之相同，各阶级利益又不期然而然有趋于共同之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必不因其阶级间部分特殊利益之故，而致限制与障碍此一联合战线之建立与成功。客观条件如此，我们是无所用其怀疑的。

征之既往事实，远者如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仅“领土保全”于各阶级有利益，而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而尚于工业资产阶级片面亦有利益，学生与商人不同期然而然出于共同之行动，商人当时极力赞助并参加此一运动，极口称赞学生爱国，事后有援助北京学生出洋留学之举。近者如五卅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又不仅“取消领土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廨”“撤退驻华外兵”“华人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于各阶级全体有利益，并且“撤销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工部局中西人有同等权利”以及抵制外货，推销国货亦于资产阶级片面有利益，工商学不同期然而然出于共同行动，商罢市，学罢课，工罢工，共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一致而与帝国主义抗争。由此证明各阶级在某一共同目标（即共同利益）之上，必然会共同行动，成立一联合战线的。

最要紧的，是各阶级出于共同行动时，固然是各阶级均须出其全力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但是，一方面亦不可因此一联合战线而牺牲某一阶级片面之正当利益，（如无产阶

级要求“加薪减时”“改善待遇”等,资产阶级不能借口联合战线的大帽子,而欺骗并压抑无产阶级必要的最低限度生活条件使不能求得。因为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一方面在此联合战线中各阶级片面利益,亦须受适当之限制(如此时工人阶级亦不能提出“没收资本”以及超过产业现状所不认可之要求条件等),因为二者皆于稳固此一联合战线有绝大的关系。假如有人不懂得这两点重要意义,他便是不懂得联合战线的作用是什么。

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一个观念自然我们应要站得千稳万稳,不能丝毫移动,否则,那么此一联合战线就等于毫无意义了。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客观的事实,这件客观事实,就是社会各阶级民众要求革命的觉悟程度之不一致。进步的民众固然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和重要,落后的民众就不然了,他们所得的只是他们目前切身的部分利益。我们且把最富于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来作一个例,工人阶级中因生活关系及职业关系种种不同,他们的觉悟程度因而就不一致,一部分进步工人群众很了解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并且了解劳动解放一定要在政治解放之后,所以他们很兴奋的做政治的革命运动;但是又一部分落后工人群众,他们就不懂得上述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容易被一般改良派“只问面包,不问政治”似是而非的妄言所欺骗,因为面包确实是工人目前的部分利益,政治确实容易被认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是不急切需要的东西。(据中国目前情形来看,进步工人群众自然应是绝对大部分。)最富于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尚且如此,其余各阶级民众更不待说了。(特别是资产阶

级落后民众更多,因为中国产业是初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简直少之又少。)

社会各阶级既然有落后民众这一事实,假使你是一个革命党,你觉得应该如何办呢?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大帽子硬逼迫他们干呢?还是姑卑之母高论,为求得目前切身的部分利益引着他们干呢?工人运动尚且不废经济斗争与改良运动,何况各阶级特别是商人尚有广大的落后民众,如果你只管高调独弹,他只有掩耳而走了。革命党的眼睛虽是远视的,落后民众的眼睛却是近视的,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知的。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由目前切身的部分利益引导落后民众到最后目的的全部解放为不可少的革命策略。上海五卅运动要求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取消交易所捐照,其意义即在乎此;此次广东工农商学联欢大会之七条决议案,其意义也在乎此。

在此一联合战线上,尤其是资产阶级要有充分的觉悟,因为我们从各国革命历史上都看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如法国革命与俄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为要获得他们自己阶级利益的时候,会与无产阶级携手,等到自己阶级利益获得或是于自己阶级利益冲突,马上就改变面孔而压迫无产阶级了。又如印度革命,资产阶级为反抗国内外势力于自己阶级有利益的时候,亦与无产阶级携手,等到工人势力稍为壮大或是工人发生经济斗争,也是马上改变面孔宁可牺牲民族利益而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压迫无产阶级了。这是事实,去年五卅运动上海资产阶级亦曾经过一次。我们要竭诚告诉资产阶级:你们要知帝国主义一日不打倒,中国实业一日不会振兴;你们要知工人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同时不可不准其改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你们还要知中国经

济命脉与产业机关多在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手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亦多系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的斗争。你们无所用其疑惧与惊恐，你们尤应加以谅解与赞助，因为这是于国民革命有利无害的，假使不放远眼光，完全为了自己利害而牺牲民族利益以至半途妥协，或临阵逃脱，这是最愚蠢没有的事，因为这会使中国永远不能得到自由与平等的呵！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
第 347、348、352 期
署名：中夏

光荣的纪念日

(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

省港罢工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纠察队是省港罢工站在前敌与帝国主义搏斗的先锋队，所以纠察队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先锋队的先锋队。

省港罢工是代表全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奋斗有力的表现，纠察队是省港罢工有力的部队，或者更可以说是维持省港罢工的主要力量，这部分主要的力量使帝国主义发抖，而狂叫而痛哭流涕。

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

天字第一号的大英帝国被八十年在国际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奴隶，打得落花流水，所谓世界第二商埠的香港，一变而为零落的荒岛。

听呵！香港忽然的狂呼而流涕：

“……香港商业受很大损失，英国的轮船停泊香港者四五十只，英国的货物不能畅快的在南中国销行。虽有些货物运去，如被纠察知道，便要充公。广州内河各国的轮船来往如织，可是没有挂英国旗的……”

听呵！帝国主义的伤心语！

帝国主义者又说：

“……如果将纠察队解散，罢工不成问题……”

帝国主义者多么仇视我们的纠察队，他们这种仇视更足证明我们的纠察队的力量，我们的军队就是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

毕竟帝国主义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中国有二种人：一种是爱国的，一种是卖国的。爱国的是那些人呢？就是工人农民以及各阶级革命分子；卖国的是那些人呢？就是官僚、奸商、土豪、劣绅，他们遂利用这般卖国的人来摧残纠察队，破坏罢工，所以这一年来有沙鱼涌之变、太平之变、白鹅潭、江门、广海、……种种惨变，他们以为这样我们便会害怕了，灰心了，其实这只是他的梦想，我们不但不灰心害怕，并且踏着先烈殷红的血迹前进，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

纠察队成立到现在已一周年了，这一年当中，我们受过千辛万苦，这不是白费的，我们的奋斗维持了省港罢工。我们先烈的热血，也不是白洒的，他们滴滴的鲜血同五卅沙基诸烈士的血一样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光荣！

同志们：在今天光荣的日子以后，我们更要努力，更要奋斗！胜利就在我们目前了！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368 期
署名：中夏

中英谈判中的我见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我南中国继续年余至今未休之排英运动,的确是一存在的事实,不存在我们不必虚构,既存在我们也无所用其狡卸。有不有排英这一事实,在怯懦的北京卖国政府或者不敢承认,若在我勇敢的国民政府必须予以承认——不可以其比省港罢工问题尤为广大尤为严重而怕承认。反正不论罢工,不论排货,不论其他一切大小排英事件,都是人民自动的爱国行为,与政府了不相干,因政府固未尝宣布勒令人民排英;既然了不相干,当然不负何种义务,故政府亦不能强迫人民不准排英。总之,排英与不排英,皆系人民之事,而非政府之事。政府此次办交涉,不过应人民之请求,受人民之委托而已。

最要紧的,倒是排英的责任问题,我们要明定责任应归谁负,我们不能不先弄清楚排英的原因。为什么排英?我们首先回答,就是反问英国人为什么在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上海南京路之血,汉口之血,九江之血,重庆之血,以至于我们亲眼看见的沙基之血,都是构成我们不能不排英的原素。我们曾经记得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者为了奥国一皇太子被刺而引起四年长久之世界大战,死伤不下二二千万人,难道中国人民被杀者数百,还不如奥国之一皇太子吗?假使中国强盛,饶有武力,老实不

客气,宣战在所不惜,岂仅罢工与排货这一类的和平排英运动。

并且英国在南中国除了沙基屠杀之外,还有其他不法之行为:一,为什么实行粮食封锁,用当年饥饿德国政策,来饥饿我广东?二,为什么实行政治封锁,截断电线使广东人民被杀真相,不能发表于世界?三,为什么勾结反革命派,以枪械金钱资助陈炯明邓本殷以及中山县土匪捣乱广东?以两千万元购买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四,为什么几次以武力恫吓广东?五,为什么我方从去年八月十五以后,几次提议解决罢工,而香港总不诚意接受?凡此种种,英国连不平等条约都违背,那么中国人民对不平等条约更无义务遵守了。

这些都是使中国人民不能不排英的根本原因。假使在此种血腥的惨酷的状况之下,中国人民如不表示反抗,全世界则真以为中国人“奴性天成”了。中国人因无强大的武力,只有出于罢工与排货之和平排英运动,这是现在反抗强暴不法帝国主义者的唯一武器。此武器,我们现在可以申明:帝国主义者一日不改变态度,我们一日必继续应用的。

由此看来,排英责任在英不在我,这是世界上稍有脑筋的人都会一口承认毫无疑问的。谁负责任,谁应受处罚。我们决不让负责者在我们面前欺骗或图赖。

北方各地排英运动因卖国的军阀与大商买办受帝国主义之购买而被摧残被打灭了,北方各地惨案均未得到满意的解决。论理我们南中国人民应坚持我全中国惨案如不全部解决,则我们南中国排英问题亦不能局部解决。不过,我们省港罢工与排斥英货已经一年有余了,惩戒强暴不法的帝国主义者也算够了,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但不是无条件的解决。我们排英的总要求,就是

取消不平等条约。如果此种不平等条约早已取消,我们敢说绝无排英运动之发生,而且无发生排英运动之必要,可惜帝国主义者不懂此层道理。南中国排英运动之首先发难者,为省港罢工工人,他们是民族运动之先锋队。他们的目的,并不自私自利,全为国家利益,如果英国政府能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则其他一切条件均可牺牲;并可担保五分钟内罢工工人可以返香港沙面复工,及停止排斥英货行动。这原是最斩截最干脆的事,而且是可以掘去日后排英之根株的事。

可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是倚靠不平等条约为生活的,我们料定他们此时断然无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觉悟,但是我方按外交程序应该勇敢提出,如对方不能接受时,至低限度我们应该提出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使得满意的解决。排英问题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必有其实际内容,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是南中国排英的两个实际问题。沙基惨案是延续排英之根本动力,省港罢工是实行排英之具体表现。如此两个实际问题不得解决,何能算是南中国排英问题解决,并且如此两个问题有一不得解决,何能算是全部排英问题解决。我方不要以为此次谈判,动因起于罢工,只谈罢工而止,而不提出沙基惨案;亦不要以为对方否认罢工存在,只谈排斥英货而止,而不提出省港罢工,要知此两个问题与南中国排英是整个不能分离的,分离便失去了南中国排英之实际内容。我们必得确切认定此两个问题为此次谈判中之两大骨干。必得使去年国民政府对沙基惨案提出之五条件,与省港罢工工人对香港沙面提出之卅条件,皆能得到满意之解决,然后沙基死难烈士与各界一年牺牲之代价,不为虚掷。

此次中英谈判,关系中国民族之荣辱生死,我八千万同胞应

一致起来誓为政府外交后盾 ,因为此次谈判的胜利 ,是全民族的胜利 ;此次谈判的失败 ,也是全民族的失败。

外交当局诸公是我们最钦仰最信任的人 ,我们希望他们要不畏强御 ,不避艰辛 ,努力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 !

原载《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

署名 :邓中夏

中英谈判总评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上 篇

中外瞩目的中英谈判，算是七月十五日在外交部开始了。十五日，无甚议论，仅我政府代表团领袖陈友仁先生致了一篇欢迎词。十六日，我政府代表团提出一意见书。十九日，英国代表团提出一答复书。二十一日，我政府代表团提出一反驳书，并提出两种解决办法。同时，我广东工农商学各界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大会，发表力争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条件宣言。二十三日，继续讨论我方提出办法，关于第一组织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英代表表示须请示伦敦政府；关于第二从速解决对英抵制之负担中英两国协力分任案，英代表表示拒绝。英代表提出实业借款办法，我方代表表示尚须考虑。一共经过五次会议，中英谈判告了一个段落。这一个段落，虽不是谈判破裂，实际是谈判延期。

我们在这一段落里要做一总批评，为我爱国同胞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与一条正当的出路。

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我政府代表团十六日提出的意见书。这一个意见书是很重要的，他为中英谈判中全部问题之所系，假

使这个意见书认题不真，拿题不稳，或措词不当，是会使全部问题受其影响，以致于减削分量，甚至乎归于失败。就意见书大致看来，是为广东排英运动谁负责任求得一个根据与解答，在这一点上，这个意见书是值得赞美的。外交通例，凡两国冲突或战争以后，进行和议，在和议席上，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谁负责任的问题。谁负责任，谁受处罚。如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间之欧洲大战。战后凡尔塞和议开始了，各国外交家戴上大礼帽，手执土提克，很有礼貌的进了会场，坐下来首先就问战事谁负责任？结果是断归德国负担了，于是德国就受战胜的帝国主义者予取予求之严厉处罚。我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书，指出广东人民排英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并指出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于是解释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待，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由此说来，此等惨案之负责者为英国，那末由此等惨案而直接发生之所谓省港罢工运动与经济绝交运动，也应该由英国负责，在逻辑上在事实上都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个意见书指陈英帝国主义者三大过失：第一，关于沙面向沙基开枪事；第二，关于香港政府封锁广州事；第三，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所提议解决条件。这三点都是广东人民排英运动之直接原因或有力辅因；“在未提出解决条件之前，本代表深望英国代表对予对英抵制之如此见解，发表意见，不胜厚幸！”是很合乎外交的程序与手续的。所以我们对于我政府代表团这一个意见书，大致上表示十分满意。

其次我们谈到英国代表团十九日的答复书了。这个答复书无理得可笑又可恨！现在把其中的重要点分别驳斥于下：

(一)驳五卅屠杀系自卫行动说——五卅惨案本不在本会议范围以内,我政府代表团意见书不过顺便指出此案为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英代表竟公然说：“群众二三千人攻击捕房……当时值勤巡捕人数有限,已设法劝谕多时,继用警棍指挥,欲令群众散去。詎愈聚愈众,反被拥回,直至激烈之群众,已行抵捕房闸外六七英国尺之遥,伊文生警长恐巡捕之被挤,捕房及军械之被夺……乃下令发枪一排……然以伊文生警长地位论之,当时身当其卫,若非放弃其警长之职责,甘心犯法,而以其所维护之全埠人民利益,付诸群众之手,则除此办法以外,盖无他道。”接着又说：“征诸国际司法调查会三委员,承认其行为完全适法,已可概见。”由此说来,伊文生屠杀中国人民是很合乎理法的了。因为他不仅“自卫”,而且“维护全埠人民利益”,上海市民应于黄浦滩头替他树立铜像以资纪念才是呀。我政府代表团二十一日反驳书内对于英代表“论及此案之言词,自当否认。而所称上海司法调查会赞许伊文生警长之说,则因中国人民与该调查会本了不相涉,尤当郑重拒绝”了。我们尚有几句话要讲,就是上海五卅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之时,捕房实未达到被攻击的危险程度,第一,群众手无寸铁,无夺取捕房的军械之可能,而且无此心;第二,死者弹从背入,可见自巡捕警告后群众已转身退后,说不上攻击,何有于自卫。再看伊文生在会审公堂的供词：

问：“你警告群众之语,彼辈可能听得否？”

答：“站在前面之人,当然听得,但毫无退却意。”

问：“你警告群众距开枪相隔若干时？”

答：“约十秒钟”。

站在前面之人，当然听得，则站在后面之人未曾听得可知。站在后面之人未退，则站在前面之人不能退却可知。警告后仅十秒钟，则二三千群众不能立即退去又可知。由此确切证明伊文生出于居心屠杀，了无疑义。伊文生还说过一段很爱人道的話：“我当时并未命令向地开枪，亦未命令向空开枪，为什么呢？因为向地开枪，子弹跳起来伤人，向空开枪，子弹落下来亦可伤人，所以平放。”呵！五卅屠杀系自卫行动吗？拿中国人性命寻开心罢了。

(二)驳沙基惨案中国先开枪说——关于此点，英代表要证明他们架诬之不虚，开首说了一段：“六月二十二之日，省港中国人士，已切实传说，次日即有袭击沙面之举，其时著有声誉之华人，实行迁港，或作其他行动，以为走避之计，亦不乏人。”末则肯定说：“本代表等不能不郑重声明，首先开枪，实为中国方面。”证据是“不特英法人皆当目击者，可以为证；丹麦、瑞典两国领事，亦有书面陈述，可以稽考；而美国人亲见其事者，亦切实断言从沙基首先开火也。开火后，沙面英法兵士为自卫计，均有还火，盖信袭击沙面之说，行将实现也。”前一段神乎其词，后一段确乎其事。我政府代表团驳复其前段云：“实不能认其为有论据之价值。比殆复述英国前总领事所称六月二十三日事前种种传说之一部耳，所谓‘中国人士’之无根传说，与‘著有声誉之华人’（或为多金之子，故神经过敏）之避迁香港，竟信为袭击沙面计划之证据，宁非人类信仰上一可叹之事。”又驳复其后段云：“盖此等事于六月二十三之日为沙面居民一份子，或参预沙面守御之役，与前总领事杰弥逊爵士无异，不能谓全无关系之人。在理彼等之

证明,与出诸杀中国学生及各界于沙基之后,同为染有色彩。”这算是驳得一罅不漏。英帝国主义者准备屠杀的计划巧妙极了,我政府代表团于十六日意见书中已指出:“六月二十三日,沙面已有准备横暴行为态度。观于英国六月二十二日致外交部伍朝枢部长之函,一时遐迩传播者,可以概见,此函由邮局寄递,而非专差致送。故伍部长六月二十三日大约实际开枪之时始收到之。……此函先述传闻某学生等之怪异消息,谓其互相投票,以博“身为烈士”之荣(此节原函已谓“恐属理想虚造”)继则郑重宣言,谓倘此说有根据成为事实,本总领事当严重警告广东政府,向贵外交长官声明,如有侵入沙面外国租界者,当以武力对付,其局部及全体责任,应由贵政府负之。并谓“现设相当警备,以防群众暴动之发生,如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已有此等事发生,倘不幸复见于此。则号召群众心理以行暴动之人,其血当自溅其首也。”由此观之,则为此函者,措词如此,纵非预定六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流血之成事实,亦早预料其当然,然所属武夫,已养精蓄锐,箭在弦上,其不能临时制止,其流血行为,亦固其所。换言之,则英国前总领事之为此函,不啻自承其欲步上海伊文生后尘之意,或以纯粹历史的意义言之,欲如英国戴亚尔将军在印度阿尔列沙之所为,盖即惯用武力之豪霸,借口防止暴动,肆其杀戮,巧言掩饰,以愚惑东方群众之计耳。沙面帝国主义者事前准备屠杀,事后则反咬一口说是中国先开枪,毒诚毒矣,其如事实难于掩饰何!假使我有袭取沙面之意,为什么不架设大炮轰击更为直截了当?为什么不如沙面一样预堆沙包以为掩护?为什么不准备渡河器具以为进攻之便利?为什么群众徒手而且都为四人之密集队伍?为什么女子小童亦参加列队巡行?为什么军

校学生不先挥去徒手群众队伍不先自行散开才向沙面开枪？人非至愚，岂有自己送死之理。英国政府以前总领事杰弥逊杀人有功，今年沙基惨案纪念之前一日，还给以奖章，说是以资鼓励哩，唉！

（三）驳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说——英代表说：“此种断绝交易非出于自由，仅以少数强有力者组织团体以武力维持罢工，而强人所不欲。”下面则极尽其挑拨煽动之能事了。不曰：“其有恢复正当交易者，不惜置于死地；”则曰：“今以人为的，与经济上健全的藩篱，横亘其中，使人民不得自由行动，恐早晚必有冲破藩篱之势。”多么利害的挑拨煽动之词呀！我政府代表答说：“似此争辩如完全驳复，势必须讨论种种问题，本代表等虽然预备讨论，然已非本会议范围所及矣。”对于挑拨煽动之词则答说：“英人如此见解，已含有侮辱中国之意，如谓中国人民对于残杀行为如沙基惨案者，尚不能引起群众公愤与群众行为，是不特贻重大之谬误，抑且暗示中国人民有奴性存乎其中。虽就中英关系间往事不难摘发一二，引为证据，第世界潮流已排荡大地，今日居亚洲此方之人民，其工作行动皆为自由意志与人道尊严所感动，已不容横暴非法之屈服。”省港罢工酝酿时，便是由全港各工团派出全权代表开联席会议，一次议决宣言条件及临时指挥机关；一次议决发动日时及离港方法，是少数人意思吗？华人机器会为工贼韩文惠所把持，不肯下令罢工，然而其所属工人群众却不待罢工令下，自动蜂拥离港。又远在日本神户之英国轮船华工，也不待海员工会通知，自动登陆返国，是少数指使吗？返省以后，组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由各工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举一代表，共七百余代表。组织罢工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十

三人为委员。一切会议多数取决,是少数人垄断吗?英帝国主义者或者说:“我不是指你们工人,是指工人以外其他人民非出于自由”,呵!对了!更切实些说,指商人罢!去年罢工工人一返省,四商会组织“捐款委员会”,捐款接济工人,此一事。粤沪交通沟通以后,商会举行游艺大会,慰劳罢工工人,此又一事。罢工委员会并与四商会定订善后条例,其原则是“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不经过香港者可准直来广州,”此又一事。为抵制英货起见,工商共同组织“审查仇货委员会”,此又一事。你们今年二月曠使海关封关后,工商共同组织“货物检验处”此又一事。农工商学联欢大会七条决议案中,而拥护罢工居其一,并进一步组织农工商学联合会以执行之,此又一事,即远在海外之华侨,对不住得很,陆续寄回救济罢工费,约有二百万元。不为香港什么东华医院华商总会走狗们捏电诬陷所阻,此又一事。为香港无理封闭之中小华商所组织的恩亲团,亦曾寄同情于罢工,此又一事。即就最近说罢,七月二十一日农工商学各界开的示威大会,由四商会与工农教育团体共同署名发表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宣言,此又一事。这一类的事,数不胜数,是少数人强迫吗?英帝国主义或亦有所根据,因为陈廉伯、何东父子、陈炯明这一类所谓中国人是反对罢工而且破坏罢工的,于是由此而推断其余人民都是没有爱国心思的,换句话说,是有亡国奴性的,凡我同胞愿意接受帝国主义这一个推断不愿?我政府代表说:“英国如此见解,含有侮辱中国之意”“暗示中国人民有奴性存乎其中”,可谓一语破的点。英帝国主义者不惜用“少数强有力”“武力”“强人所不欲”等类字眼,以期耸动视听,计诚毒矣!其于逃不过我爱国民众之慧眼何!

(四)驳香港政府并未封锁广东说——英代表辩护“香港政府对于广州及粤省他处并未设施封锁之策。”一则曰：“禁止某种食料出口者，乃为保存港中粮食计。”再则曰：“禁运金银圆块纸币等出口，乃为保护港中币制及财政统系起见。”我政府代表指出“自主观上言之，无论封锁之真意如何，然谓此‘一般的禁止’者，字意上固不能不解为对于广州及粤省他处施行财政经济之封锁也。又从客观上言之，则其施行之结果势必同于封锁，盖以香港为中国南方总转输之商港，实为中国人民输运粮食之唯一门户也。依此解释则封锁之禁令，虽有八月十一日之变通与十月九日之废止，亦不能为之隐讳。尔时所以变通与废止者，殆已灼知广州设法从他方来采运粮食以为救济，已使此种封锁政策失其效用也。”香港明知广东粮食不足，故用封锁政策饥饿广东。我们除找政府代表所举财政经济封锁事实外，还要指出几种封锁：(一)截断省港电信及检查邮件，使广东被杀真相不能发表于世界；(二)噤使卑路停止海关，使广东出入口货不能与上海及海外交通；(三)勾结北洋舰队，与之合作，封锁广东沿海，并有政治意味。英帝国主义还说并未封锁吗？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封锁香港，但是，香港封锁在前，我们封锁在后，香港封锁是欲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封锁是死里求生。我政府代表已于十六日意见书说得好：“香港之绝断与广州经济关系，实造成一好模范，使六月二十三日惨案之爱国报复，得以仿而行之者也。”

统上以观，英代表所答复者，不是造谣，便是图赖，这原是帝国主义者诿过之惯技，我们原不以为惊奇。

可是在谈判未开始以前，我们看路透电，谓伦敦国会工党议员质问：“香港与广东何日恢复关系？”张伯伦答：“七月十五日便

开始了”。以为英国此次或有诚意解决,但是英代表所答复者如是,谁谓英帝国主义者已有诚意乎?

下 篇

此次谈判和一块试金石一样,真金或假金可用试金石试出来,真诚意或假诚意可由此次谈判试出来。英帝国主义者利用其电讯政策不知造了好久谣了,总说广东无诚意,他自己有诚意。这固然有许多事实终于不能完全为彼辈一手抹杀,掩尽天下耳目,然而实际上不免有多少人被他们迷惑了。现在有了此次谈判,英帝国主义者之造谣,至少要减低其力量。现在我们且把此次谈判前后关于我政府委曲求全之经过,分别指陈出来。

第一,六月五日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直接致函于香港政府,说:“本政府现已准备与香港政府磋商罢工事件,并准备委派全权代表三人,深信香港政府亦宜委派负有同等权责之代表三人,进行磋商也。”本来罢工是人民自动的爱国运动,与政府无关,政府只能处第三者地位,从旁调停。不过罢工一年有余了,广东人民以为惩治强暴不法的帝国主义者也算够了,于是请求政府可以与香港磋商解决,但申明不能无条件的解决。政府接受人民请求,毅然直接致函于香港,可谓委曲求全之开端。

第二,外交部去函后,六月十六日,沙面英领事转来香港总督函,谓:“香港罢工已成为过去之事件,但余已任令凯普、哈利法斯二君代表香港政府与广东政府交涉排英货问题之解决,

……因驻京英国公使已任命阁下(按指英领事)为代表团之一员,故余只任命代表两名。”罢工分明是一存在的事实,由省城尚有七万罢工工友及香港轮船货仓船坞并未恢复原状可证。而香港政府偏说:“罢工已成为过去事件,”只来“交涉排英货问题之解决,”这不是与我外交部所提议的“牛头不对马嘴”吗?论理,应置之不理,然而我政府委曲求全,二十一日外交部答复英领一函,谓“查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如否认其存在,似属推诿而无谓。但敝国政府不愿以再生隔阂之见解,观察阁下之答复,但愿以坦白坚决之态度,应付所有关系之问题。故准备训令其代表,与香港政府代表或英国政府正式委派代表磋商关于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之排英货运动解决之方法与手段。惟为“将来交涉,须郑重为之”起见,要求你们说明两点:(一)“阁下复函中所言代表,其将为纯粹香港代表,抑为英帝国代表?”(二)“且愿贵国代表亦有同等之权责(按指全权)”如此答复,无非想使谈判之实现。

第三,六月二十五日,沙面英领事复函谓:“查敝国派往交涉广东发生之排英骚扰之代表团,将首先代表香港政府。但余已为该代表团之一员,则广东全省之排英事项,及广州政府自愿提出任何同类问题,皆可在谈判之列。关于香港事件,香港代表将有全权办理,余则除办理总领事通常职权以外,敝国政府亦授余以相当自由处置之权,而与香港代表共同交涉。”相当自由处置之权,则非全权可知,何能令人满意?因为双方代表如同等权责,则开议后往往一方借无全权为口实,对于对方提案随时可以拒绝磋商或停止磋商。论理,此点不弄清楚,应无别话可说,然而我政府又委曲求全,不与计较,二十九日外交部复函订期七月十

五日在本部开始谈判。

第四,七月十五日谈判开始了,我政府代表团领袖外交部长陈友仁致了一篇欢迎词,将愿望郑重声明:“此番奉委解决问题,必须本诚实决断之意态,以从事解决,而磋商根据:一方面将使英国人民于两广境内销售货物及执业服务上皆有友谊的与利益的场合;一方面将使本国政府所代表中国人民,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无所牵制,以与世界各国建设一伟大之联谊焉。”这些话说得何等剀切!何等诚恳!如非诚意解决者何能道出只字。十六日,我政府代表团提出意见书,大意谓:“其大体要点,为中国工人拒绝卸货物于英国船只,与中国人民之在本国境内者拒绝购办英国货物或售货于英人也。”“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所谓疗病当治其本也。”“对英抵制之显象,实直接发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之后,尔时中国学生及各界之惨被狙杀,断股折臂,实为抵制之原因所在,衡以因果关系,无可疑者。今欲以会商解决之法,断除此种抵制,不能不先从六月二十三日惨案着手办理。”“六月二十三日惨案为对英抵制之直接原因,已无疑义(此案亦为香港罢工扩大加剧之直接原因),而香港政府对于广州及粤省他处实行封锁,尤为激起与延长对英抵制之有力辅因。”“查本国政府曾提议解决六月二十三日案件,经当时英国总领事答复,称英国政府否认此等要求条件。”在此意见书里,列举许多证据,加了许多解释,可见我政府对于中英纠纷问题,欲求根本解决,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英代表接此意见书后,要求不要在报上发表,理由是“恐徒为激动舆论之具。”如怕激动舆论,何如当日不要乱开枪。论理,此意见书应该即日发表,我政府代表贸然答认英代表此种要求,实

在是一大错误，然而我政府代表竟答认之，亦足见其委曲求全的苦衷。

第五，我政府代表团意见书提出后，十九日英代表答复书，则完全加以否认，并指五卅屠杀系自卫行动，指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指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辩护香港政府并未封锁广东，强词夺理，造谣图赖，令人发指，不能卒读。论理，此时再无继续磋商之余地，然而我政府代表又委曲求全，尚于二十三日据理驳复。并于驳复书后，提出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委托一第三者出而组织一公正的考察法庭，决定此中争点，国民政府当遵守此法庭之决定，深望英国代表取同一态度。”然尤恐为期太长，乃有第二个办法：“英国代表方面，苟不再事争求，而愿早日恢复香港与国民政府领土（广东、广西、湖南）之通常关系，本代表等亦抱同一愿望，主张关于早日解决对英抵制之担负，由两方协力分任之。此项担负：第一，中国人民对英抵制坚持一年之久，此后应予以相当保障，使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事件不致重行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抛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赔偿抚恤六月二十三日案死伤家属；第三，如解决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之失业大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然后可以排除香港与国民政府领土各地关系之恢复上种种障碍。设两方面切恳和平解决，自非相互极端让步不为功，此明眼人所深知者也。”此项办法算是让步到了极点！去年国民政府对沙基惨案提出之条件，为谢罪；赔偿；惩戒有关系长官；撤退外舰；收回沙面等事项，今则仅仅提出赔偿限制外舰。又省港罢工工人所提条件，皆按下不提，仅仅提出筹备大宗款项，解决失业问题，以期早日恢复中英关系，其

余留待第三者考察法庭之决定，可谓体恤周到，仁至义尽，其委曲求全之心，昭然若揭矣。

第六，上述两个办法之提议，英代表对于第一个，表示须请示伦敦政府；对于第二个，表示反对并郑重声明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英代表态度多么倔强呵！论理以下再无他话可说，然而我政府代表仍为委曲求全，复行提议“当组织公正的考察法庭未成立以前，为便利从速解决对英抵制问题之需用起见，应行借债，此项借债系由国民政府及香港分别担任，藉轻国民政府财政上之重大负担。设英国方面在公正的考察法庭中将来得到胜利，则香港所担负之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之。”让步到此，无可再让了，但英代表也表示反对。英代表所提出解决抵制办法是“欲以实业的借款，贷与中国，以为开辟黄埔港口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又谓：“如中国不欲经营上项事业，则同样的实业的企业，如建筑铁路于别司湾或汕头，均无不可。”我政府代表表示尚须考虑。

由此以观，我政府委曲求全到如何田地，然而英代表仍本其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之固有天性，不稍改变态度，所谓诚意者安在？英代表在谈判中，口头极力申说，沙基事件之关系者，不仅我英国，还有法国，为什么中国只找英国，不找法国。其用意无非望中国兼找法国，他便好拉拢法国共同对我。我政府代表答：“中国找法国交涉沙基惨案乃另一问题，如英国现在自请法国参加解决，我们并不反对。”总之，经过此一谈判，英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又给我们深一层的认识了。

此次谈判虽未破裂，他却已延期了。这一延期延到何时，要

看英国伦敦政府是否赞成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之回电到来方能断定。我政府原本多方委曲求全要得到一个适当解决，然而英帝国主义万不肯改变态度，则又可以说，除非我们完全屈服！试问屈服是不是“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的广东人民应该取的态度呢？或者只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反革命派会说应该，稍有血性的人，必不承认是应该。在延期中，工人所受的痛苦，商人所受的损失，都是英帝国主义所赐。

同胞们！我们对于此次谈判的正确认识是怎样呢？此次谈判，总题目是解决南中国之中英纠纷问题，即南中国人民排英运动问题，动因虽由于解决省港罢工，实际要将“沙基惨案”“经济绝交”与“省港罢工”均为排英运动之实际内容的三个具体问题一同解决，由此以观，则此次谈判，关系于全民族的荣辱。谈判胜利，是全民族的光荣；谈判失败，是全民族的耻辱。换句话说，不仅是那一部分人的荣辱，而于另外一部分人无关。再显明些说，决不仅是罢工工人的荣辱，而于其他各界人民无关。我们已有此正确认识，然后我们大家乃能决定，此后共同的正当出路。

我们在延期中怎样办呢？这必须有个回答。大家如说要继续奋斗，不甘屈服，那么，必须“厉行经济绝交”！“拥护省港罢工”！但我们要不仅口里说，还要实地做；不仅一部分人做，还要大家做。这样反帝国主义运动才能有效，才能成功。比方举封锁海口做一个例罢！罢工纠察尽管忠心职守，甚至牺牲生命去做，然而却有一部分奸商土匪与不肖军队结成三角同盟来破坏，这是事实，并非捏造，所以我希望于工农商学各界爱国同胞者，必得要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有具体方法厉行经济绝交，有

切实行动拥护省港罢工，然后方能使得英帝国主义感觉中国人民不可侮而终归屈服。

同胞们！最后的胜利，要靠最后的奋斗！

原载《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

署名：邓中夏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

(一九二六年八月)

—

“五卅”长期潮流之省港罢工。罢工的原因。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罢工的意义。

省港罢工是中国五卅运动长期潮流中之最后砥柱。虽说在中国北、中两部所有因五卅惨案而发生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概归沉寂，然而南中国之省港罢工却屹然独存。屈指至今，转瞬一年又两个月了。这样长期的罢工，在我们身历其境者并不觉得什么，在所谓“泰西”，据说自从亚当、夏娃创造人类以来尚未有过。就此一点，我们已足以自豪了。

“八十年来的奴隶待遇已算受够了”，即使无上海五卅屠杀之事发生，香港、沙面奴隶们也会有起来对不住“深恩厚泽”(?)的皇家的一天的；既有五卅屠杀，奴隶们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唿哨，大家抛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结队离开了他们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这就是历史上可资纪念的六月十九日。

宣布罢工时，登即发表了一篇宣言，大意是说：“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

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之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无畏惧，愿与强权阶级决一死战。”诸君试听，这是多么激越悲壮的声音呵！

宣言之后，附以要求，分为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六项。

由此我们知道省港罢工不是什么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之经济斗争，而是为争民族生存与国家体面之政治斗争。这便是它特殊的严重的意义。

我们认识了此种正确的意义，进而叙述一年来经过的事实。划分为四个时期。

二

罢工之酝酿与爆发。罢工情形。香港之高压。沙基屠杀。罢工组织与封锁。香港经济之损失。激怒政策之失败。香港恐慌与纷乱。武力恫吓。勾结反革命。特许证与海外交通。修筑中山公路。特别法庭运动。

第一时期，从六月十九日罢工开始起至八月二十日廖公被刺止。

未罢工之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代表落港，与全港工团秘密的开了两次联席会议，一次是议决临时指挥机关与宣言条件；一次是议决发动时日与离港方法。此时香港政府已缇骑四

布，水兵登陆，煌煌文告，缉拿“首凶”，杀机瀰漫，一触即发。然而工人仍毫无畏惧，很敏捷谨慎的传达罢工命令。六月十九日晚九点钟，香港与日本当年大地震一样，震得人人惊惶，手足无措，最后哇的一声哭了。

最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印务工人，接着就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各种工人相继踵起，机器、船坞工人殿后。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从火车、轮船、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返省。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并起。

香港政府因此宣布欧战所无的戒严令及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一面欲以铁血政策镇压香港，一面欲以封锁政策饥饿广东。然而工人激于民族义愤，万死不辞，蜂拥离港，沛然莫御。素以凶残著称之军官总督史塔士，虽捕获领袖数十，究竟无济于事。于是“东山崩裂，洛钟响应”，沙面英领事杰弥逊遂于六月二十三日对沙基巡行民众施行比上海犹为惨酷之大屠杀了。

沙面方面的机关枪，在沙袋背后瞄准中国民众扫射，二十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倒毙在路上，此外有一百七十多个受了伤。此外白鹅潭兵舰发炮，准备轰击广州城。帝国主义者残忍成性，于斯益信。

沙基屠杀以后，广东人民莫不悲愤填胸，厉行经济绝交。罢工工人更一面努力于自身组织与封锁海口。组织方面，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举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大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为最高执行机关。其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

管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皆直隶于罢工委员会，分头办事，秩序井然。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封闭各赌馆、烟馆、空屋，以为罢工工人饭堂、宿舍，划分八区，每区置登记处，登记返省工人，工人宿食，虽不周全，幸得安定。封锁海口方面，成立纠察队，共人数二千余人，每十二人为一班，置一班长；三班为一小队，置一小队长；三小队为一支队，置支队长，支队副，训育员各一员；三支队为一大队，置大队长，大队副，训育主任各一员；五大队统属于总队，置总队长、训育长各一员（后改为委员制），为全队之统率与指挥者。布置粗定，请黄埔学生加以军事训练，分派各海口驻防，其责任为维持秩序，严拿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从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省港罢工工人与香港沙面帝国主义两军对垒，严阵相持，而香港经济上受空前未有之打击，从此就开始了。

香港每年进出口货价值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亿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尽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亿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沙基惨杀以后，英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继乃考察，原来英货每年输入广州不过三、四千万，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虽英帝国主义者答复我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函，措辞极尽侮辱嘲笑之能事，对于沙基惨案，则曰“中国先开枪”。对于我方所提条件，则曰“不能考虑”。对于外交部长胡汉民先生，则曰“未习外国言语文字，不识外交惯例礼节。”种种横蛮态度，粗率答复，讥笑口吻，无非欲以激怒我方，其用意不消说在求一战。其时我方刘杨战争方毕，广

州地方甫定,反动势力环伺,政府尚未巩固,故皆隐忍,而以坚持罢工与排货为抵制与反抗帝国主义之策。

香港自罢工后,做饭和洗衣都要自己动手,固不待说。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裹粪,抛掷街中,加以炎日蒸炙,臭气薰天,故群呼香港为“臭港”。交通既绝,内地肉食菜蔬,无从运至,猪肉涨至一元余,鸡蛋涨至五角多,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故又呼香港为“饿港”。轮船阻滞,船坞停废,商店歇业,银行挤兑,一时社会秩序,纷纷大乱,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香港)帝国主义者不觉怫然大怒,无可再忍,七月二十七日,召开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用武力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同时又积极勾结广东反革命派梁鸿楷、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辈,供以银械,推翻新成立之国民政府。关于前者,伦敦英皇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环伺,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结果对于香港请求用武力干涉广州,置之不理。关于后者,被罢工工人发觉,举行大示威运动,请愿政府肃清反革命派;只刺杀援助罢工最力之政府要角廖仲恺先生,算是他们一部分计划之实现。此时罢工和政府都到了一个危急存亡的境地,是罢工以来最紧张的时期。

我方已经看到省港交通断绝,有两大问题须立即解决:其一,即广东粮食、燃料不足;其二,即预防各帝国主义协以谋我。于是实行“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首先将上海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其次将暹罗、安南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并准日、美等国轮船来粤。原来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户,如不沟通海外直接

航运,必成坐困;再则此时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如下特准日、美等国货船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特许证制度,一在图谋广东经济之独立自存,一在撤散帝国主义间之联合战线。此特许证由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罢工委员会共同审查签字发出。此特许证制度实行后,上海、暹罗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要求领证复业。于是商船直达黄埔者,每日平均四十余艘,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这也是使得香港帝国主义眼红气愤,坚决再求一战。我们要在此地郑重声明的,就是“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个政策上的原则,是此次省港罢工能够坚持如此长久之第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应连带说及者二事:

一、修筑中山公路。罢工委员会的眼光,不仅敏锐,而且远到。认为打倒香港根本办法,即为黄埔开埠。孙大元帅在时,再三注意及此。故提议修筑从广州至黄埔之马路,凡长七十五里,定名为中山公路,兼以纪念国父也。筑路工人凡三千余人,有筑路委员会管理之。

二、特别法庭运动。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罢工委员会爰设会审处以审讯此等走狗。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以枪毙,自然须送政府法庭复审执行。其时广东检察厅长卢兴原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况中国国民党党纲明明确定:“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及个

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林和记“不仅卖工,实属卖国”;“即使戮之于市,亦足大快人心”。故要求国民政府另设特别法庭,以处断此项破坏罢工人犯。结果,政府准予所请。不过可惜特别法庭成立之后,仍落在卢兴原手里,一切走狗汉奸,他为之设一专门辩护的律师,什九宣告无罪。罢工工人又无所谓法律知识与政治权力,除掉事后干骂两声卢兴原庇护走狗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哩。

三

廖仲恺被刺的原因。肃清反革命。左派执政。如何渡过难关?取消特许证。工商联合。预祝升平运动。北上外交代表团。香港总督换人。金文泰变本加厉。提出解决罢工条件。东征与南征。罢工运输队。四代表之派定与八华商之来省。纠察封锁线扩张及其牺牲。

第二时期,从八月二十日廖公被刺起至一月一日国民党大会止。

廖仲恺先生为什么被刺?此处不能不略述当时的政治环境。自从打败刘、杨以后,国民政府成立,在政府中显然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领袖,而魏邦平、梁鸿楷及所谓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领袖,而一般官僚及失意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为领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这三派开始便明争暗斗。其时第三派主张军政、财政、民政统一最力,其议案经过若干波折终归通过。这自然于一般反革命之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大大不利——不是于他们割据地盘不利,便是于他们

霸占税收不利，或是与他们贪赃枉法不利。廖先生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及省政府财政厅长，财权在握，并且雷厉风行进行财政统一决议案，于是遂遭反革命派之忌，而买凶杀之心以决，许、胡高高在上，其部下军阀官僚政客协谋刺廖，亦不能洞烛几微，预为防范。反革命派一面在报上捏造共产与反共产之争（其实刘杨造反，亦以“反共产”为口号），一面从暗中煽动主军与客军之分，而暗潮剧烈，已达极点。香港帝国主义者见此弱点，乃从而勾结之，资以金钱枪械，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新军械之发现，皆其证也。帝国主义及反革命之军阀官僚政客团结一致，而廖先生死矣。于是而有八月二十日中央党部门首之喋血。

先是反革命派阴谋，国民政府委员未尝不知，然以派系复杂，无法处置。罢工工人虽有八月十一日之肃清内奸大运动，壮政府之胆，而政府终不敢动弹，惶然袖手。及八月二十日廖案发生，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平、郑永琦、莫雄等部，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随后许崇智请假赴沪，胡汉民出使苏俄，而广东政权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

在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政府差不多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其所处的环境，异常恶劣，异常危险。在广州，是谣啄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是陈炯明陷落潮、惠，邓本殷进攻江（门）、台（山），中山县土匪占领县城；在省外，是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全国，是各地运动摧灭，反动势力益展。我们要怎样渡过此一难关呢？

比方特许证除为图谋广东经济独立与撤散帝国主义联合之

作用而外，实在还有使得广州商人有生意可做的重要作用，这是可以公开说的，在沙基惨案发生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等到时候稍过，热潮稍低，商人必蒙头一想，自言自语道：爱国好呢？做生意好呢？料想大家的结论，必是爱国固好，做生意更好。省港交通既经断绝，如不另辟航路，那有生意可做。另辟航路，如不加以限制，势必影响罢工。此时一面“体恤商艰”，一面“保障罢工”的法子，只有特许证。不幸当时有一部分商人，不体谅罢工委员会此层意思，“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竟受反革命派政客官僚所挑拨愚弄利用，挺身而出反对。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这本是枝节问题，罢工委员会准予减免，惟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决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但工商为社会两个有力基础，何能发生分裂，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所乘；并且香港帝国主义者正在打算勾结商人，借以反对罢工。罢工委员会有见及此，廖案发生后数日，自动取消特许证，并进一步而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定善后条例，仍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本来中国工商业不能自由发展，即在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束缚，帝国主义实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广州大部分商人幸而深明此义，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之提议，积极进行，于是商人亦一同站在反帝国主义之战线上了。我们又在此地郑重申言的，就是省港罢工能够维持如此长久，工商联合政策，亦是各种原因中之一重要原因。工商联合以后，算是内部冲突问题，得一解决，我们才放心，聚精会神于抵抗帝国主义与肃清反革命派种种工作了。

不过此时广州市面，谣言四起，杯弓市虎，人心惶惶，镇定人

心,是此时当务之急。于是乃有统一广东预祝升平之运动,举行提灯大会,以“反革命肃清,广东得太平”为口号,经过此次广大宣传,人心方暂安定。

再则北方各地运动,依次降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况且沙基惨案真相,全国尚未周知,沙基惨案条件,亦须联络全国力争,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组织之,一面为省港罢工减轻负担,一面也是想扩大全国联合奋斗。

香港帝国主义者,八月二十五日还开了第二次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置之不理,乃改电首相,仍请用武力干涉广州,措辞极其哀婉,意志极其愤懑。结果英伦首相答复:“香港苦处我是很系念的,不过现在无法出兵。”老鼠跌在糠缸里,空欢喜一场。总督史塔士以处理罢工不当,此时也滚蛋了。继之者为金文泰。据说金文泰通晓华语,人甚和平,服膺孔子,主张读经,常说:“假使华人读经,此次罢工不致发生了。”一般空想家,预言以金(文泰)易史(塔士),罢工可望解决。谁知此公下马,就说:“伦敦既不赞成向广东宣战,我们尚可用别的法子对付。”什么法子呢?拿出大把花白的银子,大批明晃的枪炮,左手递给陈炯明,右手递给邓本殷。准陈逆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并准其在香港市上,得自由捕拿过往的汕头罢工工人、海陆丰农民以及革命学生,达二百余人。一面又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围困广东;一面又嗾使林警魂、袁带率领土匪陷落中山(县)。眼光四射,运筹从心。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冒昧来省,进行调停罢工,罢工委员会将对香港沙面及学生要求之三十条件交其带港,金文泰板着面孔对华商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此次都不大和

平了,或者只此一回,下不为例罢。

廖案发生后,一方面以其时政府方从事于肃清反革命派及东征南征之准备;一方面以上海北方各地运动低落,省港罢工势成孤立;罢工委员会本可在相当条件之下收束罢工(因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沙基惨案条件已经交付北上外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员会亦认为提出解决罢工条件之时机已到,谓“此条件之提出,于国民革命运动至有利益,如对方能承认吾人之要求,则国民革命运动必因以日臻巩固;如对方表示拒绝,则世界知曲直所在,于国民革命运动亦有促进之效能也”。恰巧九月二十八日香港各邑商会联合会代表十余人来了,罢工委员会即将条件交去。但是金文泰正在大规模的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虽明知陈、邓等是些破烂的工具,不值所向皆捷的国民革命军一击,但这是帝国主义者利用恶势力对付敌人常用的惯技,在历史上是有前例的,如前年英人利用希腊攻打土耳其,俄国革命时帝国主义者利用白党攻打苏联政府,不管他们准备够不够,只管自己需要,强迫他们去打,故结果都失败了。金文泰此种计划尚未试一试,如何肯罢手接受条件。“谁叫你带回条件来!”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我方也准对着香港帝国主义此种计划而反攻。此时广州市内及附近反革命派军队都肃清了,国民革命军放心的以一支大军东征,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再以一支大军南征,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南路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两月。罢工工人更为兴奋,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敌;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向民众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将士。罢工纠察队请纓出征,上阵杀贼,政府责令

巩固后方。是役也，计罢工工人死者数十，因劳致病者数百。国民革命军以“不筹饷，不拉伕”为口号，但一般市民向存兵凶战危的观念，谁肯应募去冒生死不测的危险，罢工工人担任运输，一方面使革命军宣言的实践，一方面使革命军行军的神速，也是使得东征南征能够容易成功的一个原因。

东征、南征将近胜利的时候，香港帝国主义戏法为之一变。因为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已为恢复，革命军一到汕头，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了。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赖以苟延残喘，革命军攻入南路，此项接济又被我们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又复逡巡沿海，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的率队北返。香港买办阶级固然依附香港政府，惟其意旨是遵，到底罢工太久了，中、小华商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乃忿恨香港政府，同情国民政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省，共有三百余人。继华侨又有参观团之发起。香港帝国主义在此时，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心生一计，宣布派遣遮打、宾那、周寿臣、罗旭和四人为赴省解决罢工代表，但是始终不见出发，无非借以欺骗华商，缓和其反感而已。恳亲团抵省以后，香港政府恐其有变，突然另派华商代表八人来省，问其是否代表香港政府？则曰不是，只代表华商。问其是否有权解决罢工？则曰无权，只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复：“我们是反对香港帝国主义，并非反对华商，华人与华人谈判，太不好看。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亦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诸位同胞来省，我们很欢迎，很感谢，请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之四代表，放胆来省，我们早就准备诚意解决罢工了。”这就是香港帝

国主义变戏法之又一幕。

东江南路收复以后,罢工纠察队的海口封锁线也扩张了。从前,纠察封锁仅限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圳,西迄前山,现在则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了。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其防区大概是这样的,白鹅潭之附近河南、芳村、花埭、黄沙、沙基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陈村、大良、容奇、潭州为一区,以一支队驻之。江门、公益埠、斗山、广海,沿宁阳铁路一带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石岐、前山为一区,以两支队驻之。深圳东至沙鱼涌西至宝安南头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太平为一区,以一支队驻之。汕头为一区,以一支队协同汕头罢工委员会纠察队驻之。其余则于淡水、阳江、水东、雷州、北海、琼州岛等处设办事处,配以纠察数班数小队不等。水面有小舰十二只,往来巡查截拿。从此“广州表面发达,河内有各种旗帜之船,但无英国的,此种船与上海及别埠交通,而不至香港,因受罢工领袖严格的命令,香港无可奈何”。“因之香港在本国许多定货只有搁置。此六月间,实际与国内工厂无新的贸易,地价及股票跌落至百分之五十,地方的公司减少。”(录香港某西记者对伦敦之通讯)这样一个队伍,虽说二千余人仅只二百枝枪,但在香港帝国主义者碧眼黄瞳中,是值得惊惧的。始则大骂纠察,如何勒索,如何受贿,继则直接的或间接的勾结土匪奸商甚至不良军队对纠察加以袭击了。如沙鱼涌之役,纠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便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罗坤干的。太平之役,纠察死八人,便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役,纠察全军覆灭,便是香港以枪械资助土匪袁带干的。其余各地,尤难指数。最近还有白鹤之役,淡水之役,前山之役,此乃后话不提。纠察在我们眼中却是值得钦佩的,

为什么呢？他们武器虽少，大部分虽赤手空拳，然而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而忠于职务（亦正因忠于职务而为一部分名虽中国国籍实则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人所不喜），前者仆，后者继。在上头指挥者通盘筹算，嘱纠察要严密封锁与避免冲突（其实此项原则已经自相矛盾）。但是枪声一响，队员则争先恐后踊跃应敌了，大队长或支队长，遵奉上头命令加以制止，队员悻悻然说：“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何以帝国主义打来，我们还不打去？”我书到此，我泪夺眶而出了，假使中国有充足武装，收回香港亦是容易的事，然而现在国势有所不能。

[附] 此条件即“香港罢工工人恢复工作草案”，全文如后：

一、香港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教育、居住及举行救国运动与巡行之绝对自由权（凡被解散之工会须恢复之）。

二、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保障与待遇，务须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为。

三、香港定例局之选举法，应行修改，以增加华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四、香港政府应制定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之缔结契约权，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制定此项劳动法时，应有工团代表出席。

五、不论公私机关服务人员及职工，皆一律恢复原有工作，不得借故拒绝或开除。以后并不得有政治的或经济

的压迫及报复等事。

六、不论公私机关服务人员及职工罢工期内工资照给。

七、所有因罢工而被捕者，应立即释放，并不得驱逐出境，及因罢工或嫌疑而被驱逐出境者，应一律恢复自由。

八、所有罢工期间因欠租致被香港政府及业主拍卖家私等项者须赔偿其损失，并准其居住原屋，免收罢工期内之租项。

九、香港政府公布七月一日之新租例，应立仰取消；并由宣布取消之日起，实行减租二成五。

十、在香港各国代表与中国工人代表组织赔偿委员会，应由香港政府负赔偿香港中国工人在罢工期内之损失。

十一、凡轮船工厂公司一切大小职务，华人皆有平等享受之权，香港政府应不分中籍西籍，一律平等凭证（如客船往返口岸，中国人有权行使船主及司机职权）。

十二、未罢工以前，香港政府所给予华人一切凭证及牌照，应继续有效。

十三、凡工厂及大公司货仓有一百人以上者应设立工人宿舍，免收租项。

十四、凡未参加此次罢工运动之工人须一律开除，俟用尽罢工工人，方许再用未罢工者。

十五、香港境内，应准自由行使中国货币。

四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左派地位一时动摇。香港帝国主义之幻梦。国际形势与全国形势。香港宣布

停止解决罢工。广州商人之忿怒。罢工工人之苦况与援助罢工周。香港商人酝酿罢市与第二次罢工。黄埔开埠之促进。十万大兵之恫吓。勾结右派之袭击。嗾使海关之停关。

第三时期，从一月一日国民党大会起至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止。

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广州，这件事为什么与罢工有绝大关系呢？就因经此次大会之后，国民党左派地位隐约的发生了动摇。本来廖案发生以后，左派掌握政权，取绝对不妥协态度，于是一般右派赶赴北京而有西山会议之召集，继又在上海而有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设立，专门与广东政府左派对垒。广东此时亦有一般曲解中山主义有意无意的与上海北京右派遥为呼应之组织。右派的口号虽然是反对共产党，其实是反对左派执政。共产党此时忠于国民革命，并未在广东政府取得列席位置，何可反对；其可招反对者，不过他竭诚赞助左派而已。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表面左派仍极强硬，实际已对右派让步。此时上海右派亦分两派：一派主张维持伪中央反对广东左派到底；一派主张站在外面反对无济于事不如回粤活动较有效能。大会开过了，右派或明或暗的纷纷来粤。左派在此时似进似退的而无一定应付和处置的坚决主张。此种政治情形，香港帝国主义者那有不胸中雪亮之理。于是幻梦就开始了，以为广东不久就有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既然如此，又何必急于解决罢工呢？与其今日接受左派执政时之厉害条件（其实并不厉害），何如将来接受右派登台后之便宜条件（甚至于无条件）。所以香港帝国主义者天天向世界宣传，广东有急进稳健两派，稳健

派不久就会得势。

况且,从国际形势看,罗加诺会议方告成功,英国外交大告胜利,张伯伦踌躇满志的认为帝国主义间从此可以联合了。再从中国形势看,英、日两帝国主义正从事张、吴之联合,变反奉战争为反国战争,打败国民军,重建张、吴统治下的反动政局,以分讨南、北二赤。这样,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帝国主义者率性于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停止解决罢工。

香港帝国主义这个宣布很巧妙,把无诚意解决罢工责任轻轻推在国民政府身上。其实此次罢工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惨杀,工人自动罢工,与政府无关。可是政府早就希望罢工早日解决,其诚意表示:第一次,曾派重要官员到港。第二次,港官到省表示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政府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若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第三次,港方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商店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我方也表示可以相当让步。其委曲求全,可谓至矣尽矣。一月二十五日交涉署将此真相露布于世界。此时广州四商会看到香港政府宣布停止解决罢工,是很愤怒的,通过一决议案,说:“此次罢工实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天气寒冷了,几万罢工工友住在空洞无遮的房里,睡在塞门德土的地上,罢工委员会因经济关系,又不能为置床板,置草垫,地上只是一张装货的草包。两个人共盖一张棉被,又短、又窄、又薄、材料又不好,两人共盖,你也想多盖一点,我也想多盖一点,相互一扯,棉絮就分两个半边,或是一个大洞。每人发给棉衣一

件；“僧多粥少”，尚有万余人取不到。只有棉衣，没有裤发，有的因裤破不敢出街。又如罢工医院，通常每日门诊者五、六百，留医者三、四百，死者约二十人。其病多半是脚气病，因为睡在塞门德土的地上的原故。有些是痲病，因为东征南征操劳过度的原故。女工在医院产育，因设备不周，往往发生危险。罢工工人的苦楚，真是一言难尽。不知真相的人，以为罢工工人有饭吃，是住在皇宫里享福哩。此真相宣布后，广东各界既愤英国帝国主义之无诚意解决，又见罢工工友之如此牺牲，于是发起举行“援助罢工周”，宣传演讲，售章捐款，授旗慰劳，游艺娱乐，给奖鼓励。

阴历年关到了，即商店收债的时候到了，香港自罢工后，报穷案日必数十起，收盘倒闭者日有所闻。十一、十二两月倒闭者三千余家。有些勉强支持的，一到年关，这个年头儿，怎样得过。香港政府本来从伦敦政府借来三百万镑，以为救济商业之用。但是这款是不好借的，譬如商家欠债二十万，而十万最急，银行存款，因罢工关系政府不准取出，只能向政府借，政府则以商业产业作按（押），而减低其成数；同时政府向银行将款取出（实际即商人存于银行者）付与商人。这样一来，政府一文不出，而得按业；如到期不还，政府得没收其按业，危险一。借得十万后，债主听到消息了，纷纷临门催讨，二十万都要还，商家无法应付，只有倒闭，危险二。这些都使得商人恐惧与愤怒。原来香港华商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为老派，华商总会属之，此派完全是绅士退伍官僚与买办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走狗，前时所谓公民大会电请伦敦用兵攻打广州，他们是赞成者之一；电致海外华侨截止援助罢工款项，也是他们干的。二为中派，南北行属之，他们只顾做生意，不甚管事。三为新派，各邑商会联合会属之，以地方主义相号

召，多属中小商人，颇倾向国民党；就中以新产生之愚亲团一般人为最左倾；惜乎此派有些人为何世光收买变节了。罢工半年余了，先前不免错怪罢工工人，后见罢工工人及省城政府充分表示诚意解决罢工，而香港政府不肯，于是新派就不觉发生反对香港政府之情绪了；中派亦有同情之趋向；特别在此年关更促进他们之激烈。香港罢市之风传，遂一时陡盛。罢工委员会自然绝对赞成，去年罢工开始时，本拟联络商界一致行动，今罢市虽晚，仍可为助。并准开一特例，年关前后，准省港交通暂时恢复，予华商回省以便利。同时又派人落港运动第二次罢工。结果因香港帝国主义之严厉压迫，声称如罢市则没收财产；捕拿监禁；并不准港轮上省。商人终竟胆小，不敢动弹；只第二次罢工，回省者约一万人。

广东经济不能发展，在于受香港之限制垄断压迫，凡稍有民族思想的人，都知道经济独立之不容稍缓；况乎罢工已成为长期之奋斗，亦有安插工人作工之必要。从前孙大元帅在时，已有黄埔筑港规划，此时广东各界更努力于黄埔开埠之进行了。首先成立“黄埔开埠促成会”，一面从事宣传，一面从事计划。

上面说过香港帝国主义者幻梦开始了，但是帝国主义者幻梦之中又出以毒辣之手段。

第一个就是十万大兵之恫吓。不久以前，日本出兵满洲，香港帝国主义者极力嘉奖，说这才是办法啰。其跃跃欲试，已可概见。果然天从人愿，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转载伦敦消息，说：“英国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北京二月十九日专电，英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是否有力制止粤省排英？否

则，英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每日对粤军费一百五十万。”这是多么可吓的一个消息呵！香港帝国主义者更大张其辞，仿佛八十年前炮轰广州城的血幕就要开始了。在无世界常识的人们，一听着定要屎滚尿流。在我们呢，X光线的眼睛，乃高声叫道“欢迎”。英帝国主义此种政策的作用，显然是恫吓民众，以便于所谓“稳健华人”于民众惊惧无措之余，好提议解散罢工。不过这个纸老虎被揭穿了，恫吓的作用也就烟消雾散了。

第二个便是勾洁右派之袭击。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前，留省右派与香港帝国主义者还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大会以后，却是“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了。他们经过香港，照例是“酒阑灯炧，情语缠绵”。临别之时，又是“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特别是有名的中国公使伍廷芳先生之公子伍朝枢，最受赏识，推为稳健华人之巨擘。自香港辅政司来省“惊艳”之后，接二连三就是交涉使傅秉常秘密“递筒”。往来奔波，委实难为了他。结果一万万贿赂终于成功了。（蒋介石先生已在致张继函中叙明）伍君在政治委员会席上，这一个月来，别的问题一概不管，每次只从怀里摸出一些高鼻子的函件来，不是说罢工会留难，就是说纠察队索贿。他极乖巧，摸出来给大家传观，却不下断语，让左派去愁眉皱眼，慨叹连声。此时他方嫣然乘机说道：“政府应予以裁判呀。”左派当时堕其术中，有时也发发小雷霆。譬如德国船被扣两只，是伍君告发于政治委员会的，左派果然认为违反政府的外交政策，对罢工委员会深致不满，大加声斥。幸而罢工委员会在港截获的电报，其中有云：“英商因华经理及德国公司的帮助，也做一些贸易，但一切英国商标均须除去，以免

纠察繁重的手续。”这明明是德商瞒运英货,罢工委员会何得不
予扣留。左派见此电后也就释然了。不过东江南路都收复了,广
东统一而稳固了,危险时期已过了,确实不十分需要罢工工人帮
助了,左派意态动摇,亦固其所。况乎忽而浸润之譖,忽而肤受之
炆,纵然心硬也会软化几分呀。显然的,自经右派之袭击后,政府
与罢工工人中间有了一道鸿沟了。此外吴铁城更是点兵派将,向
市民大做其宣传:“你们看,罢工工人简直比刘、杨兵士还凶。”
后来索性仿照上海工部局伊文生的办法,不加警告,向罢工工
人开放排枪,结果死一名,伤者数名。还是罢工委员会以为在
国民政府下而有向民众开放排枪之事发生,太不名誉,与政府
协商阴消,故未见报。

第三个是嗾使海关之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都用英人。其
名虽是中国政府之一机关,其实是英国帝国主义之一府库。中
国海关监督,不过“腊则季氏,祭则寡人”,摆摆样子罢了。粤
海关税务司卑路,原本是一军官,二月十九日从香港回来,二
月二十日(星期六)十一时访交涉使傅秉常陈述:“罢工纠察扣
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如此做法,彼实不能执行职
务。”晚八时又送来一公文,称“因纠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之八艇
货物,妨害其职权之行使,只得于二十二日(星期一)起停止验货
起卸”。星期日政府照例不办公,卑路在这当儿寄此公文,使政府
来一个措手不及,多么巧妙。入口船只不经关验不能卸货,即能
卸货,如未得海关发给凭证,该船到其他口岸时,该地海关以其
无开行地关单必将该船扣留;卑路此种对付广州的手段,多么厉
害。卑路对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对商
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之压迫。”这种离间政府、

商人与罢工工人之感情的言谈,多么动人。二月二十二日终因税务司英人卑路一纸命令而停关了,广州口岸被封锁了,这一个蛋捣得不小,不用说是香港帝国主义之预定阴谋,而同时亦有右派之同谋合作。卑路由港回粤两天,此事便发作,此显而明的事。右派暗与卑路商量好,借此难题给左派做,左派果然狼狈不堪,而大骂罢工工人之不对。(其实从前所定纠察检验货物原则,并未有须经海关检验后方准纠察检查之规定,罢工以来便是如此,左派初无异言。)此却是隐而晦的事了。结果还是罢工会放还八艇货物于海关,又经商会向海关严重抗议,各界一致激昂反对,卑路既已无口可借,又见外间反对太烈,只得开关,此事告一结束。

五

中山舰事件。香港之幻梦又复沉酣。香港宣布对经济问题之态度。英国矿工罢工。全国劳动大会。工农商学联合。拥护省港罢工获得胜利解决。香港勾结吴佩孚侵粤。出师北伐。组织北伐运输队。中英谈判。谈判延期。工会统一运动。教育宣传运动。

第四时期,从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起至七月二十三日中英谈判延期止。

三月二十日,罢工委员会突然被兵包围,当时大家莫名其妙,后方知为中山舰事件。蒋校长事后声明,此系其部下不听命令所致,经将带兵某连长撤差。惟自此事发生后,罢工确受相当之影响,特别在香港帝国主义一方面。

先是香港帝国主义者与右派夜半私语海誓山盟以后,客观上右派势力异常活跃。右派也屡屡切实劝慰香港:“你们莫急急

于解决罢工呀,我们就要登台了。”但是,佳音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香港帝国主义者之幻梦不能不稍醒觉。等到不耐烦,三月十九日派杜应坤医生来省。杜医生本是廖仲恺先生之妹夫,但他是满口“港宪大人”,廖夫人何香凝先生听了作呕,曾当面赐以“走狗”的嘉名的。杜向政府说,“港宪大人”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汪精卫先生以此小节,当书一函付之,书函已在二十日事件发生之后。汪先生从此长期病假。杜医生怀函返港,送给金文泰,金文泰乐不可支,大有谢安闻淝水战胜过门折屐齿之概,出席西商会议,说:“汪先生已来函提议解决罢工,已派定代表三人,我亦照派三名代表就是”。分明是他自己提议,今则反谓汪主席提议,显见帝国主义者要在外交上占上风。金文泰笑嘻嘻又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听众亦报以欢笑,高呼万岁。于是香港将醒之幻梦又复沉酣了,三代表仍不出发,自然是等广州政治入轨之佳音。四月九日不得已方派辅政司来省刺探消息,与伍朝枢作非正式之谈话,返港以后,香港政府正式布告:“本年四月八日、九日,律政司金培源君,在广州与伍朝枢君于解决罢工正式会议之前,先行非正式谈话。彼此尽情披露,接洽甚欢。于是金培源君遂表示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的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所谓尽情披露者,金培源还提出实业借款与广九、粤汉接轨问题,不过此布告未经叙出耳。关于经济问题,在以前香港政府因为面子关系,虽不愿意出钱,然而并未正

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去年年终派八华商代表来省谈经济条件可证。今则露骨的不承认赔偿原则，而且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强硬！香港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突然如此呢？不用说，因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右派未即联翩登台，尚嫌美中不足，然而右派此时确实乘机蜂起，到处分裂民众势力，究竟不无希望。

此时英国矿工大罢工已起。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已经在罢工代表大会断言英国六个月后必有大罢工，果然，幸而言中。矿工罢工，震动了英国社会的基础，这自然给予罢工工人以巨大的兴奋，而最后胜利终属我们之自信心更为坚决。英国十万大兵进攻中国之余惊，自然完全消灭。罢工工人与广东各界举行援助英国罢工种种运动甚力。

五月一日至五月十四日，开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于广州，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亦同时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全省农民教育代表群聚于此，革命空气异常紧张，慰劳罢工工人；罢工工人自然大为兴奋。在四商会欢迎席上，提议改为工农商学联欢大会，并通过七条决议案。第二条即为拥护省港罢工使得胜利解决，主张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及罢工工人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省港罢工原为民族问题，并非罢工工人私人问题，故应由各方面共同解决。再则自香港政府布告不承认赔偿原则以后，旋见广州政局并无纷扰，国共两党仍然合作，乃改变其口吻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用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此五方面共组之委员会，亦含有打破此种阴谋说话的作用。后来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执行此决

议案,曾请四商会派两代表落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亦可见其顽强已极了。此时广州工农商学联合运动特盛,因而“国民的联合战线”日臻巩固。

香港帝国主义者幻梦右派登台,前面已经说过。谁知天不做美,中山舰事件旋即大白,广州政局依然无恙,不久而伍朝枢以出走闻,傅秉常以私逃闻,吴铁城以被囚闻,莺莺、红娘、惠明都没有了,香港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惊梦”了;由是乃转而求之于北。其时英日、张吴联合,已经成功,所谓讨赤军攻入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吴佩孚势力有稳定的趋势,香港帝国主义者以二千万元助吴作军费,信使往还,催其早日攻打“南赤”。此时我国政府基础既固,桂湘先后响风来归,为防御吴贼南下,亦决意出师北伐。本来北伐准备已久,故出师异常迅速,一鼓而下长沙,再进而占岳州,会师武汉,料也非难。罢工工人仍组织北伐运输队,三千余人,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异常险阻,当此溽暑炎蒸,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罢工工人因而致疾者凡四、五百人。

这里要叙到中、英谈判了。我政府因“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故应人民请求,六月五日,毅然致函于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则答以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之排英货运动解决之方法与手段。此外关于技术上有所询问。七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我政府代表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对方

代表为香港律政司凯普,华民政务司哈利法斯,沙面英国总领事白利安。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我政府代表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待,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与外国办交涉,这算第一次,也算是外交史的新纪元。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复书,谓五卅屠杀系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我政府代表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按即国际仲裁)。惟此事须延宕时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抛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赔偿沙基惨案死伤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明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债,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债,由国民政府偿还。此种让步,可说

让到极点了,英国代表仍表示反对。英国代表提议,欲以实业的借款,贷与中国,以为开辟黄埔港口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我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结果是英国代表对于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表示请示本国政府,我方代表对于实业借款案,亦表示请示本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虽非破裂,实已延期。延期要延到何时,这当然要看将来全国政局如何方能决定。英国帝国主义真聪明,他的实业借款提议,不仅不肯丝毫失本,而且还要从中得利,既想黄埔新埠造成英国管理的租界,又想两路接轨造成香港商埠的需要,世界上打铁算盘的,怕只有英帝国主义第一个会打罢。

此期尚有二事应该叙及:

一,工会统一运动。香港未罢工以前职工运动的弱点,即在工会未曾统一。可说分为三派:一为工团总会派,有七十余工会,概系手工业,只海员工会算是大产业组织。二为华工总会派,约有三十工会,亦系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为无所属派,约二十余工会,多系大工会,为机器工人,起落货、煤炭、洋务等。故发起罢工时,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指挥全港工会,不能不召集联席会议,另组临时指挥总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及返省以后,大家都知此种状况不好,而工会统一运动之宣传,甚为普遍。究竟因历史与习惯关系,终归不易统一。后来日子长久了,工会统一的意义与利益彻底了解了,而且有许多实例证明了,方努力进行此种统一工作,首先联合的是机器工人,

叫做机工联合会,后改名为金属业总工会。其次是运输工人,叫做运输工会联合会。这是以产业联合的。四月十五日,香港总工会成立,从此工团总会、华工总会无形消灭,而所有香港工会统一于香港总工会之下了。此后联合成功的,尚有洋务工人,定名为西业工人联合会。而建筑联合、街市联合,现在进行中。

二,教育宣传运动,原来教育宣传是很重要的,罢工开始便办了一个宣传学校。但仍不过以养成一般宣传人材,为罢工时期对内对外之用,故不久停办。此后因环境紧张,我们工作更为忙碌,遂不暇注意于此了。本年四月中旬成立一教育宣传委员会,乃决定一大规模之教育宣传计划。设劳动学院一所,以各工会领袖为学生。分区设补习学校八所,以成年工人为学生。附设子弟学校八所,以工人童年子女为学生。另设妇女劳动学校一所,以女工为学生。各补习学校并附设俱乐部,日间上课,晚上娱乐。

六

罢工能够持久的原因。客观条件有三。主观条件有四。罢工之将来如何?三条出路。请海内外同胞有个回答来!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结束了。此次省港罢工得到一些什么胜利,和这些所得胜利的意义,我另有一文叫做《省港罢工的胜利》,说得非常明白,此地不再赘及。

如有人问省港罢工支持一年零两个月的长久,其原因安在?我们的回答:在客观方面有三:

第一,英帝国主义之衰弱。欧战以后的英国不像欧战以前的英国了;战前是壮年时期,战后是暮年时期;以风前残烛行将就

木之年,那有精强力壮好勇斗狠之能。经济之衰落,无产阶级之左倾,各殖民地之觉悟,都是使得英国诚惶诚恐寝馈不安的。假使在欧战以前,两次武力干涉之请求,十万大兵进攻之恐吓,决不会仅是造造空气,必定会如鸦片战争之役,英法联军之役,炮轰广州城,或者国民政府诸公有人做了叶名琛第二亦未可知。

第二,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帝国主义之冲突,是它的本性使然。广东诚然是一块肥美之肉,那一个帝国主义不想争尝一啜哩。近年来英、日、美在广东的市场上竞争得很厉害,可是英货则逐年递减,日美却逐年递加。广东排英,在日美便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果然香港电请伦敦用武力干涉广东时,美国提出异议了,大意是说因广州一隅局部之事而引起战争,似乎不是良好办法。又说恐怕因此局部战争,会引起日本之参战,引起俄国之参战,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说此不幸事情最好不要发生,美国应调集兵舰在南洋及中国沿海一带巡弋,如果此不幸事情发出,应作武装调停。所以罢工委员会特许证条例宣布以后,日、美两国公司首先要请复业,并愿将香港、沙面商店迁移广州贸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们在报上泪流满面的说:“为什么我们帝国主义者不联合起来呵!”

第三,国民政府之坚固。国民政府是打倒刘、杨以后才成立的,这个小娃娃虽然经过许多灾难,究竟“吉人天相”,日见壮健。它有身经百战的国民革命军以作巩固,它有生死与共的民众组织以作基础,它有每月七、八百万之正当税收以作营养。它不仅可以自立,而且有力量攻打军阀,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的。省港罢工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像张作霖一样对爱国运动加以摧残,而

应该是加以爱护的。

在主观方面有四：

第一，罢工工人之觉悟。为民族利益而不搀杂自己利益，这是世界之上少见罕闻的事。我们举一件很小的事，便可见罢工工人觉悟之普遍与深入了。有一次在某罢工宿舍门前，两个工人的儿子，约莫八、九岁，不知何事起了争端，先则口争，继以扭打。问何以打架？一个说，他骂我的爷娘，骂我的妹妹，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一个说，他骂我是地痞，骂我是兔子，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

第二，罢工组织之完善。罢工组织，已在第二节约略说过，假使组织不好，阵脚既不稳固，何能杀敌致果？就中尤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得力，因以人数为比例，五十人举一代表，共约八百代表。这样组织，一方面可将罢工消息与政策普遍传达于所有工友得知；一方面对于各种问题以大多数公意取决，不致为少数腐败领袖垄断；一方面对于职员加以严重监督，不使其违法舞弊，变节捣乱，以破坏罢工。一年以来，内部发生一、二次小小风波，都是靠代表大会镇压下去。

第三，罢工政策之适当。罢工政策已在上面各节中错综说到，读者可以自去领会。就中尤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一原则，为稳住此次罢工之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其妙用不可胜言，一方面可以打击香港；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州经济之困难；一方面可以拆散各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一方面可以使广东商人对外贸易不致停顿。此政策之精义，先是采入特许证条例内，特许证取消后，被采入于工商善后条例中。

第四，罢工援助之广大。罢工维持，自然要靠海内外爱国同

胞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不断的援助,然后罢工工人觉得后援不孤,更能安心作战。此次罢工费用,计开:国内捐二十五万元,华侨捐一百一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仇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余万元。至于精神援助,随时俱有,那是不可论件的叙述了。

如有人问省港罢工之将来如何,我们说,罢工之客观主观两方面的条件依然存在(只维持罢工经费存款不多),至于决定罢工将来之命运如何?要你自己回答。罢工委员会在中英谈判延期之后,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同胞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与致各社团领袖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

(一) 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

(二) 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实业借款条件乎?

(三) 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

三条出路,罢工委员会“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主于决定者也。”但罢工委员会同时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匪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等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

省港罢工之将来如何乎?请爱国同胞有个回答来!

原载《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

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

新 努 力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现在我们革命的历史又翻过一页了。

这一新页将要描写些什么？我们敢预先肯定的说，是我们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牺牲，和更大的成功。

我们在过去十五月中，用我们纠察队封锁的方法，已经给了港英帝国主义一个很痛的打击。现在的新策略，由我们孤军的奋斗，进到全国联合的奋斗。在这北伐着着胜利，革命地域开展使全国有可能联合奋斗的今日，而有此新策略之实现，自然此消息一经传出，要使帝国主义发狂发抖了。

港英帝国主义正在两个疑虑之中，一个是纠察封锁真能取消吗？一个是扩大经济绝交会不发生吗？是的，港英帝国主义此种疑虑是很有理由的，因为事实表现广东有一奇异的现象，一面罢工纠察自动之撤回，一面扩大经济绝交之潜伏猛进，是使得港英帝国主义所诚惶诚恐，寝馈不安的。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绝不隐蔽我们革命的主张，我们坦直的说，我们是由部份封锁的旧形式，改变到全国抵制的新形式，以达到我们最后的解放。我们绝不因帝国主义之炮舰所威吓，或假善所诱惑，改更或取消反帝国主义的志愿与主张。在过去十五个月中，港英帝国主义采用的铁血镇压政策，分离工商联合政策，扶助陈、邓扰乱广东政策，培

植右派从中破坏政策,十万大兵恐吓政策,封锁海关政策,炮舰政策,我们都领教过了!然而我很抱歉的说一句:这些恶毒的政策,无损于我们之毫末,可见我们的新策略乃是更有力量给与帝国主义更大打击的武器,并不是因什么炮舰所威吓,或假善所诱惑,而是我们的策略有所变更,是任何人所公认的。

我们坚决的说:“五卅”“六二三”惨案一日不伸雪,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中国一日不得自由独立,我们的责任未尽,就是说我们的奋斗不停止。

罢工工友们!纠察工友们!我们虽然辛苦了年余,牺牲了一切,然而我们所得的胜利已觉不少了,现在将反帝国主义之重担,分给各界同胞共同负担,然而,我们并不减少原来的锐气,我们现在正预备着将来新的总斗争,我们努力联合各界同胞造成伟大的“国民联合战线”,巩固革命基础,把危害革命的贪官污吏一概肃清;我们努力促进黄埔开埠与粤汉铁路延长,使广东经济脱离香港的压迫而获得自由发展;我们努力拥护北伐军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军阀,谋得人民的利益与幸福。只有这样,十五年来所受的屈辱得以伸雪,不平等条约得以取消,中华民族才能在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得到解放!

工友们 新的革命时期开展了,要我们斑斑的鲜血染成灿烂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我们努力呵!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 460 期

署名:中夏

工人与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工人阶级应该要拥护国民党及其党治政府,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事实上此数年来工人阶级对于党及政府之贡献与援助:收复东江,歼灭杨刘,肃清反革命,抵御香港帝国主义,赞助北伐,我们敢说他们比任何阶级要忠实,要努力。因为工人阶级大家都知道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当中,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确是一条生路。

不过,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党治下的地域,似乎亦应有要求“生命安全”“职业保障”“生活改善”的权利。我们试看:梧州的军队帮助店东枪毙凌二妹等,潮安的军队帮助工贼枪毙李子标等,工人生命安全之谓何?兵工厂借故停止,开除全数工人,另招工人改行兵工制,工人职业保障之谓何?广州工人要求加薪不得已而罢工,农工厅与警备司令部煌煌文告,以扰乱北伐后方为罪名,以武力为恫吓,工人生活改善之谓何?此类事实,难以枚举。所不幸者是此类事实出在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而且已经预定要做国民党党治下的模范省的广东。

假使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党治下地域连“生命安全”“职业保障”“生活改善”的权利都没有,是不是会使人疑心国民党党治下的地域与军阀治下的地域没有分别。

我们可重复声言的,工人阶级很知道现在是为国民革命时期,所以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目前要求,决不是最终目的。质言之,即是“生命安全”“职业保障”“生活改善”几种权利,试问此数种是不是工人阶级应分要求的权利?如有人抹杀这些权利,而乃闪烁其词说工人要求“劳工专政”的最终目的,不是故意造谣,便是神经错乱。所以国民党不能借口“在朝党”,借口与在野党不同,而便将这些最低限度的工人权利吝不给予。党纲之所载,政策之所定,“在朝”矣,而反可以不兑现乎?

我们敢担保工人阶级始终是拥护国民党的,不会脱离国民党的,他们所抗议的只不过是国民党的行政人员关于违反总理政策以及大会议决之设施与举措。不错,“国民党不曾施诡谲手段加诸工农”,但是国民党行政人员屡屡施诡谲手段甚至摧残手段加诸工农,确为不可隐蔽的事实。我们也要说说,这是要忠实的国民党员认识,尤其是要自命为左派的领袖认识。

原载《人民周刊》第31期

署名:中夏

“二七”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一九二三年发生的“二七”运动,虽然当时的国民党还没有改组(国民党改组时一九二四年一月),然而他的性质与意义,确实确实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革命初无二致,同归一辙。何以呢?因为“二七”所反抗的对象就是军阀与帝国主义。他直接反抗的是“三次战功,八省地盘”大哉巍巍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而他间接反抗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铁路完全属于帝国主义的五条,名义上归中国政府交通部管理而实际上归外国债权人管理的六条,而且中国现在所有铁路已经是条条有债,无一条不抵押于外人了;这就是说,无一条不受英日法比等帝国主义的宰制。所以中国铁路工人不仅与军阀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与帝国主义也有不可解的仇恨。在“二七”未发生以前,陇海路有驱逐比国总管若里运动,正太路有驱逐法国管理阿露白冷运动,是其例证。“二七”之役,执行屠杀者是军阀吴佩孚,策划屠杀者是帝国主义,北京公使团之叠次会议,汉口英领事之教唆指使,尤为明显。

京汉铁路工人此次大罢工,虽然争成立总工会而起,而其实际意义是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自由,是为民权而战,所以他们说:

“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运动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

——该路总工会代表李震瀛在群众大会说的话——

总而言之，“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实行（不止参加）国民革命之具体表现。

并且，“二七”虽然失败了，然而他影响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至为巨大，比方说，国民党的农工政策，何尝不是受“二七”影响而来。这不是说国民党以前没有想到农工政策的重要；即其他党员虽没有想到，以中山先生超越古今的智慧聪明，那有想不到的事。这只是说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表现他们的力量与革命性，不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印象与剧烈的刺激，不能引起我们有决心采用农工政策。

很显然的，“二七”之前有香港海员罢工，有开滦煤矿罢工，及至又有伟大的“二七”，于是乎国民党改组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这样说了：

“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

甚至说：

“国民党现正从事为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有了“二七”，后来又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又有五卅罢工，又有广东三路打倒杨刘罢工，又有省港罢工，又是很显然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更进一步这样说：

“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

“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其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展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也。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之作用与地位，被我们大家认识与确定，“二七”实为一大关键。真的，有了工农阶级加入国民革命这一战线后，亦即是国民党有了工农政策之后，国民革命势力更见膨胀而发展了：肃清了东江，收复了南路，统一了广东，促进了北伐，囊括了粤桂湘鄂川黔闽赣诸省，前锋快要到杭沪宁了，有大半个中国了。虽然这些胜利还有其他重要原因，然而工农加入革命战线究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这个国民革命势力发展的程途中，似乎有人发生对于工农阶级的信任问题，甚而竟有人怀疑到工农运动的本身，好说产业不发展的原因是工潮的关系，说政府税收减少是因为

农民反抗地主土豪劣绅的运动。国民革命势力发展以后，确是使民众运动扩大了，因之工潮增多了，乡村农民革命势力与反动的地主民团土豪劣绅的争斗愈加激烈了。同时，在另一方面，而军事势力亦发展了，并且这种发展正远超过民众势力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去年出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只不过八军，现在呢，发展到三十余军了，军阀军队尚余五十万，我们革命军队现在亦有五十万了。仅仅半年之间，而军事如此之迅速发展。固然在革命的斗争中我们军事必须有这样数量上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不但不应忽略并且应该注意的有一个事实。这事实是什么呢？就是革命势力发展了，原本是割据称雄的小军阀，不免有看风使舵相将投降加入国民革命。在国民政府策略上自然有容纳此等降将军之必要，然而谁都不能担保他们个个都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昨天加入国民党，今天便能够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这可以辛亥革命为例，当时革命党的势力是发展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亦复杂了，革命的力量就减削了。原有国民革命军的基本队伍，是如何在广东经过长期间国民党主义和政策的训练，如何经过两次东征，肃清杨刘，扫平南路，而至北伐与民众合作种种革命斗争中造成的。这些新加入的军事势力，固然增加了不少的革命军人，然而我们就不相信个个都是清一色掷地作金石声的革命军人能彻底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更何况国民政府势力发展以后，政客官僚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又纷纷地改头换面大家喧嚷着要投入国民党旗帜下来做升官发财的勾当。有这些复杂成分在一个革命集团中，即使本来是最革命的领袖，亦难免不多少受此辈投机分子之挑拨与中伤，“曾参杀人，告者三至，其母投机，”自古已然，何敢担保今日没有。

我们此段说话，并不含丝毫的恶意；我们对于革命应该要忠实，所以赤胆忠心地指出这一个危险来。我们很诚恳希望革命领袖充分注意此一危险，因为此一危险，不仅不利于工农阶级，而且大有害于全部革命利益，此理甚明，无须赘述。我们敢担保工人阶级依然是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依然是希望国民革命之成功，即使他们在有些地方受了委曲或甚至被压迫摧残，但是，他们知道大敌在前，军阀并未完全肃清，帝国主义尚未打倒，布满全国农村的封建势力并未铲除，他们依然在为了革命利益的条件之下而不改其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常态。工人阶级所希望于革命领袖的，只是比从前还要更坚决的信任他们是“国民革命有力的成分”，“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民族革命运动之领导者”。同时希望革命领袖对于不懂或违反党的政策之军人官吏，加以适当的教导与制裁。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民众们！工友农友们！大家团结起来！继续“二七”精神前进！拥护国民党的农工政策到底！达到国民革命之迅速成功！

原载《人民周刊》第 41 期

署名：中夏

“年初二”问题解决的途径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

近来广州工商间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所谓“年初二”问题。据商人说这是广东商场“数百年相沿习惯”。现在先把他略述一番。

据说，每年阴历新正初二这一天，雇主请店员吃鸡。当吃鸡的时候，如雇主向某店员笑逐颜开道：“某大哥，辛苦你一年了，多吃点，莫客气。”这就是辞退这个店员的表示；席终这个店员就如“丧家之狗”，含泪吞声卷起铺盖出门。如雇主不向其说话的则不辞退。故每当吃鸡的时候，店员大家忐忑不安，一双眼都钉住雇主的颜面。这是有名色的，叫做吃“无情鸡”。

凡吃无情鸡而被撵的店员，新正初几都排列在四牌楼街中，等待雇主来雇他。雇主如要雇用店员，可到四牌楼挑选；有合意的，即言明工钱雇用几个回去；大概每年工钱六元八元不等，伙食由东家供给。这也是有名色的，叫做“卖工。”

现在这个“数百年相沿习惯”引起工商双方之剧烈争议了。工人方面说：“此本旧有习惯，惟方今国民政府之下，百度维新，在新时代中，此种习惯，似无再行维持之必要；且此所谓无情鸡惨剧，不特太欠公允，抑且太不人道。度商界明达，当不忍再主维持。”（见工代会敬告商界同胞书）商人方面说：“方幸年来商人权

利已被剥削殆尽,犹赖有此万绿一红之旧习惯,足以维持商场秩序于万一。”(见商人向省政府请愿书)

工商双方都为此问题先后请愿于政府,彼此间似乎深深刻了一道鸿沟,而形成一种异常严重的斗争形式。真的,在事实上工人确因此问题而被开除失业者已达五千余人了。

平情而论,此一问题的骨子里原是一个任免职工权限问题。若仅当他做一个任免职工权限问题,自有磋商讨论的余地。不过商人方面则引“数百年相沿习惯”为不能“将其推翻”的理由,怕不有理!为什么?帝王制度简直数千年相沿了,何以辛亥革命将其根本打倒?土地关系简直也是数千年相沿了,何以孙总理主张平均地权?数千年相沿尚且如此,何况数百年!老实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古时代所有一切之社会关系。商界同胞新组织的商人代表会,不是冠以“革命”二字,定名“广东革命商人代表会”,说是“借以表示商人参加革命之意”吗?那末,我们就要说,若据革命的观点看来,“年初二”这种中古时代残留的旧习惯,我们就不应该还认为“万绿一红”去拥护他。

我想,商人方面与其提出拥护旧习惯问题,倒不如爽爽快快地提出单纯的任免职工权限问题,何以呢?因为拥护旧习惯在革命的新时代,根本就不能成立;如说是任免职工权限,自然有其特别情形,可有相当理由付之讨论。其实在商人方面,为的恐亦系一任免职工权限问题,不过刚刚有“年初二”这旧习惯到来,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借题而发挥,亦未可知。

广东商店诚然不能与什么大工厂大公司同日而语,而且现在发生争执的还是中小商家居多。中小商家可说与工人同是一对可怜虫,他们的本钱少,铺面窄,关于经营贸易委实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据经济原理,小资本与大资本竞争,则小资本必归于失败或破产。因此中小商家常常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操纵与压榨之下过生活,赚钱失本,今日不知明日事。所以他们好象一支小艇浮游于茫茫大海狂风巨浪中,时而高,时而低。他们有时生意兴旺,宜多用几个店员,有时生意冷淡,宜减少几个店员,这本是人情之常。故中小商店任免职工权限问题,在商人方面固不能要绝对自由,在店员方面亦不能有绝对限制。所以我们就有磋商讨论的余地。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以为商人方面应有几个不可缺少的认识。

第一,不要空想单方面的完全胜利——初九商人方面向政府请愿,得到四个条件,似乎兴高采烈,甚至还有燃放爆竹以庆祝胜利的。不过商人得的条件是“雇主有自由任免店员工作之权,但以前与工会或工人有特别条件订定雇主无权开除者,暂不在此限”。试问与二十八日工人方面向政府请愿得到条件“关于雇主更换工人一节,除工会与雇主已订有条件者照条件办理外,其余悉照旧习惯办理”有什么分别?不过意思颠倒一下罢了。好象一杯水,倒在另一杯里,倒过去,倒过来,始终是这一杯水,如果说初九商人得到胜利,那末也可说这就是工人已得的胜利;反之,如果说二十八日工人得到胜利,那末也可说这就是商人亦得的胜利。所以,工人固然不要空想单方面得到完全胜利,同时商人亦不要空想单方面得到完全胜利。要知道政府为国民的政府,固然不得“袒工抑商”,又何可“袒商抑工”以失其平?

第二,不要空想单方面的什么绝对权——本来任免职工权限问题是工商纠纷中一个重要问题。在商人方面说:“任免职工

非绝对自由不可,因为这于营业有绝大关系,政府如无绝对用人权,尚何成为政府?商家亦然”。不过工人方面说:“将商家与政府相比,可说比拟不伦。何况工人与商店已经订有条件,如果雇主有任免职工自由权,则是以前订立条件根本推翻,则是雇主可以随意开除工人;这样,工人加入工会不特不得到职业之保障,反而因加入工会有失业之危险。工会要来何用?岂不是根本使工会失其作用而归于瓦解!”其实一方面要任免职工的绝对自由权,一方面则坚持条件绝对不许通融,终归不能调协;亦即终归不能解决。工人方面见到此点了,所以他们不象商人那样空想,他们在二十八日向政府请愿得到三条条件之后,知道不大行得通,所以工代会另行决议三条,已用通告及敬告商界同胞书公布。那三条的意思,显然是一个通融的办法,不知道商人方面留心研究没有?总之,不论何方面如想要“绝对什么”,都是不可能。

第三,先行工商协商然后政府仲裁——很显明的,将来政府委员会仲裁,商人不同意,工人无可如何;工人不同意,商人亦无可如何。因为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所公布之工会条例已明定行政官厅对于工会与雇主间发生争执,“执行仲裁,但不能为强制执行”。所以必得工商双方互相谅解与让步,然后政府仲裁得以顺利解决。否则,将来的结果怎么样?不错,双方都有武器,一边是大罢市,一边是大罢工,究竟大罢市大罢工是于何人不利,落叶归根还不是工商两界?所以此种大罢市大罢工之说,感情冲动时说说以恫吓对方是可以的,然而何补于事。譬如两夫妻斗口,其妻觅死寻活,要悬梁,要投河,其初不过吓吓丈夫;但这是一个不小心,弄假成真,亦未可知。所以现在工商双方都要

及早觉悟，用敏捷的手段，本互让的精神，先行磋商，然后听候政府仲裁，故工代会提出工商联席会议是对的。

未了，我们还要说的，就是前几天，双方都不免为感情所蔽，在工人方面，前几天的通告中有“恶东奸商此种故意弁髦法令违背条件之行动，诚为蓄谋摧残工人运动破坏工会组织之表现”等语，固属激怒商人；而在商人方面，请愿的宣言中有“或自立规例，强迫商人服从；或动提条件，勒令商人承认。自由之身体，可以私擅逮捕；宝贵之生命，可以随意杀伤”等语，又何尝不厚诬工人（无怪乎工代会有驳正之宣言也！）。这种双方各使意气的说话，徒令解决的途径愈趋愈远，结果是两败俱伤，而为帝国主义所快，反革命派所喜。在我们看，工人早已觉悟此层了，所以他们在向政府请愿之后，商人尚未请愿之前，工代会发表一篇敬告商界同胞书，其中有云“我工商两界，关系至为密切，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商务不安定；工人固无所觅得生活；工人不做工，商务亦无从经营。深愿彼此互相谅解让步，造成繁盛之广州商务”。简约一句话，就是“工商合作”。这是何等剜切！何等诚挚！商人请愿书中有两句云“假帝国主义以可乘之隙，贻国家社会以无穷之忧”，诚哉斯言！当此之时，除工商合作外，安有其他途径乎！

原载《人民周刊》第42期

署名：中夏

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我们真苦闷极了！我们八十年来受尽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榨取，压迫，摧残，然而世界都不大明了其真相；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的父兄虽然表示反抗，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庚子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然而世界亦不大明了其真相。特别在最近两年来，帝国主义者更出其生番不如之屠杀暴行：如五州之屠杀，沙基之屠杀，万县之屠杀，以及最近汉口九江之屠杀，血肉横飞，尸骸山积，极人世间未有之惨痛，然而世界仍然不大明了其真相；我们身当其冲，我们持民族主义而继承我们祖先父兄未竟之志更加剧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如五卅运动，省港罢工，扩大对英经济绝交，以及最近收回汉口英租界运动，然而世界亦仍然不大明了其真相。为什么呢？就因为现在世界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统治着，除开苏联这一片干净土，所有电报通讯社及一切交通机关，都掌握在那班强盗的手里，所有我们的冤苦与我们的反抗之各种真相都被他们封锁了。虽然远景有崔巍的山，汪洋的海，然而以一指障其目，则这些崔巍的山汪洋的海的远景都被掩盖殆尽了。我们真苦闷极了。

好了！碧空云净，忽然霹雳一声，而国际工人代表团来华了！我们的冤苦和我们的反抗之真相可再不受国际资本帝国主

义者的封锁了。中谚有云：“耳闻不如目见”，今国际工人代表来华，不仅能耳闻我们哀号角壮烈之声，而且能目见我们悲惨与奋斗之形，以这些深刻的印象与真实的调查，报告西方无产阶级的劳苦兄弟，我们料定必更能引起西方劳苦兄弟之共鸣，必更增其对资本帝国主义之忿恨与对被压迫民族之同情。

工人代表团来华了！我们简直找不到适当的字句来表示我们欢迎之忱！仿佛长夜漫漫的黑暗苦闷中，忽睹朝阳之东升，我们只有快乐的份儿；但是这种快乐我们说不出。仿佛在久旱炎蒸的酷热苦闷中，忽得甘霖之骤至，我们只有快乐的份儿；但是这种快乐我们说不出。

国际工人代表同志们！我们已经知道产业先进国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联合的意义了。我们知道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重要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固有助于民族革命，民族革命亦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其最终目的都是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而使被压迫之阶级与民族得到完全解放。所以我们大家都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们早就知道只有西方无产阶级是我们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天然同盟者了，列宁同志说过：“中国……等许多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之唯一希望，乃世界革命之胜利。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东方几万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之唯一的同盟军”。我们确信这是真理。我们早就盼望你们来了。今天我们敢说你们与我们初次见面携手，不仅是个人与个人的携手，而是代表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民族携手了，我们何等欢欣！何等奋发！

国际工人代表同志们 你们今日来华的时候 ,恰逢在五卅屠杀沙基屠杀万县屠杀悬案未结而汉口九江屠杀接踵而起的时候 ,恰逢英帝国主义纷纷派舰调兵集中上海 ,并正联合各帝国主义协以谋我 ,准备再实行比前尤为凶残尤为惨酷的屠杀的时候 ,恰逢帝国主义正图以武力推翻我们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时候 ,你们目睹此种景象 ,你们将其真相露布于世界 ,我们以前已经得到西方劳苦兄弟不少的援助了 ,我们相信此后当必得到更伟大的援助。但是 ,希望你们告诉西方劳苦兄弟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有各种形式 ,现在英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派遣炮舰军队。入境是干涉 ,然而那些或明或暗的援助封建势力造成中国内战也是另一形式的干涉。帝国主义在华对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军事上财政上的援助 ,犹如当年在俄援助邓尼金 ,高尔察克 ,尤登尼奇 ,伍郎格尔反对革命的战争是一样的。借封建势力的手 ,摧残革命之花。帝国主义这些更柔软的更掩饰的干涉 ,其阴险狠毒不在有利的强硬的武力干涉之下。目前固然希望我们西方劳苦兄弟急切援助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进兵上海的武力干涉政策 ,自后亦希望我们西方劳苦兄弟持续援助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在华所施一切形式的干涉政策。

国际工人代表同志们 我们的革命运动 ,最初步是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一切压迫及其工具 ,求得民族的自由独立。我们誓为此目的而奋斗 !你们是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 ,你们是富有革命历史与经验的先进 ,我们伸出手来与你们伸出的手紧紧握住了 ,我们共同高呼 :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更加团结起来 !

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

中国人民自由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人民周刊》第 43 期
署名：中夏

上海总罢工的意义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海总罢工起来了。据电讯所传此次总罢工目标有一十七项，其详细虽不得知，总括起来说，上海总罢工一方面是驱逐孙传芳军队离境；一方面是驱逐英帝国主义军舰离境；欢迎革命军到沪；并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这种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及企图民主政治之英勇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应该又是大书一笔的。

我们由此次上海总罢工又使我们深深地认识了：

第一，大家都知道的在国民革命军尚未陷落九江以前，上海有所谓“自治运动”，其意义即是驱逐孙传芳，援应革命军。那个“自治运动”本是各阶级之政治联盟，以暴动形式取得上海政权。谁知一经孙传芳武力压迫，而资产阶级就临阵逃脱，大登其报，声明“在商言商”以图狡卸责任了。随后有第二次自治运动，亦蹈同样的覆辙。此次英帝国主义纷纷调兵派舰集中上海，准备给国民革命军以巨大的打击，革命军进陷杭州，孙传芳准备另隅淞沪与国民革命军作最后之抗争，形势何等危急，然而工人阶级再不能等待其他阶级起来不起来了，只得孤军奋起，振臂直呼，不顾成败利钝而举行全市总罢工。这证明什么？证明在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最可靠的，尤其在革命运动最紧急最危

险的时候,站在最前线奋斗的只有工人阶级。

复次,大家亦是知道的,现当英帝国主义大兵集中上海进行武装干涉中国的时候,亦是孙传芳既败于赣,又败于浙,势必固守淞沪,以与革命军争最后之胜负的时候,如有动摇他们的最后根据地,他们必施行更凶残更惨酷的“格杀勿论”,早在人们预计之中。工人阶级岂有不知之理。第一次第二次“自治运动”时,工人被孙传芳斩杀已无算了,何况现在。然而工人阶级却毫无畏缩的起来举行总罢工反抗。据报载此次工人学生被枪毙及枭首示众者,数已逾百。这又证明什么?证明在革命运动中亦只有工人阶级是最能牺牲的,从前的五卅罢工省港罢工,以及刘杨战争反奉战争罢工,工人阶级不惜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今上海犹仍再激再厉为革命利益而牺牲。

再其次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则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们曾听着“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工人不应只顾经济利益而忘政治斗争”的种种呼声,所以很抱歉的如此说。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上海在去年半年之间举行经济罢工至七百余次,这算是“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了,可是此次上海总罢工固然是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然而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磨炼工人阶级的战术,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与革命要求,却纯在去年这七百余次之经济罢工。这又证明什么?证明在革命运动中改善工人经济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尤其可证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害而且有利于国民革命,工人阶级并未只顾经济利益而忘记政治斗争。

上海总罢工起来了。上海总罢工关系于国民革命前途是如何重大,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言之。总结一句话:上海总罢工之胜利,便是国民革命之胜利;上海总罢工之失败,便是国民革

命之失败。革命的民众们 大家起来 积极的予上海工友以支援。

革命的民众们！大家起来，一致高呼：

反对英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

反对孙传芳屠杀工人学生！

援助上海总罢工！

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原载《人民周刊》第 44 期

署名：中夏

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

(一九二七年)

一、为什么发生工潮？

第二次潮流

大家都知道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由地上生出来的,就是说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有他发生的历史与背景。

现在我们就问:广州为什么发生工潮呢?

首先从历史上说起。广州发生工潮现在并非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在民九民十年间孙先生做非常总统的时候,曾发生一次很汹涌的工潮,差不多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都做过一次改良生活运动,那算是第一次。到现在已有五年之久了,发生第二次工潮,并不算奇怪。不过前次工潮与这次工潮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那时有组织的工人还少,因之,要求加薪的究竟未曾十分普遍;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多了,要求加薪的自然也比较普遍了。第二、那时雇主应付工潮力量很薄弱,手段也很幼稚,不象现在雇主应付这样高明,手段这样老辣。所以这次工潮比较前次工潮更为剧烈。总之,现在广州工潮并不是破天荒第一次,乃是第二次潮流。

既然明白了这点 ,我们再说广州工潮的背景。

改良生活运动

广州工潮性质是什么 ?一句话说完 ,广州工潮只是改良生活运动 ;用术语说 ,只是经济斗争。

广州历年的物价继续增涨不已 ,我们把农工厅的物价指数表写在下面 :

年 份	物 价 指 数	年 份	物 价 指 数
元 年	九九·四	九 年	一三五·四
二 年	— .	十 年	一四四·八
三 年	— 三·六	十 一 年	一五三·四
四 年	— 二·一	十 二 年	一六一·
五 年	— 一九·四	十 三 年	一七五·六
六 年	— 二四·七	十 四 年	一九 .八
七 年	— 三三·四	十 五 年	一九 .一
八 年	— 三六·四		

上表的计算 ,以民国二年为标准 ,等于一 ,十五年的指数乃九个月的平均数。从上表看来 ,十五年物价 ,高过民国二年百分之九十。十元的物价 ,现需十九元了。民国二年维持家庭的消费 ,用一百元 ,现需一百九十元了。物价几乎增高一倍。

关于工资 ,农工厅尚无公布。我把一个经济学家制定的统计表写在下面 :

下表以三十八个工会的工值为标准 ,虽然不能概括全体 ,至少可以表示一部分。从下表看起来 ,工资增加的仅只九、十两年 ,其余各年都是降落。虽然十二年至十五年期间 ,减低工资的

年 度	真工值变迁发生次数			真工值变迁的分量			每 年 真 工 值 降 低 分 量 (以百分 法计算)
	减低者	增加者	无变动者	在百分 一至百 分之五 之间者	在百分 六至百 分之十 之间者	在百分 十一至 百分之 二十以 上者	
元 年 至 二 年	三六	二		三四	—	—	二·二
二 年 至 三 年	二七	一一		二四	二	—	·八
三 年 至 四 年	三	八		—	二七	三	二·五
四 年 至 五 年	三	八		二	八	二	二·八
五 年 至 六 年	三二	六		二	二		—·
六 年 至 七 年	三三	五		九	二三	—	二·
七 年 至 八 年	二四	一四		二八	—		四·三
八 年 至 九 年	三	八	二七	三			增加的四·八
九 年 至 十 年	二七	—	—	五	一九	三	五·五
十 年 至 十 一 年	二九	八	—	一三	一五	—	—·八
十 一 年 至 十 二 年	二五	—	三	二	五		·七
十 二 年 至 十 三 年	三二	四	二	一三	一四	五	·八
十 三 年 至 十 四 年	二七	九	二	一九	六	二	·六
十 四 年 至 十 五 年	二二	一四	二	二三			·六

事情,发生的次数,每年递减;然而在总平均数计算起来,事实上工资确未增加。

大家想想,物价几乎增高一倍,而工资并未增加,在这种状况之下,广州工人怎样能够维持生活呢?卖儿卖女吗?至多一次。借贷吗?乞求无门。试问工人在此时除掉向雇主要求加薪之外,还有何路可走?在从前刘杨政府之下,工人无政治自由,虽想要求加薪,无法可做。去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以及罢工之自由,自然起来了。从前的工人好象笼里的鸟,不得自由,一旦将樊笼打破,得到自由,自然向空飞了。不过工人虽然得自由,而生活并未

改善。“自由”两个字，饥不能食，寒不能穿，工人不是把自由两个字好好地写在纸上，装在镜框里，挂在壁上，对着它说：“自由呀！你真好！”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一想到他们的困苦生活，一定会用这个自由，去做改良自己生活的运动，这是一定的道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一年来工潮特别兴盛的原因。

并无政治意味

广州工潮只不过是改良生活运动，在香港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的报纸天天造谣，说工人阶级离开国民党呀！说工人阶级反对国民政府呀！这本是我们敌人分裂革命势力的惯技，不足为怪。不过，可惜的，竟有人受了这个宣传的影响，以为工潮真有政治意味。他们把一些个别的事件，本来绝不相关的事件，如邮差罢工，广九路罢工，兵工厂复工，汽车停工，银行店员罢工，都牵连在一起，指为工潮有政治意味的证据。其实呵，事实并不如此。现在我们把这几桩事件的始末简单说一说，让大家去明白。

邮差罢工——邮差工人在省港罢工初起的时候，便向邮务管理局提出加薪条件，准备罢工。那时沙基惨案刚发生，国民政府刚成立，内外交通断绝，省港罢工委员会劝他们稍迟一点，工人很听劝告，停止罢工。这一退让，差不多一年之久。至去年邮差全省代表大会，忍无可忍，于是重提条件，冀邮局接受，而邮局在帝国主义掌握之中，故意不予接受，并且不愿磋商，并且大贴其布告以开除工人领袖为恫吓。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罢工还有什么方法呢？不过那时刚在出师北伐之后，于是有人说：“大军

北伐,宣传重要,你们为什么罢工,真是不明大义”!这实在是误会了。如果邮差工人在前没有提出罢工之议,到北伐之后才提出,我们可以骂他们不明大义。但是他们一年前已提出,一年后才罢工,这有什么可疑,所以邮差罢工完全是要求加薪改良生活运动。并且邮差罢工,条件至今尚未得到,听政府的劝告与处置,先行复工。那有什么政治意味?

广九路罢工——广九路罢工只有一日。罢工后,有人说:“工人反革命”。以参加刘杨战争最出力的工人,而骂他们反革命,出言已太不谨慎,殊为可惜。我们可以不说他了。我们要看广九路为什么罢工?其原因是因为路局局长不履行从前订立的条约。工人三番五次,请求路局履行条约,局长置之不理;上呈建设厅,建设厅又置之不理。不但如此,局长并无故将工人高桥开除,以激怒工人,所以于无可奈何中罢工一日。这不是工人好事,这是局长激之使成,其罢工责任,应由局长担负。工人还为了巩固北伐后方,军车照常开行。那有政治意味?

兵工厂复工——我们首先要明白兵工厂事件,并不是工人罢工,乃是工厂自己关门。其理由是说:兵工厂生产减低了,要加以整顿,提高生产。工人并不反对整顿,听工厂关门。但是,兵工厂关门二十多天,并无整顿办法公布,把一千七百余工人丢在厂外受饥饿。其实兵工厂生产减低,其原因并不能全归罪于工人之懒惰,而机器之旧窳,原料之缺乏,管理之不周,尤为重要原因;事后均已大白。工人方面并且听着一个可惊的消息,就是厂中到上海、宁波招收工人,替代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广州全体工人自然要起来援助兵工厂工人复工。这不过要求恢复工作而已,并未反对整顿计划。那有政治意味?

汽车停工——汽车工人为什么停工呢？因为汽车工友被担架队副官毒打重伤，汽车工会与该管机关再三交涉均无圆满答复，这时工人觉得在国民政府之下，生命不能得到保障，大家停工开大会向政府请愿。极而言之，只不过反对不法军官。那有政治意味？

银行店员罢工——银行罢工，与社会金融有极大关系，有人以为这是反对政府之表征。但是，我们要知道几个月以前，银行店员便已向东家提出加薪条件，银行东家却欺骗工人说：“加薪是可以的，但不可公开出去，恐怕影响营业，我们秘密磋商好了。”店员信以为真。可是过几个月后，毫无影响。店员才知受骗，上了东家的当，于是出于罢工，并且店员还为东家着想，要罢立刻就罢，如果稍为迟延数日，银行一定发生挤兑，东家损失更大。银行店员罢工完全是为加薪问题，后来经农工厅调处，店员还以极大的让步，好好地解决了。那有政治意味？

这五桩事件说明白了，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工人不过要求生活之改善，职业之保障，生命之安全；总而言之，只是改良生活运动，并无政治意味。

如果说是政治意味，倒不是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而是拥护国民党及其政府。工人阶级对于党和政府之对内对外一切革命政策及行动无不首先赞助，竭力参加，其事彰彰在人耳目，可以无劳我们举例了。

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

工潮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物价昂贵生活恐慌之状态中所

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我们贵省有,而是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所常有。即就去年而论,世界各国工潮不说,就是我们贵国的上海,一年之间,罢工多至七百余次,可说比广州厉害数倍。俗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无可如何的事”,那末,同一理由,工人要吃饭,又何尝不是无可如何的事。工人工资不够吃饭了,在上海那样受帝国主义与军阀重重包围与压迫之下,他们尚且从弹雨枪林中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而去为他们改良生活条件而奋斗,更何况在民主政府之广州,工人罢工权是被党的决议案及政府的法令所承认的,即是说合法的,他们那有不要改良生活之理?我们对于上海工人改良生活运动却寄予不少的同情,而对于广州工人改良生活运动则大惊小怪,这不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是什么?总之,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我们须得很小心的在根据真确的事实,谋适当的解决,决不是猜疑厌恶的态度和鲁莽灭裂的方法所能奏效的。

二、劳资的纠纷

工资问题

广州劳资纠纷问题,实在被人误解,非难,甚至掎击得不少了。然而按诸事实是怎样呢?我们把劳资纠纷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公开来简明的说一说。

首先说到工资问题。广州工人的工资,除掉公用事业和交通事业两部分极少数的工人(占全广州市工人百分之八·五)生活

比较可以过得去之外，其余绝大多数的工人（占全广州市工人百分之九一·五）工资是很微薄的：做长工的多者每月在十五元上下，少者五元亦有，平均计算，每人每月约为十元。说到女工更可怜了，每月工资平均约为七元，她们几全做散工，或论件给值。说到童工尤其可怜了，许多是做工不给工资，即给工资每月也不过二三元，平均每日多给半毫，每月共得一元五毫。此种仅得的工资，犹复时受种种无理的克扣。大家看看，广州工人工资是何等微薄！

工潮起来之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有的要求增加二三成，有的要求四五成，最高者六成（印务工人算是例外，有其特别原因，请参看《人民周刊》二十五期《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我们拿长工工资的平均数十元做一个标准，加三则为十三元，加六也不过十六元而已，何况加六乃绝对少数。试问增加区区工资是否可够生活呢？我们看下面两个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便可以知道了。

单身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

饭 食	七元	理 发	二毫
屋 租	二元五毫	烟 仔	六毫
衣 履	八毫	饮 茶	二元五毫
工 会 费	二毫		
	总 共		十三元八毫

附释：

一、饭食——指到饭店包饭，或零吃，单身工人自然无力起火。

二、衣履——每年大概三套，单衣二套，夹衣一套，棉衣

一套，帽一顶，鞋三双，约十元，平均每月八毫。

三、烟仔——工人恐怕不敢吸纸烟，此指熟烟，每月只定三先。

四、饮茶——固为广州工人特别嗜好，然工人每日只吃两顿，辛苦之余，饮茶以舒其困，实为必要，每日只得十二先。

六口之家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

米	十四元六毫	理 发	六毫
柴	五元	烟 仔	一元二毫
油盐	一元八毫	饭 茶	二元五毫
菜	九元	灯 油	二元五毫
屋租	五元	教 育 费	六毫
衣履	四元八毫	工 会 费	二毫
总 共		四十七元八毫	

附释：

一、米——本人每餐十两，每日共二 两；父母妻每餐每人七两，每日共四十二两；子女每餐每人四两，每日共十六两；六口每日共四斤十四两，每月照伸，共需米一百四十六斤四两。米价一元买十斤，故得十四元六毫。

二、菜——每餐只得一毫半。

三、理发——本人及父亲儿子三人。

四、烟仔——本人及父亲吸。

五、饮茶——仍然只计本人一人。

以上面两个表看起来，单身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需得十三元八毫，六口之家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需得四十七元六毫，照广州工人现在所得工资，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养活自己个人已

是十分勉强（如果一旦不幸发生疾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自然再不要希望讨老婆，养父母，育儿女。

据省政府委员甘乃光先生在商民代表大会报告：“现时生活程度，已高至百分之九十，工人的加薪，则约加至百分之七十，有少数工人已加多过物价指数，但如人力车夫之工值，则又减少百分之四十。大约大部分计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适合生活的标准者”。他是政府负责人员，当然不会随嘴乱说。

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广州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过份了没有？

工作时间问题

再说到工作时间问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人决议案，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最近中央及省区联席会议关于工人决议案，规定工人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以六日计算，则每日工作九小时）。国民党决议案如此，我们来看看广州工人工作时间是怎样？

广州工人工作时间除了小部分交通工人及工厂工人算是有了时间规定以外，其他工人并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亦并未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政府也并未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店员工作时间多系十三小时至十六小时。手工业工人则自天明做到夜深，并无休息。至于件工或散工，因工值太低，生活所迫，不得已夜以继日，日以继夜，胼手胝足，毫无休息，那更是劳苦不堪了。

现在只举一个例，便可知广州工人悲惨到什么程度，菜栏工人作工日夜相继，只向东家要求每晚发给二毫消夜费，并不敢

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然而东家竟不接受，一直争持到一月有余，方才解决。

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广州工人工作时间如此，国民党决议案如彼，工人过份了没有？

征收买卖佣问题

征收买卖佣问题是惹起有些人非难的。他们说：“工人已有工资，为什么还要巧立名目，征收什么买卖佣”？他们以为这是工人的苛求。

但是我们要知道买卖佣是“古已有之”，并非工潮起后才发生的。考其由来，是雇主用以奖励工人之工作。其名目大概有“入门炮金”“出门店佣”，……等。此种情形，为店员方面所特有。因为店员工薪非常微薄，月仅二三元而至八九元，十三元以上者实属无几。店员因为工薪微薄，全靠这种买卖佣为之弥补。

现在雇主方面要求取消买卖佣，将买卖佣并入工资计算。这种办法，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公道的。但是，事实并不如此。譬如工人要求加薪，雇主即能答认，但是，旋即将加薪的工人开除，这样，工人加薪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如果有了买卖佣，即便将这批工人开除，将来的工人仍然要买卖佣，这可以制止雇主操纵的阴谋。所以买卖佣是工人加薪胜利的保障。

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第一、买卖佣是“古已有之”，是工人在历史上固有的利益；第二、买卖佣是弥补工人微薄工资的一种；第三、买卖佣是保障工人加薪胜利的一个方法。

现在举一个例。比方说与买卖佣相类似的所谓“下栏”。什

么叫下栏呢？就是酒楼宰杀鸡鸭之脚爪肚肠归工人所有。假使工人生活够用了，试问他们还要这样可怜的东西吗？工人连这样可怜的东西，还不惜用罢工手段与雇主相争，这是多么可惨的一件事！

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这是不是工人苛求？

征求会员问题

征求会员问题又是惹起有些人非难的。他们看见许多工会穿起武装制服，打起什么征求队，什么调查队，或者纠察队的旗帜，招摇过市，到各工厂作坊或商店征求会员，不觉发生恶感，以为“加入工会各人应有自由，为什么纠众强迫”？

但是我们要问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呢？我们就应该懂得广州有东家组织御用工会之一事实。农工厅是政府机关，他的公文应该要负责任吧。农工厅去年秋间上国民政府呈文叙述办理三十个工会的经过情形，我们摘其声言系东家工会或有东家工会嫌疑的工会与真正工人的工会列表于下：

除这公文所叙述以外，据我们所知道的，还有火柴厂东家组织什么“火柴职工俱乐部”，当押按东家组织什么“当押按联德工会”……等等，难以尽述。

大家想想，东家组织御用工会以与工人工会对垒，工人如果要保障工会组织与工会行动不至为对方所破坏，是不是要希望所有工人都要组织在一个工会之下，方能免除这个危险？慢说工会征求会员并非强迫，即使是强迫，也是工会一种自卫行动。假使你是一个革命家，就应该予以充分的同情与谅解才是。

工 人 工 会	东 家 工 会
革履工会	革履劳资协进会革履劳工协会
牙擦抵扫工会	牙擦抵扫善育工会
土洋杂货店员工会	土洋杂货华强店员工会
菜栏工会	菜栏职工总会
遮业工会	制遮工会
柴炭工会	柴业职工总会
酱料凉果杂货工会	酱料凉果杂货仁德工会
天窗工会	天窗联合会
建造木土西式家私工会	杉杂木器合和工会

任免职工问题

任免职工为劳资争议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在雇主方面说：“任免职工，雇主应有绝对自由权，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在工人方面说：“不行，工会应有保障工友职业权，所以厂店添雇工人一定要由工会介绍，厂店开除工人一定要得工会同意。否则，工人职业便无从保障。”

这种工会职业介绍权与开革同意权是很重要的。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所公布之工会条例，已有明文规定。假使工会没有此种权，雇主方面可以随意开除工人，另雇最低工资之新工及童工、女工，或安插御用工会之会员。此种现象，在广州过去事件，已经发生不少，如火柴厂与酱料雇主都是采用这个手段。假使工会没有这个权，工人加入工会，不特不能得到职业保障，反因加入工会而有失业之危险，工人何必加入工会？工会拿来何用？工会将从此完全失其作用而解体了。

罢工与封锁

为什么罢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省政府书中说得非常明白，说“工人要求手续事前必通知雇主交涉，呈请官厅备案并请求援助解决，苟雇主善意磋商，政府极力维持，则罢工之事可免。因罢工固于雇主之工业或商店有极大影响，而于工人无隔宿粮者，其牺牲亦至巨，本非工人愿为也”。“工潮至今虽近一年，雇主对于工人要求加薪之事，从未有以和平方式与工人磋商者，非至水穷山尽之时，不予接受”。罢工本是工人的一种最后武器，假使所提要求有磋商余地，何用罢工。

现在最使社会误解的，恐怕不是罢工，而是封锁。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什么封锁？简单的答复，这也非工人所愿为，而是店主方面激之使成。

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广州，雇主方面当然不能象在北方上海军阀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可以利用政治势力或军警势力来压迫工人。他们对付工人的手段怎样呢？列举于下：

- (一)开除工人，另雇新工人，以夺其工作；
- (二)强迫工人退出工会，以去其保障；
- (三)先行闭厂停业(如报馆、火柴厂、车衣、菜栏、酱料、金行等皆是工人提出条件尚未罢工时，雇主先行闭厂停业)，以绝其生路；
- (四)组织御用工会，以图箝制(见前)；
- (五)收买地痞工贼民团，以戕杀工人(如面粉、牙刷、火柴厂皆是)；

(六)组织御用纠察队,以打杀工人(如酱料联志行、柴商公会等皆是);

(七)强行开门营业,置工人要求于不顾(几乎全是)。

这些手段,有一如此,已可使工人罢工破坏而有余。工人罢工自然希望他们的要求目的能够达到。如要达到要求目的,对于对方破坏罢工的举动,自然会尽其可能设法防御或抵抗。封锁虽明是工人所不愿为,而亦不能不为之,正如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省政府书中所言:“其情足悯,其意可哀”。至于因罢工而间或有拘人之举,或搬迁货物往工会保留待罢工解决后发还之举,均可由此解释。

未了举一个最近的例。粪业工人罢工,有许多人以为关于公共卫生,应该立即解决。农工商学联合出任调停,劝工人先行复工,然后磋商条件,工人方面听劝告立时答认了,但是东家方面则置之不理。东家为什么不理呢?第一,他知道粪业工人比任何工人穷苦,一定不能支持,不久必然内讧,所以他一味去做分裂粪业工人内部团结的宣传与组织。第二,粪业工人拟将粪运卖维以持罢工生活,东家则收买土匪,俟粪船运至乡下时,将工人劫掳或毆杀,使工人无法将粪运出,东家必操胜算。第三,粪业罢工关系公共卫生,延不解决,可引起市民对于工人之深恶痛绝,他却天天向官厅“念穷经”,运动武力强迫开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广州劳资纠纷剧烈的原因,而可以公开的判断了。

三、工会的纠纷

说到广州工会的纠纷，在反对者方面，自然是幸灾乐祸，藉此更可以骂得工人狗血淋头；在同情者方面，也不觉摇首蹙额，因而批评工人太不长进。但是，工会为什么纠纷呢？我们须得指出来。

行会组织、职业组织与产业组织的冲突

广州工会历史可说比北方各地早得一步，然而他的组织却比北方各地都要零乱。一种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叫做行会组织，其特点是互相救济和联业专利，大半是劳资合组。一种是从英国辗转传染过来的（由英国到香港再到广州），叫做职业组织，其特点是按照专门技术组织，大半以“贵族工人”为中坚，谋劳资妥协。再一种是产业组织，是最新式的革命组织，其特点依照生产机关不论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总之赚工钱吃饭的工人都组织在一起，资本家绝对不准加入，高级职员即准加入亦须受极严格之限制，主张阶级利益。大体可以这样分。广州工会很显然的有此三派倾向，于是乎纠纷就起来了。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有许多纠纷事件，就可以用此解释。比方“陈森事件”（其起因之一，是牙擦抵扫工会与东家行善育工会冲突，陈森帮同东家杀死工人。）最近“机器会攻打粤汉广三铁路事件”（其起因之一为新宁铁路总工会与机器会冲突；二

为粤汉铁路总工会劝告会员不得加入其他职业工会,均可以做此项解释的证明。

新的生产技术与旧的生产技术的冲突

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本是产业界一进步的现象,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过在这里发生问题了,比方说手工业工厂一旦采用机器,必有工人失业;机器工厂一旦采用电器,亦必有工人失业。工人为争工作,或为争会员,而纠纷遂因之而起。这种例子也很多,如从前油业工会与机器会之纠纷,数月前针织工会与机器会之纠纷,皆是。如目前有一问题,就是汽车加多了,什么加拿大,利民,模范等公司,沿途公共汽车加多几十辆,而手车夫大受其影响,幸而手车夫工会看到此点,极力设法补救,如限制汽车路线及中途搭客之类,假使处理不当,而纠纷竟不难预计。如汕头不过一掌之地,行驶长途汽车,引起手车夫之暴动,便是一证。

东家工会与工人工会的冲突

广州因为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东家无法利用政治势力即军警势力以破坏工人,所以妙想天开,组织御用工会以抵制工人工会。或简直自己出面组织,或嗾使职员出面组织,或收买工贼及不觉悟分子组织。此项组织之目的,不用说是怎样分裂工人团结,怎样破坏工人行动,所以纠纷就来了,表面上是工会与工会的纠纷,实际上是东家与工人的纠

纷,此例太多,简直数不胜数。

政治势力的挑拨

在从前工人阶级没有力量的时候,一身汗臭的工人们,自然是不值得右派老爷一顾的;后来见得有了力量了,右派觉得这于他们有危险,于是勾结工会中之腐败领袖分裂工人团结。以前如谢英伯、马超俊、吴铁城之流便是如此。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广州开第一次全市代表大会,本来是各大工团共同筹备的,情形非常的好,有联合的可能,然而又为右派所破坏,据说还花了二千元哩。此种怪事,可决其必绵延不绝。

封建思想的余毒

广东福建两省向来以“械斗”著称。此种风气,本来只在乡村。如不同姓之两村,每年约期械斗一次,双方届时不论男女老幼皆上战场,打胜固然庆贺,打败也不要紧,各人打死各人埋,并不呈报官厅,官吏下乡来亦置之不理;明年再如期打过。近年来,因农民破产,无田可耕,群趋城市寻找工作,于是此种风气也由乡村带到城里来了。城市工作又少,封建积习未除,口角相争以至于械斗,我们往往听到这种呼声:“是好汉,我们在瘦狗岭打一场”!“你如不是衰仔,我们在凤凰岗打一场”更何况有反动派挑拨哩。手车夫去年大打数天,广州市面骚然,就是手车夫中有地方主义,有什么广州帮,海丰帮,于是反动派得挑拨之使其自相残杀。

失业问题为其总原因

工会与工会之间纠纷,工会内部之纠纷,均可以上述五种原因包括之。不过为什么纠纷如此厉害?总原因即在失业问题。广州市工人失业的太多了,大概大多数工会会员差不多有半数失业,如广东油业工会一万三千人,就有六千人失业。这是如何严重的问题!他们所争的大概都是某种职业中之特别工作权,例如碾谷工人和起落货工人争起米和负米的权利。所以什么“争夺工作”“保障工权”的口号,什么“竞争会员”“谁准立案”的举动,都是表明这一意义。工会纠纷乃失业之结果,几乎可说成了一个公例。唯其失业工人太多,谁给工作他做,他便听从谁,什么政客,什么东家,什么工贼,他几乎一概不管;甚至于受这些人之挟制榨取,或额外剥削,也几乎情愿甘心。假使失业问题解决了,政客的挑拨,东家的愚弄,工贼的操纵,何能发生效力。

四、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

新经济论者之观察

工潮发生之后,广东经济究竟发展呢?抑或衰落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这一问题,务使他有一个水落石出,清一白二。

经济问题为社会共同生活之所系,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到不

完全在乎检查人们观察的错误,而是要考查事实的真相,以为工人行动定下一个适当的标准。

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力的有下叙两种意见:

(一)社会恐慌说——他的大意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靠两个要素:一是政治的安定;一是经济的安定。什么叫做政治的安定?就是政府行政得以顺利推行,不受何种掣肘。什么叫做经济的安定?就是工商业得以安静营业,不受何种妨碍。广州工潮恰恰破坏了这两个原则,而徒然引起社会的恐慌。广州事实上已陷于社会恐慌的状态。社会发生恐慌,必至使得工商业停顿或倒闭,更不要希望工商业家投资或兴业。”

(二)罢工循环说——他的大意是说:“现在不得了了,罢工将无止境。因为罢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后,物价必然增高;物价增高了,工人又不能够维持生活,于是又要罢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后,物价又继续增高。这样循环下去,罢工将无止境。”

这两说持论虽各有不同,而其共同的根本观念,却都认定广州工潮是使经济衰落之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为便于称呼起见,我们统名之曰新经济论。

新经济论的见解,并不止代表他个人的观念是如此,可说确还代表一部分人甚至革命领袖的观念都是如此。但是,此种见解很容易而且很可能为一般反动派利用以为进攻工人阶级的武器,因为基于此种见解,不仅于工潮加以取缔是势所必至,再进一步对于工人阶级加以压迫或亦理有固然。我们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必得下一番客观的研究,静气的讨论,与公允的评判。

新经济论错误的证据

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新经济论所观察的完全不是事实,这话怎讲?我们有证据。

第一个证据就是海关统计。

兹将三年来海关(广州、九龙、三水、拱北、江门五口)出入口货税收统计表比较于下:

月 份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一 月	七二一,四七九	五三 五五五	六九九, 八六
二 月	五四 ,六一	五九九,六二八	三九二,八三五
三 月	七七 , 三三	六一七,五五七	七二七,七二三
四 月	六三,五一	五一三,三九五	六九二,一四四
五 月	七四六,五七七	五六五,七八	六七八,七六九
六 月	六二一,九三九	四一七,三	五八四,九九七
七 月	四八四,八六四	一五 五四	六一五,九
八 月	六 八, 二七	二六五,七五	五七一,四一一
九 月	六 四,五九三	四一五,九一	七三一,四一四
十 月	五五四, 五八	五 五,三六六	七二五,九七一
十一月	六六七,三二二	五七五,七七六	
十二月	六二六, 八九	五四 , 五四	

上表,十四年因刘杨战争及省港罢工有两个月断绝交通,并非常态,我们不以为凭。我们把十五年与十三年来作一个比较罢。一、二、三,五、六、八月份诚然十五年比十三年少,但是四、七、九、十月份则十五年比十三年多。以十个同月份总数统计相比,十五年实超过十三年一十五万余两。何况十五年

十个月均在省港罢工封锁还未停止之中，尚有超过，否则，更多无疑。十五年不是即所谓工潮之年吗？假使工潮真正影响于商业，论理出入口货应该减少，不应增多；今则适得其反，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社会恐慌说表面上理路甚通，实际上完全无稽。他说：“广州事实上陷于社会恐慌的状态”，从上表看来，广东商业并无衰落现象。商业已无衰落现象，则社会并未陷于恐慌状态可知；也就是说工潮并未造成广州社会的恐慌又可知。

据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原理，社会恐慌倒不在于工潮而往往在于生产过剩，英美各国差不多有一定恐慌年限。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因为资本主义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往往因生产超过了限度，一时卖不出去，资本家中间彼此剧烈的起了竞争，于是一部分生产里，首先是小的和中等企业不能支持而失败，而倒闭；随后就到比较大的企业了。这种资本家只为各自增高利润而竞争所引起来的恐慌，工人阶级实拜受其赐，到处看见企业倒闭，成千成万的工人被丢在道路上，失业无限的增加起来，工人的生活变得比平常更为难堪。广州虽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不怕有生产过剩的恐慌，然而广州究竟是一个外烁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第一、受海外恐慌的波动；第二、受商品堆集的影响；第三、广州经济向来附庸香港，或受其金融的操纵，或受其政治的压迫，在在皆有使广州陷于恐慌地位的可能。总而言之，读破万国经济史，因零碎工潮而引起恐慌是从未有过的，除非象英国矿工那样宏大长远的罢工，岂但引起社会之恐慌，简直摇撼国家之基础，那又当别论了。

第二个证据，就是物价指数。

兹将农工厅去年公布的第三季物价指数平均数比较如下：

季 份	第 一 季	第 二 季	第 三 季
米 类	一八四·三	一九二·八	一八七·三
其 它 食 品 类	一七三·八	一七四·七	一七六·四
衣 料 类	一五七·一	一五七·八	一五八·八
燃 料 类	二六九·五	二五三·五	二三·九
金属及建筑料类	一九八·二	一八六·五	一七九·八
杂 项 类	一八·七	一八六·八	一八三·八
总 平 均	一九二·	一九一·五	一八六·五

上表,米类第二季比第一季高,而第三季比第二季低。其他食品类、衣料类与杂项类较平。燃料类与金属建筑类低得甚多。总平均不特第二季比第一季低,而第三季比第一二两季均低。去年四月以至十月不是即所谓工潮最厉害之月吗?何以物价反为低跌,又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罢工循环说表面上理路似通,实际上仍然无稽。他说:“加薪之后,物价必然增高”,从上面看来,广州并无物价增高,何有于罢工之循环?这倒可反证出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工人所要求加薪并未超过物价指数,即有例外,乃绝对少数;也就是说工人所要求的条件,绝对为现在经济状况所容许,并无过份,更无苛刻。)退一步言,即使物价增高,本亦司空见惯,并非奇怪之事。我们试将民国二年至十五年物价总平均逐年相减作一个比较于次:

三年与二年 一三·六减一·一 等于 增百分之三·六
 四年与三年 一一二·一减一三·六 等于 增百分之八·五
 五年与四年 一一九·四减一一二·一 等于 增百分之七·三

六年与五年	一二四·七	减一一九·四	等于	增百分之五·三
七年与六年	一一三·四	减一二四·七	等于	增百分之八·七
八年与七年	一三六·四	减一一三·四	等于	增百分之三·
九年与八年	一三五·四	减一三六·四	等于	减百分之一·
十年与九年	一四四·八	减一三五·四	等于	增百分之九·四
十一年与十年	一五三·四	减一四四·八	等于	增百分之八·六
十二年与十一年	一六一·	减一五三·四	等于	增百分之七·六
十三年与十二年	一七五·六	减一六一·	等于	增百分之一四·六
十四年与十三年	一九·八	减一七五·六	等于	增百分之二五·二
十五年与十四年	一九·	减一九·八	等于	减百分之·七

上表,十五年的指数乃九个月的平均数。我们从这个比较,不特可以证明物价逐年增高不足为怪,而且又得了两个意外的结果:(一)无工潮之年物价逐年增高;(二)九年与十五年皆系工潮之年物价反而减跌。物价何尝因工潮而增高了呢?

再则,我们还要指出罢工循环说逻辑上根本错误。因为根据经济原理,只有因物价增高而工钱跟着要求增加,决不是因工钱增加而物价跟就增高。其方式如下:

物价增——工资增……物价增——工资增

罢工循环说简直倒果为因,所以他的逻辑上已是根本错误了。大前提既已错误了,而欲其结论之不错,得乎?八十年前,有位蒲鲁东先生反对工人罢工的理由,就以为工钱一经增加,则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随之上升,其结果还是等于零。马克思反驳道:“第一就没有一般物品昂贵之事。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同时与工钱增加一倍,这不是价格上的变迁,只是表词上的变迁。还有一层,工钱上升,从没有一切物品连带昂贵的事。在实际上,

如果一切工业依固定资本的比例(依其所用工具的比例),雇定数目相等的工人,则工钱上升的影响为利润的下降,而物品的市价不致发生变化”。(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一五页)以上两个证据,都是数字,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可以由我们自由想象,胡乱构成。在我们的意见,以为这样硬性的证据,比抽象的理论要靠得住得多,要可信得多。

几个旁证

我们除掉以上两个证据以外,还有其他旁证。

第一个旁证:印务工人加薪不是曾引起许多人非难过吗?他们由九元加至十四元,不久又加至三十元,诚然令人惊骇(但此为工潮中最特别之一,其详请参看《人民周刊》第二十五期)。论理印务工人加薪如此之高,报馆或印务局应该不能维持而倒闭了,但是事实这样,不特没有倒闭,而且还有增加。据确实调查,自从印务工人加薪之后,广州报馆增加者,有《大中国报》一家;印务局增加者,有鸿发、连发、华安、鸿生、源发、捷明、市政印刷所、广新、怡盛、源源、黎义记、夏礼、周乐、联发、培利、惠民、致和、泗合、道生、合成、天成二十一家。有些人把印刷品送香港或上海承印,便引为这是印务业衰落之证,其实这恐怕是因广州印刷殊欠美观的关系罢。

第二个旁证:西堤同兴大街,去年生意比从前增加百分之八十,据商人自己说。

第三个旁证:广州市面去年增加银号五十四家,据老于银业的商人说银号增加,表示金融活泼,表示商务畅旺。

第四个旁证：最近沿途汽车车辆之增加与路线之扩张，为大家所共见的事实。

第五个旁证：各马路无处不大兴土木，建筑商店，又为大家所共见的事实。

这类旁证，难以尽数。均可以证明新经济论的错误。

我们在此可做结论了。广州工潮究竟使经济发展呢？抑或衰落呢？请大家根据事实做个答案来。我们答案是：

“广州工潮并未使经济衰落；退一步说，广州工潮未使经济发展，至少亦是经济稳定。”

五、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

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

上一章我们虽然证实广州工潮并未使经济衰落，但是广东经济不发展又确系一存在的事实，然则他的原因，既不是工潮，究竟是什么呢？这必须有个答复，否则仍不能消除人们的怀疑和存见。

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就是答复这一点。

在未答复以前，我们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念，就是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即是说广东经济不发展，并不自工潮始；也即是说广东经济不发展，乃早在工潮之前。

我们走到观音山头四面一望，广州烟突不及十只，而且半数没有烟出，这可表明广东经济不发展了；不过这半数没有烟出的

烟突 ,我们找一个在广州久住的人问一问 :“ 这些不出烟的烟突 ,是工潮后才不出烟呢 ? 还是早在工潮以前呢 ?” 如是工潮后才不出烟 ,那么工潮或者还可说要负责任 (其实这还须调查是否有其他原因) ;如果早在工潮以前 ,那么 ,管工潮屁事。广州这些烟突不出烟 ,谁人不知 ,那个不晓 ,不特早在工潮以前 ,简直早在刘杨战事以前 ,或者还可说早在孙大元帅重返广州以前 ,真是“ 代远年湮 ” ,广东经济不发展 ,与工潮何干 ?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可幸免的悲惨命运

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 ? 我们就要知道 ,从全国观点说 ,广东不过是中国之一部分 ;从世界观点说 ,广东不过是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之一部分的一小部分。殖民地或半殖民陷于经济落后的悲惨命运 ,简直成了一个铁则。其最大原因有三 :

(一) 帝国主义的束缚—— 帝国主义只希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仅仅只做他们的商品推销场 ,余资发泄地或原料供给所 ,超过此一限度 ,便非他们所愿 ;所以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各种特权以及其他方法妨碍殖民地之产业发展 ;或者还可说不仅妨碍殖民地之产业发展而已 ,即其已有之产业亦故意设法令其濒于灭亡。

(二) 封建势力之剥削—— 封建势力包括大小军阀 ,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等而言。人民本来就穷 ,他们还从人民身上予取予求的施以剥削 ,什么军用票 ,什么苛税杂捐 ,这样一来 ,焉得不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难 ,而陷于破产的地位 ,不仅无余资可

以兴业，抑且无余财可以过活。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内乱战争，以扰乱社会之和平，捣毁市场之繁荣，人民连安居乐业都不能，遑论投资兴业。

(三)农民购买力的缺乏——海外市场都被帝国主义分割净尽了，落后国家工业品的销场，只在他自己国家之内。落后国家人民占绝对多数只有农民，农民便是他们工业品的唯一的主顾。假使农民不得解放，购买力不得增加，这些工业品即无从推销。譬如中国农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的劳动生产，都给地主土豪劣绅及军阀等剥夺了，其购买力之缺乏可知。

有此三种原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不能发展，乃其必然的结果。中国全国尚且如此，广东何能例外。又何况广东之外尚有一个香港，掌握广东经济的命脉，要想发展尤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了。

与其说是工潮关系，毋宁说是政治关系

上面一段话或者说得太远了，或者以为这些大道理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了，现在大家都有一個广东要求经济独立的宏愿，都说广东已到建设时期了，于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工商业家乐于投资？为了这一点，就有人疑问：“为什么工商业不肯投资呢？敢莫是因为工潮关系”？

然而不然，因为据我们所观察的却另有在。

工人们说：“一只牛所出的牛奶必不能超过他身上所蓄的奶质。一只鸡所生的鸡蛋必不能超过他身上所蓄的卵珠。落后的产业状况亦不能给与他能够容许的工资。同一理由，工人的生

产,你也不能压迫他做超过他能够生产的程度;一个生活痛苦的工人,也不能剥削他仅能够维持他的生活的工资”。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宣言”工人们尚且知道这种很浅显的道理,而且在事实上未曾要求超过现在经济状况的限度,岂有聪明的工商业家反不知道之理?至于说因工潮而疑惧共产,那更是“既荒且唐,荒乎其唐,无一而不荒唐者也”。聪明的工商业家早已看穿了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派这种造谣的西洋镜。

据我们所观察的,工商业家不肯投资,与其说是因工潮关系,毋宁说是因政治关系。这话怎讲?

第一,战争尚未完全过去——广东十五年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几无宁日,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次东征,又一次南征,又出师北伐,固然这些战争在我们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在工商业家看来,就不免有“胜败兵家之常”的观念了。工商业家以为战争尚未完全过去,那敢放胆投资?

第二,政府信用尚未完全建树——从前的军阀政府何尝不以振兴实业相号召?从前政府曾有一次为延长粤汉铁路而招股,股是招了,钱也收了,而粤汉铁路却仍然未越过韶州一步。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廉洁政府自励,这是人民所相信的,不过事实上却有令人民怀疑的地方:譬如黄埔开埠,发行公债票一千万,始终未拿出钱来。又譬如汕头堤工,前任行政委员千方百计向商人集资二十万元,继任者变更计划,商人投资不知下落。又譬如自来水接收事件,商人说,这是商办性质,政府整顿可,接收则不可。这一类事件,均使工商业家感受不安,那敢放胆投资?

第三,发展实业计划尚未完全确定——现在政府对于发展实业,只有口号,并无计划。譬如黄埔开埠,首先就是地点问题,

究竟是白帝沙呢？沙路呢？虎门呢？其次就是地皮问题，究竟是由政府完全公卖呢？抑由私人自由圈买呢？或由政府购置商人承租实行递年加租率呢？再其次就是市场计划，究竟何处筑码头？何处筑货仓？何处筑商店？何处筑住房？何处筑官署？何处筑公园？万事都无确定，工商业家投资，首先就是一条算盘，计划既无，算盘从何打起？如说黄埔开埠已有柯维廉一个计划，则柯维廉自己已在绪言中恫恍其辞，仿佛是奉命造此计划，大有不负责任的样子。此计划地点在白帝沙。据闻伍朝枢还主张粤汉广九接轨，这样则只是造成香港的需要，开辟黄埔有何用处。工商业家对于这些比任何人要胸中雪亮，那敢冒险？那敢放胆投资？

我们上叙几点看来，可见都是政治关系，又何怪工商业家不肯投资。

时机不可错过

现在广东到了一个新时代了，就是北伐胜利已到了一个稳定的形势，革命地盘扩张，财政税收亦扩张，从前革命军军费完全仰给于广东，今则可分摊于占领各省，广东负担可以减轻了。现在省政府励精图治，一方面只是要按月拿出四五十万元提倡实业，则工商业家必闻风而起，踊跃投资，再一方面极力肃清土匪，疏通河道，则商旅交通，销场扩大。这样，广东经济既不能有充分的发展（因帝国主义未打倒，封建势力未消灭，农民购买力未增加。）至少可有相当的独立。时机不可错过，幸即努力！

六、一年来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

广州产业概况

我们在未讲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以前,为大家容易明了起见,须得先把广州产业概况说一说。

广州本来就不是一个近代工业社会。新式生产企业非常之少,现有的仅仅限于交通事业、军用事业及公用事业:如政府管理的铁路(宁阳潮汕铁路虽系商办,不在广州。)及兵工厂等;商人经营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及轮船公司等。除此之外,则为手工工厂,虽然采用机器或电器,只不过为手工之助:如榨粉,碾谷,火柴,榨油,织造,印刷,小机器厂之类。大部份仍系手工业。广州虽然不是近代工业社会,而却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商品推销市场。八十年前广州就与欧洲资本主义接触了。其进口货数量仅次于上海,若加上香港进口货则总量还要超过上海。再则上海进口货销售于长江流域各省,而广东只销售于两广及湖南之一部,销售货物数量简直居了全国第一位。因此,广州商业极为发达。正确些说,广州固然不能叫做近代工业社会,然而确可叫做近代商业社会,不过只是一外铄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罢了。

唯其是外铄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为香港帝国之经济的附庸,所以广东本国工业不能发展,农业破产,手工业亦逐渐崩溃,现在手工业仍保存大部份者,即因此项手工,为洋货所不能一时代替,故得苟延残喘。

广州工人阶级之组成

其次我们讲到广州工人阶级的成份。

广州产业状况,大致如上所述,所以广州工人阶级的成份亦异常复杂。大略分析如下:

(一)产业工人——为数约近一万七千人,占广州工人全数百分之八·五。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最有觉悟。不过他们的工资比其他工人高得多,各有职业介绍所,为其职业上之保障。因此,他们中间一部份很容易养成“工人贵族”之观念。

(二)手工工厂工人——约二万五千人,占全数百分之一二·五。他们工人阶级之地位比较明显,不过他们有一部份与农业社会之关系尚深,故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他们的思想仍然非常之大。

(三)手工业工人——约一十二万人,占全数百分之六十。他们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之行会思想。

(四)码头工人——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他们生活最苦,亦与农业社会之关系甚深。

(五)水上工人——指水上大小船艇工人而言。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不过他们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各有船艇,思想较为落后。

(六)店员——约一万二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论其生活可说甚苦,唯他们因营业关系,往往容易养成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他们现在阶级观念尚甚模糊。

以上分析,虽不甚确,不过我们可以自信,这种分析“虽

不中，不远矣”。

发展的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讲到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了。首先要问：发展的原因在那里？我们要把他指出来。

第一，刘杨战争的教训——刘杨战争以前，广州工人曾经参加几次政治性质的斗争，如收回粤海关事件，反对沙面苛例事件，商团事件，固然引起工人群众之觉悟不小，而尤其是参加打倒刘杨战争，更促其兴奋。因为此次战争中工人群众参加为其成功之重要原因。并且他们不是原始暴动的形式，而是有规划的有组织的行动。广州工人代表会在事前即已布置妥贴，并秘密组织指挥机关。故刘杨战争一发生，三路工人就同时罢工，以致刘杨军队困死广州，不能开出一步以进攻革命军队；另一方面，东西北江各路革命军队开向广州，则铁路工人立即开车，故能迅速将广州包围，不到一星期将刘杨打倒。同时，海员在香港将刘杨援军（唐继尧由云南经安南香港送来助战的）截阻不许登岸转船入粤；凡叛军军官乘轮来往省港者又派队侦查捕拿，亦给予革命军助小不小，其他各种工人（如兵工厂之类）亦相机罢工援助。在历史上说起来，工人阶级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参加这种反军阀的军事战争，可说是第一次，所以他更有重大的意义。广州工人阶级经过此一战争，充分表现他们的力量与权威，自然增加其自信力与奋斗力。大家有了这种深刻的教训，于是乎落后的工人群众也跟着起来了。

第二，省港罢工的影响——上海五卅罢工给了全国工人一

种兴奋,广州当然不能除外,但是远道传闻,其印象甚为模糊;不如省港罢工亲见亲闻之深切著明。省港罢工实在也有他特别惊人的地方:宏伟严密的组织,远大灵敏的策略,坚毅奋斗的精神,求之世界各国职工运动史中,都是殊不多见的,或竟是空前未有的。这种与世界天字第一号的英国帝国主义之抗争,固然要增加各界民众之勇气与魄力,而广州工人以同一阶级的见解,其受影响更大,当然无疑。所以省港罢工一举一动,广州工人几乎亦步亦趋。如省港罢工委员会有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亦组织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属下工会做工会统一运动,广州工会亦做工会统一运动;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广州工会亦组织纠察队(后改为自卫队);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宣传教育事业,广州工人亦办宣传教育事业;省罢委员会属下工会办壁报,广州工人亦办壁报。这一切都惹得广州工人心痒难挠,相率效尤。

第三,民主政治的帮助——广州工人五年前有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加过薪,五年之中,物价腾贵五成,而工资仍然未加,其经济苦痛,不言可知。慢说在民主政府之下会起来要求,就是在反动势力之下,为了救死求生的经济所迫,也会冲破藩篱,背城借一;如去年上海发生七百余次的罢工,便是明证。适值刘杨倒后,国民政府成立,予人民种种政治自由,并扶助工人组织的发展,广州工人得到此种助力,而发展自然格外迅速。

发展的经过

以前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究竟若干,无统计可察,大约十万是不少的。从前年下半年至去年上半年增加人数若干亦不知道,大

约总有四五万。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开第一次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才有调查。现在我们把他由四月第一次大会到十一月第三次大会增加的数目开在下面：

第一次大会（四月一日），工会一百三十八个，会员一十六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

第二次大会（六月十五日），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会员一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人。实增加工会二十八个，会员一万二千九百零一人。

第三次大会（十一月一日），工会二百零六个，会员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人。比第二次大会增加工会四十个，会员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八人。比第一次大会实增加工会六十八个，会员三万零八百五十九人。

我们看了下面这个调查，可知去年的广州职工运动是在一个急遽发展之中了。

除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之外，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属下工人不得其详；据闻广东总工会约三万人，机器工会约一万人。

发展中的表现

正经说起来，广州职工运动是去年才上轨道的。这话怎讲？

第一，意识政治化了——广州工人去年虽多做经济斗争，然而他们对于政治问题仍然未曾放松。比方前年一切政治的群众示威运动，差不多尽系省港罢工工人，而广州工人却不大出来；去年却不然了，每有群众运动他们必踊跃参加，广州工会的旗帜与群众，差不多与省港罢工工会等量齐观了。他们对于国民政府

是绝对拥护的,在任何工会都可以找得出拥护国民政府标语。他们对于出师北伐,亦曾应募运输队,铁路工友并且组织前敌交通队,随军出发。他们普遍的知道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知道国民革命是工人解放必由之路,知道痛恨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知道痛恨反革命派,知道拥护总理的三大革命政策,并且还知道革命绝对不能中途妥协。随便找一个工人问他,他可以毫不踌躇的答复出来。广州工人意识确实政治化了。有人以工潮剧烈而说“工人只问经济,不问政治”,这话错了。有人说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应该暂时牺牲自己利益,那更是大错。象欧洲从前经济派那样,说工人应该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固然不对;若我们贵国要产生一个新发明的政治派,说工人应该只管政治不管经济,则何异要“工人饿着肚皮革命”。工人即或“谨遵台命”,无如气力不佳何。

第二,工会群众化了——从前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名称虽是代表会,实则未开过一次代表会,连执行委员会也不开的。只是一块金字招牌,高高挂起。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其选派代表之标准如下:

(一)一千人以下之工会,每五十人选派一人。

(二)一千人至三千人之工会,除照千人为底选派二十人外,在一千人以上之数目,每百人选派一人。

(三)三千人以上之工会,除以三千人为底选派四十人外,在三千以上之数目,每二百人选派一人。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第一日,出席代表共二千四百余人,后广东总工会属下三十四个工会及广东机器工会退出代表大会,仍保留有一百三十八个工会,代表共一千八百余人。

这样一个一千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可说是少见的。不特是“济济一堂”,简直是“挤挤一堂”了。

代表大会是广州工人的最高机关,任何属性的工人任何工作处的工人都能有派出代表出席大会的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所以群众化了。其他各个工会,亦相率组织各个工会的代表大会,不象从前仅有上层组织的执行机关,由少数职员或甚至会长个人实行“迪克推多”,垄断把持一切。各工会并努力树立下层组织,组织支部或小组等等。

第三,组织集中化了——广州工会一因产业幼稚,二因行会习惯,组织上甚为散漫而难于集中。去年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属下之工会,其性质相同或类似者进行联合运动甚力。如广东运输工会联合会,包含二十六个及中山汕头两处之分会,共计会员约八万余人。如广州店员总工会,包含二十三个工会,各工会改为分会,共计一万五千余人。此外在筹备中尚有广东粮食品总工会,织造业总工会,街市业工会联合会等。此种趋向,与日俱进,必蔚为臣大潮流。不象从前各工会各囿其行会习惯,职业界限,或地方色彩,而深固闭拒了,因为他们知道大联合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出路。

第四,工作具体化了——从前一切工作皆由各工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就不免有原始的幼稚行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自第一次大会以后,成立执行委员会,分为七部办事,真正负起责来了,而实际上亦有事可干。又如经济斗争原本是各工会自由行动,今则有经济斗争委员会以管理之。从前各工会各自组织纠察队,今则逐渐改编为统一的自卫队,有自卫队委员会以指挥之。此外又有罢工基金之筹集,劳动大学之筹备,工人剧社

之设置。工会是谋得及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机关,现在各工会皆明白此一重要意义,而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对象,去努力奋斗了,所以工作日趋于具体化。

第五,群众革命化了——如统一工会运动。去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原邀请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共同发起筹备,实行联合。及至开会,广东总工会代表故意攻击机器工会,机器工会遂借口退出,广东总工会亦相继退出。这一幕滑稽剧,明眼人自然一眼看穿。不过工人阶级联合的重要,已影响到下层群众,所以广东总工会尽管退出大会,而其属下最大之玉石工会不愿退出,随后脱离广东总工会加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群众不再受腐败领袖之欺骗,表示群众革命化。又如陈森事件。陈森前年主使杀死面粉工会工友三命,经年未决,去年七月又帮助东家杀死牙擦抵扫工友二命,其凶横可知。然而政府又不予追究,下层群众皆愤不可遏,相率为大规模之请愿运动,再接再厉。这又表示什么呢?表示要铲除工贼及东家工会,表示群众革命化。

末了,我们要讲的,广州职工运动虽有进步,然而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幼稚的毛病。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去年在一个急遽发展之进程中,差不多增加十万人,所谓河出龙门,一泻汪洋,小有冲决,在所难免;又何况总机关指导的人有限,那能管理得各方周全,一罅不漏。即工人中有小部分发生幼稚毛病,亦是情理之常。譬如说,辛亥革命成功那一年,各省有不少的革命党员,乱七八糟的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革命党不好。同理,工人中即有小部分发生幼稚毛病,我们亦不能说整个工人阶级不好,或说工会不好。这里,我们还要补足一句,广州工人中小部分幼稚毛

病虽所不免 ;然而在大体上说起来 ,广州工人确实走上了轨道 ,进步得多 ,是好的。

七、怎样解决工潮？

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

我们在未说怎样解决工潮以前 ,把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先行介绍一番 ,或者是于解决工潮有很大帮助的。兹不嫌累赘 ,择其重要者 ,摘录一下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云 :

“中国以内 ,自北至南 ,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 ,贫乏之农夫 ,劳苦之工人 ,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 ,与所感之痛苦 ,类皆相同 ,其要求解放之情 ,至为迫切 ,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 ,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 ,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 ,然后可以决胜 ,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 ,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 ,以全力助其开展 ,辅助其经济组织 ,使日趋于发达 ,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 ;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 ,相与为不断之努力 ,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为反帝国主义与军阀 ,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 ,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 ,质言之 ,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 ,亦即农夫工人自身而奋斗也。”

又云 :

“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工人的政纲：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运动决议案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规定：

“（一）制定劳动法。

（二）主张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

（三）最低工资之制定。

（四）保护童工女工，禁止十四岁以下之儿童作工。并制定学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内，应休息六十日，并照给工资。

（五）改良工场卫生，设置劳动保险。

（六）在法律上，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

（七）主张不以资产及知识为限制之普通选举。

（八）厉行工人教育，补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置。

（九）切实赞助工人生产的消费的合作事业。

（十）取消包工制。

（十一）例假休息照给工资。

为求上列条件之实现,凡本党参加工人运动之党员皆应切实负宣传之责,本党指挥下之政府更应渐次实行。在本党政府之下,得设由工人代表参加之检查机关,检查上列条件之执行。倘党政府下之企业机关,对于上列条件之执行或有所违背时,本党有时应立于工人群众利益方面,纠正其错误,不应因其措施之失当,而不顾工人群众之利益。”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议案中其他关于劳工问题的主张:

见于宣言的:

“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

“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此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达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也。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见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的:

“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努力。”

去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最近政纲关于工人之规定:

因中国工业(非外人所办者)现状之落后,及其发展之

迟缓,由于中国在半殖民地状况,及大多数人之经济落后,所以就现在工业之可能范围内,应实行下列十条:

- (一)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采取
 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特别注重女工童工之保护。关于兵
 工厂及其他政府军用事业,并于军事有关之交通,须另
 定劳工待遇条例,以不妨国民革命运动为标准。
- (二)修正工会法,改善工会之组织,免除工会间之冲突。
- (三)限制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
- (四)例假休息,照给工资。
- (五)废除包工制。
- (六)制定劳动保险法,并设工人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及死
 亡保险机关。
- (七)设劳资仲裁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之冲突,务求满足
 工人之正当要求,特别注重规定适合之工资。
- (八)改良工人住居,并注重其卫生。
- (九)设立劳工补习学校及工人子弟学校,以增进工人普通
 知识及职业技能。
- (十)奖励并援助工人消费合作社。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孙大元帅公布之工会条例,共二十一条,亦极重要,兹撮其十大要点开列于后:

- (一)承认工会与雇主团体立于对等之地位。(第三条)
- (二)承认工会以言论出版及办理教育事业之自由。(第四
 条)
- (三)承认工会对雇主之团体契约权。(第十条第三款)
- (四)承认工会对雇主争执事件发生时,有要求雇主开联席

会议仲裁之权,并得请求主管行政官厅派员调查及仲裁。(第十条第十款)

(五)承认工会之罢工权。(第十四条)

(六)承认工会对雇主方面有参与规定工作时间,及改良工作状况与工场卫生之权。(第十五条)

(七)行政官厅对于公用事业之雇主或工人间冲突,只任调查及仲裁,不执行强制判决,以养成工会自动之能力。(第十六条)

(八)予工会以公共财产之保障。(第十七、十八条)

(九)特别声明于刑律及违警律中所禁止之聚众集会等条文,不得适用于工会法,以免法院警厅之比附而妨碍工会之进行。(第二十条)

(十)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但中国大部分之工业仍系手工业,故职业组织亦未绝对废止,以求事实上之适用。(第六条)

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

论理,政府既然是党治的政府,党的态度便是政府的态度,政府不能除党的态度以外另有他的态度,这就是说政府应该完全根据党的宣言与决议案做他行政的准绳;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做不执行党的宣言与决议案的挡箭牌。不然的话,党与政府态度两歧,这个政府就不能号称党治的政府,只不过是某人或某派的政府,与党是毫不相干了。

广东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请看下述的说话,不难推想

而知。有人说：“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不能就要求他们的经济利益。”有人说：“国民革命是为全民族利益的革命，工人不能只顾他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利益不能超过民族利益。”有人说：“党的宣言与决议案未实行的很多，工人不能单要求实现。”又有人说：“政府并不是不愿意兑现，因为事实上不能兑现。”好了这些话一来，党的宣言与决议案撕得粉碎了。

不过研究广东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我们亦不可用武断态度，一笔抹杀；应用历史头脑，分别来说。现在可以公开的讲，广东政府对工潮的态度，可说三月二十日是一个分水岭。上面所述这些怪议论在三月二十以前绝少听见的，三月二十以后才渐渐发生了，特别在国民政府北迁的前后，盛极一时。就是什么“社会恐慌说”，什么“罢工循环说”，都是在国民政府北迁的时候应运而生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分为三个时期：廖部长被刺到三月二十为一时期，此时政府确是站在工人方面；三月二十到国民政府北迁为一时期，此时政府似乎守了中立了；国民政府北迁以后为一时期，此时政府似乎连中立也不守，似乎不客气对于工潮用政治力量甚至有时还用军警力量加以取缔了。（虽说政府诸公不一定全体都是一致的态度）

如何说用政治力量取缔工潮呢？十二月六日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关于工人纠纷问题案：（一）不许工会擅自拘人；（二）厉行禁止持械游行；（三）工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封闭商店，东家方面，亦不得无故自行封闭工厂及商店；（四）工人不得向工厂及商店强取一切什物。又议决“关于拥护革命利益保障公共生活之安全，以下（一）军用品之制造事业，（二）金融事业，（三）交通事业，（四）与公共生活有直接关系之事业，

四种事业，发生工人纠纷时，仲裁委员会之裁判，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之。”

如何说用军警力量取缔工潮呢？军警机关今天一布告，明天一布告，以及公安局用保安队禁压工人罢工，甚至开枪伤人，乃有目共睹之事。

事实是如此，只要不是聋子瞎子绝不会疑心我们又在造谣。

如借口说：“工人太猛进了，不能不加以取缔。”我们就要问：是工人要求条件太猛进了吗？我们绝对否认，就是省政府委员甘乃光先生也说“大部分计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适合生活的标准者”，何猛进之有？如说是工人斗争形式太猛进了吗？不错，斗争形式似乎是太猛进了，但是工人们说：“皆为特殊环境所迫而成，更非工人之所愿为也。”“工人为保障罢工维持生计计。虽明是己所不愿为者亦不能不为之。”“如果政府有其他保障方法，则此类行为自可不致发生。”（皆见工代会致省政府书）这些话说得何等明白！三月二十日以前为什么工人斗争形式并不猛进呢？因那时政府对于工潮，诚恳指导，加意保护，故一切纠纷迎刃而解。三月二十日以后，工人要求条件仍与从前一样，仍未超过经济状况的限度，即是说仍为东家所能容许，为什么斗争形式忽然猛进了呢？因工人失其保障，不能不当于自卫，因罢工而间有拘人之举，封锁工厂或商店之举，搬迁货物往工会保留待罢工解决发还之举，追本溯源，难道可以完全由工人单独负其责任吗？

如借口说：“阶级斗争破坏了联合战线”。我们就要说，工人阶级所以为联合战线中的主要对象，只是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决不是大商资产阶级，因为大商资产阶级永远不会革命，而

且贩卖革命。事实具在，毋庸举例。即令与大商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也只是政治的，绝非经济的。经济上的联盟，只有第二国际黄色改良派如此主张，革命的国民党似乎应该鄙弃此种理论。工人阶级必须在经济上足以自存，政治上的联盟方有意义。所以不能以政治的联合战线，而反对工人经济的阶级斗争。一枝军队要他打仗，必须充分予以给养，工人阶级既被认为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岂可连仅够维持生存的给养反靳而不予之理。正经的说，工人改良生活运动，不仅不妨害国民革命，而且有利于国民革命。

如借口说：“工潮是共产党捣的鬼”。我们就要问：广州工人经济生活是否痛苦？如不痛苦，工人已经满足了，决不能由共产党煽动而成；如系痛苦，即无共产党，工人何尝不会自己起来。很显然的，广州工潮完全是由一种自然状态发生的；因为在物价增高百分之九十的生活状态中，所以潮流所趋，一发而不可遏，如将工潮归罪于共产党，未免太过恭维共产党了，这样，无异说共产党有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共产党真有此本领，不特不当推卸，而当引为荣誉。老实说，共产党在此广大绵延的潮流中，因其人手太少，正很惶愧未能尽其领导责任多多帮助工友呢。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除工人阶级利益外，无他自己的利益，对于工潮，自然毫无疑问站在工人方面，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共产党自信是工人阶级的良友在此，工人阶级相信共产党是他们的良友亦在此。我们还要说，在此半年斗争中，破坏罢工者既如是其凶猛，保障罢工者又如是其渺茫，工人为感情冲动，往往悲愤欲死，想采用激切手段，假使没有共产党从中解释维系，更不知要闹出如何大祸。共产党一方面要为工人利益着想，一

方面又要为革命后方着想，若还说共产党捣鬼，真难乎其为共产党矣。

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

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自然是希望完全依照国民党的宣言与决议案切实执行。今姑卑之毋高论，最低限度希望政府有下列几个态度：

（一）诚恳态度——政府有政府困难，工人阶级自应谅解。不过政府总得要将党的决议案那几项可以实行的先予实行，那几项不能实行的很恳切的向工人解释。在陈炯明时代，在刘杨时代，国民党实际上未能掌握政权，犹可推诿，今则不然。在今日若是虚伪的架辞搪塞，那末徒然引起工人群众之怀疑或失望，于政府有何好处？广东政府简直可说是工人阶级与刘杨诸逆及香港帝国主义血肉相搏得来的政府；他们自己用血肉相搏得来的政府岂有不爱戴与拥护之理？政府如有困难，工人必然乐于谅解，如邮务工人以并未得到要求条件而复工，银行店员以极大让步而解决，便是明证。老实说，现在的问题倒不是工人能否谅解政府困难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仍然信任工人的问题。假使政府仍然信任他们是“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民族革命运动中之领导者”；“国民革命主力军”，决不是“反革命”；假使政府不因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及反共产派所造之谣言所惑而疑惧工人有推倒政府的阴谋（如国民政府北迁后，有人造出“劳工专政”“克伦斯基政府”的谰言，而党报竟以之作成社论，危言耸听。潮州惠州还制造“打倒国民政府”的街贴，以实其罪），假使政府仍然诚

恳与工人合作,则政府与工人乃是一家,政府困难即是工人困难,何至不能谅解。

(二)审慎态度——不过,工人亦有工人的冤苦,政府亦应予以体察。老实说,工人脑筋是最实际的,他们决不作超过可能限度的幻想,只看他们决不敢依照国民党决议案所许可的提出条件,而只提出目前切身利害的最低条件,便可知了。工人经济生活实在太困苦了,改善生活实乃万分迫切。为了养活一身,养活一家,而提出要求,以致于罢工,并因罢工而有切激举动,本是人情之常,应该加以怜悯,不应加以仇视。官厅往往听东家一面之词,动不动以“扰乱社会秩序”“危及北伐后方”为言,或以布告恫吓,或竟武力从事。大禹治水,其要诀在“疏”之一字,疏则通,壅则溃。如不此之务,即使工人慑于威力而归于屈服,何能算是根本解决。老实说,事实上何曾是工人慑于威力,只不过因在国民政府之下,投鼠忌器,不得不隐忍退让。所以政府办理工潮,第一须廉得其情,第二须就事论事,既不可敷衍颟顸,亦不宜鲁莽灭裂。

(三)公道态度——现在仿佛有人这样说:“工人压迫商人,工人是压迫阶级,商人是被压迫阶级”。哈哈!笑话!工人仅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并未根本推翻旧有社会经济制度,旧有社会经济制度既然存在,则雇佣劳动关系亦依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存在一天,试问是谁压迫谁?如说罢工为压迫东家吗?不错,罢工的本身是一种压迫行为(虽说是和平的),然而东家不善意磋商或诚意接受工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除罢工外,又有何法。世界各国几曾见资本家仁爱而自动的给予工人利益,何尝不是因罢工抵制而被动的容纳工人条件。如说拘人为压迫东家吗?

不错,有拘人这一事实,但是所拘捕的是破坏罢工之走狗工贼,至于拘捕东家,乃绝无而仅有。我们要说在此一年中,工人因工潮而毙命者何止数十人,不是因东家雇买工贼而杀死,就是因东家勾结民团而杀死。大凡社会心理,东家被拘,则奔走骇惊,义愤填膺,如工人被杀,好似当街踏死几个蝼蚁,大家就漠然无动于心了。东家与工人生命价值之悬殊如此,岂得谓平?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真是“数千年于兹”了,今日仅仅起来要求改善生活,难道还不应该。所以政府办理工潮,应该力持公道。

(四)敏捷态度——为什么要提出敏捷两字呢?因为事实上因官厅办理不敏捷,而工潮愈益纠纷。工人提出要求的手续,一方面通知东家,一方面请求农工厅主持公道,提出要求若干日,方行罢工。当刘纪文做农工厅长的时代,简直置之不理,当他下任交卸之时,移下公事至一千余百件之多,岂非骇人听闻之事。刘纪文袒庇东家,犹其余事。官厅办事如此玩忽,又何怪工潮之多,斗争之烈。所以政府办理工潮,应该敏捷从事。

解决工潮的方法

解决工潮的方法,重要的有下面几项:

(一)统一工会运动——应按照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公布条例,只准工人组织工会,绝对禁止东家或工贼组织工会。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如手工业可酌用职业组织。各工会应就其性质相同或相近者实行组织联合会。地方总组织应合并为一个。不论何党何派均应组织在一起,绝对不准分裂。如此则工会纠纷可以解决。

(二)规定加薪标准——工人加薪以物价指数或生活指数为标准，由政府明令公布，物价增加时，工人工资随着照加，作为一定原则；如有某厂或某行东家不遵照执行者，得由政府强制执行之。如此则劳资纠纷可以解决。

(三)开发实业救济失业——首须积极进行黄埔开埠及粤汉铁路延长两种工作。每月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以资提倡。现在广东财政收入超过一千万元，每月五十万，并不为多，如此则失业问题亦即工潮总问题可以解决。

八、工人阶级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

广东工友们！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仅仅只是改良生活运动；分析起来，只是为了“经济改善”“职业保障”“生命安全”而奋斗。我们为了生存权与劳动权而奋斗，谁说不应该。我们并不是好事，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付了若干的牺牲代价。可见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

但是，工友们：我们在过去受的教训不少了。我们不应忘去过去的教训，应由过去教训之中决定我们今后的努力。我们今后怎样努力呢？

巩固自身组织

第一,巩固自身组织——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自己要大胆承认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补救这些缺点,则有下列四项:

A 工会组织统一——工会数目多并不是好现象,要工会数目少而会员数目多才是好现象。苏俄六百万工人只有工会二十三个。我们广州,仅就工人代表大会来说,人数只得十九万,而工会竟至二百多个之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尚未完全一致团结。我们须就其产业相同或职业相近者组织联合会或总工会,如运输业联合会,粮食业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之类。须在一年之内将所有工会逐渐组织联合会统一起来。再者,地方总组织只应有一个。广州显然有三个:(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二)广东总工会;(三)机器工会。虽然广东总工会与机器工会有些领袖不愿统一,然而他们工会所属下的群众一定是愿统一的。我们须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统一的成功。

B 经济斗争统一——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经济斗争大都是各自为战,有许多是未先行呈报工代会经济斗争委员会便向对方提出的;或未经过工代会经济斗争委员会决定便罢工的。要知道:此种各自为战的方法会使我们遭受许多不必要而且不经济的牺牲,如率尔罢工而无粮食准备,或罢工太久而接济不来,或孤军奋斗而救援不至,均使我们工友感到意外的困苦。这是我们已往的经验。要知道虽然是小小一个经济斗争,亦好似作战一样,必须有种种“杀敌致果”的战术。战术好,士卒无大牺牲,子弹无多损失,依然可以得胜利。所以我们必得要统一在

经济斗争委员会指导之下，然后才能免除这些不必要而且不经济的牺牲。

C .武装指挥统一——武装自卫是工人的权利。广州工人武装表面上有军衣军帽，实际上无一枪一弹。各工会纠察队都是自然发生，正因自然发生而指挥就不容易完全统一。后来改为自卫队算是统一了，然而各工会仍另有纠察队或调查队直辖本工会不属工代会。要知道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一致与集中。所以各工会纠察队调查队均应一律改为自卫队，而且统一在自卫队委员会指导之下，受统一的训练与指挥。然后才能彼此互助，实行自卫。

D .宣传教育统一——我们广州工人从前简直可说没有宣传教育，即有亦系无计划无系统的宣传教育。我们要知“智识即权利”，智识极可宝贵。我们要革命，如无革命知识便无革命行动。何况工人阶级既被公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如不提高革命知识，何能领导革命。宣传教育为工人所不可一日缺乏之事，所以我们应即组织宣传教育委员会，有统一的计划，扩充各工会的宣传教育，一致发展。

上述四端，如能努力做到，则自身组织自能巩固。只有自身组织巩固，然后才能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取得最后胜利。

拥护中国国民党

第二，拥护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固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即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党，亦即各阶级政治联盟的党，这个党就是中国

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是工人阶级有份的政党。革命运动不能没有革命的党，如没有革命的党站在领袖地位，指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以工人阶级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应该绝对拥护国民党。广州工友们在过去有时为受政治压迫或军警压迫往往动了感情，忘了理智，有的对国民党表示失望，有的甚至还激而出于焚毁党证。工友们！这种倾向和行动，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即使行政官吏有时违反党的宣言与决议而对人民压迫，这只是他个人的不肖，与整个的国民党无干。国民党党员包含有各阶级的成分，自然包含有各阶级的意识，有些党员代表资产阶级而右倾或反动，这是不足为怪的。国民党决不是那一个人那一派人或那一阶级的专利品，而是大家有份的，只要你是中华民国国籍而又是决心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都有份。所以我们不应存着“国民党是人家的”的观念，而应该认定“国民党是大家的”。所有工人应该都加入国民党，或以整个的工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员的行政官吏如有违反党的宣言与决议时，我们可以向高级党部提出控诉，要求惩办。我们应该站在国民党内去与他们奋斗，不应该站在国民党外对他们干骂。要使国民党永远左倾永远不腐化，决不是消极离开所能奏效，而必须积极加入方能保障。只有加入国民党内去占多数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左派同盟，以打击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的右派势力。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工友们！大家起来，加入国民党，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争取革命领导权

第三,争取革命领导权——领导与领袖应有分别,在国民革命中,领袖这个革命者自然是国民党,好似总司令;领导各阶级上前线与敌人决斗者乃是无产阶级,好似总指挥。中国革命由“五卅”起直到现在,无产阶级都是领导者,这是稍有常识的人不能否认的,亦是国民党宣言所确定的。但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必然逼迫帝国主义放弃专门利用封建军阀的政策而改为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一政策必然指使资产阶级钻入革命战线中而与无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要建立资本主义,必然仰仗帝国主义资本之协助,结果与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革命。所以领导权如果被资产阶级抓去,则革命便是宣布死刑。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用什么方法能够争得此领导,就是那个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那末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领导当然也是归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就是争取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应该结成坚固不拔的联合战线。其策略应该如下:

A 对农民——在西欧农民有被资产阶级拉去的可能,因为资产阶级为工业发展必须破坏中古的农村经济,所以资产阶级往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阶级。而在中国则不然,所谓资产阶级大都是由地主变来而兼地主,或成了资本家后又多买土地兼作

地主。这样必对农民剥削，农民与资产阶级利益是冲突的，故资产阶级决无拉住农民的可能。农民与工人利益绝对一致。农民占人口三万五千万，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广大的农民群众方能保障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对于农民解放斗争，应该予以最高之同情与援助。

B. 对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还不够脱离帝国主义，即中国工业资本不能脱离商业资本；中国资产阶级半数 是买办阶级，而与都市中小商人冲突，所以不能取得中小商人。无产阶级虽然也与中小商人有冲突，但没有资产阶级对他那样大。假使我们有好的策略，亦容易取得他们。其实，自工人运动发展以后，店员运动接踵而起，与中小商人冲突最厉害的还是店员。所以店员除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以外，对于用人权不宜绝对加以限制，但对于店员职业需切实加以保障，这样与中小商人冲突是可以减低的。

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

第四，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一点尤其重要了。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权绝对不能存在，就世界观点说，世界资本主义已到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已在破坏了，无论那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在革命之后发展资本主义。就中国观点说，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大过资产阶级力量，绝对不容许中国有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存在，即一时实现不旋踵亦必崩溃。况且中

国革命的特点即在根本铲除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与特权。如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使资本主义发展,这不是革命的前途,而是反革命的前途。因为这个前途实现,就是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稳定,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延续下去,即是使帝国主义能够继续其压迫与剥削,施行其反动,巩固暂时稳定期中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政权如果实现,则中国民族只不过从帝国主义武力干涉政策转变到道威斯计划之下讨生活罢了,中国何能独立自由,中国民族何能完全解放。所以这是反革命的前途,而非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前途,既绝不是纯资产阶级政权,现时亦不是纯无产阶级政权,他有他自己的第三个形式。第三种形式政权是什么呢?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

工友们!我们想想,我们所负的使命何等重大!改良生活运动只不过是我们的初步要求,我们是革命的主要势力,我们须尽所负的使命以完成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但是,工友们!我们要知道胜利要靠努力得来。譬如树上的果子,累累然挂在上边,这些果子绝不会端端正正落在我们的口里。我们要想果

子吃，必须一起上树去摘，或用竹杆去敲，这就是努力。想果子吃尚且如是，要工人阶级得到解放，更非大大努力不可。工友们！我们高呼：

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

向共产国际第六次 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建议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九日)

主席团：

我有下列的建议，请付讨论。

(一)

在苏联方面：

- 1 开办一大规模之中国字印刷所。
(闻已筹办购买,但不知规模大不大,不大则请交涉添钱,务求扩大。)
- 2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年国际”各机关杂志,务须译成中文,按期印出,输送回国。
- 3 初步组织一翻译委员会,翻译马克思全集与列宁全集。
(凡有编译能力而国内不需要他工作者,在莫者留下,在国内者调来,如李季这一类人。)
- 4 出一介绍国际政治经济消息的月刊(或季刊),其性质比较灰色,可以在国内公开发行。由此间编样,寄归国内印刷发行。
- 5 东方部附设之中国问题研究会,不知成绩如何,我意:此会的作用,不仅完全限于只供给东方部之材料,而应带有

所谓“国史编纂处”的性质,(这句话不可以辞害意。)至少须搜集下列诸问题之材料及整理,或编纂之。计开:——

- A 中国革命运动史
- B 中国共产党史
- C 中国职工运动史
- D 中国农民运动史
- E 帝国主义与中国
- F 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
- G 中国农村经济
- H 其他部分的专门问题(如关税制度,租税制度,中国军队之类)

此会可网罗在莫同志加入之,如吴玉章林祖涵徐特立等皆可加入。

(二)

在国内方面

- 1 必须立即恢复《布尔塞维克》,为党的政治主张发布机关,但文字须力求浅显,能使工人看得懂;篇幅可以减少。
- 2 出一党报,为党内教育及讨论机关。中央政治通讯当然仍须保存,为发布中央及各省重要文件之用。
- 3 广东,北方,两湖,应有地方性的政治刊物。
- 4 中华全国总工会必须恢复《中国工人》,为比较理论性及记载有系统之职工运动消息机关。各地则出工人小读物。

邓中夏

1928年8月19日

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

(一九二八年)

自从去年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厉行世界所无之白色恐怖，中国职工运动由公开一变而为秘密的状况。国民党对付工人阶级的策略，第一，逮捕屠杀工会领袖及共产党员；第二，封闭工会会所，禁止工人集会；第三，如认为工人不易镇压时，则改组革命工会，或仍用旧有名称而以其走狗工贼充当职员（如湖北广东）；或更改旧有名称将产业组织变为职业组织（如上海之工会统一委员会，工人总会等），破坏工人阶级势力之集中。中国工人阶级在此种严重压迫与屠杀之下，牺牲者不下数万人，或被枪毙，或被梟首，或被腰斩，或剖目剖心以死，或用开水烫胸以死，种种原始时代之野蛮刑法，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仍不为这些惨酷刑法所慑伏，在广东而有四月二十三日之政治总罢工，接续而有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纪念之示威运动，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纪念之示威运动，至十一月有夺回广东工人代表会会所之血战，有杀海员工会改组委员之血战，有包围汪精卫公馆之斗争，以至于后来举行震惊东亚之广州暴动。在武汉而有八月二日之政治总罢工，兵工厂罢工继续到十日以上，接续而有十一月震寰纱厂罢工杀死改组委员七人之事，京汉粤汉两路索薪之事，武昌汉口两处劫牢反狱释放政治犯及工会领袖之事。在上海而有

反统运动,八月小沙渡六个纱厂之同盟罢工,十一月杨树浦五个纱厂之同盟罢工,十二月公共租界电车之大罢工。各地罢工者,难以计数。他们的要求,大要不外:(一)要求启封革命工会,故有杀改组委员之行动;(二)要求恢复所谓“共产时代”之劳资条件;(三)要求发欠薪(有欠薪十余月者,少亦三四个月);(四)要求发现洋(纸币跌价,甚至有时买不到东西);(五)反对开除工人(因资本家多乘机任用女工童工以代替成年男工);反对强迫仲裁(国民党反动后多设劳资仲裁机关)。

广州暴动以后,工人阶级势力的发展同时教训了反动阶级势力之联合。如上海中日英纱业联合会,长江中外船业联合会,则中外资本家之联合会也。九省商会大会,议决取消所谓共产时代之劳资条件,并决定资方用人自由权,则中国资本家之联合会也。蒋桂战争之酝酿一变而为缓和,则新军阀间之联合会也。上海工部局表示与国民党合作,解决华董问题,征集惩治共匪奖金,则帝国主义与中国新军阀资本家之联合会也。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决不能消灭,然而他们对于压迫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确能一致。因反动势力进攻,而中国工人阶级更处于更困难的地位。

中国工人阶级自广州暴动以后虽受了第二次的重大挫败,但并未减少他们的锐气,如最近上海丝厂之大罢工,浦东燮昌火柴厂之罢工,又接踵而起,皆可证明。

中国工人阶级现在仍未脱离白色恐怖的苦境,他们的组织方式,罢工策略,都有新的表现。革命工会的秘密存在,在上海仍有四五万人,在广东已恢复三四千人,香港新发展二三千人,其余各地有数千数百不等。他们的组织范围确缩小了,然

而他们应用各种形式以团结工人，或投入黄色工会之下以争取群众，其政治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工厂委员会之运用，在中国已逐渐萌芽，将来可断言必收绝大效果。

罢工策略，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数月来可说尚多一仍旧贯，所以叠受挫折或失败，在斗争经验之中已教训他们改用新的方法，现在亦逐渐萌芽了。

中国工人阶级有他数年来斗争所集聚的伟大力量，决不是白色恐怖所能完全消灭的，他们虽受了几次重大伤创，以他们的丰富的经验是可以很快的医治好的。何况有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共产党，势力仍然存在，他的党员现在比国民党未反动以前增加一倍。他们日日在前线上与广大的工人群众共同奋斗。何况有新开展的同盟者——农民，在全国各地特别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有广大的农民实行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没收地主土地，为城市工人的绝大援助。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终于要得着最后胜利的。

中国工人阶级在此奋争苦斗之中，希望世界无产阶级予以广大的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可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就是：

“取下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

这两句话的释意，就是“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亲爱的兄弟们！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完成他们的伟大任务呵！

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提纲

(关于职工会新策略的讨论)

(一九二九年)

中国职工运动

一 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

1 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职工运动经过三个时期: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为第一期,此时工人阶级一般的陷于消沉状态;从五月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到十月为第二期,此时工人阶级已有局部的冲破消沉状态,进而为防御战;从十月邮务罢工以后到现在为第三期,邮务罢工影响于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打破从前消沉状态,斗争发展的形势,由手工业店员的斗争逐渐发展到产业工人方面,由上海一地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亦由保守的逐次转到反攻的形势,总之,阶级斗争已逐渐剧烈起来,消沉状态应该过去了。

2 中国全国统计没有,我们所知道的仅只上海一地的统计。一九二八年为大革命失败后之第一年,上海罢工人数共二十一万四千余人(十二月份尚不在内),比之一九二六年二十万零二千余人多一万二千,比之一九二七年二十三万余人只少一万六

千(这两年的统计参加暴动的人数当然没有计算在内)。由此可以证明中国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年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未停止——自然还是自发的经济斗争的性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正当中国旧历年关)上海工人斗争发展尤为风起云涌,此种工潮很迅速的波及各地,特别是北方各地最近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发生斗争,有名的开滦五矿又发生了罢工。汉口有反日的水案罢工。就是在最反动最残酷统治的广州亦发生规模较小的工人斗争或罢工。

3. 最近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的联盟统治发生破裂,蒋桂战争虽已告终,冯蒋冲突随之而起,中国从此仍与从前北洋军阀时代一样将发生时止时起缠绵不绝的分割互战,工人阶级在反动统治分崩离析的罅隙中,有更发展的可能。

二 国民党的工人政策

4. 国民党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直到现在,对于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政策,仍然是以白色恐怖为其中心。对于共产党员以及工人的积极分子仍然是极残酷加以肉体的消灭。白色恐怖在中国现在依然还未减轻。

5. 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叛变以后,将所有所谓“共产工会”完全取消而指派其“忠实同志”官僚流氓另组白色工会。这种白色工会虽在国民党各派军阀势力范围之内而稍异其形式,然而其为箝制工人阶级的作用则一。白色工会完全建筑在军事政治机关之上,完全依靠铁血镇压工人使之不敢反抗,完全系警察工会性质。直到后来所谓黄色工会兴起,而白色工会方才逐渐减少或取消。

6.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自去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工人阶级反抗的情绪的表现逐渐增高, 在反革命的国民党自己亦知道完全依靠白色工会控制工人阶级是不够的, 而须要利用另一种工具, 避去四目相向的直接冲突, 于是黄色工会便济白色工会之穷而起了。黄色工会便成了国民党控制工人阶级之替代机关。当然白色工会仍有多数存在。

7. 国民党一叛变, 首先便取消所谓“共产时代”工人阶级用血肉取得的劳动条件。直到现在, 中外资本依旧继续联合向工人阶级进攻, 工人生活近来变得更坏: 工资一般的降低; 工作时间的加长; 工作的加重; 待遇的恶化; 失业恐慌的加厉。国民党工商部所拟的劳动法草案, 其作用只是敷衍国际联盟劳工局长多玛(帝国主义的走狗)到华之“考查”, 与在报上登载维持工人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而已, 实际到现在还未正式公布(如照原案我们可断言国民党永远不会公布)。至于分红制亦只在报上讨论讨论, 制造一些空气, 以迷惑工人, 至今亦未实行。国民党唯一实行的是强迫劳资仲裁。他们的市政府有一社会局专门干这件事。在劳资仲裁时, 除掉社会局的代表以外, 还有当地的警备司令部, 国民党市党部的代表, 其余则为劳资双方代表。这种的仲裁毫无疑问只是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但反革命的国民党亦很狡猾, 在有些时候, 如果是极小范围的罢工, 极低度的要求, 他们也往往断归工人赢, 以眩惑工人的视听。最可恶的, 是一切罢工如不先经过他们的仲裁是不允许的(但多数罢工, 工人都不遵守他们的约束而勇敢地先行罢工)。国民党什么改良政策也未实行, 只有一种不经常的“市惠政策”。如蒋介石有时坐一次火车, 颁赏一两万元, 冯玉祥办几个工人浴堂。这些小恩小惠只

是反革命派企图取得工人对于他们个人的信仰。自然国民党改良口号的宣传极其厉害,特别是国民党在野的一派——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用革命(?)的辞句,更使落后的工人有不少的幻想。

8 国民党无所谓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行,只有民族改良主义,如他们所宣传的“为民族的利益应牺牲阶级的利益”、“为爱国必须努力增加生产”、“在建设时期不准罢工和怠工”、“应刻苦耐劳的来富强中国为子孙谋福利”等等理论。他们这些理论是以铁血作后盾而强迫工人阶级信仰的。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现在也已逐渐削弱了。

三 黄色工会的兴起

9 首先我们须弄清楚的,就是改良主义在中国有没有经济的基础?我们的答案是没有。退一万步言,即有也异常之微弱。因为中国本身是一半殖民地国家,第一,帝国主义为榨取更多的额外利润不愿对工人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第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能力太弱,只有向工人有更多的剥削方能抵补外资的压迫;第三,贵族工人只有极少数分子而未形成什么阶层,所以改良主义不能象在欧美各国一样种下深根。机会主义者他们是不愿了解这一个真理。

10 因此,中国黄色工会的基础自然是极其微弱。中国早年本有黄色工会的兴起,如一九二五年上海工团联合会,但皆经不起共产党的打击便烟消雾散。广东的机器工会原系各工业部门的机器匠的职业组合,因广东工业不发达,机器工人失业者太多,不加入该会便不能维持或找得其工作(该会的主持者全系老

机器匠师和小机器厂老板) , 因有此特殊原因 , 故该会能够存在。虽然如此 , 该会早年虽蒙上改良面目 , 但后来仍须采用武力 (所谓体育队 , 皆有武装 , 经常约有五六百人) 来统治会员使不敢反抗。实际上广东机器工会系一半改良派半法西斯的混合性的组织。

11 . 所谓黄色工会在去年五月突然兴起的原因 , 显然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 , 显然只是反革命派以济白色工会之穷而需要的御用工具。在起初虽然是由工人阶级中之贵族分子——职员 , 工头——自动的组织起来的 , (在大革命时这些贵族分子虽包括在内 , 但无被选举权 , 工会实权皆在最低级的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的手里。) 但不久便很快的变为国民党的附属机关了。所谓黄色工会开始发生于上海 , 即所谓七大工会 : 包括邮务工会 ,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印刷所两工会 , 英美烟工厂工会 , 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 , 华商电气工会 , 报界工会。名义上这七个工会共约四万余人。北方一带国民党在野的一派——改组派——和被共产党抛弃的知识分子今年也组织了不少的所谓黄色工会。这些黄色工会在起初确有改良派的倾向 ; 因在白色恐怖之下 , 工人需要斗争 , 又对此等可以合法存在的工会起了不小的幻想 , 所以他在群众中曾有一度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影响 , 在上海到去年邮务罢工已达到最高峰 , 然而因它终不能离国民党而独立存在 , (领袖当然要是国民党员) 必须受国民党的统制约束指导方能存在 , 不久便变为半黄半白的性质 , 于是他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也逐渐减弱了 , 自然还未曾消灭。在北方一带的黄色工会虽后起 , 其影响也很快的减弱。

12 所谓黄色工会目前的主要作用 , 是如何帮忙国民党消灭

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如工人发生罢工要求时,他们是想尽方法抑制或延缓罢工,如用请愿式或仲裁式代替罢工。如工人要求罢工万不能阻止或已自发发动时,他们便出而领导,防御共产党在罢工中的作用,往往用这样的方式,罢工宣言中总要加上一段骂共产党的话,大意是说:“可恶的共产党,你休想来捣乱,你要知道我们是受三民主义领导的独立(?)工会”。在罢工中如见积极分子则以共产党头衔相加,恐吓其不能动。拒绝外来的工会援助,说这是共产党要来捣乱。罢工数日不得解决时,他们便散佈谣言,说资本家如何强硬,罢工经费不够了,总之一切使工人灰心丧气的话无不广佈。于是由此种种鬼把戏将罢工引导到妥协或失败的道路。有时他们与国民党所谓党部连同一气利用罢工向资本家敲竹杠,如竹杠不能敲到手时,则很热烈鼓动工人坚持罢工以为与资本家暗中讲价地步。竹杠一到手,自然是不顾工人的死活,强迫复工。如工人不服,则用开全体大会名义,召集工人到场,用军警押解复工。不属于他们工会的别业工人罢工,他们亦闻风而往,表面用援助的假面具,实际亦即要争得领导,抵制共产党的领导,必致使罢工妥协和失败而后已。

13 中国的所谓黄色工会,不要因为我们用了“黄色”字样而误认为与欧美的改良工会性质相同。也不要误认为群众与他们的关系与欧美改良工会相同,要知道中国的所谓黄色工会,在名义上全厂工人都是他们的会员,因为会费是由资本家发工钱时按名扣除,工人不愿做他的会员也是会员了。如我们不认清这一特点,那么在估计时便会发生大错。

四 赤色工会的困难

14. 赤色工会究竟有多少会员至今还无精确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情形，上海和香港两地比较有点基础。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大概约一万人，能影响并能动员的群众大概约四五万人，但大半还是店员，纱厂工人还只有几厂。香港为大革命失败之后新发展的地方，赤色工会会员虽不过二千余人，但所有香港几个大工厂（特别是造船厂）尚能平均发展，并且在此一年半中各厂赤色工会都曾领导群众作日常的斗争。其余则天津有一千余人的赤色工会会员。满洲亦有新发展。武汉、广州赤色工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有一时期武汉恢复到三万余人，广州恢复到二千余人，但均遭破坏，以后屡复屡破，至今还未恢复。其他各省如山东、河南、浙江、云南等省亦有赤色工会的日常工作。海员赤色工会在远洋沿海内河轮船约四五十艘有相当的连系。铁路赤色工会与各路有连系的仅只几数处，如唐山天津。矿山则开滦煤矿有工作；安源煤矿水口山铅矿完全破获；大冶铁矿，淄川博山煤矿，焦作煤矿工作都停止了；新发展的有满洲之抚顺煤矿和云南之个旧锡矿。

1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赤色工会的力量是如何的微弱。赤色工会不能建立与发展的原因，在客观上自然是白色恐怖太厉害，但在主观上则由于我们的党对于赤色工会工作不充分。实际说来，在大革命极盛时期我们的革命工会会员虽有二百七十万，但是都未经过严密的组织，一旦由公开转到地下，一经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便完全瓦解了。在转变期中，我们党没有很快的找得新的组织路线，等到找得了，又未曾充分的坚决的有耐性的

去执行,这样赤色工会未能建立起来!

16 赤色工会现在因为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反革命的国民党宁可在工人要求上对工人有相当的让步,但绝不容许工人积极分子之存在,不是开除,便是逮捕。所有工人积极分子,经过一次斗争很难在该工厂中立足,因此赤色工会处于困难的境地。

五 党内对职工运动的错误

17. 去年六月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关于职工运动决定建立秘密的独立的赤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为赤色工会吸取广大工人群众之公开或半公开的机关;加紧在黄色工会下的群众中工作。这些决议我们的党始终是未能充分的很坚决的很正确的去执行。

18. 首先说在黄色工会中工作问题,党内确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幼稚病,拒绝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一种是右倾的机会主义,主张无条件的在黄色工会中工作,不另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说是怕黄色领袖骂我们分裂工会。现时虽前一种倾向已归消灭,而后一种倾向正有势力,且正在执行。其实在中国那样厉害的白色恐怖之下,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有许多怕加入共产党,但愿加入赤色工会,而且事实上他们往往自动的组织兄弟团姐妹团这一类暗中与黄色工会相对立的原始组织。所以在黄色工会亦应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使党的势力加大,然后才能吸住广大的群众成功黄色工会中革命的反派。但中国绝不能象欧洲一样可以成立公开的革命的反派,所以革命的反派一开始便须有秘密的赤色工会为之范畴,且便于教育与训练。

19. 其次说组织独立的赤色工会问题。在中国可说应该毫

无限制的执行。譬如上海，所谓黄色工会的名义会员不过四万人，赤色工会也不过一万人，上海纱厂工人和丝厂女工共约四十余万，其他如造船厂工人和金属厂工人建筑业工人等又不下二三十万，黄色工会一点影响没有，赤色工会也只极小的一部分。其他各大工业区大致与上海相仿。铁路工人二十万人，国民党只沪宁沪杭两路有点党部组织；矿山工人五十余万人，国民党还未过问。中国可说几乎全是无组织的工人。所以在任何工厂作坊中都应毫无限制的建立赤色工会。但这一点是未被我们党所充分注意的。

20.再其次说到工厂委员会问题。本来工厂委员会应用于中国，与苏联工厂委员会固异，就与中欧工厂委员会亦不相同。因为中国是一极端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工厂委员会的名称形式都不能一定，不必有一定章程，也不必有一定会所，也不必收纳会费。最主要的这个工厂委员会必须经过全厂工人群众的选举。这个工厂委员会应注意本工厂工人的日常要求及代表工人向厂方交涉，改善工人的日常生活。建立此项工厂委员会首先可由斗争委员会脱化而成。斗争委员会（如罢工委员会，索薪委员会等）系一临时性质，斗争一完，立即取消；工厂委员会系一永久性质，可随时召集全厂工人或分工作处召集工人举行几分钟的大会，但一到反动军警闻讯赶到时，这里已经散会了。这种工厂委员会不仅赤色工会下须建立，作为赤色工会吸取全体工人群众之公开半公开机关。就在黄色工会下尤须建立，用工会德谟克拉西的口号，自动建立，如某厂已有黄色工会，则建立工作处会议。我们的主要任务便在夺取这些组织的领导权，以与黄色工会相对立。但工厂委员会虽由党的大会决议被采用

为新组织路线，但到现在我们党在这一点还无什么成绩，有些地方甚至对此点还未了解其重要与意义。

21. 党内盲动主义的倾向（如强迫罢工，非群众的红色恐怖等）可说现在已经消灭，但等待主义合法主义的倾向却正伸张。在困难环境中对新策略即未充分的坚决的有耐性的去执行，同时又因不断遭受打击感觉无工作办法，于是遂发生等待主义合法主义等类的观念，自然在不少的斗争中，党是曾经很勇敢的很聪明的去领导，如去年年底上海法界水电罢工中党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22. 还有一些苦闷问题我们还未加以明确的解决，加占领黄色工会机关否？工会领袖加入国民党否？这一类的问题亦使得同志们犹豫不决。其实在黄色工会中工作，最主要的是夺取下层群众而不是占领上层机关，只有在某种条件之下（如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和将近崩溃的地方或革命群众确有卫护工会的极度热忱与力量的地方）我们方能占领上层机关。至于国民党强迫我们加入国民党，不加入便不准当工会职员，那么我们宁可不当工会职员，绝对不能加入国民党；这样，我们在群众中的信仰仍然存在，事情一来，群众仍然是需要我们的。

六 结 论

23 总结起来说，可作以下结论：

- 1 工人阶级消沉状态已经过去；
- 2 白色恐怖仍为反革命的国民党控制工人阶级的中心政策；
- 3 国民党并没实行什么社会改良主义。就是所谓民族社会

主义的影响亦逐渐削弱。

4 .所谓黄色工会实际系一种半黄半白工会，他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亦已逐渐降低，但并未消灭；

5 .赤色工会陷于困难的苦境；

6 .党对于职工运动的策略还有不少的错误，而未充分的坚决的正确的执行新策略，故赤色工会的成绩仍然无多大成绩可言。

7 但我们不能借口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基础之薄弱而拒绝在黄色工会中工作，恰恰相反，因为在此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即使反革命派有些小的市惠政策都要给一部分落后工人的幻想，所以更要使我们加紧在有群众的所谓黄色工会中工作去夺取其群众。

8 同时我们尤其不能有任何借口无条件的在所谓黄色工会工作，而不自己在黄色工会中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以造成坚强的革命的反对派；更其不能一心只注意于所谓黄色工会中工作，而不注意组织广大无组织的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市政等）要加紧独立组织，以巩固无产阶级之领导力量。其次是农业工人，亦须刻不容缓的从事组织，以领导农民加强无产阶级的厚援。

我以为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在此次大会后应专为此问题写一封信给中国党予以明确的指导。

24 .同志们！最后有一点可以告慰各位的，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政治的影响极大。我们现在唯一的大弱点就是没有将政治影响从组织上巩固起来。我们党虽幼稚，但我们必须以无限度的力量克服这一大弱点。中国第二次

大革命高潮之到来已经有许多征候指示我们所能一眼看到的远景。我们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我们有布尔塞维克的策略，我们相信能很迅速的纠正我们的错误，我们此后的职工运动将不致再蹈上次大革命时组织薄弱的覆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革命高潮再来可以取得稳固胜利的保障。

苏兆征同志传

(一九二九年)

一 早年生活

兆征同志，一八八五年生于广东之香山县。家为贫农，幼年便到海洋轮船中工作，先后作了二十多年，足迹走遍许多国家，为一有名的老海员。在二十多年被惨酷剥削的苦状中，自然容易锻炼阶级的极端坚强的革命意识。他作工二十多年中，亦有失业的时候，当他失业回到农村时，见农村中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对于农民之剥削与压迫，往往抱不平，鼓动农民从事反抗，后来有一次竟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入狱年余。

二 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中国海员中感受痛苦最大者有三：第一是工资薄。海员平均的工资大概在二十元上下，光是单身尚难为生，如有家属更困苦颠连了。第二是“洗马沙”制度即包工制。海员找工作必须贿赂“洗马沙”数十元或数百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每月工资须以十分之几报效“洗马沙”，因为轮船公司是同“洗马沙”约定，不如此则找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报效，“洗马沙”随时可以向轮船公司撤

换海员。第三是民族间的不平等。白色海员与有色海员做同样工作,但不能得同样工资。他们的工资比例,普通是十与二之比,至于其他的待遇更是悬殊。兆征同志身为二十多年的海员,感受此种痛苦特甚,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影响,更加强了他斗争的信念与决心。所以于一九二一年——二二年,他便纠合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如林伟民等,在海员中从事宣传与组织,不到数月,成效大著,海员工会虽经过许多困难,然终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得以成立,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海员工会成立后,便向轮船公司提出改良生活条件,一连提出三次,资方均不答应,海员工会乃声言如二十四小时内不答复,便罢工。资本家方面以为海员无力量,漠然视之;谁知果然不到二十四小时,凡到香港的轮船都罢工了。这就是一九二二年春赫赫有名的海员罢工。此时海员工会会长虽为陈炳生,但兆征同志是此次罢工最得力的中心人物,他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后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去职,兆征同志便代理会长。

罢工实现了,香港帝国主义政府马上派华民政务司到海员工会带半欺骗半威吓的劝告。华民政务司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兆征同志由群众中挺身而出高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兆征说完以后,群众和声如雷,华民政务司不得已毫无意思的只好请群众让路给他出去。

罢工的势力愈扩愈大了,到港一条船便罢一条。后来运输

工人（如起落载、煤炭、海陆理货等）都同情罢工了，再后全香港工人都同情罢工了，香港政府不得已有让步的意思，首先就利用中国轮船公司商人向海员谋和，中国商人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是同情的。这样好不好？中国轮船先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样照办。”海员代表中，竟有为中国商人这种甜言蜜语所动的。兆征见此危险，起来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中国商人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罢工一开始，便请中国商人替我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默然无所表示，今日向我们要求此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中国商人应该发扬中国人的国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的条件，早早解决。”这样才把千钧一发的危机挽救过来。

后来香港政府又利用中国绅士邀请海员谈判了。先是罢工开始不久，政府便把海员工会封闭，把工会招牌抢去，并架起大炮对住工会会所。此时海员罢工条件又增加先决条件数条，其中一条，便是恢复原有海员工会，送还工会招牌。所以中国绅士与海员代表谈判便提出两个问题，他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不是原来称的工会，而应改名，工会招牌不能送还，你们是知道的，这是与政府威信有关，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关于增加工资也可以的，但是你们是知道的，各船上的情形是不一样，最好你们先上工，我们大家从长商议，那船该加工资，那船该减，定出一个公平办法来。”海员代表中居然也有少数软化者，软化的原因，一是罢工已久，恐难支持，二是以为真的香港政府为威信所关，可难送回工会招牌，反正只要工会存在，改名亦无关宏旨。当时兆征毅然起来答复绅士说：“工会名称是一个字也不

能改，工会招牌必要送还。各船情形虽略有不同，然而工资太薄，不能维持生活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增加工资非马上签字不行，不能待以后从长商议。”因兆征同志这样的坚持，后来结果如何呢？香港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海员条件，（虽然有修改）而且恭恭敬敬的送还招牌。最有趣的而且最有声威的，是罢工胜利之后，海员群众与全香港工人群众二十万人，把香港街市挤得水泄不通，燃着爆竹，一致仰着头，呼着“海员工人万岁”口号，看着工会招牌徐徐的挂上去。

兆征同志那时便注意国际联合，所以海员罢工时，广州有苏俄通讯社，兆征每日必到该社请其将罢工消息传布于世界，并请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工人予以援助，他又听说法国有个《人道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所以他又用海员工会名义致电该报，请其将海员罢工的事件传达给全欧无产阶级，予以援助。而兆征同志此时虽还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他后来说：“我当时到处找共产党，总找不到手。”

三 加入共产党

兆征同志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即参加推翻清朝帝制运动。一九〇八年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他是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广东海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广东是国民党多年经营的地方，而且孙中山流亡海外时，因乡谊关系而与粤籍海员接触甚多，曾在海员中组织联义社群益社等团体，以救国相号召，孙中山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得此等团体购买军火的助力不少。兆征同志当然是这些团体中之一员。但是他与林

伟民等却与此等团体的领袖迥乎不同。我们只举一个事实便可了了了，当国民党得势于广东，在广州组织政府而与北庭对抗，联义社等海员领袖相率依草附木的到政府中钻营官职去了，兆征和伟民不仅鄙视这种钻营，甚至国民党政府知他们是海员中的健将，欲罗致之，予以官职，他们却掉头不顾，一心不离海员工作。

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并不是国民党发起的，而是兆征、伟民等觉悟分子发起的。罢工以后，国民党曾予以帮助，特别是陈炯明帮助尤多，大概帮助十万元上下。但陈炯明帮助海员，是企图利用海员帮助他倒孙中山的事业，而海员群众因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的主持与领导，是不曾上陈炯明这个当的。

一九二四年冬，北京发生政变，孙中山北上，号召开国民会议。那时段祺瑞则改国民会议为善后会议，不让真正民众团体参加。共产党的策略是由民众团体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时在一九二五年春），与段祺瑞对抗。兆征同志便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此会。在北京他正式加入共产党（林伟民同志比兆征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共产党团，一切行动完全依照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兆征同志曾由全总介绍在北方铁路及大工业区中进行数月工会工作。

由北京回广东以后，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于广州。此大会是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兆征同志在上海已与共产党中央商妥这个大会一切事情，故此次大会以兆征出力独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

际,并谋广州香港职工运动的统一。兆征同志被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而林伟民同志则被选为委员长。

四 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省港罢工

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此时兆征同志归返香港,未几余亦到港,乃共与杨殷同志等商讨香港罢工之策。香港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分子。兆征同志此时还只是一司理(即总务主任),但握有实权。香港的共产党员当时还不满十人,且多属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共产党员多几个,但多为知识分子,以我们的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万难实现。然而终不到两星期居然实现罢工。其主要原因,固然革命高潮的逼近,这座火山只须一点导火线,便可爆烈,然而亦因兆征同志平常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其时,刘杨战争刚平,李森、刘尔崧两同志等领导组织广州之沙面(即帝国主义的租界)工人罢工亦已成熟,故六月十九日两方同时并起。这就是震动全世界的省港罢工。

兆征同志当被举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罢工委员会组织与职权,实际上是当时革命的广东政府的最可靠的柱石。有隔日一开的八百余人之代表大会,有封锁香港的二千余人之纠察队,有法庭,有监狱,有法制局以惩处汉奸,有公共饭堂,有公共宿舍,有学校以供给工友学习,有检验货物处,有仇货拍卖处,有船支放行领证处(凡中外轮船来广州者皆须向罢工委员会呈报,须领得证书方可放行),有骑船队,(不拘中外轮船皆

派罢工工人骑船监视,不准驶到香港)以封锁香港和检查仇货,在这样的庞大的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万几。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

在此时间,海员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组织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又被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六年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便成为全国工人一致拥戴的领袖了。

五 代表共产党加入武汉国民政府

省港罢工不仅给香港帝国主义经济上一大打击,而且新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依赖这个罢工势力,剿平内部的反贼,统一了广东政权,抵制了外力侵略,发展了广东经济,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就在这个条件下能够聚集力量出师北伐。待出师北伐后,赖广东工人、两湖农民以及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官兵之力,连战皆捷,一战而下长沙,再战而克武汉,三战而收南昌,同时武汉与上海的工人革命火焰惊天动地到处轰发起来,上海工人及全体市民三次起义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武汉、九江的工人及市民则用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全国人民的斗争也如火如荼的高涨着。但国民党右派以蒋介石为首到南昌后而叛迹愈彰,于是武汉国民党左派而有所谓“护党运动”迁国民政府于武汉,添设农政劳工两部,而以共产党员为此两部部长。兆征同志便代表共产党为劳工部部长,一九

二七年春,兆征赴武汉就职。中华全国总工会亦由广东迁于武汉。后蒋介石自立政府于南京,与武汉政府对峙。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投降南京,正式提出“国共分家”,实行反动。

兆征同志在武汉时代,曾积极从事拥护工人利益的工作,那时震惊全世界的武汉工人运动,兆征同志是有计划的领导者。他在政治上曾不断的与武汉政府一般无耻的叛徒,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终为当时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政策所误,致未能挽此危局。兆征同志由于自己阶级的意识,不期然而然使他有违反机会主义的行动。当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员示威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电令到时,陈独秀并未以此电相示,只问兆征“形势如此,你意如何?”兆征则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便发宣言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群众反抗。”由此可见兆征同志意见完全与国际相合。当形势万分危急时,劳工部存款十万余元,兆征尽数发给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被国民党所攫取。最后,在武汉政府叛变时,武汉工人举行的政治总罢工,兆征同志主持之力是很大的。

六 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

兆征参加八七会议,中共中央改组,兆征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先是兆征在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虽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只是挂名,陈独秀等向来有这样一种观念,认定工人同志都是“政治能力薄弱”。兆征同志从八七会议后,便成为中国党的中心首领之一了。如果兆征在武汉时代便已不期然而然有违反机会主义路线的行动,那末,此

时更是反机会主义的急先锋了。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以党的使命来往沪汉之间,一无所畏,中国党的组织便在这种艰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维持起来。党内因坚决肃清机会主义而更加巩固了。兆征同志此时除党的工作以外,仍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还秘密开了一次全总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兆征主张采用工厂委员会的新组织路线,而与反对者怀疑者作了坚决的斗争。

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

东方第一个苏维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实现了。兆征同志便是这个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兆征虽未亲自指挥广州起义,但中央指导广州起义的总计划与训令,他是最积极讨论的。因此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社的主要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

八 沿太平洋的职工运动

一九一四年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到广东召集太平洋沿岸运输工人会议,兆征是参加的,从此他便与太平洋沿岸职工领袖发生接触。一九二七年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罗佐夫斯基亲身到汉口召集太平洋第一次职工会议,兆征同志是主席团委员之一,并被举为太平洋职工运动秘书处主席。秘书处设于上海。太平洋沿岸职工联合从此开始,苏兆征在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中的影响亦日益加深了。

九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开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的,他的价值是在于当大革命失败之后,总结过去几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示出党的当前主要任务,是在于夺取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兆征同志是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曾与右倾的观点和盲动的情绪作了激烈的斗争。兆征同志在此次大会中拥护国际正确路线屹然不稍动摇,言辞十分激切。因此右倾者说他有肝气病,实则兆征同志为了政治主张,故对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不稍宽假也。

十 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与共产国际大会

一九二八年春,兆征同志到莫斯科去参加当年四月的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与八月的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他在这两次大会上的贡献都是很多。他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主席团,并被举为两国际新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苏兆征成了世界革命有力的一员战士了。

兆征同志在苏联时,除莫斯科外,曾至列宁格勒和南俄,他到各处都受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大的小的工人集会,群众无有不欢喜他的。

兆征同志复又被举为农村工会国际的副委员长。

最后,兆征同志在莫斯科还参加了苏联全国总工会的第八次大会。他在这次大会上曾做过中国职工运动之报告,不幸这

就是他最后的留言。

十一 工作的风格

兆征同志的工作的风格，是每一革命战士之最好的模范。

一、勤劳——兆征同志一生都是勤劳，举省港罢工为例，那样长久的岁月，但他没有请过一次假。罢工开始的两三月，从早六时起至夜十二时是无片刻闲暇，而党团必到十二时以后方能开会，往往开到两三点钟甚至到天亮，有些同志便因疲劳东倒西歪呼呼的睡了，而兆征却神采奕奕以终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虽是组织最密，分工办事，但总机关的事物是比任何分机关要繁重得多。兆征是每事必躬亲处理，往往人家都散完了，而他还在荧荧电灯之下办公。同时兆征对外的麻烦亦不减于对内，与政府接头，与各社会团体接头，参加群众大会以及各种会议，而且他的秉性是不大喜欢请人代表的，特别是到群众大会，兆征自己的勤劳是如此，因而他最厌恶的是人家的怠工，他很锐敏而正确的感觉到这怠工态度，可给革命以绝大损失，所以他对怠工者总是不稍假借。

二、守纪律——兆征原先是国民党员，而且他未加入共产党以前，在社会上便已有很大的名望，照常理推测，这种人是不惯于守共产党铁的纪律的，但兆征同志却完全不然，他加入共产党的第一天，便过党团的生活，完全依照党的政策去活动。在国民会议预备会中，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就是多年的老党员还不及他。在省港罢市中，国民政府中，以及在一切活动中，都无不如此。

三、廉洁——我们要知道在幼稚的中国工人群众中，他们最

注意领袖的行动,往往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关系,就是看你俭约否,扒钱否,许多富有才能的领袖在这一点上“翻筋斗”。兆征一生都身兼财政,在海员工会中,在省港罢工中,以至于后来在共产党的中央中,都是如此。在海员工会他管财政,每月必开会报告帐目一次,收据一总拿来听凭到会者查阅,并将帐目在会刊上按月登载。在省港罢工时,两日向代表大会报告帐目一次,又发行帐目专刊,送各工会审阅。省港罢工委员会每日出进动辄数万元,有时甚至数十万元,若不如此,何以能招大信。那时何来同志(亦一老海员,广州苏维埃时被选为财政委员)为会计,兆征得他的帮助不少。所以帝国主义及反动派不断的造谣说:“苏兆征肥了”,可是群众中没有一个人相信。

四、谦逊——兆征同志是一个百万群众所拥戴的领袖,毫无领袖派头,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的。

五、坚定——兆征为人虽和气谦逊,但一到政治问题,他便有坚定的主张,以非常强悍的态度而与人斗争。

六、天才——兆征富于组织的天才,他早年识字不多,但到省港罢工时便能执笔为文。中国党八七会议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便是他起草的。此外对各种会议起草的文件很多。离莫斯科之前,曾著《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记》。

这就是兆征同志工作的风格,这就是兆征同志为什么能够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仰的根源。

十二 疾病与死亡

兆征同志身体本来强健,但因办事认真,操劳过度,而营养

又不足，逐渐羸弱下去。其病源由来已久，但他并不休息，以致所病日益潜滋暗长。一九二八年在国内外一连参加中国共产党、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几个大会，劳苦尤甚，所以共产国际大会刚刚闭幕而他患盲肠炎几乎至死。幸此次入医院不久即告痊愈，但身体过于羸弱，医生主张先行赴南俄休养，俟身体复原后，再割肠以绝祸根。俟南俄归来，兆征精神不如平日，医生则云盲肠可以不割，只须好好的休养。后因革命斗争发展，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力疾回国。因风尘劳顿，在途中不免感冒风寒，到上海便血病复发，竟以至死，享年四十三岁，家中尚遗有妻子及一子一女。

十三 苏兆征在东方革命中的位置

兆征同志是由不断斗争中，由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是海员的领袖，他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由工人出身而成为这样伟大的领袖，在东方还只有兆征同志一个。

广州公社所涌现的苏维埃，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个出现的苏维埃，而兆征则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领袖，他已经成为东方一切劳动群众解放运动的酵母。

署名：中 夏

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一九三一年)

(一) 广州暴动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便决定武装暴动，为武汉反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至于广州暴动一直到十一月十七日方才正式决定。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在反动阶级方面，国民党的内部已经公开发生的战争，就全国而言，有所谓南京政府与唐生智的战争，时局已经非常混乱；就广东而言，广东派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正准备打倒广西派军阀（李济琛，黄绍竑）的政变与战争，一触即发，广东各县已有数处小的战争，时局异常紧张。

在革命民众方面，工人由普通罢工示威，转变为打杀工贼与抵抗警察的武装斗争，群众常常走到街上；农民发生三次暴动，四月李济琛反动时发生一次政治示威暴动，九月叶、贺攻入潮汕时发生一次秋收抗租暴动，十月发生土地革命暴动，海陆丰得着完全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彻底的土改。

中间阶级因勒捐派款以及战争，确有厌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情绪，表示动摇；其先进分子有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广州驻军确有大部分对工人表示同情。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的威信确已增高，与群众结合同生共

死的亲切关系,有调动群众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广州暴动与广东张、黄举行政变刚刚同一天。那时中央在上海本来还未得到张、黄政变的消息,但已估定张、黄政变日内必然发生。中央很郑重的给广东省委以训令,谓“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的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汇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更提议下列具体办法,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施行:

1. 广东省委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私人战争。

2. 广州市工人应站在阶级的利益上,自主的公开各地革命工会组织,召集产业的职业的地域的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之开始),开始一切斗争,实现各项要求,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但当斗争期中,各工会原有之秘密组织仍须严格保存。并在罢工期中利用机会建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雏形。

3. 海陆丰之工农革命军应号召农民群众尽量扩充志愿兵额,利用陈济棠、黄琪翔军队在东江的战争或因陈、黄集中东江作进攻惠州扑得广州之计划。但此项计划实施时,必须使工农革命军沿途号召农民杀死豪绅,分配土地,以扩大土地革命。

4. 广州三条铁路的反动机器工会领袖,在此次政变中号召革命工人自动铲除,并夺取铁路管理,以响应广州市工人罢工运动。

5 .广州市郊及中路各县农民运动,须注意各地暴动向广州方面之会合及水陆交通之破坏与乡村暴动之蔓延相并而行。

6 .广东南路、海南的农民暴动已在各地蜂起,目前所最注意的,是怎样使这些暴动能获得农民群众之广大参加,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政权,破坏统治阶级的统一局面;同时须积极根本改变乡村中之一切旧有关系。

7 .广东的北路、西路为两广实力派目前战争的所在之地,这两处农民暴动应使之发动为破坏军队之主干,不当拉夫,不卖米粮,破坏铁路、河运,截留两方谍探,煽动两方军心,夺取军队武装,并引导兵士离开队伍,而加入农民群众革命军,以扩大并巩固工农暴动在这一个区域的胜利。

8 .退在江西信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宜迅速使之开往老隆、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民会合,以开展五华、紫金等县的农民暴动。

9 .在全省各县工农暴动中各主要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各县的手工业工人都须同时兼顾到,并宜使之自动的发起,由经济斗争或是部分的政治斗争发展到全城暴动。

10 .依据本党军事运动的新方向,广东省委应训令所有军事同志极力向军队下层活动,并设法煽动士兵使之在战斗中哗变反抗,散入农民群众中,成为农民革命军,当其战争溃败时,宜领导农民夺取武装,武装自己。

11 总之,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一运动,并且于每一个策略的决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扩大会议各项条文,务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实施。

有些人怀疑中央是否与闻广州暴动,其实是误会的。中央

所未与闻的只是暴动日期问题，这是因时机紧迫，交通不便，有以致之。

（二）广州暴动的准备

广东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到中央训令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当时是全体一致赞成中央决议的。并决定发表号召暴动宣言及暴动的口号，又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从事军事组织技术的工作。他们的准备工作诚如共产国际所指出还不充分，虽然全部布置还没能运用周密，还没能组织完备，还没能实行无缺，然而省委确实尽了他的力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我们此地只举出几个大者来做例：

1 纠正等待主义的错误。广东省委对于暴动政治上的准备，可说早在中央提出“武装暴动政策为党的行动之普遍方针”的时候便已进行了。那时叶、贺南征，广东省委便去准备叶、贺军队打到潮汕时，潮汕暴动响应，打到惠州时，惠州暴动响应；打到广州时，广州暴动响应。此时省委便做了不少的宣传鼓动工作，自然这个计划一望而知为是以叶、贺军队为主力，而工农变成了一种仅仅响应的副力，这是一个大错误。迨叶、贺失败，省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而先进行各县的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于是海陆丰便先广州暴动而取得了胜利。

2 启发群众的政治斗争。四月李济琛叛变以后，省委曾不断的引导群众斗争，如四月二十三日之政治罢工；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纪念与六·二十三沙基惨案纪念之两次示威大会。自然此时的口号仅仅“反对白色恐怖”“要求释放政治犯”“肃清反革命”而未提出“打倒国民党”更未提出“苏维埃政权”但省委对于引导

群众斗争是随时注意的。

十月,叶、贺失败了,省委在政治上更是进一步的准备,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引导群众斗争。其中最大的是十月十四的海员大示威运动。先是江门、汕头海员经济罢工,广州的海员总工会为李济琛所派的改组委员所盘据,海员得不到援助,于是十月十四日便联络广州、香港、汕头、江门、澳门五处在广州举行四万余人的大示威运动,开会后,游街巡行,行经海员总工会门首,群众便蜂拥闯入工会,当场打死改组委员二人,占领工会,自动办公。影响所及,广州各工会都纷纷自动夺取工会。夺取广州工人代表会会所时,亦发生与警察武装冲突,互有死亡,反动政府十九日来一压迫,工人失败。此外,国庆纪念,工人群众是参加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工人群众又举行示威。在这些争斗中,工人高呼着“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此时,汪精卫、张发奎定计强迫解散省港罢工工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虽然取消对香港之封锁,实际上罢工仍未解决,罢工工人仍留居省城约三万余人,此次方被汪张解散),封闭罢工工人的公共食堂和公共居舍。罢工工人举行示威,并自动放火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房屋。

十一月十七日,张、黄政变后,省委已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张、黄召集的所谓“护党运动”大会,事实是等于阅兵,然而工人群众忽然闯入参加,高举红旗,向士兵高呼“打倒国民党!”,“广州苏维埃万岁!”、“工农兵政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兵士表示同情,张发奎气极,下令捕拿工人,兵士不肯动手,卒由张之卫兵捕数人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省委公开发表宣言,号召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提出下列口号:

“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工农武装起来,劳动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和改组委员;立刻恢复省港罢工工人权利,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增加一切工人工资;工人监督生产,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居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一切土地归农民、兵士,杀尽土豪乡绅地主,改善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反抗军阀,兵士委员会监督军费的开支,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琛、黄绍竑;枪毙一切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工农兵联合万岁,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万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众与苏联联合万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将这些口号联为“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打倒军阀斗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

3 纠正过早暴动的倾向。十月十四日海员大示威以后,群众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十九日反动政府便来一个压迫,此时工人异常悲愤,工人中有主张立即暴动者,省委认为时机尚早,此时尚无准备,故指出“我们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更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要求,宣传暴动的必要”。由此可见省委并非轻举妄动者流了。

4 打破“左派国民党”的幻想。此时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尚以“左派国民党”自居,为打倒他们的政敌李济琛,想借民众势力以为助,故用许多左倾口号以欺骗群众。自然此时民众不少为

其所惑。省委除一面竭力宣传汪精卫在武汉反动事实外,同时一面又领导失业铁路工人(四月十五日后被李济琛开除的)及其他群众数千人向汪精卫要求恢复职业。当时有人反对省委此种计划,谓一方面反汪,一方面又向汪请愿,自相矛盾,徒然混乱群众视听。但省委坚决如此执行,结果如何呢?汪精卫不特不能允许工人要求,而且调动军警捕拿工人领袖,于是群众自然在自己政治经验中认识了所谓左派的真面目,由和平请愿变成示威包围,高呼“打倒汪精卫”。张发奎几次欲找共产党谈判,省委毫未犹豫加以拒绝,并向群众公布,于是张发奎的所谓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

5 赤卫队的编制。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后,即着手赤卫队的编制,组织二千工人的赤卫队。这赤卫队是极端秘密而按连组织的。又组织最可靠、最忠实、最有训练的敢死队两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夫一连)。此外,又准备运输工人汽车夫等,以及一切运输用具以备暴动之用。又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药,少数手枪驳壳及许多冷器,如此武装工人。又建立消息机关,差不多反动军队及政府机关、参谋部等处都有共产党的消息报告员。

6 苏维埃的组织。因为秘密状态异常严重,所以苏维埃只能在决定暴动日期的时候才成立。由广州工代会六十余人联席会议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十人。革命的兵士会议选出三人。市郊农民协会选出三人(但只有一人参加了苏维埃工作)。此外共产党亦有代表参加。工人占三分之二。举行暴动的最终决定,是在这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并且还通过了举行暴动的行动计划。由此可知,说广州苏维埃未经选举,是不合事实了。

7 教导团的夺取。省委对兵士中的工作仅仅只限于广州市内驻军，而驻在市外及外县的兵士并未发生关系。广州市内的教导团十二连本是由武汉调来广州的，其中大部分是军事学校学生的知识分子，经省委的活动，他们中除少数高级军官外，一致赞成苏维埃革命，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此外则警卫团、炮兵营、黄埔军官学校都有一部分受共产党影响。在暴动前的一星期，曾开二百兵士的会议，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共产党所提出的口号，尤其是“土地归农民兵士”口号，得着群众热烈的拥护。

总结起来说，省委所做的准备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不充分的地方。这许多不充分的地方，也是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省委已经做了的，是我们宝贵的经验，当然不可抹杀。平情而论，这些做了的工作，是值得赞美的，决非毫无能力的所能梦见。

(三)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

伟大的东方殖民地上第一个出现的广州苏维埃存在了三天，终于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队、军舰、民团联合的环攻之下颠覆了。广州暴动一起来，使得帝国主义震惊危惧，使得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恐慌发狂。帝国主义使用了所有可能帮助国民党军阀。日本水兵登陆，开枪射击赤军，使得长堤的反革命军队难以肃清；英国的军舰商般救出许多反动派和豪绅资本家运送到河南或香港，使得他们能从集中力量来对付广州苏维埃；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也派兵登陆；反革命的海军与河南的李福林便在英、美、日、法的军舰的掩护及运送的条件下，得以轰击广州。国民党各派军阀亦为广州暴动胜利所

震吓,立刻放弃互战且联合起来拚死命的来扑灭他们所毒恨的苏维埃政权。就客观原因而论,自然是敌人力量大过革命力量,所以苏维埃政府不能不失败。然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主观原因,因为研究主观原因可以使得我们得到极大的教训。所以我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厌求详。

A 暴动的社会基础与发动群众问题

……这次暴动之中,并非所有的广州工人都参加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人甚至于说广州暴动仅仅只有五千人参加,这是有意的极端诬蔑。积极参加暴动的确在两万人以上。平情而论,广州暴动虽然有两万人参加,我们仍可说是社会基础不广,比方说在国民党未叛变以前,经共产党所组织在广州工人代表会之下的工人群众便约近二十万人,虽然经过李济琛、汪精卫、张发奎屡次的不断的打击,然而仅只两万人参加暴动,实觉太少。

省委在暴动前后确尽了不少的努力,约举于下:

1. 经过党的系统,党在暴动前一星期中曾召集了两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第一次讨论总同盟罢工,到会的三十多人中多数认为总罢工可以做到。嗣后各支部书记陆续报告罢工困难,在第二次会议中,便移转方向讨论暴动时的政纲,和暴动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的可能程度。在各支部中,党又分别召集活动分子会议,讨论暴动的方法,罢工的发动和赤卫队的扩大组织。

2 经过工会系统,工代会亦在那一星期中开过代表会两次;第一次亦讨论总罢工问题,到会四十多代表,多数认为罢工可能;第二次便选举苏维埃委员。

3 赤卫队按联队分区域开各队长联席会议,会议中侧重政

治报告和组织扩大的讨论。

4 党的指导机关和工代表特委会、赤卫队委员会更是日日在开会,暴动的决定是经过一次热烈的讨论,并全体承认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是当时必须采取的策略。

5 暴动时赤卫队是按联队分区域集合。每一联队几乎全部都是徒手群众,而每一联队组织之外,还跟随着许多徒手群众。

6 暴动前决定了于暴动胜利后,召集群众大会,但缺少详细的召集方法。总罢工的命令决定于群众的军事行动起来后,即以工代会名义发布,并召集群众大会拥护苏维埃政权。

7 暴动前通知各支部的任务是:(一)宣传暴动意义;(二)准备总罢工;(三)号召群众参加赤卫队。

8 暴动开始后,十一、十二两日召集群众大会未成,改开代表会议,到三百余人。党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亦两次均流会。但赤卫队总部却聚集一千多人,多徒手的积极的工人,甚至领袖等编制。在暴动的总机关的门口却川流不息地有工人前往领枪,自动地参加暴动。各街各巷都见有缠红布带的工人。

群众没有如火山爆烈般广大地起来,究其原因安在?

客观方面

1 广州工人群众向来是分裂的。不但产业工人中分出了机器工会的组织,便在手工业工人店员中,于广东总工会所属之外还增加了所谓“左派”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因此,此时在工代会直接指挥之下的工会不过六十余了。虽然这三个反动工会并没有真能取得若干群众,至少反动派可利用这些工会名义来阻止所属工会参加一切革命运动,削弱了工代会所号召的力量。

2 广州工人运动两年来都有省港罢工工人领导。自一九二

六年十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取消对香港封锁以后，尚有三万人留居省城。广州市一切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罢工工人的行动成了唯一的领导者。暴动前一月便被汪精卫定计强迫解放，力量便已分散，赤卫队的秘密组织留存在罢工工人中的只得五百人。所以反动派解散罢工工人一事，实给我们发动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致命伤。

主观方面

一、暴动前没有总同盟罢工。中央与省委虽然都曾决定总同盟罢工，但因客观困难终未实现。当时未坚决执行总罢工，而改变为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自然因恐反动派借口战争戒严时间便对群众施以无情的屠杀。结果总罢工依然是一暴动。此时我们的准备还未妥善，因此索性迟数日，总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先罢工而后暴动，本是暴动艺术的常轨，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实乃变例；暴动前既无总罢工，群众不能周知，暴动开始后便转入作战状态，交通上更增加许多障碍，这亦是广州暴动时集合群众比较困难的原因。

二、暴动时没有适于发动群众的灵便组织。广州产业工人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以机器工会的分裂运动，多部分群众是被划分了出去。结果工代会属下的工会最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他们每一工会的群众都是遍布了全市，平常示威集会，各工会参加的群众，多半只就其工会附近所能通知的为数，远的便不能在他的旗帜之下集合。加上党在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群众中的组织也是按照工会的系统划分支部，每一支部所管辖的党员也同样遍布了全市，党没有采用街道支部的组织形式，来集中这些散乱的手工业和店员群众。所以党的支部除掉海员、汽车、邮务、印

务、铁路(失业工人)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会的积极工人领袖或支部负责同志多半参加到赤卫队中去,暴动事起,他们便去巷战去了,于是群众的发动自更少人领导了。上层指导机关与下层群众中间失去了连系,就因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暴动时会发生这个困难,没有采用适宜的组织来解决这个困难,这在客观上又是阻碍了群众的发动工作。

除此之外,社会基础不广还有其他原因:

1 党对黄色工会政策不对。从前广东党对于黄色工会就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有时对黄色工会完全取仇视的态度,对于黄色工会会员完全置之不理;有时与黄色工会取联合战线的策略,然而只有上层机关的联合,而没有下层群众的联合,甚至因恐怕黄色工会上层领袖的怀疑嫉忌而完全停止下层群众中的活动。由来已久,不是旦夕可以改正的,不过有人说黄色工会会员完全与苏维埃立于反对的地位,亦是与事实不符。一方面机器工会领袖统率他的武装体育队(约近千人)帮助白军进攻苏维埃是事实;同时另一方面广东总工会和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下面的群众很多自动的走到苏维埃方面来,就是机器工会会员亦多表示中立(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未对苏维埃罢工或怠工)也是事实。广州工人群众一向是分裂的,而这次暴动却收到了对黄色工会下之一部分群众的领导的功效,暴动失败后,黄色工会下的群众有的说为何早不通知他,假使我们早在他们中努力工作,他们必更有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暴动或对反动领袖反对苏维埃的行动加以制止。

2 对市郊农民运动的工作不好。党在外县的农民中虽有好几处有深厚的基础,特别是海陆丰,但是市郊及中路农民运动却

一向未做好,差不多市郊农村之中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这次暴动市郊农民有数百人占领广三铁路车站,兵工厂附近,亦有数百人起来,然而没有立刻发动几十万的市郊农民暴动,围护广州并截击白军;而海陆丰等处又远水不能救近火,于是广州的暴动便陷于孤立。

3 对兵士运动的工作不足。党在国民党未反动前,简直没有兵士运动,仅只军官拉拢。国民党反动后,又来不及做兵士运动,老实说,党也没有兵士运动的经验,中国军队是雇佣制度,在兵士中的工作自然比较困难。党在准备暴动期间,仅只在广州驻军中做了工作,而且教导团甚至整个参加暴动,至于广州市外的白军中就没有丝毫的工作了,故兵士群众参加暴动的不过数千人。

这些都是使得社会基础不十分广大的原因。

B. 选择暴动时期问题

这一点同志之间争论颇大。说暴动时期不适当的同志最有力的论据是引用列宁关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之事变的话。列宁说:

“七月三日至五日的时间或者是可以夺取政权的,因为敌人无论如何总是要加我们以暴动的罪名,而以暴动者来处理我们的。从这个地方,并不能就得出个结论说:那时候夺取政权是于我们有利的,因为使暴动胜利之客观条件还未具备。”

是否能引用列宁的话适用于广州暴动,当然要问是否当时圣彼得堡的状况与此时广州的状况完全一样或者差不多。

我们现在提出几个事实来:

1. 你们不说“广州暴动因为铁路没有罢工以致李福林得利用铁路由韶关调回军队向广州进攻,是一个错误”吗?我可告诉你,三条铁路本来是共产党的势力,但四月十五日以后,李济琛先下手,开除革命工人至一千余人之多,换用黄色机器工会会员,铁路已非我有,遑论罢工?

2 我们大家不是公认广州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十分广大吗?我可告诉你,留在广州的三万余人的省港罢工工人,事实上是两年来广州的政治斗争的唯一的领导者,但十一月汪精卫、张发奎又先下手将其强迫解散,使我们在暴动中减少一个伟大的力量。

3 你如说“暴动时间应该稍为延迟一些,最低限度也要等到张发奎、李济琛军阀开始激烈战争的时候”。好的,可告诉你,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在上海已经电致张发奎,并派其妻兼程赴粤,要张发奎先下手,决心解散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教导团,决心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领袖,决心封闭工会及禁止工人活动,并决心搜查苏联领事馆,以至驱逐苏联领事出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张发奎亦决定日内就干。

这个时候,很清楚的还是依然让反动派先下手根本消灭我们势力呢?还是我们先下手消灭他们呢?何况群众已经愤激,反动派压迫一来,群众必然是散乱的各自为战,结果依然等于暴动,这时候,还是让群众分散的暴动给反动派各个击破归于流产呢?还是我们有计划的暴动先给反动派一大打击力争胜利呢?省委原决定暴动日期应在两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但因时机迫切,不能不提早于十一日先下手暴动,事实上我们先下手已取得胜利,虽然只有三天,不然,我们的势力再被反动派来一个空前的打击,那末连三天苏维埃的胜利都不会有。

是不是当时圣彼得堡状况和此时的广州状况完全一样,或者差不多?我想,并不一样,并不差不多。

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正多,(另见上下文)决不关于选择时期问题,我们认为广州暴动的时期非此不可,就是说,省委将暴动时期提早是对的。

我们在此联想到批评广州暴动的另一意见,他说“广州暴动失败之一,是因当时没有没收银行存款”,好的,这正合乎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批评,但是,事实上广州暴动却因攻打银行费时太久,以至延搁对河南及其他白军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如果象巴黎公社一样认为没收银行似乎不合理,那当然不对,然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宣言明明有没收银行的字样。从上面引用列宁的话,如此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批评不同的事件。同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C. 军事技术上的错误

中国非征兵制度,工人阶级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他们差不多都是在暴动之后第一次开始练习开枪的,此次广州暴动,夺得敌人的机关枪只使用一部分,二十五尊大炮只使用四五尊。这些都是减少军事上的效能。虽然如此,当时指导机关对于军事上实做了不少的错误。

1. 没有同时爆发。广州暴动虽然坚决,勇敢,无妥协的前进,突然进攻,是其优点,但是没有同时爆发,如河南、黄埔(此处并且有一部分军力)、石龙等处有同时爆发的可能,可是并没有与广州市同时而起。如此等处同时爆发,既可壮大声势亦可扰乱敌人后方。

2. 没有立即捕杀反动军事领袖。捕杀了敌人的军事领袖,

至少可暂时使得敌人军队失掉指挥，张皇失措，不至很快的来进攻我们，广州暴动没有顾及这一着，如张发奎、黄琪翔都居在东山，只须少数队伍去便可捕杀，我们没有早做，以致他们得以逃往河南发电调西江军队回省进攻我们。

3. 没有占领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不仅有大批枪械，而且此地是西北面屏蔽广州要地，我们也没有派一部分红军联络已经起来的农民围攻占领，亦一失算。

4. 没有堆集街上障碍物，以致敌人来攻时顺利无碍。

军事上既有这多错误，于是广州暴动不到半天便反攻为守，一个暴动假使到了反攻为守，大事已去了一半了。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一重要原因。

我们在此地要反对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是说广州暴动的失败是“偏重军事偏重武器”，于是得一结论说广州暴动是“军事投机”，或说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这种见解是有害于暴动的。什么是军事投机？严格地说，必须是专门勾结军队靠之作一切工作以代替群众自动地斗争，宽泛地说，也须是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或竟至阻止群众斗争，至少也是不理群众而一意靠一些外来的武力去发动斗争，才能认为是军事投机，广州暴动并不是这样，如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军事投机”一词在中国党中随处乱用，遗害无穷。

总结起来说，在主观上社会基础尚不十分广大，军事技术又做了不少的错误，这些东西便更促成了广东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失败。

但是，我们有一点要认清楚，即使无主观错误也不能说必然胜利，因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我们优越几倍，即使国民党军阀因战争而削弱或崩溃其军力，然而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存在，帝国主义的兵舰曾经封锁过武汉，曾经炮击过南京，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旗子，现在广州暴动是苏维埃的旗子了，谁能担保，帝国主义不肆无忌惮的轰击广州城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得一结论，敌人势力既优越我们数倍，例如普列哈诺夫的高叫“你们不应该拿枪呀”！这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这样想。我们必须郑重的认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只有发动伟大的工人以及农民兵士的群众可以战胜；只有认清我们当前的战斗是极其困难艰苦的斗争，是极残酷的肉搏。从此而得的结论，决不是抛弃战斗，而是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强组织力，百倍的加强指导与考察的力量，百倍的英勇的精神，以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及中国一切种种反革命的势力。

固然我们不能担保操必胜之权，共产国际说得对，“广州暴动是中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必要尝试”。我们号召所有革命者反对有人对于广州暴动认为是“过早的行动”是“盲动”是“军事投机”是“游戏艺术”之一切企图与阴谋。

(四)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中国革命的转变非常迅速，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又很幼稚（才只成立八年），在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策略，自然不免有许多错误。我们决不隐瞒我们的错误。我们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广州暴动给予我们丰富无比的经验与教训，广州苏维埃政权虽

然只存在三天而失败，然而他已渗透了全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心理之中。国民党革命已经完结了，此后便已开始苏维埃的革命。我们热烈高呼：

苏维埃的红旗在全中国在全亚洲在全世界遍插起来！

原载《广州公社》，1930年12

月25日无产阶级书店出版

署名：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九日)

著者 申明

本书原定三十章：前三章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后十四章为“广东时代极盛期”，“反奉战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海罢工期”，“北伐期中两湖职工运动之发展”，“上海三次暴动”，“武汉时代极盛期”，“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国民党叛变后”，“广州暴动”，“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转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总结”。但中国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涨，使著者不能不立即回国，因此，只得把已写成的定为上卷，先行出版，前三章也只得日后再补。其余定为下卷，将来有暇时再写。

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加以匡正，以便再版时加以补充和修改。

列宁说过：“因为作出‘革命底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底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所以著者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

参看“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三一页。

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

邓中夏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九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原始的职工运动

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

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中国劳动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有种种特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现代式的”工会同日而语的。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是很新的阶级，大家都知道这一阶级只是在欧战期间因中国工业相当发展才形成。在此以前，中国很少产业工人，主要的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我们来说明这三种东西：

一 行 会

“中国劳动者的组织，从前是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这当然都是手工业的组织，其中雇工学徒和业主是混合组织的。业主在这些组织之中，自然是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样组织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同行公会’的任务，即所谓生产者对付消费者的组织。例如木匠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工作的价钱和条件，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此处及第二章所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系指共产主义小组而言。

致的对付雇主。同时这也是雇主对付雇工学徒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收学徒的条件、学徒的年限等等。这些行会的公约，都请一个神来保证，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鲁班（行会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学徒在这种组织之中，只有听从雇主的决定：每年工资或每次工资的多少等等；不过这里所谓工资，往往在形式上都带着分红的性质，而且行会的组织总有雇主‘团结’自己的雇工对付消费者的幻梦，使雇工和学徒觉得雇主的事业和营利，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营利似的。”（见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一书）

二 帮 口

“再则还有一种会馆式的组织，这种组织本是绅士阶级的组织。例如北京有各省甚至各县的会馆，每省或一县的人住在外乡做事，他们之中最大的绅士官僚就收集金钱，建设会馆，准备同乡人暂时居住的地方，碰着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着外县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苦力和劳动者在外乡做事，当然受不着这么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实际上这些同乡帮口，都只是大小绅士的工具。……”（见同上）

三 秘密结社

“中国‘下等社会’之中,还有一种组织,便是‘秘密结社’性的组织,例如青帮,洪帮,哥老会,三合会等。这种组织的历史很长,此地不能叙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他们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着组织方式,互相帮助着反抗官厅的追捕,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为豪绅资本家利用,去反对自己的仇敌,他们这种组织往往是用武力斗争的办法,打架,械斗等等。他们的首领,也大半是职业的刑事犯。……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社会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父徒弟的辈份分得极清,纪律极严。‘下等社会’的组织都模仿着‘上等社会’的帝制主义,族长主义。自然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见同上)

最早的罢工

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无疑的发生很早,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实,但都已湮没不可考,我这里只来叙述两个为老一辈的工人所知道的罢工运动:

一个是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的罢工。这时中国已经推翻满清帝制,改建“民国”,黎元洪为当时的湖北都督。汉阳兵工厂为中国最大兵工厂之一,却于此时发生一次罢工。这次罢工的原

因,是因为当时纸币跌价,工人反对以贱价纸币发给工资。罢工只数小时,便被黎元洪用武力压迫而失败。领导这次罢工的刘某,他是老君会(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名)为中心,他们的目的在于暴动,但结果这位领导罢工的英雄被处了死刑。现在武汉老一辈的工人尚能记得他。

再一个是一九一五年安源煤矿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工人反对一个德国工程师,因为工头极端剥削工人,这位工程师却袒护工头殴打工人,工人大动公愤,相率罢工。主持这次罢工的也是秘密结社性的洪帮。结果也被军队当作土匪用武力镇压了,杀了一个工人领袖。

辛亥革命后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由专制政体改为共和,当时政党组织纷纷而起。就中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有两个政党:

(一)无政府党——首领刘师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反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攻击不遗余力,特别反对江亢虎,出有“伏虎集”。他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相传理发工会当时有基金十万元。茶居工会则至今犹存。

(二)社会党——首领江亢虎,是一卑鄙下流的政客。当民国成立,选举国会,江亢虎为了要多得选举票,想拉拢工人替他捧场。因此派出党徒,倡言组织工人团体。据说浦口码头工人和北方有几处铁路工人,有一部分是被他们组织起来了。民国二年,袁世凯专政,解散国会,江亢虎所组织的工人团体也就昙

花一现，无影无踪了。

除此之外，国民党中包含各种的派别，就中有谭人凤组织自由党，收买秘密会社哥老会的群众，即流氓无产阶级；戴天仇（季陶）则在上海办民权报，亦鼓吹组织劳动党，但都与职工运动无关。

上述的社会党，对于工人的影响，自民国二年后就丧失得干干净净；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余年，特别在广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还成为共产党斗争的对手（大革命时无政府党纷纷解体，几乎完全投入国民党；国民党叛变后，不用说这些分子也做了“助桀为虐”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欧战后自发的罢工斗争

欧洲大战后一九一八年，中国曾有一度自发的罢工斗争，如在上海日华纱厂便继续有四次罢工；三新纱厂、上海第二纱厂各有两次罢工；厚生纱厂有一次全体罢工。其他如英美烟厂、祥生铁厂、冷作铁工、沪宁铁路小工、电车司机以及手工业工人亦发生零碎罢工。就中尤以黄包车夫的罢工，参加者八千辆，两三万人，规模最为雄伟。其他各地如苏州之机织工人，杭州之络经女工，汉口之笔工等，皆有罢工。此外尚有不少的罢工，可惜报纸失载，我们无从稽考了。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赞助“五四”运动的爱国

罢工。什么叫“五四”运动呢？当一九一九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开大战后的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处分战败国的德国的会议，亦即重分世界市场的分赃会议，在这会议上中国山东问题也是被处分的一个。先是欧战以前，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以协约国资格，乘机攻陷青岛，强迫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当时中国既对德宣战，则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自应完全归还中国。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巴黎和会，却硬把山东处分给日本。此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震惊，群情愤激，于是首先在北京发生空前未有的群众大示威运动。发动此次运动的是北京学生，时为五月四日，是谓“五四”运动。当日群众示威，愤怒之下，放火烧毁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又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当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会条件”，并“罢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官职”。政府当然不允，学生再接再励，六月三日，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余人。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北京学生声援。

此次参加罢工的：纺织厂方面，有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及叉袋角日本纱厂数家。金属业方面，有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厂，札新机器厂等。运输方面，有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江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电车，英美电车公司，全埠汽车夫，全埠马车夫，华洋德律风公司（属英国）接线人员，中国电报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

有亚细亚美孚煤油栈,叉袋角大有榨油厂,荣昌火柴第一、二两厂,华昌梗片厂,华章造纸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英美烟公司烟厂,礼查饭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户及西人饭店之执业者。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期参差不齐,有从六月五日罢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罢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

其他各地工人参加此次运动不详,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的意义。

“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青年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参加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此次运动,显然是因为这一运动与他自己的利益适相符合,特别是反日更为他们所绝对需要。当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曾有一个比较发展时期,因为欧洲帝国主义那时不暇东顾,减少了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但是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却于此时在中国与民族工业作猛烈的竞争,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认日本是他们当前的大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家对于此次反日的爱国罢工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不仅赞成而且鼓励(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但资本家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利用工人给了他们的竞争者一个打击;可是另一方面却也相当的启示了工人,认识罢工的威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

这里还要附带说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首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开破天荒的公开讲演大会,头一个题目就是“劳工神圣”。另有一个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在上海着手组织工业协会。这一类事实,无疑的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争取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企图。

当然,还另有一种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或者可说是急进民主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孤立,须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南方工会的发生

南方工会为什么首先发生?这里不能不略略叙说当时的政治状况。原来辛亥革命形式上虽成功,实际上却因当时革命派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失败。帝制虽倒,代之而起的为封建军阀。当时封建军阀的代表者就是袁世凯。革命之第二年袁世凯就削平当时革命派各省的政治军事势力,而大权独揽。后来解散国会,再后来帝制自为,于是当时革命派起兵讨袁,而有所谓“护国战争”(一九一六年)。不久袁死,起而代之者为段祺瑞,取消帝制,

恢复共和。后来段又解散国会，于是当时革命派又起兵讨段，而有所谓“护法战争”（一九一八年）。从此南北分裂，国会南迁于广州，自建所谓护法政府。但既号称护法政府，政治不能不略取开明，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

这里须得指出的，就是南方工会，严格说来，仍然算不得“现代式的”工会。首先说到孙中山领导下的工人团体，简直不能算做工会。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体，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等组织，这些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只是为了孙中山自己的目的。的确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输军械。再则当时还有谢英伯曾大辟等发起的华侨工业联合会和手工业者组织的广东总工会，都还不是阶级的工会。就是有名的机器工会，也是广州办理市政的资本家，利用他们从南洋群岛招来的技术工人组织成的，为的是好和其他的资本家抢生意，至多只能说是行会工会的“欧化”。这种欧化是很自然的，因为广州邻近香港，香港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免多少渲染英伦职业工会(Trade Union)的影响，香港那时就有这类欧化的行会工会，这种影响于是由香港间接及于广州。相传广州当时共有六十二个工会。

南方工会当时的真相就是这样。

第二章 职工运动黎明期

世界革命高潮

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能不略述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欧洲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接着就发生了一次掀天动地的世界革命高潮,首先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领导之下,在最短时间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光芒万丈的工人国家,这样一个事实,是如何鼓舞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精神呵!从此就开展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高潮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如一九一八年三月芬兰的工人革命,同年十一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德国巴维里亚苏维埃的建立;一九二〇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九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革命。就在远东,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本米荒运动和一九一九年二月的高丽暴动。至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多至不可胜计,例如英国,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四年之内,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革命怒潮,以其锐利的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过

据当时报纸和一九四九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的《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所载,均为三月一日。即举世闻名的朝鲜“三一”运动。本书所载二月,当系三月之误。

程。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世界革命发展到最高度，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才受挫折而低落，因为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保加利亚的暴动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

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俄国，泛滥于欧洲，很快的也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的工人群众被这种潮流惊醒了。

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

治领袖 ,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

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 ,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 ,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 ,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我们这里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一九二 年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 ,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 ,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 ,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 ,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 ,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 ,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 ,距北京四十里 ,这里有一大工厂 ,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 ,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 ,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 ,经过相当的筹备 ,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 ,当时发起学校之中 ,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 ,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 ,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 ,增加教员数名 ,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 ,日班是工人子弟 ,夜班是工人 ,但多青年工人 ,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

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余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

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

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特立,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脱党)等。发行《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

罢工运动之蔓延

在此时期中，全国自发的罢工斗争仍不断发生，间亦有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总计大小罢工不下九十余次。这里只略述几个大的罢工。

(一) 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四月，香港机器工人，因米价太贵，生活困难，又因外国资本家常借口营业衰减，辞退工人，遂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五千余人。结果，由劳资双方代表谈判。计罢工二十五日。这里须指出，香港机器工人给予香港海员不小的刺激，因而有一九二二年赫赫有名的大罢工。

(二) 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先是一九一九年长江下游一带米粮歉收，但奸商却运输出口前往日本，因此，上海米价飞涨。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日，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秬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日。

(三) 广州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广州机工万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罢工时与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之上机工一致行动，经当地政府调停，结果，加工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计罢工三日。

(四) 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因新厂机车间与监工冲突，发生罢工。参加者万余人，结

果，双方会议，和平解决。计罢工三日。

(五) 粤汉铁路武长段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由北京政府交通部调查，结果，工人胜利。计罢工五日。

(六) 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罢工，全路停车。要求撤换洋总管若里，并要求恢复原薪及最发材料。结果胜利。计罢工十日。

(七) 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发生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哄动了租界内五国领事，商量对付之策。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

以上七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参加去领导的；汉口人力车夫和粤汉罢工完全为共产党武汉党部所领导的，陇海铁路罢工，共产党北京党部闻讯派人驰往参加则已解决。由些可见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特别是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主持者为林育南（牺牲）和施洋同志。

罢工运动中最早的思想斗争

我们这里首先略述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概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新

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思想上的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自然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当时从事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确有很大的影响,也就经过后者以影响前者。

就职工运动本身来说,只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其余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故北方及中部工会中的确多部分或者完全是共产党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职工运动中却有另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市侩的或流氓的工会主义。这种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你如说当时上海没有工会吗?有的是!工会的招牌有好几十,自然群众是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市侩和流氓办的。他们假借工会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

的极大障碍物，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大敌。所以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中，共产党会有一次反对招牌工会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著成效的。

第三章 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

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终结。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当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人以上。我们先叙述这个罢工高潮的总形势。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接着就是长江海员罢工和上海邮差罢工与日华纱厂罢工。五月，全国劳动大会后，广州发生盐业工人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继续发生罢工，澳门全体华人发生总罢工，于是高潮又起了一个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汉口钢铁厂发生罢工，工潮又高涨，此时劳动立法运动普及到全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目前的斗争纲领，更推进高潮上升。首先表现在八月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接着是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从此以后，因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影响波及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再次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安源煤矿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十月京奉铁路唐山罢工。至十月末，开滦五大煤矿大罢工，而工潮达到最高峰。开滦罢工失败，工潮已开始表示低落的征兆。上海方面所谓金银

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三角同盟罢工，就一败涂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虽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工潮仍回旋荡漾于铁路方面，十月发生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二月发生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次年一月发生津浦路浦镇罢工，次年一月发生花厂罢工，英美烟厂再次罢工。湖南方面发生水口山铅矿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第三次罢工。武汉方面，十一月发生汉口英美烟厂罢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的一个怒涛。从此以后，中国职工运动暂时进于消沉期了。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各个工潮。

海员罢工潮

海员罢工，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影响及于长江，于是长江亦起而斗争，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争得的加资条约，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宁波海员公所乃派代表朱宝庭到香港要求海员总会派人援助。总会乃派林伟民到上海，着手组织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向中国轮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资条约，资方不允，遂宣布罢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时为三月下旬。罢工坚持两星期之久，结果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长江海员罢工虽未取得领导，确曾加入援助。

铁路罢工潮

在这里须略略提到过去的事,中国铁路最早的罢工,要算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粤汉铁路南段全路工程罢工(主因在索欠薪),和于次年三月该路全体车务工人罢工(因军队殴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对北方铁路毫无影响。对于北方铁路有影响,当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的武长段罢工和陇海铁路机工罢工,我们在上章已叙述到。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汉、京绥两路旧交通系职员因反对丁士元将两路合并为汉库路而罢职,一九二一年京绥路员司因请求发薪致发生冲突而罢职(这些罢职,虽然是上层老爷们的勾当,于工人无若何关系,但这种为“罢”的群众,却相当印入工人脑中)。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领。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差不多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国家铁路变为该系私产。该系在铁路上的势力确已根深蒂固。此时刚在直皖战争之后,交通系得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助,组织内阁,总理便是梁士贻,交通部总长便是叶恭绰。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影响亦日益澎湃,该系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该系应付共产党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开办学校以为抵抗,他们的计划拟办学校三十余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设职工教育委员会,开办职工教员养成所,为实行这个计划之用。首先该系便在长辛店开办职工学校,和共产党的劳动学校恰恰两相对垒。

第二便是交通系指使他的爪牙(员司),以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如在京汉路之郑州便组织“交通传习所”,粤汉路之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这个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又恰恰两相对垒。很明显的,共产党与交通系成了争取铁路工人生死仇敌。不用说共产党如要争取铁路工人,首先须将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断发生剧烈斗争。

适逢其会,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余,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

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

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摔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

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并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于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政策毫无关系。

现在要来说到铁路罢工潮了。

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参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两日，绝断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胜利条件如下：

(一) 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

(二) 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

(三) 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

(四) 短牌换长牌，从九月起，凡作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

(五) 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

(六) 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单候奖。

(七) 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

(八) 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

(九) 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害病期内，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

这里须特别指出的，即中段与南段的工人并未参加罢工，然而罢工胜利的条件，连带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资，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

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斗,作最大的牺牲。

长辛店罢工胜利后,很快的就传染到了各路。

接着就是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火车未停。工人要求斥革工头,改良生活。结果路局与工人代表会议承认条件,计罢工八日。

再接着是九月八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路的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军警干涉,伤毙并逮捕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及武汉工团之助,结果监工查办,被捕工人释放,并承认工人要求,分别加资。计罢工二十七日。

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本有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十一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等。结果,相当胜利,惟承认工会一项未得。计罢工八日。

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参加者一千余人,亦系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日。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火车全停,参加者一千余人。要求与京绥路大致相同,惟多提承认工会,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十一日。

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罢工。南段火车停止,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大致与上相同,结果相当胜利。

一月六日,粤汉路徐家棚工人罢工,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结果相当胜利。

此外还有一月十六日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因反对兵士殴伤

工人而罢工一日。

最后便是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路总罢工,下面第七章再专门叙述,此处不赘。

总起来说,除东三省云南广东不计外,北方及中部各铁路,只沪宁、沪杭、胶济、南浔未发生罢工,京汉路和粤汉路武长段均全路加入。京奉路只山海关、唐山两处罢工,甚至并未停车。无论如何,铁路罢工潮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醒起来了,也就因此迅速的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一跳跃的具体表现,就是最后发生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详后)。

矿 山 罢 工 潮

此时矿工罢工的共有三处,直隶的开滦五大煤矿,江西安源煤矿和湖南水口山铅矿。

首先是安源煤矿罢工。安源煤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在大冶取铁,在安源取煤,运到汉阳炼造。安源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每日可出煤共二千多吨,其中烟煤约七八百吨。共产党湖南党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此地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能至(立三)同志。过两月即筹备工人俱乐部,至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七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消息到后,因其同属一个产业,故感受极大的影响。遂于九月十三日罢工,株萍铁路为该矿专门运煤所筑亦同时罢工。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经过五日,终使路局屈服,承认工人十三条件,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

增加工资,完全胜利。

十月二十三日开滦五大煤矿罢工,更是光芒万丈,下面第六章再专门叙述,此地不赘。

继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其条件大致与安源相同,结果胜利。主持者为蒋先云同志(蒋同志死于武汉北伐之役,时为张发奎军队团长之一)。

武 汉 罢 工 潮

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一九二一年冬粤汉铁路和人力车夫两次罢工,便预报潮汛之将至。到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罢工运动澎湃一时。这里只叙述几个大的罢工。

首先是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上面叙述安源罢工便已说到汉阳钢铁厂是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它与汉阳兵工厂是武汉两大五金工厂,自然在武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势力。这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该厂有大规模的熔铁炉,如继续一星期不升火,便会凝冻作废,也就因此迫得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条件,故只五日便已解决。接着就是八月十三日汉阳兵工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军队干涉,伤工人若干名,毙三名,工人炸毁一部分机器,结果相当胜利。

九月二十三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帮助粤汉铁路罢工外,并提出增加工资条件,结果亦得胜利。

蒋先云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北伐河南时作战牺牲。

随后就影响到轻工业。十月十九日汉口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亦要求增加工资，得到胜利。计罢工十三日。后来因厂方不履行条约，于次年一月作第二次罢工，又得胜利。计罢工二十八日。

一月十一日汉口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起因为厂主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工人罢工对付，结果胜利。计罢工八日。

此时局部的小罢工很多。最后就是二月援助京汉铁路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包括各业工人，其详叙于第七章中，不赘。

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

湖南罢工潮

与武汉争辉并美的，便是湖南罢工潮。湖南本非工业区域，比之武汉相差很远，此地除一个纱厂外，尚有造币厂、黑铅炼厂数家，其余则有三个大的矿山：安源之煤矿、水口山之铅矿和安化之锡矿。

如说共产党在武汉方面没有遇着竞争者，那么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头就遇着竞争者——而且是非常强固的竞争者。

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钰。一九二一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两年以后约有工会二十，会员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被杀后，无政府党人争着黄、庞是纯粹的无政府党，不是共产党。其实黄、庞不失为为

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而无政府党人后来借黄、庞之死,在外敛钱自肥,以致晚节不终,投降杀黄、庞的军阀,实属可耻)。湖南劳工会的基础便是那个唯一的纱厂(华实纱厂),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罢工。

罢工的原因在于工人要求奖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者二千多人。华实纱厂实际即政府企业,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击伤工人数十名。虽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坚持,赵恒惕不得已承认酌给奖金。罢工工人虽然胜利了,但他们的首领黄爱、庞人铨却于罢工解决之后,被赵恒惕逮捕,推至浏阳门外斩首。黄、庞因此便做了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

黄、庞被杀后,湖南劳工会亦遭封闭。但黄、庞被杀却引起社会的不平,因为当时湖南省刚刚宣布省自治。赵恒惕制定什么省宪,亦曾冠冕堂皇规定人民得有什么自由权利的条文,这样一来省宪的假面具完全揭开(本来赵恒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军阀割据的护符)。

共产党湖南党部便发起“驱赵恒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限于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响甚大。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最大的当然是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的罢工。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总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湖南罢工潮也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而归于停止。

上海罢工潮

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但在此次罢工高潮中，却不及内地远甚。其原因：第一、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余裕。真的，我们要承认那时真不是他们的敌手。至于内地，我们固然幼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压迫罢工也同样没有经验，所以当时罢工往往在内地胜利，而在上海则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铁路工人来，女工童工极为充斥，如纱厂百分之九十是女工，丝厂则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觉悟力与战斗力当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时帝国主义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但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自然开除工人领袖多以别项美名（如“调工作”，“自动辞职”等）为欺骗。我们遇着这样的强敌，真使我们难于应付。虽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阶级仍曾表现其好身手，仍是屡跌屡起的前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日华纱厂两年之内发生八次罢工。我们这里来叙述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

二月上海有两个纱厂的大罢工。一个是上海第二纱厂，因为工人家属送饭时资本家恐怕偷纱，不许入厂，工人大愤，二日起罢工，参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计罢工三日。另一个是三新纱厂，工

人要求增加工资,十一日起罢工,参加者共六千多人,结果被租界巡捕压迫而失败,计罢工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日华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资,结果胜利。

四月二十四日,邮差罢工,参加者七百余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胜利,罢工二日。工人组织工会。

这两个胜利的罢工,可说给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业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处不少的影响,数月之内发生无数的罢工。

全国劳动大会后,五月二十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因经纱间要求按件付工资不遂而起。工人组织工会,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团体纷纷援助。结果前一次加资一律有效,罢工期内发二日工资,经纱间女工技精者按件计资,但工人领袖自动辞职,工会不准存在,计罢工十五日。

罢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逮捕李启汉同志,罪状是“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判处徒刑三月,永久驱逐出租界。帝国主义驱逐李启汉同志,并不是真驱逐,而是递解中国官厅,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将李同志脚镣手铐送入大狱,时经两年,百计营救无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起,李同志始被放出来,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八月五日,丝厂女工大罢工,参加者一万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被警察干涉。罢工只三日而失败。

从此,罢工便趋向低落了,最后发生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

即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三罢工是也。

十月七日,上海金银业罢工,参加者数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学徒年限,废除包工制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败。

十一月一日,日华纱厂又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启封工会,被军警压迫而失败。

十一月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结果,亦遭军警压迫而失败。这三个罢工失败后,上海罢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

广东罢工潮

广东罢工潮比上海还要落后,其原因是共产党广东党部很弱,而且夹有极大机会主义成份。代表人物即现今国民党改组派的陈公博。他当时主张“联陈倒孙”,后经共产党中央派人前往纠正,开除陈公博及其信从者出党,自经此事变后,党部方稍能对外发展,但领导罢工仍属软弱无力,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的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

五月十二日,广州盐业工人罢工,其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国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为省长,但此次罢工却是经伍廷芳之手压迫下去了,甚至于还实行取缔工会条例。

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澳门系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

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全国罢工高潮的状况我们已大致叙述过了,现在来叙述当时工人组织的状况。

首先须叙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简称书记部)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面第五章还要专门叙述)就是由它发起的,而且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它为全国总通信机关,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在大会以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并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分部,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现已叛变),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一九三一年已离开了党),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现已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真的,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书记部的总机关报即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

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参看后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余了。

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

在罢工高潮中，固然，多数是先有组织而后罢工，但亦有不少组织成立不到数日便罢工的，或罢工时开始成立组织的，甚至还有罢工前后均无组织的。这样一个大的缺点，当然是书记部首先须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帮助工人组织当地工会外，书记部特别注意是组成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矿厂工人俱乐部、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缝纫业工会、武汉轮驳工会、江岸铁路分会、徐家棚铁路分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洗衣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建筑工会等二十个工会，会员三万余人。

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粤汉铁路岳州分会、粤汉铁路长沙分会、造币厂职工俱乐部、铅印活版工会、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工会、土木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

会、笔业工会、安源矿工俱乐部、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等等十四工会，会员亦达三万余人。

再其次成立的是汉冶萍总工会，包括汉冶萍总公司整个企业，计有汉阳铁厂工会、大冶钢铁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于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

最后就是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这里有一个困难，即各路工会组织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汉铁路算是沿路经我们的手组织起来了。但京奉则只有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有我们的组织，关外没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镇、浦口和中段济南有我们的组织，其余各站不是没有组织，便是工头组织。泰安工头某承交通系的意旨还宣布成立全路总工会。京汉路则机务车务机器厂分成三部，车务和机器厂有我们的组织，而机务则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陇海路上的罢工，本为工头领导，故工会亦为工头把持，分化的结果，洛阳完全为我们所有，其余各站则我们的影响极微。正太路只石家庄、阳泉有我们的组织。道清路粤汉路和株萍路北段则全有我们的组织。其他如沪宁、沪杭，全无我们的影响。在这样状况下，马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当然时期尚早。开滦大罢工起，书记部召集各路代表开会于北京，本为讨论援助开滦罢工，但开会时开滦已失败，于是讨论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当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最短期间内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便为成立该路总工会而起。“二七”失败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遭一顿挫。

自然那时我们在上海和广东均有这种总组织的企图，上海是没有成功，广东虽然挂起“广东工团联合会”的招牌，但实际上

没有基础。

海员工会方面,香港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虽由李启汉同志打进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顿。

工会组织的内容

无疑的在那样紧张那样迫切的罢工环境之下,对于组织无论如何是不精密的,更何况那时我们的经验实在太少。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每一工会内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员长,文书、组织、宣传、庶务、调查、交际各部。大会,代表会议,委员会议都是有的,但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一般的说,工会的秘书,确是我们派知识分子去充当,自然经过工会的同意,这个秘书帮助工会办事,久而久之,信仰巩固,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秘书专政”,这是有的。至于由我们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有几个同志确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他的勇敢和能干,为群众所拥护,至选举时,群众便选举了他,并非党的委派。

工会与党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当时确做了一个极大错误,这个错误不在党与工会的关系,而在于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最大错误是党的关门主义,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介绍个工

会会员入党,常郑重经过数月的考察。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后来,“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遗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铁路工会还有残留。

我们已经对于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流,有了一个一般的叙述,现在可以把当时职工运动里最大的几件事,分章的详细说一下:海员罢工,第一次劳动大会,开滦矿工罢工和京汉铁路的“二七”屠杀。

第四章 香港海员大罢工

海员的生活状况

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其最感痛苦的有四:第一,是工资的微薄。普通工资每月大概在二十元以下,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因此,海员工资不够单身维持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了。故中国海员中往往有因生活艰难而做偷运军火的冒险事业。但这种事业,幸而不被破获,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获,本人必须潜逃,否则必须被捕坐监或被杀。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

(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馆口”,约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第四,是失业恐慌。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手工业与农业破产,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于是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得肆无忌惮的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于轮船之外。香港一处,海员失

业的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就只有饿肚皮,睡马路。

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

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基于经济痛苦,他们就有起来斗争的可能,更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海洋轮船来往东西洋,他们受此潮流的激动,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就是内地亦发生不断的自发的罢工斗争,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了。

一九二一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从此便乘机开始从事宣传与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便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当时很难团结,工会依然还是空的。但工会此时已明白,要工会取得群众信仰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于是用工会名义向轮船办了几次交涉,如抗议殴打海员,和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更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因罢工后事实上工人必须离开香港回广州。关于罢工经费亦着手募集。又发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条件到各埠各船给海员传观,同时并派

人到各埠各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另外还联络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联络中国其他运输工人要求援助;各国工会凡知道地址的便发信要求援助。兹将要求条件列举于下:

(一)工资十元以下者加五成;十元至二十元加四成;二十元至三十元加三成;三十元至四十元加二成;四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二)工会有支配工人权(按即职业介绍权)。

(三)雇工合同签订时,工会有派代表权。

一九二一年九月,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十一月又提出,又不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次提出,并申言限二十四小时内答覆,否则罢工。当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约定对工会有信仰的轮船海员为领导罢工的中坚。果然不到十二小时,罢工便爆发了。凡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国的海洋轮船,霹雳一声,一致罢工。当时数约一千五百人。

罢工实施后香港政府甚为失惊,因为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这是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当然是英国人)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此时群众挤满工会内外,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

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陆续罢工。这种形势,很快的影响到新加坡,暹罗,上海等口岸。汕头亦随即加入罢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之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

于广州，于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

香港政府的恐慌

罢工之势既成，香港政府极为恐慌。一月十六日，宣布戒严令以恫吓罢工工人。十七日又出一通知，内中提出船主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其条件如下表：

轮船种类	海员要求 百 分	船主的还价 百 分	相 差 百 分
(一) 沿海轮船	三五·	一五·	二·
(二) 内河轮船(中国)	三二·五	二五·	七·五
(三) 其他中国的轮船	三二·五	二五·	七·五
(四) 省港澳轮船(英国)	二五·	一五·	一·
(五) 其他英国轮船	二五·	一五·	一·
(六) 爪哇线	一七·五	一二·	五·五
(七) 太平洋线	一七·五	七·五	一·
(八) 欧洲线	一七·五	七·五	一·
(九) 澳大利亚线	二·	一·	一·

由上表看来，海员的要求与船主的还价相差实在太远，于是海员不理，锐意扩大罢工。

的确，海员罢工可以致香港于死命。因为香港是一个孤悬海口的小岛，它的海上转运业，虽在远东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

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就骤形停顿，而物价则突然飞涨，看下表便知。

十三种食物市价表

食物（以磅计）	一月十日		一月二十四日
	价目（以元计）		增加百分数
米	·一三(元)	·二二(元)	六九·二
鲑鱼	·四	·六	五·
鲤鱼	·一三	·三二	一四六·
鲟鱼	·二四	·二八	一六·七
龙虾	·三二	·四	二五·
蟹	·三六	·四	一一·一
猪肉	·二	·二六	三·
羊肉	·三四	·四	一七·六
牛肉	·二	·三	五·
牛肉排	·一九	·三	五七·九
鸡肉	·三四	·四二	二三·五
鸡肉排	·三二	·四四	三七·五
鸭	·二八	·三二	一四·三

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

至一月底有香海运输工人同情罢工的事。当海员罢工时，本拟联络其他运输工会一致罢工。但运输工会非常复杂，大半由工头或小买办做中心，故当时尚意存观望。后来轮船越停越多，事实上他们已无工可作，经海员工会之活动，不到半月他们就

同情罢工了。从前有一两只船偷偷摸摸起落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则完全停顿。于是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旧历年关，香港形势更形严重。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并架大炮对住海员工会，将工会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

调停与破裂

香港运输工人既一致罢工，使香港政府更为困难，对付罢工政策，软硬兼施既均无效力，不能不出于托人调停之一道。首先嗾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向海员工会调停。海员工会说：“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遂无结果。

华工总会调停既失败，香港政府又嗾使东华医院用街坊名义出面调停，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东华医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其名义是一医院，其实是一社会集团，不用说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海员工会派了五个代表去，于是东华医院调停之一幕喜剧便开场了。

此时因香港政府封闭工会，拆去工会招牌，故海员工会的要求首先提出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绅士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是要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

封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关。海员代表说:“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绅士们见话不投机,乃改变态度,说起妙语来了: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们要顾念现在香港的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地饿死。海员代表说:“是的,香港居民将绝食,这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着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我们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要饿死了。我们此次罢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救济的话呢?”说来说去,不着边际。海员代表声言:“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且把同情罢工的工会也封闭,还要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政府既没道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叫政府给还我们工会招牌,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海员代表立起身来要走。绅士们知难挽回,便说:我们同去华民大人处说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员代表表示拒绝,后经绅士再三要求,海员代表方允许。

到华民政务司后,华民司说:“因为你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可以,但名称要改。加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举出代表按照公道评判,看那船该加,那船该减。”海员代表说:“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用莫须有的罪名,用机关枪拆去我们工会招牌,抢去我们工会家具,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哟,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前好得多(按意即谓市面萧条)。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我们

中国海员去到伦敦,他们还要我们一共参加。现在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同情罢工哩。说到加工资,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应该调解。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同时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国海员,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那我们‘唔领过的咁既啲’(按即不上这个当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第二承认加资条件,我们立刻上工。如工会招牌要改,那么加资问题也不必谈了。”海员表示明天回广州去,华民司说:“西人商会要找你们谈话。”

当晚上海银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 燕梳公司大班等请海员代表谈判,非常秘密,不许旁听。他们问:“你们愿意华民司参加吗?”海员代表说:“有什么不可以。”华民司亦一同参加。洋资本家说了一套与华民司相类似的话,海员代表亦用与答覆华民司相类似的答覆。说到恐吓罢工一事,海员代表否认,华民司说:“是事实,现在许多人愿回香港做工,你们强迫他们不许回来。”海员代表说:“省城太远了。拿香港来说吧,有馆口一百三十余间,每间总有数十人,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工?是谁恐吓他们。”说到加资一事,海员代表说:“找公正人调查评判,我们不能接受,只有说定加多少,大家签了条约,才是实际。”说来说去,说了几个钟头,海员代表坚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他们说这事要请示“兵头”(按即香港总督,他有统率香港海陆军的全权,故俗称之为兵头)。一场谈判无结果而散。

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了,香港政府暗使华商总会约海员代表去谈话,劝他们明日莫回广州,等西商请示“兵头”看有什么商量?有罗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绅士,约海员代表到他的写字楼

去,他说:“今天的事你几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什么叫帮助?你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他说:“一切都在你们身上,你们说什么就可解决。”海员代表已料定罗旭初有行贿的意思,乃说:“我们什么都取决于罢工工人,那能说在我们几人身上。”说毕不顾他的强留而走了。

第二日华民政务司叫海员代表去,拿出公文来,大意与华民司昨日所说相同。海员代表立即拒绝。说:“工人委托我们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现既办不到,带此公文何用?”既而说:“带回公文也可以,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并不是接受了公文上的什么条件。”

香港政府布置了这一网,假使海员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会落在他们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国的大绅士、西商大老板、华民大老爷,从前眼角都不瞧工人的,今则这样和顺与谦恭,甚至于表露行贿的意思,如果海员代表稍一动摇,全盘糟了。然而海员代表却不激不随,坚持到底,应付裕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海员代表之一便是苏兆征,说话亦以他为最多。

双方的鏖战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政府乃改变了策略,进行破坏罢工。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便因此被捕入狱。但在上海所招得来的新工几百人,经过汕头时便给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菲律宾印

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佛。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藩院,终被判决死刑,绞绝)。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

罢工海员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二月中旬罢工的船只有如下表:

英国	八二只	五八、三六八吨
中国	三六只	三、一六六吨
日本	一五只	三六、四七四吨
荷兰	一一只	二七、四一七吨
美国	八只	一四、五二九吨
挪威	七只	八、七九八吨
法国	四只	三、五三吨
丹麦	一只	一、四五六吨
葡萄牙	一只	一、一四五吨
暹罗	一只	九九八吨
总计	一六六只	一八二、四四吨

这次罢工实在太可怕了,好像时疫一样,传染得异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并不要工会的命令,他们便自动的离船上岸。所以各地轮船都认香港好像一时疫区域,不敢开来,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或者径直不停,由西来的直达上海,由东来的直达新加坡或小吕宋。

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激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我们要大家同情援助,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海员工会此时便根据此一决议向各工会大肆活动,工会都表同情。但不能立时即罢,因香港一般习惯,工人须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资,此时正是二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会共派出七个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商议筹备一切,并组织“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他们只提出援助海员,并未附加自己条件。

虽然如此,当前却来了一个障碍,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准备同情总罢工的消息后,便嗾使机器工会(本名“华人机器会”,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又说:“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我们可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种宣传居然发生极大效力。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即派在广州筹商总罢工的七个代表回港制止调停会之实现。同时海员工会召集大会,宣言:“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大会一致决议不受什么工人调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群众异常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口号。此消息在报上布露流传香港后,港工人憬然觉悟,取消调停会,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

得粉碎。从此便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

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知全市总罢工就要到来,宣布欧战时一样的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离港者要铺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谣言四起,罢工海员率性放火烧了香港三个贮藏粮食的货仓,于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

但香港政府虽下战时戒严令,然而工人并不害怕,月底领得工钱后,大家收拾被袱乘夜过海,预备天亮步行回广州(因火车已停)。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场)一律罢工,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终无如之何。只得调遣全部海陆军警巡查街道,加紧戒严。

沙田惨杀

十余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三五成群,络绎于道。行到沙田地方,该处有大队英国军警驻扎,禁止工人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工人非常勇敢,大声高呼:“不要怕,前进,去啰去啰!”一呼千应,声震山岳。英兵开枪扫射,当时死四人,伤数百人,后因重伤致死者二人,是为“沙田惨杀”。工人被英兵开枪击散后,有绕山背回广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绕回的,也有中途闻讯退回的。但是退回并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楼底,军警见三四十人一堆

的便枪击驱散。政府禁止饭店借给成堆的工人煮饭。

香港政府满拟此项铁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起工人愤激,不肯开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

沙田惨案发生后,罢工海员更形愤激,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

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

我们这里要来约略说说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当工会准备罢工时,本已筹备经费,但为数极微。所得之数不够罢工海员回广州的火车费。陆续回广州的海员人数不下五万人,后来又加上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数更众多了,罢工经费当然拮据万状。幸而此时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约十万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得以支持(其时广东的政象是这样:一九二一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而有所谓“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联合政府。南方护法讨段之目的既失,于是岑孙分裂,岑去孙来,另建立政府,自为总统,继续抗北。但孙之部将陈炯明势力益大,与孙不睦,孙不得已以广东交陈而自去广西之桂林督师北伐。海员罢工时孙陈冲突愈益紧张。陈炯明是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的,此次海员罢工,所以他极力表示帮助,其用意不用说是在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之以帮助自己倒孙的事业。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亦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却利用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作政争)。

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刚刚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着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

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罢工开始时苏兆征便是总务科主任。后来,会长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会公举苏兆征代理会长。

此时还不知组织俱乐部扮演新剧等,罢工工人无可消遣,不下雨时就舞狮打球。后来在观音山附近开修一条马路,定名海员罢工路。

外界的援助

香港工人同情罢工援助,足见其阶级同情之深。广州工人援助亦极踊跃。就是远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亦热烈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次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休戚相关之义,一面捐款援助海员罢工。最有趣的,是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

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是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举。在国外的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示慰问及援助，但均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时广东有一华俄通讯社，系苏联所组织，海员工会和它建立密切关系，每日以罢工消息报告，请其转达各国。那时海员工会便常致电法国《人道报》——共产党的机关报，请其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予以援助。

此时中国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小资产阶级不用说表同情，就是资产阶级，亦有对海员罢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质相援助的。

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

香港政府对于罢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后，更见狼狈万状，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领事并派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很哀怜的说：“香港几十万中国居民没有粮食，必会饿死，我们白人在那边并不多呢。”要求海员工会先准香港船来广州自由采买粮食。海员工会说：“可以，你叫船来，但买不到粮食不关我们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军开一船来，但来了一天，一块肉一粒米都买不到手。叫艇艇不来。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把空船开回香港去。

海员工会知道提出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二月七日召集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

(甲)暂时办法如下：

一、工人月薪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

三、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

四、必首先承认后面丁项原则，然后可谈暂时办法。

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全体即刻复工，由公断处商议（丁）项决议案。

（乙）公断处设在广州。

（丙）公断处由下列人员组织之：

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

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这个公断处有讨论解决罢工之权。

（丁）中国海员工会提出下列八条，请求公断处讨论。

一、工人工资在每月三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三十，在三十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业或降职。

三、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

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

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

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

七、加工资日期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

决议之后，电告香港政府，并于（丁）项所列八条之外，再加一条，“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与被禁之办事人。”

罢工的解决

香港政府此时除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外，再也无路可走，七十年来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政府接到海员工会电报后，叫沙面英领事要求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谈判。海员工会派出代表四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去香港。香港政府承认组织公断处。此公断处屡次在香港和广州开会，到三月五日，把条件议妥，签字解决。全文如下：

下列条件经各签字于条约者同意，认为解决双方争执的办法：

（一）兹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二号在香港应支之工价，须由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一号起增加如下：

甲、华人内河轮船	加三成
乙、其余华人轮船在一千吨以下者	加三成
丙、省港轮船公司	加二成
丁、其余英人轮船公司(以省区港澳轮船公司之 工资为底)	加二成
戊、沿岸轮船	加二成
己、来往渣华轮船	加一成半
庚、来往太平洋轮船	加一成半

辛、来往欧洲轮船 加一成半

壬、来往澳洲轮船 加一成半

(二)须订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价折半支給。各船东须用回其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供职,又如双方允肯,则安置其在别船供职亦可。如各船回工无席位,则于无席位用他期内,须折半支給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计,不得过五个半月为限。此项折半之工金款项,另委管理人管理之。

(三)各船东允愿襄助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付船员工金之弊病。

关于工资一项,其百分比,结果如下表:

	解决条件	海员要求	相 差
一、沿海	二 .	三五 .	一五 .
二、内河(中国)	三 .	三二 . 五	二 . 五
二、其他中国船	三 .	三二 . 五	二 . 五
四、省港澳(英国)	二 .	二五 .	五 .
五、其他英国船	二 .	二五 .	五 .
六、爪哇线	一五 .	一七 . 五	二 . 五
七、太平洋线	一五 .	一七 . 五	二 . 五
八、欧洲线	一五 .	一七 . 五	二 . 五
九、澳大利亚线	一五 .	二 .	五 .

除上列条件之外,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沙田惨案死者每人优恤一千元,也答认了。

总而言之,此次罢工算是得到胜利。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八日止,共罢工五十六天。

庆祝罢工胜利

罢工胜利之后，工友们自然欣喜奋发，首先就在广州举行庆祝大会，随后回香港又举行庆祝大会。会中情形，略而不叙，我们这里只简单叙一事，即启封工会时之盛况。海员工会招牌曾被香港政府拆去，三月六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二月一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工会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给还海员。当重行挂上工会招牌时，罢工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祝，人数不下十余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欢声雷动中，一致仰着头，看招牌徐徐地挂上去。爆竹连天，声震全港。

这次罢工的教训

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国航业几乎全系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远洋船一条也没有，沿海内河船也不及外资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海员与帝国主义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直接的仇敌。这是中国海员斗争的特殊意义。

此次罢工胜利的原因，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是一个利于斗争的环境；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中国旧历年关），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运

输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应付策略的适宜(特别是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等。

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工时而在于罢工后，罢工胜利了，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致到了后来一九二四年，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做驱逐工贼运动，而把苏兆征(罢工胜利后仍回船作工)从船上叫了回来整顿工会，方逐渐恢复旧观。但胜利条件帝国主义却至今仍未履行。

虽然如此，此次罢工在当时总算是胜利的，它的影响，及于全国，所以它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的意义便特别重大了。

这次罢工还有另一结果，就是影响广东政府把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之条文明令取消。

第五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及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召集

中国共产党见当时罢工高潮之到来，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集。共产党召集此次大会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便发出通告，一面登报，一面发公函，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于五月一日开会。

通告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凡四：

- (一)纪念五一劳动节；
- (二)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
- (三)讨论改良生活的问题；
- (四)讨论各代表提案。

大会情形

此次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百余工会，二十七万会员。代表当然以广州香港两地点为最多，因其近便，占全体百分之八十。其来自北方及长江一带者，据记忆所及，铁路方面有长辛店、江岸、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矿山有开滦、安源各工会；城市方面有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江西等各处工会。

五月一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偕同广州市工人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巡行到第一公园，开大会，群众极为热烈。当晚劳动大会开幕。

大会代表成份非常复杂，就其大者而言，有共产党派，有国民党派，有无政府党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在这样一个复杂成份的大会中，不消说会要发生冲突。就在举行开幕那一次会上，为了主席团名单的问题，便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几乎把大会捣乱。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

据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十万。

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他们提出理由,却是从另一方面说话,主张根本不要主席团;本来“主席团”这个东西是新从苏联搬去的,中国开会旧例只有一个主席,没有什么主席团,因此不为大会群众所了解,而无政府党就利用这一点企图捣乱会场。为了主席团名单问题,争辩数小时,无结果而散。

但是共产党在大会中是有威望的。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就是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工会代表(只江西和上海少数代表除外),人数虽少,却是外省来的,因此引起广州香港代表相当的尊敬。再则共产党在当时确尚非各派反对的目的物。所以大会场的布置,完全赤色,三大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派均未提出异义。也就因为共产党在大会中有极大的威望,主席团名单问题,后来成了不解决之解决。由一个共产党员主席到底,各派均无异言。

主席团问题虽然是不解决之解决了,但大会过程中却在别种问题上仍是不断的发生冲突。就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五月五日孙中山就大总统周年纪念,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全体到总统府庆贺。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者去,无政府党工会代表根本反对,引起一场其势汹汹的大争论,结果,还是照共产党的主张通过。本来国民党当时所需要的只是这个“面子”问题,那时国民党并未注意这个大会,因为国民党那时根本只看见军事势力,而

未看见民众势力。那一天讨论时,国民党工会代表甚至暗怀手枪入场,这可见他们是如何有决心争取这个“面子”啊。国民党工会代表之所以如此决心,当然有他的背景,因为引领工人去庆贺,可以在孙中山面前邀功,做猎官的阶梯。

大会一共开了六天,会场上虽常发生冲突,但大体总算顺利过去。大会上给了工商组合团体的代表一打击,因为实际上他是资本家,虽则是小,所以当他登台发言时,工人们指着会场的悬额说:“这里明写着‘工人讲坛’不是商人讲坛,请下来吧!”

此时工会确还没有分化,广州、香港工会分明包含许多极坏的成份,然而那时他们对于外省来的代表确是“相敬如宾”,故在大会的数天内,每天晚上都有几起欢迎劳动大会代表的茶会、宴会或演剧。比方现在最反动的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那时也是极其客气的。而且每次欢迎席上总是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及外省来的代表提前演说。但这里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海员工会的欢迎席上,前十名都请的是国民政府要人演说,记得轮到邓中夏时,已经是十三名了,其余工会代表签了名而竟不被主席邀请。海员工会在五一节那一天在海旁街口扎了一座雄伟奇丽的花牌楼,左右一付对联,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这次欢迎会是用西式大餐,满屋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事实,都可看出那时海员工会对国民党信仰到了如何程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国民党政治上和物质上切实的帮助(请参看第四章),于是也就把阶级意识模糊起来了,更何况当时会长便是现在为全体海员痛恨的著名的工贼陈炳生,欢迎会上不把工人代表放在眼里,自非偶然。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当时共产党对于海员工会的影响又是如何的薄弱!

还有一点须补说的，国民党在欢迎席上宣传说：“劳动大会能在广州自由开会，这就证明只有国民党才给工人以自由”。当时我们的答覆是“自由是天赋的，不是什么人给我们的”。这种见解现在看来虽觉可笑，然而也可见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取工人影响的斗争。

大会决议案

现在我们来说到大会决议案了，可惜得很！原文完全丧失。凭能记忆的写在下面：

大会决议案共九个：

- (一) 八小时工作制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
- (二) 罢工援助案（同上）；
- (三) 工会组织原则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代表邓中夏提出）；
- (四) 铲除工界虎俵案（上海机器工人联合会代表许白昊提出）；
- (五) 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提出人未详）；
- (六) 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湖南劳工会代表提出）；
- (七) 规定海员罢工沙田烈士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提出）；
- (八) 明年五一节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劳动大会案（大会临时动议）；

(九)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大会临时动议)。

这些决议案一望而知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术,然而当时大会的代表的智慧确只有此限度。不过其中须指出的,就是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成为大会最热心讨论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在那样罢工的高潮中,这三样东西都是工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

三案的内容大致如下:

罢工援助案 理由之外,胪列具体办法:一、凡每地罢工发生,须通知各地工会,特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负此通知责任。二、各地工会得到罢工通知后,就须广为宣传,通电慰问,捐款援助,并致函该罢工工厂资本家,威责其接受罢工工人条件;又各致函各地官厅,责成催促罢工工厂资本家从速解决。三、如罢工工厂资本家执迷不悟,先由附近及有连带关系之工厂举行同情罢工;如不解决则举行当地全市总同盟罢工;再不解决,举行全国总同盟罢工。这些援助办法在今日看来虽有可议之处,但确为当时大会代表讨论的结晶。

工会组织原则案 主要的是确定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只手工业工人方能斟酌采用职业组合。这个原则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观念。中国革命工会一开始就依次成立以产业为标准的组织,比之西欧工会还有一日之长,当非偶然。

铲除工界虎伥案 什么叫“虎伥”呢?中国有一故事,人为虎吃,这人的鬼魂须为虎效劳,为它另找一人给虎吃,然后才能超生。这鬼魂就叫做“伥”,譬喻一个人替恶人效劳,叫做“为虎作

仗”。当时还没有工贼这一名称,其实“工界虎伥”就是工贼。这案的内容就是规定如何对付压迫工人和破坏罢工的工贼。

这次大会的成功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的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虽然这次大会有极大的缺点,但无论如何它给予全国工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只看大会以后,中国罢工高潮便发展到最高度,就可证明。

这次大会之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抬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议决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劳动大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准对着罢工高潮制定一个目前斗争纲领,弥补这一缺点,则为七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我在第三章便已说过,从一九一八年起,广东便已建立与北京对立的政府,以护法为号召,迁国会于广州,从此南北完全分裂。一九一八年后,南北政府双方都发生不少的政变与战争,此地当然不能详细叙述,只能略述一九二二年即罢工高潮时的政

治状况，那年夏天，南北皆发生战争，北方为奉直战争，南方为孙陈战争。奉直战争的结果，张作霖失败，吴佩孚宣言恢复国会；孙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逐，陈炯明宣言取消南方护法政府；因此，国会在广东不能立足，应吴佩孚之召，重回北京，而有所谓“法统重光”的滑稽剧。国会重开，进行制宪，其实这些猪仔议员，那里能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

劳动法大纲

书记部拟定劳动法大纲如下：

- (一)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
- (二)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
- (三)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
- (四)承认劳动者有国际联合权。
- (五)每日昼间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超过六小时，每星期应予以连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 (六)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及剧烈劳动之劳动时间，不得过六小时。
- (七)禁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如有特别事故，须得工会之同意，方可延长之。
- (八)农业劳动者之工作时间，虽得超过八小时，但对于超过时间之工资，须以八小时制为标准而计算之。
- (九)以法律保障农民(不掠夺他人的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

格,由农民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 (一) 剧烈有害卫生及法定之工作时间外之劳动,不得使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工人为之。
- (一一) 对于需要体力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六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
- (一二) 十六岁以下的男女工人不得雇佣。
- (一三) 为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计,国家应制定保障法,制定此项法律时,应许可全国劳动总工会代表出席,公私企业或机关之工资均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 (一四) 各种劳动者有由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之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之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 (一五) 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应设立劳动检查局。
- (一六) 国家对于劳动者,应予以完全参加劳动检查局之权利。
- (一七) 一切保险事业规章之订立,均应使劳动者参加之,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或机关中劳动者所受到的损失,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分担之,不得使被保险人担负。
- (一八) 各种劳动者,一年劳动期间中应有一个月之休假,半年中应有两星期之休假,其期间有受领工资之权。
- (一九) 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劳动立法运动之扩大及其影响

书记部以劳动法大纲通知全国工会,并号召其进行此项劳动立法运动。首先响应的是唐山铁路、矿山、纱厂、洋灰厂各工会,组织“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为大规模的示威大巡行,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书记部提出的十九件劳动法大纲。继起者为郑州铁路工会,通电全国工会一致进行,并电国会,谓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为我等工人最小限度的要求,务须完全采入宪法中。长沙亦举行劳动立法大会,并组织劳动立法的大同盟。其他各处均有大同小异的运动,皆电国会一致要求,与书记部遥相呼应。

书记部见各处劳动立法运动已发展,乃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作广大的宣传。

其时因吴佩孚通电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于是国会议员亦有借此投机者提出保护劳工法案,当然他们所提出的与书记部提出的恰恰相反,书记部遂于招待国会议员席上作无情的批评,特别是工人代表的发言,声色俱厉,以致议员不得不当面谢过。

但国会议员历年来的无恶不作,声誉狼藉,早为全国人民所齿冷。此次宣言制宪,无非为恢复已失之声誉,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之劳动法当然不能望其通过。虽然如此,而这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却深入了工人群众之中,变成了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

第六章 开滦五矿大罢工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叙述。

中国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矿山,就是从开滦开始。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开滦便已开工。此矿起初虽系中国政府独立经营,但后来因资本关系,借贷英款,变为中英合办,实际上也就变成隶属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企业了。

开滦系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而成,全年约产煤四百余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百分之二十。矿工共约五万人。

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中国矿山大抵都采用包工制,开滦当然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因此,工人虽卖劳力,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之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一角可换二十枚至三十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再则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有。

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输光在赌博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借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二十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六十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谓。其他凌辱打骂,更是不用说了。

罢工的爆发

开滦矿工以前亦曾因不堪其苦发生过小小斗争,但都是旋起旋灭。一九二二年的罢工高潮,必然激荡了开滦矿工,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为他们所目见的事,于是引起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罢工。

十月十六日,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要求。其重要条件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在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在五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每一工人应得一个月花红。

(三)工人服务满二十五年的应另加一个月花红。

(四)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贴津贴。

(五)工人在受雇期内死亡,应由局中给以五年工资之恤金。

条件提出后,矿局拒绝,工人大愤,于是召集大会,继续提出两条:

(一)工人现时正在组织俱乐部,应由矿局承认。

(二)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

这样形势愈趋严重,矿局为缓兵计,于二十日宣布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三十元以下的增百分之十。工人不满意,于二十三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二十六日马家沟亦罢工。整个开滦煤矿都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矿局门首的喋血

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视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

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有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由天津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经济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五十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牺牲)同志亦被捕。

罢工工人的坚持

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于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书记部当时有一错误,即未多派得

力同志前往，固然当时因各地罢工纷起，到处需人，应付实感困难，但无论如何开滦罢工关系至钜，就有如何困难，亦应多派得力同志前往才对。自罢工总领袖潜逃后，书记部特派员大感困难，重新提拔新领袖，一时又来不及，但领导虽失，工人群众却非常坚持，他们并不因喋血而气馁，只看当时竟无一人私自复工，便可证明。

最后的失败

开滦罢工事前毫无准备，事起仓卒，罢工经费当然没有。书记部在北京方面借款，一时不能到手。罢工人数又多，每人发一角，每日便须五千元。罢工工人忍饥受饿，一直坚持到二十日之久，最后由当地军队师长和滦州县知事出面调停，其结果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

(三)工人在罢工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这个调解条件当然与罢工工人原来要求条件相去太远，但罢工旷日持久，的确工人再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方始忍痛逐渐复工。

书记部对于此次罢工的确异常重视，曾召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会议，拟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为开滦声援，但等到代表到京，开滦已最后失败，来不及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失败,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的错误,举其大者如下:

(一)准备太不充分:这次罢工是被当时罢工高潮所刺激,工人们迫不及待而宣布罢工的,因此,一切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都未准备,如工会就是在罢工前数日才组织的,关于罢工经费,事前更是作梦也想不到。

(二)组织太糟糕: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上层组织。开滦五矿范围数百里,岂是一个机关所能指挥,最低限度至少每矿须有一个指挥的机关,那时没有,其他可知了。

(三)领袖非人:其时罢工总领袖本一投机分子,未有任何斗争经验,我们当时未能于广大群众中选拔多数积极的骨干分子,以致领袖一跑,便难于为济。

(四)罢工经费不足:矿工生活既苦,那有积蓄,罢工下来,如无金钱接济,便只有挨饿。这一点是对于矿工罢工更要留意的。

第七章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

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

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罢工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做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我们这里将这个光荣的罢工加以叙述。

这个罢工是为成立全路总工会而起,我们提前略略叙述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以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陆续组织分会(当时都叫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各站皆组织就绪,共得十六个单位——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等处。组织的原则是这样,每站工人过百人以上的即组织分会,不足百人的则隶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一次会议,筹商组织总工会,决定先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在郑州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二次会议,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长辛店罢工胜利,更促进工人对于成立总工会之迫切要求。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开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此时即交通系御用的“交通传习所”亦自动取消,原有之百余工人悉数加入工会),成立总工会之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定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附录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一章 宗 旨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京汉铁路总工会。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第三条 本会地址设郑州，于长辛店，江岸，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及其办事处的地址得由执行委员会随时议决迁移之。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凡京汉铁路的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赞成本会宗旨，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服从本会及所在地分会命令者，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凡京汉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

第六条 凡真实热心赞助本会的人，在某站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或经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直接认可，均得为本会名誉会员。

第七条 本会会员之权利如下：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有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二、本会谋得的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讲演、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四、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的补助权。

第八条 本会会员之义务如下：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

规约及各种议决案之义务 ;二、有尽力拥护本会 ,为本会尽忠服务之义务 ;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 ,办理本会各种事务之义务 ;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之义务。

第九条 名誉会员与会员有同等之义务 ,但只有发言权。

第三章 组 织

第一 条 每站或数站联合有工人五十人者举代表一人 ,每增加五十人者加举代表一人 ,组织全路代表大会 ;每年由本会执行委员定期开会一次 ,遇特别事件发生 ,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

第一一条 每次代表大会 ,举定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每四个月由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 ,并得开临时会。

第一二条 由执行委员会互举正委员长一人 ,副委员长二人 ,任期一年 ,但随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改选之。

第一三条 由执行委员会派定干事若干人 ,组织干事局 ,设总干事一人 ,其余干事分作秘书、调查、庶务、教育、交际等科办事。

第一四条 凡人数满百人的车站 ,须组织分会 ,名曰“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 ,凡人数不满百人者 ,举出代表 ,加入临近的车站分会 ,设立执行委员会 ,其组织法 ,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另行审定之。

第四章 职 权

第一五条 本会代表大会 ,为本会最高机关 ,审议本会预算、决算案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

第一六条 在两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下:一、决定预算案;二、执行大会议决事件;三、决定代表大会未决定的一切问题;四、征收会费;五、议决对外交涉事件;六、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

第一七条 正副委员长常住总工会所在地,代表本会,总理本会经济及一切事务,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一八条 干事局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命令,办理一切事务。

第一九条 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办理本会所在地一切事件。

第五章 规 约

第二 条 凡举行全路罢工事,必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会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举行。

第二一条 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如不服从时,得令其改组。

第二二条 某分会反对委员长时,由执行委员会判决之,反对执行委员会时,由代表大会判决之。

第二三条 各分会彼此不得相争,如遇争端,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或委员长解决之。

第二四条 本会会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如下:一、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二、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次及其各种规则;三、不得顾全个人私利,违反公共利益;四、不得破坏本会和有碍会员的言动;五、不得迟缴或不缴会费;六、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七、不得无故退会。

第六章 经 费

第二五条 本会会员每人每月须缴纳半工工资，特别捐临时规定。

第二六条 全体会员每月所缴会费，各分会每月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存作本会基本金。

第二七条 本会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通过，不得支用。

第二八条 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之。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九条 本会会议细则、执行委员会细则、干事局细则及各分会组织大纲均另定之。

第三 条 本会章程经代表大会过半数之通过，得修改之。

第三一条 本会章程经各站分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宣布之日起才能实行。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

军阀吴佩孚的处心积虑

我们在第三章便已说过，奉直战后，吴佩孚四大政治主张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不用说这只是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欺骗。吴佩孚后来对于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欺骗手段，如宣传设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

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但工人却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笼络，他们却不顾吴佩孚的意志，八月间在长辛店干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无疑的使得吴佩孚疾首痛心，因京汉铁路收入为吴佩孚军饷的唯一来源，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得吴佩孚每月损失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长辛店罢工胜利条件，每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故路局每月须多开支工资六万），再则工人气焰日益增高，变生肘腋，又为意中之事。原拟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却“另有异图”。因此吴佩孚决计准备对付工人。吴佩孚这种准备表现得最明显的，一是组织“学兵队”，学习开车；二是嗾使南段段长冯沅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但吴佩孚这些方法，收效甚微，首先是“学兵队”遭着工人猛烈的反对；“同人通谊会”只有员司加入，而工人则一个也没有。一九二三年二月工人公然要组织全路总工会了，实逼处此，所以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再不能耍了，爽直的实行屠杀。

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前夜

在本会方面，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未料及有如是之速。故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纯取公开态度，将开会宗旨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向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得其允许，赵继贤当时还特准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工会方面以为如此公开，当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一月二

十八日,意外消息到了,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会声明,谓吴大帅禁止开会,该会受此意外压迫,甚为情激,决计不顾军阀干涉,依然筹备二月一日开会。三十日,忽得吴佩孚电,召工会代表赴洛阳计议,工人派五人前往。

代表当日到洛阳,吴辞不见,次日早才得见吴佩孚,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吗?改期不行吗?改地方不行吗?其实会过餐也可开会,在屋里也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官长,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正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要非开会不可,我亦没有办法了……。”工会代表据理力争,吴佩孚但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不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歼灭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谈话的微笑中。

悲壮激昂的大会

三十一日,代表赶向郑州,报告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各站到会代表与各地工会来宾,皆异常愤慨,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开会,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工人开会根据民国约法,不受非法干涉。于是悲壮激昂的大会,于原定的二月一日在普乐剧园开幕了。

先是各路及各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的请

帖,无不兴高采烈,纷纷派遣代表到郑州庆贺。共计来宾约一百三十余人。

本路各分会代表完全到齐,共六十五人。

二月一日清晨,代表及来宾全体整队向会场出发。但此时市面已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代表来宾无不笑军阀小题大做,又无不恨军阀妄自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整队前进,以军乐前导,以各路各处工会所送匾额等次之。各人手执红旗,顺序而行。郑州铁路工人,则全体齐集普乐剧园,出发迎接。代表及来宾队伍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瞄准示威,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相持二小时久,最后乃不顾生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

当时由主席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压迫的可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会场已被军队包围,黄殿辰百般威吓,迫令解散大会,但是群众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总罢工之决定及其宣言与要求

是日下午,代表及来宾所住旅馆,皆被重兵包围,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的酒席也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对联等,也尽被摧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军队占领,驱逐职员,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说:“是奉吴大帅命令。”

在这样极端侮辱与压迫之下,工人们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守之可能。各路各地工会来宾目击此种情形,极为愤慨,当晚离开郑州时,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谓:“京汉铁路总工会之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总工会当晚召集秘密会议,决议:

“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

又议决提出五项要求,并即日正式发表宣言。其原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和对联,均被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杂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军警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

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暴横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啊！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查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运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们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人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

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鹗。

地方长官军警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住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总罢工的经过

果然，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罢工实现了。那天上午九时，中段罢工；十时南段罢工；十一时北段罢工。不到三个小时，全路罢工了。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

江岸方面

罢工的第二日(五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先使该地警官，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工会答以“如有对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谈判，否则，恕不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张厚生在工人家内拘去开车工人，强迫开车。总工会当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及厂门者约二千余人，冲破军队防线，将二工友抢回。正午，又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总工会派人要求释放。

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百人，共二千余人持旗帜到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到者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申述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杨德甫于罢工失败后便反动了，现为国民党的走狗)，继由各工会代表数十人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最后向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

致答词,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熏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长辛店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早,召集全体大会,到者三千余人。主席报告总工会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会毕即罢工。工人待遇旅客极有礼貌,男子为代雇车马,女子则延至工人家里住宿,次日护送至京。故当时社会人士对罢工工人均表好感。

罢工第二日(五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亦举行罢工。赵继贤此时已得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乃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理,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答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午后,曹锟派兵到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亦遂前往示威,并向兵士宣传,士兵有为之感动至泣下者。

罢工第三日(六日),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为可疑,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一时全市突然紧张,但工人态度仍不稍变。正午,赵继贤由塘沽运来新工百二十名,另挑选五百兵士,随同学习开车,并宣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

仍置之不理。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前来说劝上工,工人答以“由总工会作主”。下午,涿州军队开到。

郑州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谈话,靳见面大骂,勒令开车。工会代表答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拒绝之。

罢工第二日(五日)晚,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三人。工人闻讯大愤,敌忾之心,更为坚决。

罢工第三日(六日),又捕去工会委员两人,上午靳将被捕五人推至车站威吓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更愤激。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总之,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的口号。

“二七”惨杀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北京公使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不用说是意在怂恿政府立即用武力解决罢工。

在汉口的英国领事,更活跃了,六日,召集萧耀南代表及洋资本家在领事署开会,讨论应付罢工之策。其时群众示威游行正经过该领事署,谁知此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正在指导军阀屠杀工人的方略,果然第二日(七日),军阀便开始血肉纷飞的屠杀了。

吴佩孚本已准备好屠杀工人,此时又得帝国主义之指点,遂

下令于七日南北一齐下手。

江岸方面，数日来张厚生用了许多诱骗方法，拟先将总工会领袖一网打尽，但均被总工会识破。总工会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并要求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并说：“张参谋长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又说：“条件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其言甚甘，总工会已起疑心，乃开一假姓名名单予之。不久警官又来，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到，匆匆别去。至五时二十分钟，全权代表正准备到工会相候，半途忽闻枪声大发，于是流血惨案就开幕了。原来警官之来此，为诱敌之计，以为时候已到，重要人物皆在工会，张厚生率领军队二营急驰而到，先将总工会包围，开枪环击。当时纠察队有数百人在总工会门首守候，但皆赤手空拳，无以抵御，当被乱枪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伤者共二百余人。工人犹死守工会，相持至数十分钟，得总工会退却命令，方渐次退散。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数十皆缚于车站电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灯找出林同志，回顾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声说：“不上！”张又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

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忘八蛋的军阀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枭首。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如此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纪律严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才能有此。

同日长辛店方面亦有惨杀的事情。六日晚军队便搜查工人宿舍,时值严冬,深夜奇寒,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工人妇孺,哭声露天。当捕去史文彬、吴汝铭等十一人,剥去衣履,加上镣铐,准备天明解往保定。天明,工人群众三千余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还我们工友 还我们自由!”军队向群众开枪,弹如雨下,继以马队践踏,数千工人遂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无数。军队更乘机大抢,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

其他各站亦有惨杀情形。

施洋同志亦因此被杀。施洋同志本一律师,年来努力职工运动,在武汉各个罢工斗争中,皆亲身参加,因此得到工人群众极大的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京汉罢工,施同志当然是最出力之一人,湖北督军萧耀南,将其拘捕,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杀于武昌。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

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左: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

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惧。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议决“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 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 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 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

城市。

北京 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 ,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的示威游行运动 ,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 ,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二七”惨杀以后 ,北京又举行五千余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 “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 ,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 ,准备罢工 ,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 ,派其副官到上海 ,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 ,部址被查抄 ,职员被通缉 ,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 ,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 ,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 ,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 ,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 ,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 ,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 ,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

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广泛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

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着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之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第八章 职工运动消沉期

“二七”失败后之残破局面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这样浩大的损失,无疑的要转到一个消沉期。我们现在来检查“二七”惨变所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

京汉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不用说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会也由公开的而转为秘密的,当时尚称完好的只有广州和湖南。

“二七”失败,死者、伤者、入狱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样众多,书记部此时的当前责任,便是救济问题,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书记部一面在国内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会要求援助,并组织专门委员会,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以其捐款散发被难者。

就全国情形而论,此时工人阶级确已陷于消沉状态,虽然

有少数零星的自发的罢工，甚至还有千人以上的罢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恒大纱厂一千余人的罢工，装订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罢工，五月中之皮箱业工人一千余人的罢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数千工人的罢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余人的罢工等。但无论如何，这些罢工一大部属手工业工人，且多数失败，故给予当时的影响是不大的。

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

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长沙市民举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顺大连湾原租给旧俄，日俄战后转给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满，故当时各地有收回旅大运动），日本兵舰水手枪杀码头工人，全市工人曾举行一次抗议惨杀的总罢工，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工人虽处防御地位，而其势力尚得公开存在。直到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以后，湖南职工运动才完全进于秘密状态，因为赵恒惕不仅以铁血摧残水口山工人，连带亦以强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会。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

路矿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

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此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有两点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头每月收入如是之丰,欲其相安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弊(“吃点”就是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的工资,而只雇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即归工头腰包。“买空”就是如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虚报一千吨,此一百吨之价值即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买灰”,该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经化验,磷灰轻者奖,重者罚,灰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赂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磷灰立减,不爽毫厘)。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惩,此时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

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总代表五十一人)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百代表会议(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为俱乐部复决机关,十代表会议(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则听俱乐部之报告。至于全体部员大会,一年开一次,如有要事,临时召集,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这种组织,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诚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

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了。

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

“二七”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右倾的取消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现今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到整个陈独秀主义,而只就其与职工运动有关者略略提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

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断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这样，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上便是取消职工运动。不仅取消职工运动，他当时还主张取消共产党呢！他当时公开的说：“混蛋的中国，便有混蛋的无产阶级。混蛋的无产阶级便有混蛋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该早成了几年，所以弄成一个三不象的共产党。”真的，陈独秀此种观点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于是另一中央委员就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即是要劳动运动也只能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量齐观，而共同的隶属于国民运动之下，做国民运动之一部分。”在这种取消主义的观点之下，无疑的中国职工运动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

陈独秀这种叛卖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曾受着抵抗的。比如邓中夏当时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报上，就曾经作

见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刊载的陈独秀所作《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

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刊载的陈独秀所作《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

文章批评过这种观点,在党报上而且是指出这位“家长”陈独秀的名字公开批评的。

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

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

这里须说到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因为它与职工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未改组以前,本无所谓工人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才明白规定。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还叫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相号召。革命成功以后,改名国民党,此时新加入的成份更为复杂,贵族官僚,将军政客,无所不有;因为那时国民党拟与袁世凯争权,企图建立所谓“政党内阁”,故广为延纳,以扩党势。癸丑(一九一三年)反袁战争,国民党一败涂地,于是该党党员纷纷向袁投降,党遂瓦解。孙中山逃亡海外,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到后来南方举行所谓护法战争,孙中山回粤,恢复国民党名称,上添加中国二字,以示区别。其实孙中山那时醉心军事运动,所谓“党”也不过粉饰门面,实际党的组织荡然无存。正确些说,那时无所谓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国民党当时在民众中的信仰,不用说是渺乎其小的。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党取得了政权,这确是给孙中山一大启示。“五四”运动以后,政治团体纷纷出现,各树

一帜,就中以共产党最为猛进,隐然握有全国思想界之权威。此时中国革命新的浪潮,日益紧张,事实上需要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军阀的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就是说需要各阶级联合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民族革命的战线,遂命令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自然共产党自己的组织须完全保持独立),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因此共产党以改组国民党建议于孙中山,孙中山亦因屡败之余,觉悟其党不行,于是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国民党遂于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了。

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只有简单的口号,而无充实内容的政纲;此次改组,得代表新的革命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员之参加,才厘定政纲,发表宣言,对于孙中山夹七夹八的三民主义,给以改头换面,加了一番新颖的解释,这里只摘录其中关于工人政策的几段于下;在宣言中说: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感受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又说:“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

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在它的政纲中则说: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国民党经共产党帮助它改组以后,的确气象一新,它的组织范围,也就不限于广东一隅,而扩张到中部与北方,国民党各级委员会均设工人部,这部秘书与干事,在初时期,多半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充当,因此,大有助于职工运动。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与挫折

在消沉期中有一事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检阅我们当时在铁路上的力量:计京汉路工会各重要车站尚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京奉路唐山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拥有实力,工会基金亦有一千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也颇有进步,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人;正太路工会依然存在,工人尚能团结一致;粤汉路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略有减少;津浦路浦镇有五千余人的秘密组织;株萍路工会如旧,且极有进步;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继续秘密出版,

也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共产党估计了此种状况,于是决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集各路代表大会,计到者九路代表,二十余人。通过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宣言,其全文如下: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及各路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余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会和各路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大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国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友的救星,我们只要看总工会的宗旨,便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

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样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有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的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人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斗争者,吾人必同情之。

“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

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代表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各路组织，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确能收齐，正太路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等。

不料五月间武汉发生拘捕工人领袖杨德甫（叛变）、许白昊（牺牲）、罗海臣（未详）、周天元（未详）、黄子韦（未详）及律师刘芬（未详）等六人的事件，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秘密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立和、李斌（未详）等同时被捕（系杨德甫供出），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后消极）亦在石家庄被捕，胶济路工会因举行大会而被封，领袖郭恒祥（未详）等四人则被开除，后来又被通缉。一时各路领袖被开除者、被通缉者，共计四十余人，都不能在本地立足，逃亡在外，于是铁路工会又遭一次挫折。

流氓工会的招摇

消沉期中，还有一特殊现象，就是流氓工会的兴起，“二七”失败后，有几个曾与武汉工会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潜逃上海，闲居无聊，由动摇以至于叛变，于是遂与湖南劳工

会残余分子及上海招牌工会分子,联合起来,形成流氓工会的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时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们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等口号。他们反对的对象,不用说是共产党,所提口号即是针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穿长衫的,呵!是穿西装吧)。这些口号,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需要的,那时帝国主义在租界极端严禁共产党活动,吴佩孚正在诤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萧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这些流氓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与保护,在上海公开活动,不用说他们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们却和他们作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势力逐渐团结与开展,国民党内立即起了分化,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首先起来反对改组,形成第一批右派,与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处于敌对地位。流氓工会于是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实行反动。

这些流氓工会,当时在上海专做破坏工人事业的勾当,如勾结丝厂厂主破坏丝厂女工罢工,勾结南洋烟厂厂主破坏工人复业运动,甚至殴打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这种流氓工会,曾经有过企图,要组织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曾派人到北方一带活动,但是他们这种企图,却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没了,他们在上海的组织也从此就烟消云散了。

困苦艰难中的工会工作

消沉期中，我们的工会工作，确实困难万分，从上面叙述中，已可看到我们在当时的工作范围是如何狭隘，完善的仅安源矿工工会。铁路工会又稍起即仆。在上海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印刷工会，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和—个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后来成立一个店员工会，人数却是很少。武汉方面，只有人力车夫工会、花厂工会等。此时给予我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在困苦艰难中如何组织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恰于此时派代表到中国，我们与他讨论的结果，于是决定以“工厂小组”为此时组织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作处，成立若干个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这些小组，视环境而决定相互关系，如环境好的地方，各小组组长可以发生关系或开联席会议，否则，各小组彼此不发生关系，其组长与工会的组织员接头。这个新组织路线，的确在当时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时国民党已经改组，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确有意思改造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一个接近民众的党，但这种事他们却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分子，共产分子当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国民党自改组后，经共产党的宣传与提携，此时声誉日起，共产党当时的职工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用国民党的旗帜去做，如在上海，我们曾用国民党的名义，在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工人教育运动，的确给了我们公开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线索，于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团体，如杨

树浦,我们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小沙渡,我们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职工运动之转机——沙面罢工

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着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

在沙面没有罢工以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一百余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几个罢工影响亦不大,如五月间湖南湘潭的锰矿罢工,九江的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和六月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均不得结果。

沙面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此时颁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租界,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贴主人相片,每晚九时以后,华人非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却均可自由,这分明是对中国民族的侮辱!于是引起沙面华人愤怒,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后来华捕亦加入罢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决,取消新警律。

沙面罢工却给了帝国主义相当打击,不消说给了中国人以劳动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为后来省港罢工有力的启示了。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

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海陆丰一九二三年便有过农民减租斗争,此时广宁又发生抗租斗争,以至与地主武装冲突,农民协会已在好几县成立起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之下成立起来,此时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正在此时孙中山因广东商人反对他,感到地位困难,见此新生的工农势力拥护他,一时颇为左倾,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坚决的举兵削平商团,即受工农运动的影响。“商团之变”是广东当时一件大事。商团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所组织,受香港帝国主义指示,阴谋推翻孙中山,自建所谓商人政府。在国外私购大批军火,被孙中山发觉扣留,商人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国庆日之游行群众,孙中山十月十五日举兵将商团击溃,是为“商团之变”。

此时广州还开一个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到中国、爪哇、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处运输工人代表,这是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第一次联合,当然给予中国职工运动之转机以很大的影响。

广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参加者七千余人,因反对厂方反悔旧有条约另定苛刻条约而起,结果失败,失业者一千七百多人,这次罢工失业,引起广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烟草入粤,相持数月。我们在上海差不多两年没有领导过大的罢工了,这算是第一次“复业开张”。在这次罢工中,为援助罢工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发生激烈的斗争。

此外汉口发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发生一万多人的机织工人罢工,浙江余姚发生一万多户的盐民罢工,广州有

报馆排字工人罢工,这些都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朕兆。

第九章 职工运动复兴期

北京政变

中国职工运动到一九二四年冬的北京政变显然由消沉转到复兴期了。从此中国职工运动很快的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开“五卅”运动的先声,亦即开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先声。

“北京政变”就是冯玉祥倒戈驱逐总统曹锟的事件。先是一九二二年奉直战后,直系军阀即欲拥曹锟为总统,其所以未即实现者,只因直系军阀内部分为缓急两派:缓进派以洛阳吴佩孚为首,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然后再利用国会,制定宪法,选举其义父曹锟做表面的总统;急进派以天津曹锐为首,当时虽然反对吴佩孚主张,但吴佩孚势盛,只得屈从。一九二三年七月,急进派一方面经过外交系顾维钧得到美国帝国主义全力的帮助,一方面得到直系冯玉祥兵力的帮助,遂不顾吴佩孚意志,实行驱黎拥曹。后来贿买国会,逼选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大哗,各界宣言否认北京政府。孙中山被陈炯明驱逐离粤,蛰居上海时,曾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缔结反直的三角联盟,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反直战争便开始,首先发生江浙战争,接着便发生山海关战争。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助直,日、法帝国主义则助奉与皖。战争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日本运动冯玉祥倒戈,从前线回到北京,举行政变,于是曹锟被囚,吴佩孚败走湖北,是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二七”大屠杀的祸

首曹、吴倒台，代之而起的是张、段，又在北方企图从新巩固军阀专政的局面。但他们相互间的冲突更日形剧烈，因此无暇注意妨碍工人的行动，在客观条件上，给予职工运动的复兴以极大的便利。也就因此，共产党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工会运动。

恢复工会运动

首先是救出“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保定、北京、天津及其他各处被捕的工会领袖皆救援出狱。其次恢复“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其时唐山铁路工人在战争中被裁汰三千余人，至此亦恢复工作。同时乘机进行恢复各铁路及武汉工会的工作：如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绥、京奉各路工会，或恢复全部，或恢复一部，差不多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此时最伟大的成绩，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四天，计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余件。这次大会特别注重进行方针，其纲要如下：

- (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
- (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
- (三)力谋工会之统一；
- (四)确立经济基础；
- (五)救济失业；
- (六)要求以前罢工争得条件之实行；
- (七)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
- (八)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

(九)参加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

(十)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大会还听了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个国际运输会议的报告,接受美满的同情,尤其以汉堡国际运输会议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战斗事实,指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防制工贼之方略。

罢工斗争蜂起

在此复兴期中,各地罢工斗争亦随着蜂起。就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破天荒的日本纱厂二十二家四万余人的大罢工,其次就是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我们在下一章须专门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各地的罢工。

首先是胶济铁路罢工。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该局工会提出承认工会为工人代表机关,恢复因办工会失业工人的工作,加工资三元,每年发免票二次,立发奖金等五条件,举行罢工。结果相当胜利,计罢工八日。即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其他各铁路未曾罢工,但皆提出恢复“二七”以前的条件,发生普遍斗争,有些地方,完全胜利。

此时最饶兴趣的是北京的罢工。北京虽为首都所在之地,而近代工业可说绝无仅有,但此时该地的罢工斗争,却呈空前未有之现象。一月电车罢工。三月织布厂罢工,财政部印刷局一千八百人罢工,菜园工人三百九十八家罢工,隆华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瓦木匠罢工。四月,瓦作工人六千余人罢工,北京附近之宣化皮行工人五千余人罢工。这些罢工均系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

再说到武汉的罢工。此地虽仍为直系军阀最后根据地，但其统治力已不如前巩固，工人乘机而起。三月，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英美烟厂罢工。四月，武汉三镇糟房工人罢工，汉口汉阳织巾工人一千余人罢工。五月，汉口和记蛋厂一千余人罢工，英美烟厂四千余人罢工，武昌印刷工人罢工。这些罢工，亦系经济斗争性质。

再说到广东的罢工。广九粤汉两铁路和兵工厂皆发生罢工，最出奇的，是民船三千余只的罢工，和顺德生丝女工十万余人的罢工，声势极为浩大。

其他各地如唐山纱厂的罢工；杭州布厂一万余人罢工；苏州、长沙、南京、宜昌的人力车夫罢工；甚至于奉天亦有几个工厂发生罢工。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表现中国职工运动已经进到复兴期了。

国民会议运动与工人阶级

此时有一事不能不说到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欢迎孙中山北上，张作霖段祺瑞亦不便出头反对，于是孙中山离粤北上。共产党向孙中山建议，发表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大主张，当时得全国群众之热烈同情与拥护。及孙中山抵京，段祺瑞则以“善后会议”代替“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遂停而不行。共产党乃于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之同时，另行召集全国民众团体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以与段祺瑞之善后会议对峙。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工会皆派代表积极参加，做了会议中的主干。虽

然此次会议的决议,并未发生效力,而且不久因孙中山逝世,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归于停顿,但工人阶级却受了此次运动不小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做了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最强悍的战将。

第十章 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 (附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

日本在华的纺织业

日本在华设立纱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它在中国设厂的原因:一、是因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不要纳付关税,便可将生产品卖给中国人,以占取中国的市场;三、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工人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资本家乐于在中国开设工厂。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岛有九家,在满洲有五家,总共用中国工人八万八千余人:在上海约五万八千人,在青岛约二万二千人,在满洲约八千人。与中国本国纱厂相比,日本纱厂数与雇用工人人数皆占三分之一(华商纱厂七十六家,雇用工人一十五万八千余人;英国纱厂三家雇用工人二万人)。这可以看出日本纱业在中国的势力,特别在上海更为庞大。

并且日本纱厂差不多是国家资本,譬如内外棉株式会社总

共有一十九个工厂，在日本的仅只三厂，其余的在上海有十一厂，青岛三厂，满洲两厂。所谓“内外”即指国内国外而言。这样一个雄厚的国家资本企业（就是其余的日本纱厂亦有国家银行做后盾），幼稚的华商纱厂那里是它的敌手！所以欧战时中国民族纱业本有一度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敌不过日本资本之竞争与压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后，便发生剧烈的恐慌，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有许多被日本人吞并了去。这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在那个时期发生反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高度情绪的原因。

日本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压迫

日本纱厂对于中国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骂，惨无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时候都有。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很低，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合银币不过一角。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于一间小屋，重床叠架，隔以薄帏，吃的是喂猪的食料。甚至于厂中还有这样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须领牌照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个牌照。另外还有一种“储蓄费”，每月在工资里扣除，但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费”（俗称“红簿子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费”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个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成年男

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自己养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待剥削而不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调，并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罢工的爆发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们在小沙渡办了一个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由孙良惠同志主持。成立数月，加入的不过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厂先进分子。我们在此地也发展初步的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厂因粗纱部男工整批被厂家开除，自动罢工（俗称“摇班”）。我们知道了，劝工人暂行停止，先去领取工资。四日等工人到厂中去领工资，日本人不但给工资，并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工人们忍无可忍，遂一致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向厂家提出的条件是：一、以后日本人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第八厂辞退的工人须完全复工；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六、以后职工非犯通奸斗殴等事者，不得无故开除。当时把这条件并做成传单发给各厂工人。厂方面当然置之不理，并布置侦探，陆续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工人愈愤，二月九日大罢工遂爆发了。

内外棉第五厂东西两厂首先发动，九日下午当日夜班换班的时候，工人高呼“摇班”蜂拥而出，厂中即将厂门关闭，群众则将巨木碎门而出，或爬墙而出。出来之后，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间集合（此地为中国地界，为一荒僻旷野，仅有田舍数家，

与租界一水之隔),开群众大会,并有各厂夜班工人亦在半路闻讯随同参加,约万余人。首先一杆白布大旗,就是“反对东洋人打人”。群众异常兴奋,在我们热烈演说中,工人将其头上之帽撕毁掷地,加以脚践,大家说: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按此帽为厂中所发)。我们当即宣布纱厂工会成立,并叫群众听工会的命令,明日仍来开大会,群众欢呼赞成。当即组织队伍在各路口劝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称“拦摆渡口”又称“断口子”),工会连夜办公。

罢工的蔓延

影响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厂继续起来响应罢工。十日,第三、第四厂亦罢工,还有几个未罢工的,于是群众自动带队“打厂”,公然又打下几厂,相率罢工(这是上海一特别现象,此厂罢工,彼厂工人本欲响应,但不敢发动,希望已罢工者前去打厂,一打便罢,此风传染至今,尚未完全停止)。十二日,曹家渡的丰田纱厂亦自动响应。后来这种影响传到杨树浦,又有数家日本纱厂罢工。总计罢工者有二十二厂。小沙渡方面,为内外棉共十一厂(所有内外棉在上海之厂全罢工)、日华全厂、同兴两厂、及制麻布袋一厂,曹家渡丰田一厂,杨树浦方面为大康两厂、裕丰一厂、公大一厂、东华一厂。参加人数共四万余人。在上海日本纱厂,只有浦东的日华两厂与杨树浦的上海纱厂三厂、东华两厂共七家未波及。总而言之,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差不多都要转入漩涡。

日本帝国主义的胆战心惊

在上海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伟大罢工，自然出乎日本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真使得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初起时，日本“小鬼”还只利用豢养的包探诱捕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但工会系在对河华界，不在租界，他们无计可施。有些包探混过来时，反被工人发觉，饱以老拳，因此包探相戒不敢再来。

日本“小鬼”再来一计，收买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这一班工贼，以援助名义前来参加，并用“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动同盟”大发其传单，骂共产党，但革命情绪异常之高的群众，那里相信那些鬼话？工人气势汹汹，赶着追逐，那班工贼也不敢来了。

于是日本“小鬼”就放谣言：一面说此次罢工是中国资本家从中挑拨和资助，一面又说此次罢工是赤化，是受了苏俄的津贴。总而言之，他是一方面想借这些谣言和其他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中国人，一方面则借赤化谣言，威吓中国军阀压迫工潮。不过帝国主义虽然一致，如租界巡捕房确实每天在帮日本人捕拿工人。但群众都在华界，他们无可奈何。至于中国官厅均奉系军阀，初至上海见舆论同情工人，亦不敢公然断行压迫。

日本“小鬼”急了，一面由日本调来几艘军舰来华实行武装示威，一面由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国际交涉。于是劳资争议一变而为国际交涉。惟此时全国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气焰正高，段祺瑞政府亦不敢公然袒日仇民，又无多大效果。此

次罢工的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寝馈不安,上海“日本纱业联合会”天天会议应付,上海日本报纸天天宣传,是不用说;甚至于惊动了日本本国纱业界,不断地派人来华援助,后来连日本纱业联合会总领袖亦不得不亲自来华了。

总一句话,此次罢工造成一个震动远东的严重事件。

罢工的战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一九二二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败以后,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党方有相当的活动,开始参加丝厂罢工与领导南洋烟厂罢工。这次日本纱厂罢工之来,党当然认为是生死关头,于是由中央组织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负总责,并命令上海党部全体动员,但当时上海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不过百余人。要领导这样一个规模伟大的罢工,不能不于罢工战术上去求胜利,我们这里略略叙及。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突如其来,是群众自动的发动,而不是党预先的筹划。二月二日第八厂发动后,党才开始讨论,但那时党便紧紧地抓住这一个机会。但当时还不知道日本纱业亦发生恐慌这一回事(中国纱业恐慌当然知道)。罢工之时,正是纱价低落、美棉奇涨的时候,假使是中国纱厂,罢工一来,便有乘机闭厂的可能,然而日本纱厂究竟资本雄厚,足以维持,并且此时正是

日本纱厂加紧打击中国纱厂的时候,自然不愿因罢工而闭厂。我们在罢工中,知道日本纱业恐慌时,就是如此估计,所以我们一直进攻到底。

罢工既由群众先行自动,所谓组织,仅仅只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七八十人,很显然的,罢工开始时完全是原始状态,劈头的一问题,就是如何领导群众,能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所以“激发士气”和“稳定战脚”是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在这一点上花费不少气力。我们那时差不多每日一次群众大会,每日有几种新闻式的而且是俚歌式的传单。群众是切忌死板生活,所以每日必花样翻新,然后群众方觉得新鲜活泼而更兴奋,我们开大会不仅讲演,而且把群众编排起来,首先是各厂归各厂排队,举出代表来,组织代表会议,随后又由群众队伍中挑出若干人编成纠察队,立时教以简单的训练,派到各处守卫及在各要隘劝阻工人上工。这样一来,群众渐渐有了组织,而工会才能真实指挥。

虽然如此,如无新的生力军加添,群众必至感觉孤立无助而动摇。所以我们那时尽量扩大罢工,差不多罢工的前半期,每日必有新的工厂罢工加添,有些是自动的罢,有些是被煽动宣传而罢的。到后来罢工风潮波及于杨树浦,我们倒有一度迟疑,因为小沙渡与杨树浦一样是原始状态,如若兼顾,势必顾此失彼。但杨树浦工人迫不及待,情绪异常之好,我们也毅然决定罢工了。因罢工一扩大,给此次罢工以巨大的影响。

再则就是取得外援,我们联络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发起“罢工后援会”,慰劳,捐款,并请求舆论援助,因此群众更觉得势力不孤。

上海是流氓的渊藪,应付流氓亦是当时任务之一。就是工人

中亦有不少的流氓,当时有力的工人领袖,不少是青帮洪帮,他们是有老头子的,罢工时自然不能不争取他们,必要时甚至还须请老头子吃吃茶,讲讲“抱义气”。因为罢工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流氓中多少有点民族观念,因此,亦有不少老头子表示赞助。自然罢工在阶级斗争中的意识格外明豁,原是青帮洪帮工人此时也不大听老头子的话了。如流氓明显破坏罢工时,群众不客气便以老拳奉送。在此紧张空气中,流氓有的变好,有的畏缩,有的反动被群众加以重惩,流氓亦起分化。

罢工工人在潭子口闹得太凶了,帝国主义在对河眼睁睁地无可如何,自然逼迫中国官厅取缔。群众每日开大会,练队伍,无人过问。忽一日,上海警察厅派来武装警察数百,蜂拥而至,将群众包围,实行解散群众,我们在墓堆上(因为墓堆就是讲台)大声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群众和声如雷,声震天地,警察见群众气盛,只得退处一旁。

这次罢工的范围完全限于日本纱厂。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年来被日本资本排挤、压迫,积不相容,仇日极盛。我们看清了中日资本家冲突这一点,一面暗中散布空气,说这次罢工与中国纱厂是有利益的,中国纱厂应该起来帮助工人取得胜利,一面公开提出“抵制日货”、“日本纱厂搬回日本”的口号。此时中国纱业资本家确有利用工人报复日本的意思,他们居然用华厂工人的名义捐了一千元与罢工工人。这样一来,日本纱厂更恐慌了。

这里须说到我们一次的失策。罢工约十日,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曾暗示小沙渡中国的商界联合会以街坊名义出任调停,但没有结果,罢工延长下去。打厂之事,工会认为可一不可再,约束群众不能再做。因为第一次做时或可乘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再

做非碰上钉子不可,有损锐气。但群众则不然,天天问工会:“喂!我们总是文对之,到底几时武对之?”有一天群众自动要求非要闯入租界不可,我们同志亦有主张非去不可的。我们当时对他说:“不可去,你要去谁负责?”那个同志说:“好!我负责!”这样,群众便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向租界冲去了,还没到租界口,中国警察上前拦阻,工人大愤,扭打起来。警察便乘机借口工人殴打警察,派出大队警察持棒打得工人落花流水,群众溃散,被捕者五十余人。邓中夏同志当日亦被捕。

调停与解决

但工人虽遭打击,却仍坚持如故,虽然潭子口的群众大会因受警察干涉不能再開,但却因社会舆论同情工人,故警察不敢封闭工会。故罢工之事,仍得进行。同时罢工工人因受了十余日的训练,已由原始状态进于组织状态。“听工会的命令”,这一口号已深入于群众脑中,因此得以支持。

至后,上海总商会出任调停。二月二十五日,日本纱厂代表与调停者总商会会长、交涉使、淞沪警察厅等共同商议,并约工人代表出席,当时工人代表提出条件是:

- (一) 严禁殴打工人;
- (二) 增加工资一成;
- (三) 工资每两周发给一次;
- (四) 回复辞歇的四十人之职务;
- (五) 罢工期内工资照付;
- (六) 公司规定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的制度;

(七) 无故不得辞歇工人；

(八) 释放被拘工人。

日本资本家对于上面的条件的解答是：

(一) 对于第一项，公司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职工，是有同情亲切的态度的，公司方面，严禁殴打的事情，将来也与此取同样的方针。

(二) 公司所给工资，比较中国厂与外国所营的工厂为多，所以不能增加。

(三) 第三项无异议，公司正在实行中。

(四) 辞职的工人，不能复职。

(五) 第五项不能同意，但在罢工之初，曾声明上工者每日支付罢工期内工资三成。

(六) 第六项职工略有误解，此种储蓄制度，与工资无关系的，是因增进职工福利起见，而任意赏给的。

(七) 无理决不解雇工人的。

(八) 第八项是工部局警察厅所拘禁的，释放工人，在公司权限之外。

日本帝国主义的答解真聪明，把工人的要求推得一干二净。上海总商会便出卖工人了，它以为第二、四、五、七及第八项不必提出，遂取消而以下列的条件代之：

(一) 不虐待工人，如有虐待情事，可禀告工场长，以待工场长公平的解决。

(二) 工人复工者，可照以前的办法。

(三) 储蓄奖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佳良者照给。

(四) 工资两星期一发。

最后的结果：

(一) 不许无故打人；

(二) 依照工作的勤惰增加工资；

(三) 不许无故开除工人；

(四) 发还储蓄金(原本公司押下的工资预备十年后发还的押金, 如果工人被开除是不发给的)。

由这四个条件看来, 可说工人完全失败, 但在精神方面, 工人是胜利的。因为罢工总算得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在工人看来, 是由他们奋斗得来的。从此他们相信团结的重要了, 相信工会了, 于是加入工会的大大地增加了, 数日之内, 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 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 各工会也产生了工会小组的组织。

“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工会仍在潭子口存留, 由刘华同志主持。刘华同志便是在此次罢工中训练出来的, 他原系一印刷工人, 后来入上海大学附中做半工半读学生, 在此次罢工中表现异常勇敢勤劳, 而且善于鼓动, 甚为工人所爱戴。此时, 我们按各厂企业组织工会, 如内外棉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同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太康纱厂工会、公大纱厂工会等等; 并于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即分工会, 于是后来有同志误会说“工厂委员会中国早就有了”, 其实它不仅无苏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 抑且无西欧各国工厂委员会的作用), 其下并按各工作处组织支部。从此我们在上

海才立下一个空前未有的工会组织基础。会务发达，蒸蒸日上。

工会日益发达，在另一方面则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以为如果任工人这样下去，那么，那将来的祸患是不堪设想的。厂中纠纷又层出不穷，工会硬出头代表工人利益与厂家交涉。工会的用意，是这样办成习惯，即使工会在条文上未得到明白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已被厂家所承认。日本资本家于是决心反对工会了。五月七日那一天，会集了日本纺织同业会，商议取缔方法于下：

(一)主义者指挥工会，强制劳动者加入，每为惹起斗争的原因，所以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若职工有所要求，可直接提出于工厂，不能组织工会。

(二)若因此决议，而工会唆使工人罢工者，同业会决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并可锁闭工厂。

(三)关于第二项决议，当十分取缔工会的活动，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厅交涉。

工人知道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工人首先不服，发生罢工，第八厂也略有波动，但工会知道时机不好，叫工人在此时期内只能取怠工的方法（怠工的方法很多，如做得慢，做得坏，损坏机器，损坏货物等都是），不用罢工的手段，所以十一日无条件复工了。日本资本家方面从此益加强硬，以为如不开除不良分子，那么劳资争议事件总是不会停止的，五月十四日第十三厂开除工人两名，因此引起工人第二次罢工，到第二天，第五厂响应，第七厂发生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剧，于是成为“五卅”事件的导火线，以至于激起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青岛日本纱厂罢工

这里须附带叙述青岛日本纱厂罢工。青岛日本纱厂罢工不用说是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的直接影响。日本自从在欧战时由德国手中攫取青岛后,经营不遗余力。在工业方面,就纱业而论,在四方有内外棉三厂,大康、隆兴各二厂。在沧口(距离四方二十五里)有富士、钟渊、长崎各一厂。共有工人二万二千余人。除纱厂而外,如火柴、面粉、榨油等厂约四万人,合计青岛日本工厂有六万余人。此时名义上虽经中国收回,但实际政治上和经济上日人仍有支配和操纵的权力。北京政变以后,奉军南下,山东归其掌握,但此时山东尚有直皖两系军队,军事行动尚未停止,故奉系势力还未稳定。

青岛日本的纱厂劳动条件与上海日本纱厂不相上下。所稍异者,只此地工人成份,其中女工占百分之十,童工占百分之六十,男工占百分之三十,比上海略略好些。

青岛日本纱厂和上海日本纱厂因为多在同一企业之下(如内外棉、大康),关系自然密切,小职员和工人时有调换情事,所以青岛纱厂工人很容易直接受到上海的影响。四方这个地方又是胶济铁路机器厂所在地,其时胶济铁路正成立了总工会,铁路工人以全力提携纱厂工人,于是纱厂工人又得到眼前的一副兴奋剂。

开首就是一般练习生最为活动。先是大康纱厂在济南招了一班练习生到厂内工作,这班练习生大半都有高小毕业和中学一二年级的程度,他们向具狭义爱国反日的思想,复感日本资

本家苛待压迫的痛苦，今受上海纱厂罢工和胶济铁路罢工的影响，于是暗中联络工人组织工会。

四月初旬纱厂工人便起来组织工会。不幸关于组织工会的文书及加入工会的名册等，为日本资本家发见，资本家乃极力压制，如大康厂主得了上海的教训，就先发制人，武力压迫，实行搜查工人宿舍及身体，开除工会发起人，捕拿活动分子，甚至非刑拷打。但这样一来，反而激起工人的愤怒，工友会议决提出下列各条件：

- (一)日工十小时，夜工八小时；
- (二)取消房价；
- (三)每年发给花红；
- (四)每年准工人告假一月；
- (五)每日增加工资一角。

日本资本家当然不能容纳，工人遂召集紧急会议，议决二十一条，限厂方二十四小时答复：

- (一)承认工会；
- (二)日工加资一角；
- (三)包工加资百分之三十五；
- (四)夜工饭钱，自本月起，一律加倍；
- (五)取消压薪制；
- (六)取消二割引制(按即二成储蓄，只大康纱厂特别规定)；
- (七)因公受伤，工资照付，医药在外；
- (八)一律免收房费；
- (九)延长吃饭时间至一小时；
- (一)不得打骂华工；

- (一一)每年内给假期一月,假期内不得开除工人;
- (一二)规定保护女工,每月给生理假二日,工资照给;
- (一三)减少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过八小时;
- (一四)如工人违犯厂规,由工会同意后方可处分;
- (一五)公司罚工人之款,应交给工会作为工人教育费;
- (一六)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代表;
- (一七)应当规定工人有得花红的利益;
- (一八)此后公司待工人一律平等;
- (一九)罢工期内不扣工资;

(二)公司承认此项条件后,应该双方订立合同,签字,盖章;

(二一)订立合同应该有证人作保。

四月十九日首由大康纱厂罢工,至二十三日内外棉纱厂亦继续响应,二十四日隆兴、日清两纱厂也卷入漩涡。各工厂工人所要求的条件,除“工人死亡时给予一年工资抚恤遗族”一条之外,余均与大康的二十一条大略相同。罢工人数约一万名,同时其他各厂也有跃跃欲动之势。青岛日本丝厂恐遭波及,不得已让工人在工潮未解决以前,停止工作;凡要回乡的,由纱厂发给旅费。二十六日沧口铃木丝厂也罢工了,工潮益形扩大。随后银月钟渊各厂又罢工,富士厂亦觉不稳。

日本资本家方面当大康罢工开始时,态度非常强硬,绝断工人伙食,而工人只吃六个铜板的大米。又用军队包围工人宿舍,而工人就在街上露天的睡。到二十三日日本资本家方面才向工会代表提出下列三条:

(一)面粉由公司廉价供给;

(二)现在规定的吃饭时间三十分外,无论日工夜工给与十五分钟的休息;

(三)无论日工夜工各加补助金一钱(日金,不及华币一毫)。

工人不满意,仍旧支持下去。内外棉、隆兴、日清等罢工之后,日本公使向中国政府要求取缔风潮。一直到后来工潮扩大到沧口各厂,日本资本家方着实恐慌了,催促中国官厅禁止,一面逮捕工人领袖,一面解散罢工后援会。此时我们的战术,有许多是利用上海的经验。由上海纱厂工会派出代表前往援助。青岛历年受日本的压迫,一般市民痛恨已深,又值收回青岛运动之后,民气极为激昂,此时工人罢工,地方各团体多表同情,青岛大学学生联合各团体成立罢工后援会,捐资援助。同时我们还放了威吓资本家的空气说:“如果厂方不承认青岛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同情罢工。”上海纱厂工会公开宣言及致函日本资本家道及此意。上海大罢工的余威犹存,于是日本资本家害怕了,终于不能不承认青岛工人相当的条件。

最后由青岛日本领事同中国商会等出任调停,召集劳资双方,议决条件如下:

(一)改善工人待遇;

(二)食费加给一钱(日金);

(三)工作中受伤的工人,支给工资及药费;

(四)吃饭时休息三十分;

(五)休息时间昼夜勤务各为十分,在午前三时及午后三时以后;

(六)复工的工人支给两日工钱,但五日不复工的工人不在此限;

(七)工钱从速支付；

(八)工人赏钱,公平办理；

(九)不殴打及辱骂工人,有犯过的给予相当戒饬。

工人于五月十日复工,计罢工二十二日之久,当上工的时候,又起了冲突,因为资本家宣布于早晨复工,而工会宣布晚间复工。这个办法在斗争上是有很大的意义,一则可以表现工会的威力,二则可以预防上工后资本家再来压迫,结果还是晚间复工。

工会组织从此益加巩固,但就因此而遭日本资本家之大忌,要求中国官厅解散。中国官厅听从日本人的要求,拘禁工会办事人员,工人大愤,于五月二十五日第二次罢工。大康、日清、内外棉厂等都一齐发动。日清纱厂工人虽然停止作工但并不退出工场,仍在工场中高唱劳动歌,当时督办虽有训谕,但毫无效果。二十八日日本驱逐舰桦桦两舰,从旅顺入港,中国官厅也派奉军到了青岛,同时保安队消防队,也奉了戒严司令部的命令出防,厂主遂借了军队的势力实行闭锁工厂,勒令工人出厂。在纷乱的时候,军队发枪射击工人,死者二名,重伤者六名,轻伤者十余人。同时中国官厅封闭工会,尽力检查压制,工人无从活动。后来工人为生活所迫,同时亦有少数为厂方所诱,于六月十四日,三厂同时开工。起初时上工的工人还不多,后才渐渐增加,第二次罢工风潮遂在血泊中镇压下去了。

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死者八人,受伤者十六人,被拘捕者七十五人。

第十一章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大会的发起与召集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中国职工运动进到复兴期以后,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观察,显然有许多征兆预示着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共产党当时的任务,无疑的首先需要扩展和巩固自己阶级的力量,因此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为再不可缓,遂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

依照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决议,这个大会应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但共产党当时对于召集问题,颇费一番斟酌,原因是自从国民党改组一年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固然日有增高,然而同时“反工农”、“反共产”、“反苏联”之反革命口号也日益普遍。——革命斗争的剧烈和阶级分化的过程是相并而行的。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他们在当时非常嚣张,他们并且还积极破坏工人运动,收买一部分工贼,组织什么“劳工反共产救国同盟”等。真的,他们还有这样一种企图,就是拟用工贼工会的名义召集全国工会大会,组织所谓“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当时在天津确已发行一种报纸,专门躲在“工会”名义之下反对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然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说书记部就是“过激派”,过激派这一名称,在当时许多落后工人中确是莫名其妙,而且有相当的恐惧,如用

书记部名义召集,有可能使这一部分落后工会观望不前。再则“二七”失败以后,我们已不常用书记部的名义去做职工运动,因为我们此时最注意的是去成立产业总工会,凡属某产业的职工运动即用产业总工会去做。在事实上我们已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因此,共产党决定没有必要用书记部名义召集此次大会,而由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邀同海员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适海员总工会赴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代表苏兆征同志经过上海(苏同志也就是此时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和他接洽,苏同志完全赞同。因此,这次大会就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召集。

最可笑的,是四个大团体登报发起召集以后,工贼工会也登报说什么这次大会“其用心险恶”,“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等等鬼话,这当然不用说无损于这次大会之毫末,果然,这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了。

空前的工农兵大联合的示威与会议

广州此时有两个大会,除全国劳动大会外,还有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亦在广州举行。五一劳动节上午,这两个大会偕同广州市全体工人、四郊农民和青年革命军士,举行了十万人以上之大示威的游行。在这样的大示威的游行中,的确不仅可以看见被压迫群众形式的团结,同时使人奋发注意的是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到处都表现同一的心灵、同一的希望。的确,这是中国

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

最有兴趣的，是赤色职工国际派赴广州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同志亦出席演说，当他登台演说时，台底下红旗招展，呼声震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赤色职工国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他演说中最警策的语句，为中国工人至今所不能忘的，是：“工会是炮台，坚固的建立起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制度。”

当晚，工农两大会便共同在广州大学大讲堂举行开幕典礼。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革命学生亦派代表参加。到会者一千多人，代表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七十多万。除主席宣布开会、工农两大会各派一人报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经过外，并有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及工农两大会的代表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演说。全体一致通过工农兵联合决议案如下：

“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革命军人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在广州举行盛大的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革命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无疑的这个决议案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大会的经过

这次劳动大会,计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大会共开七日。

这次大会的召集,工贼工会虽然捣乱没有成功,但工贼工会却致电广东、香港两地工会,嘱其反对大会。的确这给了我们相当的困难,因为广东香港当时工会都不统一。当时香港工会情形是这样:工团总会一派,华工总会一派,其余尚有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数大工会无所属。广州工会的情形也是差不多:广东总工会一派,机器工会一派(这两派有亲属关系),广州工人代表会一派,虽然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在表面上是加入广东工人代表会的,但是广州工人代表会是差不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政治上独立的成一派别。在大会未开以前,大会筹备处派人邀请香港工团总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都被拒绝。他们表面上是吃醋,比方香港工团总会觉得不用工团总会名义发起而用其所属的海员工会名义发起,大为不满;广东机器工会觉得不用老资格的机器工会发起,而用新起来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也表示不满。其实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香港工团总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都为黄色领袖所把持,这些黄色领袖甚至还包含有资本家的成份,他们受上海工贼工会的怂恿,拒绝参加大会。大会筹备处设尽方法邀请他们到会,因为他们的工会领袖虽坏得不堪,但确有很多的工人群众。结果,香港工团总会因海员工会之敦促(海员工会为该总会的台柱子,故黄色领袖不能不相当听从)是到会了,而广东机器工会却始终拒绝到会。

这次大会的成份,不象第一次大会那样复杂,此时无政府党已匿迹销声,他们在工会中的活动也已停止。流氓的市侩的招牌工会根本为大会所摈斥。大会中最主要成份,当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自然还有不少无党派的工会,因此大会之进行,是异常顺利的,几乎未遇到若何意见上的冲突。只当选举主席团的时候,引起小小纠纷,原来主席团名单中本有香港工团总会代表,该会代表突然声明,说不能接受。因为该会派他们来,只是来看看大会的情形,不是来当代表,更说不到当主席。经大会代表群相督责,该会代表在大会的权威之下,不得不承认接受。真的,这样一来,该会代表一直到终会,都不敢退席,也未发生异言。

大会的成绩是很多的,通过决议共有三十多个。最主要的是:一、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二、经济斗争决议案;三、组织问题决议案;四、工农联合决议案;五、铲除工贼决议案;六、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在大会上群众所最热烈注意而激昂欢呼的是四件事:工农联合;铲除工贼;组织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不是偶然的,这四件事刚刚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所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

一 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

(一)工人阶级的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优越地位势力之保障,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

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

(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三)我们敌人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着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压迫的麻醉方法,这都是资产阶级制服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且在中国每个阶级总是相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阶级斗争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自争求自由的政治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都要依靠这个武器。

二 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一)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推翻资本制度,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更多受一层帝国主义的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要推翻这种压迫,而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三)民族革命虽然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可是中国资产阶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海建国书店出版的《工人运动》所录该决议案原文,本书此处遗漏如下的几个字:“斗争中,各国资产阶级”。

级中主要的买办阶级,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养成,不能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见到中国之阶级革命发展之危险,反愿勾结帝国主义,以阻碍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城市的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它的本身没有集中的战斗力。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

(四)在过去许多次斗争中,如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及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路罢工,本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无次不明显的表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主要的仇敌,军阀必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要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

(五)民族革命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所以无产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固然协力以反抗我们更大的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合,这种混合,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

(六)民族革命一切方面的进行,一定要不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

三 工人阶级目前的争自由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还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够得到的。

(一)在这长期斗争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加我们的斗争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一步。

(二)同时我们不可把这些目前迫切的要求,当作最终目标,这些要求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败,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也就不能达到。

经济斗争决议案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经济的或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至实行最激烈的坚强的斗争。第一,因为现在的劳动条件,已经坏到极点,千百万的工人,还未到他精力衰疲之年,而已衰弱不堪,失了他们的力量,失了他们的健康同他们的生命;第二,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以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目的的斗争,并且促进资本主义的崩坏,及劳动解放之早日实现。

甲 我们不否认经济斗争,不否认目前迫切要求之改良运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运动的观念是

(一)每一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走向总解决的一部分,不把它看作最终目标去做,比如资产阶级打不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被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

(二)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如工人的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

乙 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

(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本来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的标准,是按照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定,它应该要够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维持子嗣(即预备工人老后,再有小奴隶替资本家工作之用),照这样发给工资,工人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剥削,因为工人每日所生产的,并不只值他所领得这点报酬,很多劳动是没有受报酬,这就是资本家所谓的企业利润,上了他们的荷包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中国的资本家,他们还不肯按这个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工人工资,还要从这里面再加克扣。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分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一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每日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费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二)八小时工作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

之实现,不知经了几千百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还是做十二点以至十八点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誓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加或照旧,不然资本家一面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却减少工资,迫使工人不得不因维持生存而愿继续加工,这样名至而实不至的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反对一切虐待。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则资本家视工人直与牛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人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喜欢女工童工,他们是看到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愈为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六岁未滿的小孩,终日站着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最近上海工部局提议改良童工生活,但所有条文完全是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我们应当要求:(甲)禁止妇女与不满十三岁者作有损健康之特别困难与危险以及地穴下面的工作。(乙)绝对不许怀孕与哺乳的妇女作夜工及特别强度的工作。(丙)妇女在产前后有数星期的休息与照领工资。(丁)怀孕及哺乳之妇女,于普通规定的

休息时间以外,并须补足其哺乳小孩的时间。其哺乳相隔的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三小时半以上。且每次哺乳不得少于半小时。(戊)绝对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女工。(己)绝对禁止使用童工工作夜工。(庚)每日工作六小时,每周须有继续四十二小时之休息。(辛)不得克扣工资,女工童工与成年工人做同样工作时,须领同样的工资。(壬)为童工设立免费的平民学校。

(五)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险。中国国内各种工厂的一切设备,是很少能顾及工人身体健康的,因而危险之事常常发生。如去年上海祥经丝厂的大火,工人被烧死者数百人,同时因工厂之不洁,而得肺癆疫症以至死的,更不可计其数;又在工人工作受伤死亡或失业后,亦无相当的保证。因此我们当努力要求:(甲)一切企业机关应设法消除或减少于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的事情的发生;极力注意工场卫生与防疫事宜。(乙)对于从事于有危害健康的工作之工人,工厂须供给他以种种抵抗危险的服装用器消毒材料等。(丙)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死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失业老年时能得到救济。

(六)取消包工制。有许多工厂,资本家非常狡猾,他在他与工人间设立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就是包工制度。他利用他最忠实的走狗为工头,把工作包与工头,工人须向工头要求工作,这样一来,在资本家与工人间,更多了一层工头的剥削,愈使工人的生活痛苦,而且在斗争时,资产阶级更可利用工头以破坏工人的组织。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制度不可。

丙 为监督实行保护劳动的一切事件,预防机器的不慎,在危险的生产中,要预备保险的服装及防毒的用品。工人有病或

者在工作时受伤，须赔偿其损失。关于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

丁 全国总工会在这次大会后，应具体的指导他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争取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阶级斗争中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在这斗争过程中我们想得到胜利，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应有统一的集中的便于战争的组织。

(二)一地方的罢工，同时须得各地方的援助，切忌分立的行动。

(三)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发生罢工后，其他地方及其他企业应做通电声援或集资援助。若形势严重时，总工会应讨论资本家经济封锁及宣布同情罢工问题。

(四)不可无组织的暴动，应善利用时机，善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力量向其最弱点进攻。

(五)全国总工会应附设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在罢工时筹备罢工之基金，罢工后应作失业工人之救济。

(六)应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一方面为减低工人之生活费，一方面也是团结工人及工人家属的一个武器。

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 工会是工人阶级是宽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

二 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

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

三 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样，因此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四 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行会。这些行会是根据手工业的，已经是旧式而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奋斗，因为他们将有组织的工人势力分裂了。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主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怎样，都要按照该工厂或作坊是那种产业性质，就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只有一个工会包括该产业机关所有一切工人，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很快的得到决议，并且就可马上很坚决的起来斗争。所以这种组织对于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工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匠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很明显的，这种组织对于阶级斗争是不及产业组织，因为当对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各工会的代表与会员有各自的利益与观点，所以要彼此同意，很难有一致行

动之可能,即是可能,也必须消费时间,对于工人的战斗力与精神是极有障碍的。还有最坏不过的,就是不特不是依产业组织,并且也不是依职业组织,而是以狭小的专门为范围(如铜匠、铁匠、司机、翻砂等),这就是等于不善的旧式行会制度了。因此,很明显的,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是绝对须采取产业组织,若小铁厂、理发店、裁缝店、泥水作坊等小工厂及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织。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我们亦须记着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之实在情形,决定组织的形式,不可死板。

五 政治的环境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因此,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工人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为工会的秘密发展。

六 工厂支部当为工会的基本,在小的企业内,特别是在不能公开工作的地方,首先工作只能委派工会的全权代表,由这工会的全权代表,按照工会上级机关的指令,在该企业内工作。在大的企业内,必须按照工作部分,组织工厂支部,倘若工厂支部增加到几十或者几百的时候,工厂支部内或大企业内,得按加入工会会员十人、五十人、或者一百人选出代表,酌量情形组织办事机关,这部分代表即工会中坚分子,与选举他担负工作的群众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并经过他通知他们工会的一切情形。有可能时还须要召集大会报告工作经过,时常在工作的时候、工人的家

庭里、与工人见面时,宣传工会利益,鼓动工人加入工会。

在工会的中坚分子的大会上(倘若不能开大会时,则在代表会议上)选举职员,组织某一地方的机关,这地方的机关,又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至一年须召集该工会大会一次,在大会上选举该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统一当地工会组织及互相密切起见,凡城市或省区应只组织一个工会联合总机关。如一城市或一省区有数个此项性质总机关者,应开联席会议,公决归并为一。

七 工会是为工人一切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金和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讲演所。

八 为要实行上面所说的,因此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会费。每月至少为一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入会费。

九 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会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的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

一 工会的建设须有经常的计划,能利用一切劳资的冲突和一切罢工以及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有意义的事变,作普遍的宣传。

一一 目前因组织的力量缺乏,不能注意到所有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纺织、缫

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厦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

一二 为加多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起见，大会完后，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的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一 无论在那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至少农民也是经济上一个重要势力。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减于工人阶级，或者还要过之，因此他们在现存制度之下，也是一部分革命的势力。

二 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三 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

四 过去许多国家内劳资两阶级的斗争，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一九一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其失败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着农民帮助，或农民的势力落在资产阶级手中。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着农民的援助。

五 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所受的

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

六 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

七 工农联合在目前应该实现下列几点：

- (一) 在其回乡村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
- (二) 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当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
- (三) 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

铲除工贼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的原文已经遗失，大意是说明：为什么发现工贼？工贼对于工人阶级前途发展的障碍和铲除工贼的办法。并列举罪恶最著的工贼姓名如下：

- 王光辉、徐锡麟、郭寄生、董理璋（上海）；
宾步程、李彤（湖南）；
杨德甫、张德惠（京汉铁路）；
郭聘伯、张玉荪、刘伯勋、余友文（湖北）；
冯自由、×××、黄焕廷（广东）；

据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百一十五期刊载的罗亦农五月九日广州通讯《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一文所记为张彝。据同上刊物所载为马超俊。

张恩荣、苗凤鸿（粤汉铁路）；
×××（天津）；
何东（香港）。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无疑的是这次大会积极的结果。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选举二十五个执行委员。执行委员姓名如下：

林伟民、苏兆征、谭××（未详）（海员）
邓培、王荷波、刘文松（脱党）（铁路）
李立三、刘少奇、朱××（汉冶萍）
邓中夏、刘华、张佐臣、李森（即李启汉）（上海）
项英、许白昊、×××（武汉）
郭亮、谭影竹（叛党）、×××（湖南）
刘尔崧、×××、×××（广东）
何耀全（消极）、关××、郑××（香港）

大会以后，执行委员会开会，推举林伟民为正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总会设于广州，再于上海设办事处。

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

据同上刊物所载为苗凤鸣。

据同上刊物所载为谌小岑。

第一章 总 纲

- 1 本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 2 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 ,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
- 3 本会总机关暂设广州 ,并得择定其他相当地址 ,特设办事处。

4 凡在中华国境内之真正工人组合 ,均得为本会会员 ,凡产业工人已有全国一总组合之组织者 ,或一市、一县、一省之城市工人已有组合组织者 ,由该总组合加入本会为会员。各单独组合直接加入本会者 ,则须经本会之审查认可。

5 本会之职任如左 :

- (一)发展全国工人之组织 ;
- (二)统一全国工会运动 ,务期密切之团结 ;
- (三)整理各工会之组织系统 ;
- (四)指挥各工会之行动 ;
- (五)仲裁各工会间或各工会之争端 ;
- (六)发布全国工人共同奋斗之目标 ;
- (七)代表全国工人与国际工人谋密切之结合 ;
- (八)提高工人知识 ,联络互相之感情 ;
- (九)促进各工会彼此间有效之互助 ;
- (十)保障工人利益 ,设法解决救济及职业介绍等事项。

第二章 组 织

6 本会之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 ,每年举行一次 ;并得举行临时大会 ,均由本会执行委员会召集之。各工人团体派赴代

表大会之代表额数,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按比例决定之。

7 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二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闭会时,执行委员会为本会最高机关。

8 执行委员互选正执行委员长一人,副执行委员长二人。委员长不能执行职务时,执行委员会重新互选之。

9 执行委员会之下,须组织一干事局,受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驻会办理一切事务(干事局干事人选由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10 干事局分设下列各部办事:

(一)组织部——掌管本会所属各工会之组织事项,并帮助各处无工会组织之工人群众,组织工会。

(二)秘书部——掌管本会一切文件收发,统计,报告等事項。

(三)宣传部——掌管宣传本会教育工作,并指导工会之教育方针。

(四)经济部——掌管司库、司账、庶务等经济事项。各部须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由执行委员会斟酌事之繁简选任之。

11 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由执行委员中之一人兼任为干事局会议之主席。

12 本会为会务发展及便利起见,得于相当地点特设办事处。各处主任一人由执行委员会斟酌情形决定之。

13 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设立各种特别委员会或机关,并得聘任顾问、编辑等人员。

14 本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局及其他机关人员,均每年改选一次。

15 执行委员会、干事局、特设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及特设机关之会议及组织细则,由执行委员会另定之。

第三章 公 约

16 各工会须实行本会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及命令。

17 如一处或一种工人发生为工人阶级斗争时,各工会接到本会之通告后,应一致为声势上、经济上、或实力上之援助。

18 在同一产业及职业,或同一地域内,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等性质之工会发现时,应依本会之劝告,互相让步,并成一个工会。

19 各工会间,如有争端,须直向本会控诉,听候仲裁,不得互相攻击。

20 各工会对本会有不满意时,得直向本会抗议,或向代表大会控告,不得有破坏本会之行动或言论。

第四章 经 费

21 各工会应按月向本会交纳会费,其数目由各工会按比例法认定之。

22 遇必要时,经本会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得向各工会征收特别捐。

23 本会经费发生困难时,得向外界热心帮助本会者捐募。

第五章 附 则

24 本章程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后即发生效力。

25 本章程如有不适当处,应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修正之。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原文已遗失。大意是说明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是整个世界的经济系统,因此无产阶级要根本推翻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非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大团结不可。赤色职工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组织,中国工会竭诚加入,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携手,共同奋斗,完成世界革命。同时决议案中又很鲜明的反对亚姆斯坦黄色职工国际破坏全世界职工运动之统一。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正式加入世界革命的行伍中了,无疑的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大会宣言

“全国工友们 我们现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万状;不是生活程度日高,工资不够维持,便是工作时间太长,疲劳过度;不是工厂私定苛章,虐待工人,便是整工包工头等,殴辱剥削工人;不是横遭抢掠,欠薪失业,便是受拉夫封船苛捐重税痛苦,种种事实,数不胜数。我们受了这许多痛苦,自然不能低头忍受,而且不得不奋起图存。但是敌人却枪杀我们的战士,拘捕我们的代表,封闭我们的工会,摧残我们的罢工,开除我们的兄弟,监视我们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苦?非明白知道不可。

我们受苦的原因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外国帝国

主义者为什么侵略中国 无非是想发财。发财就有三个方法：一、盗窃中国的财富，如占据矿山、铁路、收买原料等。二、剥削劳苦人民，即是以低廉工资役使中国人。三、输入洋货。……这三种发财的方法都大不利于中国人民，尤其不利于中国工人。他们的勾当，既不利于中国人民，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各个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彼此之间，不免互相冲突。如是他们强迫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派遣军舰军队来华，并获得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种种的特权。所以他们能够在华设工厂，奴隶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如有反抗，他们又能利用此特权以压迫之。输入大宗洋货，使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失业。如是一部分又变为他们的工银奴隶，大部分失业者便变为兵或匪。他们想在中国领土内和劳苦人民身上发财，自然是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而且各人都想大发其财，如是首先互相瓜分中国，再进而共同宰制中国，更进于分途侵略中国。他们各自都培植一派军阀，借图扩充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其大发财主义。他们培植的军阀，就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指示——特别摧残工人与人民的势力。

帝国主义者不但用种种侵略的方法，以图发财，还用种种方法愚弄中国人民，用意在于制造一班洋奴，为其发财之走卒，如开设教堂、学校、报馆等方法。最近帝国主义和受其利用之军阀官僚，又收买一般工人败类和反革命分子。假借工人名义，破坏工人团体。这般的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都是保障帝国主义者发财的走狗。

全国工友们！我们要睁开眼睛，看清我们受苦的原因。明瞭了受痛苦的原因，方能知道怎样解除痛苦。现在给我们种种苦的

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其一切走狗。那么只有打倒他们,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有了这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走狗的利益,便没有我们工人的利益。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没有这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这是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全国工友们非一致团结,与这般仇敌作最后的死战不可。

全国工友们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会议,参加者全国一百六十五个工人团体,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七人,共代表全国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致认定全国工人,必须用自己的组织力量,解除自身的痛苦,获得自身的利益,并要力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工人所需要的是组织工会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而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摧残工人自由的仇敌,又非首先打倒不可。

大会并代表全国工人,与广东有组织的二十一万农民,和数千革命军人联合,而且正式加入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队伍。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工友们 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阶级奋斗的总机关。

全国工友们 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身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

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确开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记录,我们在上面的决议案及其伟大的成就(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便可看出。我们还要指出数点,以证明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

一 大会对于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有很好的认识。如在政治斗争决议案说:“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并说:“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在经济斗争决议案中又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

二 大会对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有很好的认识。如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上说:“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在宣言中说:“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三 大会对于工人组织有很好的认识。如政治斗争决议案中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合,这种混合,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

人的危险。”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说：“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

这些认识虽然还不能说已很深刻，但至少可说已有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萌芽，这次大会之所以有伟大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此。可是可惜得很，这些认识到后来几次大会却一次一次的忘记了。而且一次一次的代以机会主义的观点，使这次大会的思想不能发扬光大，以进于完全布尔什维克化，这真是最痛心的一件事。

这次大会开得非常合时，刚刚开在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前夜。看呵！大会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惊天动地的“五卅”运动便迎面而来了。

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

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到来

“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起端。从“五卅”运动起，中国工人阶级从痛苦和流血的经验中，不仅悟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悟到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喋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从此不止回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要求，或普通自由的政治要求，而已走上了革命的大道；并且事实上，它在这个大潮流中做了革命的中轴和重心。

帝国主义的军队所给予中国工人的教训，正象一九一五年被鲜血所喷溅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皇朝反动军队所给予俄国工人的教训一样，所以中国工人再不愿意安分了，造反了，而人民的

喊声“打倒帝国主义”，也愈喊愈响了。

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本不自今日始，早在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战争，已经不知屠杀了中国若干万人。中国人民在无数血泊中被帝国主义降住了。但是中国被压迫民众始终与帝国主义成对抗形势；这种对抗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愈进展而愈加紧。一直到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众自最受压迫的劳动阶级，以至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的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最近一二年来，国民运动猛进，反帝国主义的喊声几乎普遍全国各地，而这种反抗的表示，与日俱进的要达到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短兵相接的阵势，这已非帝国主义的惯技如“亲善”、“和平”、“正义”、“文明”等欺骗口号所能麻醉了。特别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成了帝国主义当前最厉害的大敌。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所了然的事，于是帝国主义不能不断的采用屠杀政策了。

“五卅”屠杀的直接导火线

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接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爆发此次屠杀直接的导火线，自然也是因帝国主义凶暴压迫而起。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段祺瑞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已先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发难反抗，举行四万余人的大罢工，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见上第十章）。对中国工人这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

本纱厂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得日本政府命令枪杀八人，并杀伤拘捕无数。因此引起中国被压迫各阶级的民族义愤。这便是“五卅”惨案的直接导火线。

首先代表此种民族义愤而起来援助工人的就是学生。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租界巡捕捕去数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捕去数人。于是激动上海各学校学生的愤怒，这便是五月三十日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

同时，帝国主义还有一种压迫，兼能危害中国的商人阶级，即所谓上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此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演讲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因而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在这样全上海市反抗帝国主义的紧张空气之下，为消弭这种空气，为镇压这班“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强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决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

血肉横飞的“五卅”屠杀

五月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的事，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人数以日本领事署、会审公廨、南

京路口等处为多。上午南洋大学学生出发讲演,当即被捕百余人,至下午二时即释放。各处讲演队闻南洋大学学生被捕信,乃逐渐集中在南京路一带讲演,特别以反对工部局四提案及越界筑路为宣传的主体,并提“上海人的上海”口号。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集愈多,听众亦愈聚愈多,巡捕又开始捕人。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一处已拘留留学生一百多在內。于是愈促起学生及听众的激昂,而聚于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四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开一枪,接着印捕即平放一排枪,华捕向空放一排枪,登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者十三人,伤重者数十人,被捕者五十三人。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二同志死于是役,是谓“五卅”屠杀。

霹雳一声的罢工罢市罢课

南京路屠杀发生以后,上海全埠震动了。当晚各社会团体纷纷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此惨案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联合战线,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当由党组织行动委员会,并派遣同志到各社会团体活动鼓吹。第二日(三十一日),女工和学生千余人到南京路散发罢市传单,此时南京路已入严重状态,此时虽大雨滂沱,但女工学生仍然奔走呼号,毫无所惧。又复被捕多人。本拟由南京路先行罢市,造成严重空气,逼迫总商会赞成罢市,但至下午四时,南京路罢市仍未成功。适闻总商会与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问题。群

众遂赶赴天后宫。总商会为大资产阶级的组织，其分子为大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工业资本家与买办等，加入资格以财产为标准。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为中小商人组织，每一马路或数马路的中小商店组织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再联合成为总会；其中亦有大资本家在内，但为数较少。屠杀事起，被害者当中亦有小商人和店伙，于是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纷纷投函联合总会，激烈地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后盾，于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六月一日罢市。在天后宫开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主张罢市，总商会反对罢市。中小商人说：“学生为反对工部局四提案而被杀，难道是过激？如这也是过激，那末只有亡国便不是过激了。”正相持不决之际，工人学生群众适到，当天后宫开市民大会，议决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命令，要求总商会签字，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市不可。总商会副会长避不敢出（正会长虞洽卿已赴京），群众促之再三，始出来说：“个人不敢赞成罢市，须候总商会开董事会决定。”群众异常激昂，再四胁迫，在此严重空气下，总商会副会长方签字总罢市命令。于是六月一日，霹雳一声，总罢市罢课罢工便实现了。

上海总工会乘时崛起

自二月日本纱厂罢工以后，上海工会虽茁然而生，然而仍不过二十来个雏形组织，人数总共不到两万，其主观力量之薄弱，概可想见。屠杀事起，共产党知非有一总工会不足以指挥偌大的群众，遂根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决定乘时组织上海总

工会。屠杀之第二日(五月三十一日)晚,各工会开联席大会,通过成立上海总工会。于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便于当晚出现了。成立后,第一道命令,便是宣布六月一日上海总罢工。后在总罢工中立时组织各工厂工会,至六月五日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已有一百七十余个工会,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皆集中在它的领导之下。而上海总工会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的上面。

帝国主义继续屠杀

六月一日罢市罢课罢工起。自上午七时,南京路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演讲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印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十分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尤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街市,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一切车辆及行人,概不能通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小沙渡纱厂工人被日本人协同西捕枪杀四人,沉尸河底。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打杀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廨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学生,公廨周围,外兵把守,异常周密。下午六时,帝国主义又用机关枪步枪攻打新世界游艺场,弹如连珠,历时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无数,被捕三百余人。在新闻桥又有西捕印捕携机关枪向中国保卫团示威,欲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等事件。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

厂。其他各国军舰亦陆续来到,这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下午新世界被万国商团占领去了。海军陆战队登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便打伤或杀死。杨树浦是日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不计其数。是日并有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来上海者日见增多,计至本日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其中属于英国的二艘,属于美国的三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全体登岸。杨树浦西捕复有开放排枪轰击罢工工人事情。美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亦有多人侵入华界。英界工部局下令通缉瞿秋白同志等。四日下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没收一切文件,驱逐学生出校,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后复施行于大夏、同德、南洋等几个大学校。

五日晚,万国商团突然下令检查所有过路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乘车或步行,在枪刺威吓之下,尽被驱入老闸巡捕房严行搜索,一千余人鹄立露天细雨之下数小时,结果西捕搜查无所得,方释出。当时并有一汽车夫行路稍缓,被商团刺伤,奄奄一息。

八日搜查旅馆,有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十五人在旅馆被捕。此时外舰已增至二十六艘,其中属于美国的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五艘,属于英国的四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意国的一艘。

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华界拘捕学生,调来铁甲炮车两辆,英日水兵一二百名,几与中国保卫团开战。

总而言之,在此时期中,开枪日必数起,死伤时有所闻,上海

成了帝国主义消闲寻欢的猎场。

反抗运动继续飞涨

与帝国主义的继续屠杀成正比例的,便是中国被压迫民众反抗运动的继续飞涨。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全体罢市,法租界亦于五日罢市一天。各商店外粘贴许多标语和旗帜,店伙运动行人不坐电车。只南京路大商店有数家还开市,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门。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甚至不遵从总商会的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然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到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罢市。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极其热烈参加,上海各学校自六月一日起无不罢课,甚至圣约翰大学(该校最顽固最反动)的学生,此次也激起义愤,与美国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反抗最有力量而最坚决的当然要算工人。自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宣布总罢工后,各工厂立即陆续罢工,特别是三十一日那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已有十余万人;至五日便增至二十余万,其中最主要的是纱厂、电气、海员、码头工人。甚至于公共租界所

据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晨报》出版部出版的《五卅痛史》所载: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总计十二日之内,英日人在上海九次枪杀我国人,当场立毙及因伤毙命者,凡六十余人,重伤者凡七十余人,轻伤者则不计其数。”正式列入上海学生法律委员会及上海地方检察厅调制的死伤调查表里的是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五十七人。

用之华捕相率罢岗的也在半数以上。

上海人民八十一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此时他们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在腥风血雨中与帝国主义对垒鏖战。

为各界行动一致起见,于是上海总工会向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提议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为此次运动的总指挥机关。总商会拒绝参加,理由是:“此次英人屠杀,凡属同胞,谁不发指?但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之不加入,即为将来调和之余地。”大资产阶级开首竟以调停人第三者自居,其无耻反动,已可概见。但其余团体不管总商会加入与否,仍然热烈的成立“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每大团体各出代表六人共同组织之。不用说上海总工会是此会的灵魂。自有总指挥机关而后,于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抗形势愈形完成。

七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见后)。北京政府见风潮扩大,特派专员到沪调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特于十一日召集市民大会,邀请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宣布意见。那日到会者,各工厂工人、各马路商人、各学校学生近二十万人。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都规避不到,群众一致对外交官不满,散会后,并在华界游行示威,民气激烈异常。

全国各地的狂飚运动

事变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不满一两个星期,上海南京路的枪声已震动全国各重要都会,直到最偏僻的城市与乡村。全国各地,特别是工人,都已纷纷起来参加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北京、

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等都发生大大小小罢市罢课罢工,而“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在示威游行中听见。河南、广东的农民,也起来加入此运动。这些事实书不胜数,这里只能简单的说到几个大的地方。

北京。三日,北京学生便举行五万余人的示威运动,队伍行至东交民巷(即各国使馆所在地,自筑城堡,俨然另成一国,界内行政,不用说中国政府不能过问)时,帝国主义军警严阵以待,不许群众通过,以水龙射击群众,以骑兵冲散群众,并鸣枪示威以恐吓群众,群众只得退去。自那天起,界口密布刺铁线网,加紧戒严,如临大敌。十日,北京又举行国民大会,参加者突过二十万人。北京商会亦宣言与英日经济绝交。后来八月间,英国公使馆及兵营中的华人侍役,还宣布罢工,表示反抗。

南京。南京学生自得上海屠杀消息后,首先罢课。五日,英国和记蛋厂工人宣布罢工,坚持至七月十七日方有条件的复工;在罢工中还发生流血事情。和记蛋厂罢工是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壮烈的一举,给予各地影响不少。五日那一天,商人亦罢市。

汉口。继上海青岛大屠杀而起的是汉口大屠杀。武汉学生亦于二日起即罢课,四出讲演,劝导商人罢市。有数业工人首先罢工。但直系军阀萧耀南,极力压迫,提前放暑假,遣散学生回家。工人方面,积极准备于六月十三日举行大示威运动,十四日罢工。适十日下午英租界码头工人与太古轮船公司职员,发生冲突,十一日晚,汉口英领事调集海军陆战队武装登岸,用机关枪向群众轰击数百余响,死者无数,租界熄灭电灯,将工人尸首沉

于河底以灭迹,据知者已死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屠杀发生后,萧耀南当即宣布紧急戒严,于是工人总罢工之计划不能实行。

广州。六月一日,广州工人得上海消息后,于二日举行示威大会。其时广州将有反刘杨战事爆发,故工人准备于帮助革命政府削平反革命刘杨的战事以后,立即罢工。十二日刘杨扑灭。十九日省港大罢工发生(详见下一章)。二十三日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举行大示威运动,行至沙基,遭沙面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开枪扫射,当场死者五十余人,伤者无数,是谓“沙基惨案”。于是便促起广州人民愤怒,厉行抵抗香港,省港大罢工延续到二年多之久。

湖南。六月二日,长沙工人学生便举行二万余人的大示威运动,当场成立“雪耻会”。五日,又举行十万以上的大示威运动。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派兵搜索群众领袖,并布告“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于是工人学生不能活动。水口山铅矿于十七日停工示威,矿长下令军警开枪轰击,伤者十余人,工人代表被捕者二十余人,赵恒惕电令“就地正法”。

其他各地,镇江、九江、重庆,皆有帝国主义开枪屠杀情事。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无处不热烈进行,但天津为奉系军阀李景林压迫,山东为奉系军阀张宗昌压迫,张宗昌并于六月二十六日到青岛用铁血摧残日本纱厂工人,并杀害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与“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其他各地亦大致相仿。

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据当时地方警察厅和地方检查厅两厅的调查:死者十名,受伤者二十一名。后据学生会调查:阳逻捞获被枪杀之尸体二十五具,连同前十名共死约近四十人。

帝国主义者的策略

“五卅”屠杀,主犯虽是英国帝国主义,然而其他帝国主义,其残暴凶横并不减于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纱厂工人,为“五卅”案之导火线,不待说了;若美国、意大利事实上派遣陆战队上岸与英国共同屠杀上海人民;法国则在广州与英国共同屠杀广州人民。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外交上当上海三罢实现之后,颇异其趣。除英国始终强硬外,日本欲卸责于英人而表示愿单独解决顾正红案,它说:“日纱罢工与英捕残杀,截然两事。”它并且还欲借此风潮使中国人民抵制英货,使自己取得英货市场的地位。美国仍不放弃其向来面子上的卖好市恩政策,它说:“美兵在公共租界杀人,也出于英人指挥,与美无干。”它在会审公廨上还说什么“本领事历任七载,中美感情极为融洽”等鬼话。法国因自有租界,不愿替人受罪,表面上表同情于中国人民,它还说“英人此举乃强暴行为”。法租界罢市一日亦不禁止,开市后法领事更向中国商界大唱“中法亲善”。意大利在中国没有多大经济利益,自然随口乐得说句“愿为调人”的风凉话。

帝国主义在上海连日的屠杀,愈演愈凶,民众反抗,亦愈激愈厉。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敷衍场面。帝国主义列强于是有“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的组织(英、美、日、法、意与中国)。同赴上海调查“五卅”案真相。调查结果,毫无疑问是英捕屠杀,但英国委员一味无理的强硬,因此各国委员大受一场没趣,扫兴回京,结果亦秘而不宣。只法国委员捣了一个小蛋,单独将沪案调查所得宣布了。

当时各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关系是这样的：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美国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亦与英有裂痕；日本自英日同盟取消后，与英国冲突日多。这些强盗，特别在中国问题上彼此利益的冲突尤甚。“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的确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笼络中国人心。所以“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孤立的状态中。

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手腕是有名的敏捷的，一是竭力宣传中国此次运动为“排外”、“赤化”，并以英日同盟恫吓美国，务造成英、日、美三国联合对华的局面；二是鼓吹武力对华，特别进占广东，以恫吓中国；三是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四是勾结奉系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五是以关税会议诱惑中国军阀及资产阶级；六是以租界停给中国工厂电气以挟持中国资产阶级；七是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运动。

果然英国帝国主义这些政策，有大部分成功了。

特别是武力对华与关税会议威迫利诱的把中国“上等人”弄瘫了。停给电气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屈服。勾结奉系军阀更是完全有效。

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反动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对于此次运动的态度是这样：

(甲)商业资本家，内分国货与洋货两派。国货派起初对罢市非常赞成；洋货派则始终反对。

(乙)银行资本家,内亦分土著银行与中外合办银行两派。土著银行此时与汇丰银行冲突,排斥该行钞票已久,故对罢市赞成;中外合办银行则反对。

(丙)工业资本家,纺织业起初本欲利用工人打击日本,积极赞助工人;后来罢工延及于华厂,顿改态度,特别在日本单独提出解决时,日本资本家拟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及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中国纺织资本家代表亲向日人表示反对,诚恐此例一开,祸延及己。

(丁)航业资本家,以为英日轮船罢工,而中国轮船可以一时专利,竭力赞助罢工。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各个资本家都以各自的利益做出发点,而各持相当差异的态度。然而尚未想到利用领导此次运动来取得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观察上面所已指出的,如罢市经工人学生与中小商人的胁迫方始赞成,罢市十日之内,绝不发表任何意见,置身事外,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皆可证明。等到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由北京回来,而资产阶级顿然采取积极政策(虞洽卿系一流氓出身,曾为国民党陈其美部下,失败时,蛰居上海,充当买办,开设三北轮船公司发财,于是面团团作富家翁,而为上海资产阶级之佼佼者矣。直系全盛时,皖系政客匿居上海,与虞洽卿非常接近,因此介绍虞洽卿加入皖系。此次北京政变,直系倒台,皖系再起,段祺瑞以虞洽卿为上海商埠会办。虞洽卿因此入京,适在“五卅”屠杀时)。

虞洽卿回沪后,他看清楚“五卅”事件,英人是要让步承认相当条件的,于是欲借群众的力量来做投机买卖了。他眼目中之所欲得的有二:一、上海租界添加华董;二、收回会审公廨。上海租界

纳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外人占百分之三十,但纳税会议董事会英人六,日人二,美人一,而华人一个也没有。董事会事实上系租界立法最高机关,一切重要法律及重要事件,皆须经董事会通过,交由工部局执行,华人只有纳税义务而无选举权利,不平之气,酝酿已久。虞洽卿乘机宣传,如董事外人九人,华人亦当为九人,最低限度华人亦得七人(此项主张日本人亦竭力利用,因为日本人亦欲平均董事权以打破英国的权力)。会审公廨比领事裁判权尤为岂有此理。领事裁判权为某国人归某国领事管理,中国法庭无权审判;会审公廨不仅华人与外人诉讼须由领事陪审,就是纯粹华人与华人诉讼领事亦得陪审。这是殖民地审判机关的雏型。此项会审公廨对中国资产阶级亦极不利,因为会审公廨在帝国主义操纵中,常罚中国商人巨款。这两样东西与中国资产阶级有切肤之痛,于他们有绝大利害,所以他们想乘此次运动,逼迫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有所让步。

虞洽卿回沪后,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策略,便是主张“单独对英”、“缩小范围”。这个策略的反面自然是“放开日本”。不用说,这是虞洽卿在北京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段祺瑞商量好的。他们说:“纱厂罢工是经济事情;五卅'屠杀罪魁是英国。我们力量微薄,对英还怕不够,何能兼对他国。”他们主张罢市罢工范围以英租界为限。这个主张出来,果然发生效力,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

适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置之不顾,单独另提十三条件。现在我们把两种条件比较一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先决条件

-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杀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或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的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巡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一)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

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陪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如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一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已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已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一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总商会提出的条件：

第一条 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 惩凶。先行停职，听后再办。

第四条 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 道歉。

第六条 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写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 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 优待工人。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 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已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两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

（一）资产阶级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二）资产阶级又删去“承认工人有组织与罢工之自由”而轻轻代以“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

（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廨，资产阶级亦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反面即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而不想根本收回。

这三点是最重要的 ;其余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 ,由此比较 ,我们很明白知道资产阶级的倾向 :对外只要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华董 ,收回会审公廨 ,及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等——(当然仅限于恢复不平等条约原状) ;对内则压迫此次运动的主动力量——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把民众的热血、烈士的头颅 ,就这样的作了他们阶级利益的牺牲品了。

但是 ,总商会提出条件后 ,适帝国主义内部关于调查事件发生意见冲突 ,北京公使各将委员撤回 ,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买卖没有成功。他们从此就提出开市问题。他们说 :“罢市一日 ,中国商家损失三十万。罢市无益。”但此项主张必招民众反对 ,于是他们同时宣言“援助工人坚持罢工”、“抵制英日货物”。上海总工会提出抽货办法 ,仇货抽百分之五十 ,国货抽百分之一 ,作为罢工费用 ,他们满口承认。六月二十三日 ,终于开市了。

开市之后 ,资产阶级并不履行与总工会的成约。本来照总工会计算 ,抽货可得三十万两 ,足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一月。但结果只抽得四万余元 ,此都因资产阶级阻碍所致。不仅如此 ,资产阶级还心灵手敏 ,取得罢工救济的经济权。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给总商会 (发款由其附属机关之“济安会”发放) ,资产阶级财政在握 ,高下从心 ,于是对于罢工极尽操纵利用之能事。

第二步提出日厂复工问题 ,强制执行 ,他们借口救济费不足 ,或故意延宕数日不发 ,以挟制工人。此时上海总工会的策略亦已变更(见后) ,于是日厂先行复工。

第三步提海员复工问题 ,亦强制执行。

第四步便提出中厂复工问题。

资产阶级本拟如此做法，可以挟制英国帝国主义对他让步，曾由所谓十国商会作调和人，他们向英国表明以华董和收回会审公廨为主要条件，其余都不重要。资产阶级虽然有点小聪明，但终不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老辣，英国人公布工部局停给中日工厂电气。于是发生电力问题。这样一来，使得资产阶级着实狼狈。英国人说：“电气工人罢工不得已停给电力”，其实是使中日工厂复工不成。资产阶级乃大发雷霆，归罪于总工会，完全反对工人罢工，要求交涉署与英领事交涉，以电气工人复工为供给电力的交换条件。工部局却要其他英厂亦一律复工。资产阶级终于不能不归屈服。

资产阶级对总工会的政策，也经过几次变化。最初是极力拉拢总工会，欲利用工人的力量，做他要求帝国主义让步的后盾。等到所谓十国商会进行调和时，内部发生三种主张：一派主张立即封闭总工会，罢工则俟调和后停止；一派主张调和后即封闭总工会，同时即停止罢工；一派主张调和成功后，先停止罢工后封闭总工会，但现在即须驱逐工会的共产党员，代以工贼，而收归自己指挥之下。这三种主张显然是最后一种最为毒辣，代表这种主张者即为虞洽卿。他看清了：一方面如果此时封闭总工会，工人立刻看见他的狡谋，则无异自己打碎一个对帝国主义威胁的工具，安能使帝国主义有所让步；另一方面数十万罢工工人对总工会已有深厚的信仰，只可利用总工会招牌安然停止罢工。不然，难免不激成暴动。虞洽卿究不失为老奸巨猾，当时帝国主义本已与奉系军阀勾结妥当，首先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他认为利益尚未到手，尚非时机。于是向奉系军阀说项，出来挽回，重新启封三个团体。同时

在另一方面则造出总工会职员吞款滥费的谣言，指使工贼捣毁总工会所，积极向共产党进攻。到电力问题发生之后，知英国帝国主义非可轻侮，连让步也不要，遂积极反对罢工，主张罢工立时解决。最后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沆瀣一气，终于把总工会封闭了。而轰轰烈烈的上海“五卅”罢工，便在资产阶级的妥协、破坏、出卖之下而终止。真是“愈到东方的资产阶级愈卑鄙愈无耻”。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首先说学生。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尚未加厉的时候，还大半有革命的作用。这是很显明的，因为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与其他被压迫阶级一样的找不到经济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在此次运动中，首先激发民族义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学生。“五卅”屠杀后，更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慨，与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坚决。前面所叙述的事实已可证明。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渐渐变成软弱无力死气沉沉，此次运动开始时，上海学生会所包括的学校还只十多个，总罢课后，各校方重新组织学生会而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于是乎上海学生联合会有了肉和血附着上去了，成为群众的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在此次运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子。

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

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但学生因其家庭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此次运动中,自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主张以后,学生中便分左右两派,右派赞成,左派反对。同时,此时国民党中起来一个新右派,代表人物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单独对英”说,这是孙中山历来的根本主张,自然又给学生不小的影响,于是右派学生便有劝法租界商家及东北部商家开市等情事。不久学生联合会发生改组,左派得势,战胜右派。学生联合会与总工会完全站在一边,采取同一态度与策略,总商会主张开市时,学生联合会激烈反对,并派代表取包围政策打消总商会开市计划,此时学生左倾极了。

但学生究竟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力量很有限,又适值放暑假,学生纷纷回里,于是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后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的毫无力量就表现了。

再说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罢市开始虽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现,但以后便始终是犹豫不定的态度,以至于最后完全倒在资产阶级一边。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积极参加的,后来见总工会与学生联合会站在一边,人数太多,于是害怕起来了,提出“每一个团体只有一票表决权;如某一团体不赞成时,此案不能通过”(按工商学联合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

组织,每团体选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学生一致则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则如以团体为单位,而工人学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们提出此限制)。工学两会让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们仍存留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内。惟此时一方面谣言极盛,说学生会都是共产党,甚至于还说参加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商人也“赤化”、“过激”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国民党右派又竭力鼓吹,于是中小商人由畏缩恐怖而动摇了。但还未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虞洽卿回沪后,当然非将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响之下不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本有少数总商会分子,于是他们积极活动,而中小商人倾向资产阶级也日益浓厚了。

此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就是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商人的领导权。适开市问题发生,总商会登报于旧历五月一日开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节为中国结账的时期,即每个大资本家大收入的时期,故定在节前开市。小商人说:“沪案尚未解决,条件尚未承认,今忽然开市,是我们商界的耻辱。”实际呢,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们已感受罢市痛苦,希望早早开市,其所以要这堂皇冠冕的爱国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节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于己不利。上海总工会看清这一矛盾,于是在工商学联合会提议旧历五月六日开市,结果通过。资产阶级亦无可如何,只得屈从。但这种策略只一时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倾,此后与无产阶级愈离愈远,而完全跟在资产阶级的后头跑了。

罢工策略的变更

“五卅”反帝运动,无疑的是无产阶级做了主力军。在此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在万分艰难的复杂环境中斗争着。他们不仅与对面的帝国主义斗争,而且要与民族的内奸斗争——与军阀斗争,特别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策略是针对这些敌人而斗争。

真的,这一斗争是极艰苦的斗争。在“五卅”运动初期,军阀、资产阶级及其教授学者,总之所谓“高等华人”,发生无数摇惑民众的言论与主张,这当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劈头的大敌,要使此次运动发展,首先须要打倒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择其重要者可列举于下:

一 惩凶赔偿说——他们以为南京路惨案,惩凶赔偿可以了事(其实此次惨案,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的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的行凶,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

二 缩小战线说——他们主张对英日或专对英(其实此次惨案,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惨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决说——他们主张此次惨案用法律解决(其实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裁判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

四 局部解决说——他们以为上海惨案,青岛惨案,汉口惨

案,都是地方问题,应各就当地局部解决(其实各地惨案,皆由于帝国主义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而来,不但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才能解决)。

五 政府交涉说——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实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得着相当的解决,并且当时政府对于各地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不特不敢向帝国主义严重交涉,反而严刑峻法抑压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

这一切言论与主张,无疑的是军阀、资产阶级企图影响革命的民众,分裂革命的民众,把革命运动消灭下去,当时共产党曾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发表宣言,主张:

“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祺瑞政府一纸哀求式的官样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

“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统一那散处各地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快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至农民等的各界联合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此时的总策略,是所谓“民族的各阶级

的联合战线”。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学联合会为其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的确，此时无产阶级已发生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斗争的开始。

开市以后，情势日非，因为英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奉系军阀业已成功。奉军初到上海的时候，还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奉军之来，即为压迫罢工运动替帝国主义解围。奉军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下手，而是那时运动初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反抗奉军。

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首先是在青岛天津压迫罢工运动，青岛日本资本家直接命令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及《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并将纱厂工会封闭，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袭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此外南京和记蛋厂原已答应罢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英国资本家不但悔约，并且开枪打人，又叫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奉系军阀亦从旁帮助，这种情形眼见得就要出现于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公开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上海戒严总司令）说：“枪毙一二首领，则余者当知彼等之恶作剧今应闭幕。”如罢工必须以武力对付时，即直当诉诸武力，瞻顾无益也。”又说：“邢

将军若无行动之决心，则势必令租界当局出而为之。”果然奉系军阀开始有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之事发生。

军阀既一天天进逼，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反动，小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动摇——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就应该变更自己的策略。

当时上海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与先进的工人确有这样一种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救此种危机。但共产党中央认为“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起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以泄愤，或拿来替代现时困难的斗争。现在是群众的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于是武装暴动的意见被打消。

此时共产党中央决定“为防御工人阶级的孤立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罢工的政策，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它对外让步，使它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并且认定“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斗争中民权运动的成份，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于是准备结束上海罢工而开始反奉战争。

这个决定之后，上海罢工的局势一变，一是经济斗争，一是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是同时并行的,就是局部解决仍然是以经济要求为主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先把局部解决叙述之后,再略略叙述经济斗争。

自“五卅”以来,到八月中旬,罢工已两月有余,而总要求并未达到,因资产阶级之出卖,中小资产阶级之淡忘,所谓各阶级之联合战线,至此已无法重新团结,而英帝国主义强硬依然如故,无产阶级何能孤军独战?故总要求“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而进行工人方面自身利益的局部解决。

第一日本纱厂复工。“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资本家便有先行单独解决的表示。八月中旬由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协商的结果,日本纱厂同业组合发表声明书,声明条件如下:

(一)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之后,得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

(三)各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

(四)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支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以大洋支付。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

(五)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

(六)工厂无故不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

附件：各厂自备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余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

此外对于无电厂家不能即行复工的工人帮助费，为日人担任十万元，中国总商会另筹十万元。顾正红抚恤金一万元。

这些条件，总工会当然不能认为满意，但审查各方面的情形又不能不忍痛接受。日厂问题，算是暂且这样解决了。于八月二十五日早一体复工。

第二海员复工。日厂复工以后，接着就是海员复工问题。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日轮公司代表及海员工会代表商量海员复工条件如下：

(一)凡罢工船员(连小轮船驳船领江等)均复回原职。

(二)罢工海员长期失职，各船务公司表示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如不足由上海总商会补足。

(三)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

(四)各轮船由复工日起，照原有工资发给，其加资问题在复工一个月后，由海员另函请求，酌核加薪。

条件解决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复工。

第三工部局电气复工。上面已经说过，即是英帝国主义以工部局不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为挟制，如工部局不给电气，中日工厂复工等于不复。由此连带而及的，自然解决工部局电气问题。九月四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中国交涉员、工厂代表及总工会代表商量，由中日双方纱厂与总商会集洋六万元，作为补助三分之一的工资，再由中国纱厂联合会与总商会加筹三万元，作为特别津贴，于是工部局电气工人也复工了。

第四英厂复工。英国帝国主义是以英厂复工为供给中日工

厂电气作交换条件的,当然亦须解决。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英厂商量条件如下:

(一)工人之工会,须俟政府工会法颁布,并地方上治安及秩序恢复后,始得承认之。

(二)维持工人,发给罢工期内工资,星期一总商会发一元,进厂时厂内发一元,至第七日厂内发一元后,总商会发二元。

(三)各厂应调查工人之生活情形,将来必需时,磋商酌加工资,与中日纱厂同样办理。

(四)各厂所给工资,均照大洋计算,零数则并入下期工资内,一律发给大洋。

(五)外国职员平时在厂内不带武器。

(六)各厂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并先对于工人待遇上加以注意。

(七)各厂俟内部刷清后,即行复工。

条件议定后,于九月三十日起,各英厂亦陆续复工,只英船海员坚持至最后方解决。

“五卅”以来的罢工,至此已依次完全解决。

在另一方面经济斗争却同时勃兴,而且都是华人工厂。兹将几个重要的罢工,略略叙述:

一 邮局罢工。上海邮局工人,在“五卅”发生时并未加入罢工,八月十七日举行罢工,可算是大潮流中之异军特起。参加者约二千余人,声势颇为浩大。要求纯为经济条件。中国邮权表面隶属国家,实际为外人所潜夺,高位要职,尽为所据。故此罢工亦含反帝国主义性质。罢工三日,由中国官厅、总商会调解,结果承认:一、工会改为公会;二、薪水除照部定新章外,因沪埠生活

较高,另给津贴:甲、邮务生每月十元,乙、拣信生每月七元五角,丙、邮差听差每月六元,丁、苦力每月二元五角,戊、各部专门员役,及老大、汽车夫、机器匠、小手纸夫、锅匠、木匠每月五元。算是得到胜利。

二 商务印书馆罢工。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所、总务科全体职员工人罢工,后来编辑所亦加入,共三千六百余人。要求亦纯为经济条件。结果,由劳资双方协商条件,共十六条,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完全胜利。至二十八日复工,计罢工七日。

三 中华书局罢工。接着中华书局罢工,要求与结果均和商务印书馆大致相同。自八月二十八日罢工至九月二日复工,计罢工五日。

此外八月二十八日还有沪宁快路车务处员役提出经济要求,路局批准增加工资,故罢工未发生。

“五卅”的上海大罢工,就在这样各种形式下解决了。但接着便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而发生封闭上海总工会的事。

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 联合进攻——上海总工会的被封

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帝国主义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它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仇敌,自然是无时无刻不想设法消灭它。然而因为上海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中涌现而出的,它不仅有余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的雄厚势力,而且得着社会、特别是小资产阶

级之广大同情,所以在“五卅”运动初期,帝国主义是无可如何的。在“五卅”运动的后期,资产阶级一方面欲利用上海总工会胁迫帝国主义对于华董及会审公廨两问题有所让步,即资产阶级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总工会“统率”数十万的罢工工人群众,免得发生暴动,以至于最后顺利的解决(资产阶级明白他们自己是无此“统率”力量的),所以不赞成解散上海总工会。大老板虞洽卿的言论可以做代表。他说:“在国民对外运动尚未收束,工人人数又多,有一统率机关,于办事上较易接洽,封闭总工会实为不当。”这段话的反面,很明显的如国民对外运动收束了(正确些说,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封闭总工会,是大当而特当的。所以一到“五卅”运动末期,他们不需要总工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于是九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终于被封了。他们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总工会是他们共同的仇敌。

上海总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动势力环攻之中,自然敌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贼。上海本是工贼团体的中心。工贼的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后,他们说:“工团联合会是代表三十余万工人的组织,有三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三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么?”要求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的所谓工团联合会不仅工人切齿,就是小商人亦知他们没有群众和惯于招摇撞骗的丑史,不准其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说:“明天召集全体大会以示信。”次日他们的大会果然召集了,到二百来个流氓。其时适洋务工人一千余人在同一屋内开会,工贼乘机欲借洋务工人自己的群众,以图掩饰。上海总工会代表即当群众宣布工贼罪状(如破坏

南洋烟草公司罢工等),群众大愤,群呼“打倒工贼!”“肃清内奸!”结果一个工贼被打伤了,余则抱头鼠窜而去。又次日,上海总工会亦召集代表大会,并请商会代表列席,而工贼闻讯亦乘机赶至,欲借大会煽动。工贼登台后,中小商人起而质问:“贵会有三十余万工人在那里?”工贼窘极,而信口说如洋务工人,码头工人十余万都在他们领导之下。当时洋务工会代表及码头工会代表起而申明:“我们工会始终是受上海总工会指挥的,并未加入过什么工团联合会。”全场哈哈大笑,工贼无法只得走了。总之,在运动的初期中,工贼的一切企图和行动都失败。

罢工之后约一月余,工贼又抬头了,统率流氓数十百人到上海总工会以罢工工人名义,要求发给救济费。至时便将总工会所捣毁一空,殴打工会职员,而警察则故意置之不理,总工会请求他们保护时,他们说:“这是工人内部之争,警察不便干涉。”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指使。可是总工会是以广大群众做基础的,工人闻讯大愤,纷纷派人来保护总工会,因此,工贼这次的破坏,总工会虽略受损失,但他们捣散总工会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战争忽然紧张,因为奉军入关以来,由直鲁直驱上海,所有中国北部中部海口尽为所夺,不仅战败的直系残余军阀朝不保夕,即战胜而于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国民三军(以冯玉祥为领袖)亦被逼甚厉,在人民方面,感受奉军残暴比直军还凶,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气顿浓。浙江孙传芳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尤其紧张。上海罢工影响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发生猛烈的罢工风潮,此等地方即属奉军势力范围,同时上海造船厂、铁路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亦为奉军所注意,故奉军为免除战争时后方不稳起见,必须先给工人一大打击。所以到此时决心要

封闭所有工会。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已久,奸计得售,不用说眉开眼笑了。资产阶级亦因“五卅”罢工依次解决,所剩者只英厂而已,不再需要总工会;同时中国工厂经济斗争猛烈,由对外罢工延至对内罢工了,他们以为这是总工会所指使,又急于需要解散总工会。于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严司令部奉系军阀邢士廉执行封闭总工会,并指明逮捕委员长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领袖。后来还秘密枪杀副委员长刘华同志,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挥各业工人作种种斗争,上海总工会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坎之中,这是敌人无论如何封闭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几次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的事。

戴季陶主义之出现

还有一事在这里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这反帝国主义的大潮中发生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早年在国民党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民气报”的时候,鼓吹劳动党;在“五四”运动中,他在上海办“建设”和“星期评论”的时候,颇竭力介绍马克思学说。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时候,他确是参与发起会议,但他不愿出名发起,却与沈玄庐抱头大哭一场,说什么“我虽不加入共产党,我的精神与共产党一致”的鬼话。当国民党领袖主张容纳共产党加入的时候,他还是竭力赞成的一个,所以以前的戴季陶无人不承认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这不算奇怪,在社会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和锐利的时候,急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的左倾,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前例,如俄国的司徒庐威便是明证。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来,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明显的表现它的阶级觉悟与斗争力量,而成功一独立的而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并且事实上成了威逼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样一来,却使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吓坏了,于是宁愿抛弃反帝国主义而拚命进攻无产阶级。其着重点便是攻击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主义便是代表这一个倾向。

戴季陶当时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书叫做“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谈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评中国共产党说:“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怜极了。”他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整个戴季陶主义的精神,就是“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戴季陶主义在当时的影响确不小,促成国民党内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时旧右派已经离开党,所遗下的地位,便给新右派顶补了。

戴季陶主义一出现,共产党即与之作极猛烈的斗争,但它的影响仍是伏流而进,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广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发生。

此次运动中的教训

总结起来说,在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它的政党所采取的

策略,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争取对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尝试,罢工扩大到华厂不为什么民族学说所束缚,这些都可说是幼稚的党所难能而可贵的事。但是在此运动中,分明看见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最后反动,分明看见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可靠,分明又看见了无产阶级的孤立,然而却没有教训我们的党,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很显明的,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论理这里应该启示我们的党,要开始积极做广泛的农民运动,然而结果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走到另一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这一道路便是所谓“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反奉战争,确是当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然而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者,现今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力量到底不行,于是他专心致志的去祈祷冯玉祥之战胜,郭松龄之倒戈,联合军人反奉,成了当时共产党中央的“国是”。“联合进步军阀反对反动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补充了陈独秀主义的一部。很显明的至于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农民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是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后来上海三次暴动,共产党不能利用这次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以致于暴动得到悲惨的失败,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第十三章 省港大罢工

罢工的准备

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而起,继续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长期潮流之最后砥柱。罢工继续到这样长久的岁月,详细叙述所占篇幅太多,我们这里只能将这次罢工择要的作简括的叙述。

省港罢工未能继上海“五卅”运动立时发动,其原因是广州此时发生刘杨战争。广州正在准备战争状态中,故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到上海“五卅”惨案消息后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众大会,还不能有省港罢工的决定。虽然如此,但全国总工会已准备于刘杨战争告终之后,必须号召这个罢工以响应上海。故当战争方殷之际,就派代表到香港去准备。

当时香港的情形是这样: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虽有我们的影响,特别是林伟民、苏兆征两同志相继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在海员工会中的影响增加,但该会会长还是一个极右倾的分子。香港的共产党员,此时还不满十人,而多为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党员多几个,但多数为学生。很显明的,如以我们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能否发动,确无把握。我们当时鼓动这个罢工是从上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各工厂散发传单,一方面与各工会领袖接头。此时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风起云涌,这种影响给予香港工人极为巨大,果然,不到数日,我们的鼓动工作生效了,罢工情绪继续增

高。当时我们最感困难的是香港工会的不统一，我们在十一章便已指出。当时香港工会大别为三派：一、工团总会派，包含七十几个工会，多属手工业，就中海员工会为一大产业工会；二、华工总会派，包含三十个工会，亦属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无所属派，约二十几个工会，却多是大工会，如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等工会。在这样分立状况之下，罢工如何能够一致！幸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各工会是参加过劳动大会的，故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颇有信仰。于是全国总工会之代表召集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罢工公然竟在此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还通过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过一日又开第二次联席会议，组织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选定职员。

上面说过，香港工会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为什么这些黄色领袖会赞成罢工呢？这因为黄色领袖有他们自己的企图与希望。这般黄色领袖实际上是些百业不居的分子，以抽收会费为生，他们以为参加罢工，与自己并无不利，因为罢工之后，领导权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爱国虚荣，一方面又可取得克扣罢工经费的实利，所以他们赞成罢工。这一点我们当时是估计到的，所以在香港与这些黄色领袖计议罢工时，关于他们争夺罢工指挥机关的位子，我们当时取放任态度，因为那时如要香港罢工实现，的确少不了他们，去了他们罢工便会被捣乱。我们所需要的是罢工实现，故对于他们一时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虽然如此，但黄色领袖事到临头终于畏缩起来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第一个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他们说刘杨战争未平，罢工工人何处取得宿食？我们解答：刘杨战争三日内可平，回广州宿

食不成问题。果然削平刘杨的消息第二日便证实了,但黄色领袖还不相信宿食问题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广州接洽,其时刘杨战后,广东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提议,赞助香港罢工,因此香港工会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满意的答覆。第二个是如何应付香港政府封锁出口问题,他们说:香港政府如下戒严令,停开火车,罢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样办?我们解答,即使火车停开,尚有好几条水路与旱路可回广州,万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锁水陆交通,我们起来暴动,我们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与援助。到最后,第三个难题来了,黄色领袖提出罢工程序问题,他们主张分批罢工,其畏惧罢工更明显了,我们极力主张同时罢工。在会议上,他们勉强通过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已预料到黄色领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当晚共产党党团开会决定,首先由受我们指挥的各工会(海员、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工会)先行罢工,再来逼迫黄色工会罢工。于是这伟大历史意义的省港罢工,就在这个决议之下,于六月十九日晚实现了。

罢工的爆发

未罢工以前,香港各工会联名送给香港政府公文一件,叙明罢工理由,并胪列罢工要求条件,分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六项: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罢工时,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

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样，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率罢工，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罢工人数约二十五万人，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由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回广州。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罢工。

这里须略略补述的，上面说过黄色领袖事到临头便畏缩起来，真的，如果不是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罢工一定发生变化，事实上黄色领袖对于同时罢工之决议案怠工，一直到后来影响所及，工人群众纷纷自动罢工，才不得不跟着走。所以共产党团决议是正确的。最有趣的是，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的分子，对于罢工，临时发生动摇，海员逼着他下罢工命令，说：“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罢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机器华人会本系香港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到会，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但是其属下的机器船坞工人群众，却不待工会罢工命令，纷纷自动罢工，这就是机器船坞工人罢工独后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本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

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但这种恐吓，对于罢工工人，丝毫不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欧战时的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万死不辞，蜂拥离港。

沙基惨杀

罢工工人纷纷回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广州市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军士、学生共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当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后瞄准游行群众，开放机关枪扫射，同时，兵舰发炮示威，二十五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当场被枪击身死，重伤者一百七十余人，轻伤无数。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又重演于广州。但帝国主义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

罢工工人的组织

罢工工人到达广州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当通过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法。罢工委员会以十三人组织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罢工委员会之上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代表八百余人，间日开会一次。罢工委员会之下设

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筹措以保管罢工经费。后来又添设会审处,为审判破坏罢工,私运粮食,偷卖仇货之走狗的机关,并有监狱,拘禁犯人。设保管拍卖处,为保管及拍卖被纠察截获仇货的机关。设法制局,为起草各机关组织法及各种办事细则的机关。设审计局,为审核各机关开支账目的机关。设筑路委员会,为管理修筑马路事宜的机关。另有纠察队(见后)、水陆侦缉队、罢工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又设工人饭堂、工人宿舍,封闭原来之赌馆烟馆及所有广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为八区,每区设登记处,罢工工人登记后领得凭证,分往宿舍住宿,至于吃饭则只要有凭证及饭票,到处可以吃饭。到后来,还添设不少机关,不能详述。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苏兆征同志。原来当大会通过罢工工人组织法时,黄色领袖力持异议,首先反对组织统一的罢工委员会,谓香港沙面应各有关机关各办其事,但是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继则反对代表大会以人数做比例,谓应以工会为单位(黄色工会多半系手工业的小工会,人数不多),亦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三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向香港工会提出希望:罢工委员会中香港方面之九人,应包含海员、起落货、机器、煤炭、洋务各一人及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各二人,他们又反对,主张自由选举,但选举结果全国总工会的希望完全胜利,他们又失败。因此黄色领袖着着失败,他们在香港时之一切企图,到此皆空。苏兆征同志被群众拥护起而充当委员长。

我们对于黄色领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虽不让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发起罢工之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我们听其存在,月给津贴。各部亦网罗他们参加办事。设法分化他们。这些黄色领袖在罢工过程中,营私舞弊,层见叠出,后来经代表大会——加以惩戒,有不少还被逮捕送会审处,处以有期徒刑。

我们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罢工,这个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罢工内部许多纠纷,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权予以解决。黄色领袖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之阴谋企图,都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制裁。工人群众的一切意志,都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须附带提及的,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权力都有,只没有杀人权,正因为此事,当时曾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原来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处死刑。此消息传出以后,广东检察厅长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结果是由广市政府另组“特别法庭”,处断此等人犯。

封锁香港

封锁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员罢工的旧经验，故罢工工人一回广州，各工会即纷纷自动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乃统一各工会纠察队，加以整理与扩充，设总队部，置总队长一人、训育长一人，为全队主脑（后来改为七人的纠察委员会）。设总教练一人，施以军事训练。下分五大队，每大队置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训育主任一人。每大队下分三支队，每支队置支队长一人，支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每支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置小队长一人，每小队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长一人，每班十二人（这个编制后来略有变更）。纠察队起初总数为二千余人，后来还有扩充。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纠察队布置以后，分派到各海口驻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当广东尚未统一时，纠察队封锁线还只限于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圳，西抵前山。后来广东政府收复东江南路，纠察队的封锁线也扩张了，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广东沿海港口皆有纠察队驻扎，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纠察队还有小舰十二艘，电船数只，往来巡查。纠察队枪枝号称四百余支，实只二百余支能用（我们当时为增加枪枝，不知花了若干气力，结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这种封锁之下，肉食菜蔬，无从取得，猪肉涨至一元余一斤，鸡蛋涨至五角多一个，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包粪，抛掷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气熏天，故当时群呼香港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还

是经济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击。

香港经济上的空前损失

当沙基惨杀后,沙面英国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当时我们颇为诧异,继乃考察《中国海关贸易册》,则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为一万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万二千万。罢工以后,航业商务概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万一千万,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但英国货每年输入广州者不过三四千万,这样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于是我们坚持罢工排货与封锁,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锁以后,经济上受到空前大损失。我们根据当时香港报纸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来。

就输入输出来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一十一万镑。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镑,一九二五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总之,输出输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这样的,香港出口货中,四分之一往中国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岛,四分之一往中国南部,香港罢工工人封锁以后,即使中国北部与南洋群岛未被封锁,但中国南部是被封锁了的,所以输出输入皆损失一半。

我们再就其他方面来说,都可证明香港经济上的损失。例如航业,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为

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吨数为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计算,平均每日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为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四年比较,船数减少五·五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八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产。罢工以后,香海报纸与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报穷案。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的商店已达三千余家。

又如银行。罢工以后,存款断绝,提款突增,纸币被抵制,现金流出。虽然当时香港报纸对于银行损失,讳莫如深,我们无从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汇丰银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损失大半,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固然锐减,同时开销却又锐增,因为政府要应付罢工风潮,军备等项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当时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都从银行提出来用了,并提出制定新预算,高唱“裁员减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国主义对于广东的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么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后来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不理,乃改电首相,意态极其愤懑,仍请立时出兵。但当时英国伦敦政府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蠢动,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有此种种种原因,所以对于香港什么公民大会之答覆是:“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统观全

局,现时无法出兵。”英国伦敦政府当时借款给香港三百万镑,为救济商业之用。但当时有名的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不过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香港此时真是陷于绝地。罢工、排货、封锁,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国民政府的成立

罢工以后,广州当时的政治情形是这样:刘杨虽被削平,但东江又被陈炯明占领,南路仍被邓本殷割据,就是广州内部各派军阀亦是拥兵自恣,各有异志,总之此时广东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幸而有此次罢工,十余万革命工人,集在广州,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当时国民党左派,也为之气壮,采纳共产党的提议,重建新政府,即国民政府,宣布新政纲,主张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统一,各军受政治训练,军需独立。这样一来,广东内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首,而魏邦屏、梁鸿楷及所有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为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共产党不用说是赞助最后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争暗斗,也愈趋愈烈。胡许两派阴谋政变,首为罢工委员会查觉,于是召集罢工工人于八月十一日举行肃清内奸大运动,游行示威,其意即在于壮国民党左派之胆,实行断然处置,但国民党左派当时却极其动摇,懍然不动手。此时胡许两派公开宣传“反共产”(其实刘杨叛变亦以反共产为口号),形势更为严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左派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屏的部队,并下令捕拿胡毅生、

朱卓文诸人。在军事行动时,罢工工人为军队作侦探与向导,尽力甚多。随后驱逐胡许离粤,许崇智则以“请假赴沪”为名,胡汉民则以“出使苏俄”为名。广东政权从此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时期。

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党政府真是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内外环境更为恶劣;在广州,谣诼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陈炯明陷落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中山县被土匪占领;在省外,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于是罢工工人援助国民革命军东征与南征。

在东征与南征的时候,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前进,向农民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战士。罢工纠察队请纓出征,上阵杀贼。政府嘱其巩固后方。真的,国民革命军得罢工工人之助,行军迅速,东征军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南征军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三个月,广东全省统一了。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就在罢工工人帮助之下完全巩固了,以至于能再准备力量,而有后来之出师北伐。

罢工的中心策略

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广,如不

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罗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罗与广州间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 商 联 合

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

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机隍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而出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

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月	二二九、五二三(以海关两计)	七、七一—
八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

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

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的罢工对平定刘杨战争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来的编写计划是要写在“广东时代极盛期”一章(见“著者申明”)中,后来因著者忙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原来的编写计划未能实现。

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一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

使得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余。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己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着,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香港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与广东政局

香港帝国主义对于罢工的态度经过好几次的变化,这些都与广东政局有关。

第一期,强硬时期。罢工开始时,香港方面急于在求一战,所

以他们的什么公民大会两次电求伦敦出兵攻打广州。出兵被伦敦否决后,香港则专心一致实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勾结北方军阀侵粤,一方面勾结广东内部一切反动势力作乱。第一着便是香港暗中资助胡许两派政变,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队新军械之发现,皆其铁证,于是而有廖仲恺的被刺。但因为当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左派实行断然处置,胡许被逐,香港的第一着政策失败。第二着便是香港资助陈炯明邓本殷两路进攻广州。陈炯明当时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过往汕头的罢工工人、海陆丰的农民以及革命的学生达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复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帮助陈邓反攻。再则又嗾使土匪袁带、林警魂陷落中山县。此时罢工委员会本已准备解决罢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代表来省,罢工委员会将香港沙面工人及学生要求之三十余条件交其带回香港。香港总督扳起面孔对华商代表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很明显的,香港帝国主义此时在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此种计划还未实验,如何肯解决罢工!但因为当时罢工工人帮助国民党左派坚决进攻陈、邓,东江南路都次第收复,而香港第二着政策又失败。

第二期,软化时期。原来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复,但革命军攻入汕头时,本地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封锁香港。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但革命军攻入琼崖时,此项接济又被本地工人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见陈邓已败,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率队北返。香港亦无可奈何。同时又因香港中等华商见罢工已久,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决,使他们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

痛；又见国民政府着着胜利，同情广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广州，共代表三百余人。继而又有“华侨参观团”之组织，不久亦来广州，其人数亦相若。香港中等华商这些举动，无疑义的直接对广东政府同情，间接即对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国主义知大势已去，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于是戏法为之一变，宣布派遣四个全权代表，赴广州解决罢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时又派华商代表八人先行来广州，以探广东方面的意旨。八个华商代表抵省以后，与罢工委员会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覆：“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也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并瞩其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放胆来省，可以商量解决罢工。无论如何香港帝国主义此时确有软化的表示。

第三期，犹豫时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回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暗中准备反革命的政变。这种内容，香港帝国主义岂有不知之理，认为广东既要发生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么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始终迟迟不来。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还于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决罢工，以示决绝。

香港帝国主义此时一方面静候广东的政变，一方面则用尽一切方法以加速这一政变。比方那时他们加紧“英国决用十万大兵进攻中国”的宣传。上海英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登载这样一个消息：说“伦敦方面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

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英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能否制止广东排英运动?否则,英国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对粤每日军费一百五十万。”很显然的,这种恫吓的作用,只是给右派一种借口,好来提议解散罢工。再则就是勾结广东右派加紧对于罢工工人的进攻。伍朝枢等此时与香港政府已经发生密切关系。在此时期,伍朝枢万事不管,专门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上,替外国商人告发罢工纠察队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长吴铁城向市民宣传,“罢工工人比刘杨兵士还凶”,简直开枪射击罢工工人。很显然的,这种造谣中伤的作用,一面是离间左派对于罢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给右派将来借口强迫解散罢工打下基础。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粤海关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按照不平等条约都须尽用英人,粤海关税务司不用说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突然宣告停关,借口是“罢工纠察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队如此行动,彼实不能执行职务”。并对广东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又对广东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队之压迫。”又很明显的,这种挑拨离间的作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催促广东政变加速的到来。

但一切阴谋,当时是被我们一一加以打击,故一时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国主义见广东政变竟未发生,不觉犹豫起来了,于十九日派人到广州面见汪精卫说:“香港政府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可见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

意解决罢工。恰恰第二天广东发生蒋介石的政变,罢工委员会亦被兵包围,即所谓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于是香港帝国主义的态度又为之一变。

第四期,重新强硬时期。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使香港帝国主义从此根本取消解决罢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变消息传到香港以后,香港总督召集西商大会,兴高采烈的说:“恭贺诸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东政府已上轨道了。”听众报以欢笑,高呼万岁!所以香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遂不出发。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广州与伍朝枢谈说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以前香港帝国主义虽因面子关系,不愿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个华商代表到广州谈经济条件可以证明。今则露骨的不承认出钱原则,而且布露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坚决!无疑的这是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影响。香港帝国主义从此重行抱持强硬的态度,以至于后来的“中英谈判”,仍坚决的把罢工问题撇开,我们在后面再说。

这次省港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罢工与北伐

北伐是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北伐,使中国革命发展到最高度,革命领土扩张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很迅速的得到长足的进步。北伐自然是当时中国全国范围

内革命高涨的需求，然而直接促进北伐则省港罢工实为很大的动力。广东统一以后，就开始了北伐的准备，虽然经过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但北伐终是革命的要求，终不能因任何障碍而阻止它的进行。六月，北伐出师了。在这次北伐中，省港罢工工人不用说是积极的参加。他们照东征南征一样，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三千余人，给予北伐军巨大的帮助。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湿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罢工工人病者好几百人。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八月便收复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

中英谈判

因为北伐的原故，因为“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罢工委员会同意国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六月五日，国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国主义答覆谓：“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国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货运动的方法与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国民政府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货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

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峙,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办外交,并坦直指斥帝国主义,这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覆书,谓“五卅”屠杀是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国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须延宕时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双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停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国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款,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英国代表表示反对,提议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以为黄埔开埠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罢工委员会偕同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双方皆表示须请示本

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实则破裂。总而言之，中英谈判虽为广东自有独立政府以来第一次与外国开的对等会议，为国民政府的新纪录，但对于罢工解决是毫无结果。

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中英谈判延期以后，罢工委员会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

- 一 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
- 二 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实业借款条件乎？
- 三 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

对于三条道路，罢工委员会说：“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立予决定者也。”罢工委员会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们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罢工委员会发出这信之后，各方面纷纷回答，都说“应当继续奋斗，誓为罢工后盾，以求得最后之胜利”。

本来罢工委员会有好几次准备收束罢工。当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的前后，曾有一度准备，因那时“五卅”运动，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于是而有“北上外

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共同组织之,将省港罢工所提的政治条件交付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而罢工委员会只与香港解决经济条件便可复工。但此种准备,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国主义一时还不愿意解决,一方面确因当时东征南征,须要罢工封锁香港,将帝国主义对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所以第一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就作罢。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前后,我们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因东江南路均已收复,我们须准备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国主义接受相当条件,亦可复工,故当时广东方面派一重要官员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员到广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广东方面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上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后来香港方面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因谓商店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广东方面表示可以相当让步。但因国民党大会后广东政局有新的酝酿,右派纷纷回粤,香港帝国主义因为有新的希望迁延解决,我们亦拟维持罢工,以预防右派的叛逆行动的发生,因为罢工工人经常聚集广州者近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实在是镇压右派的一种力量,所以第二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又作罢。三月二十日政变发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乘机进攻,此时当然我们不愿即于收束罢工,自己解除武装。到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前后,我们因急于需要出师北伐,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劳动大会提出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罢工委员会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这个五方面共同组织的委员会,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谣言的作用,因为当时香港有一种谣言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

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里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罢工委员会曾以此办法，怂恿广州商人派两代表到香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准备收束罢工又作罢。陈独秀、魏琴当时大骂广东的党部“太左，自始至终就无半点意思收束罢工，简直是胡闹”！据他们的意思，应该无条件解散罢工。自然他这种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但当时谭平山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宣布：“省港罢工终止了！”省港罢工在广州分明没有终止，而他们却在上海宣布已经终止，这简直是工贼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师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复全湘，直趋武汉，我们此时以为时机已至，决定自动的收束罢工，首先是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取消对香港封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广州沿海农民的让步。自罢工以来，封锁香港，所以沿海一带农产物一律禁止出口。当罢工初起时，罢工纠察队封锁海口，的确得农民的帮助不少，当时爱国热潮甚高涨，农民也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但封锁实在太久了，农产物停滞不能出口，农民当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农民与纠察队在海口常常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偷运农产物出口，纠察队当然截留。此时正是新农产物上市时期，农民非得出口不行。罢工纠察队封锁以来，在各海口常常发生战争，如沙鱼涌之战，纠察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干的。太平之战，纠察队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战，纠察队全队覆灭，是香港以机械资助土匪干的。其他还有白鹅潭之战，淡水之战，前山之战，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协同干的。在这些战争中，农民还有帮助纠察

队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时便不然了,农民反对纠察队,如宝安,好几个邻近英界的村庄农民,简直与纠察队取了武装对抗的形势,虽被纠察队征服了,但农民不平之气确是与日俱增。这一点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取消封锁的。

关于取消封锁自然需要收束罢工有一根本解决才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经过郑重的讨论。罢工委员会提出办法,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税作为收束罢工之用。每一罢工工人先领一百元,到各处寻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寻找工作,六个月后,如不能寻找工作,可以回广州,罢工委员会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税当然不是一次便够发给所有罢工工人,可分五批发给:每批二万人,以五个月发齐。此问题决定后,以二五附加税由政府通知各国领事,期在必行,各帝国主义无法,只得在罢工工人这种伟大权威之下承认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封锁,并宣言“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

十月十一日,便于海关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税征收机关,由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开始征收。

于是对于省港封锁,便这样的告一结束。

二五附加税是由省港罢工开始的,这又是中国革命史中的新纪录。此例一开,不仅国民政府领土内一切海关照例举行,就是当时北方军阀亦向帝国主义要求援例开办,罢工工人所争得的果实,不期军阀也能得受实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后省港罢工便办理结束,实际上罢工并没有完结,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罢工食堂与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

九二七年整个国民党叛变以后,汪精卫回粤,知省港罢工工人为一不可侮的势力,于十月方用武力强迫解散罢工工人,罢工才算完结。所以正确计算,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起,应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

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

这是一个为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它的意义的确超过“罢工”以上。很明显的这个罢工在中国大革命的广东时代,无疑的起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九十四县之中有八十五县)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四百余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以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所以省港罢工的意义,的确是难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了。

省港罢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错误呢?如就罢工范围内所有主要的策略来说,我们直到现在始终还未发现错误,认为是正确的。关于个别的局部错误,当然是不免的,但与根本策略无关。的确省港罢工所采用的策略达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厂范围

的形式，也不只是国内范围形式，而是国际范围的形式，这在中国，这种罢工策略之最高形式，应该说是自省港罢工才开始的。我们要说这些策略便是我们的教训，读者可自去领会，这里不重说了。

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的诞生。

要求改变二军团向武汉进攻等问题 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

长江局并转中央：

我于初九日搭船动身，经过五六天才到赤色区域之白螺矶，在牌州时我乘的船虽被白军拉了一次差，与白军同船行走，因应付得宜，幸未发生变故，一路平安无事。十日午抵白螺矶，此处离后方办事处尚有约九十里之路，十一日到军事政治学校，十二日才到后方办事处。兹将所得情形择要报告如下：

一，第二军团开往江陵，进攻沙市、荆州，虽沙市未攻下，据说得省总行委命令变更策略，放弃荆州进攻武汉，于是第二军团分二路回师，一路由潜江、荆州、天门等县由襄河北，一路由江监、沔、汉川由襄河南，此项战略显然与中央与长江局所规定者不符，当即派人飞至传达，每日一函已共去四函“嘱其将军队调回先集中洪湖附近，候开军事会议后再行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惟据我观察，第二军团是否能担此重任尚是问题，因其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从上次进攻监利失败，此次进攻沙市无功可证，虽然如此无论如何须照中央决定执行，至于第二军团本身之弱点，迅速设法，予以补救。

二，监利自红军开往荆、沙后，地方空虚。农民的枪枝在扩大红军口号之下全数提出，赤卫队亦宣布解散，因此地方毫无自卫能力，监利白党政府见此弱点，即乘虚派队清乡，于是有几乡的苏维埃政府尽被焚毁，监利白党军队虽非正式军队，但其常练队，为桂系陶广残部所成。人数共七百，枪亦如之。战斗力甚强，最近亦学会我们的游击战术，分为小队四出下乡，焚毁苏维埃机关，大杀大抢后呼啸而去。甚至我们唯一的河口白螺矶亦于十日前被陷一次，因此农民大起恐慌。监利县党部、县苏维埃不得已搜集余枪，将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编成游击队，抵抗白军，所幸数日以来接战四五次学生皆获小胜利，前后毙敌三十余人，学生亦损失四五人，虽未缴得敌人枪械而敌人气焰消灭。但赤区恐慌状态仍未过去。

三，最重要者为赤区反水问题，现监利已有数乡完全反水与白军完全合作为之向导，并组织硬肚会、北极会等团体，甚至有一次在某处开群众大会，群众突起暴动当场杀苏维埃工作人员四十余人及党部共产党三十余人，其严重有如此者。农民反水绝非偶然，有经济原因甚至土地政策之不当，原来鄂西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凡从地主处没收之土地只转给原佃农等，少数人民均未得到土地，所谓流氓地痞即党部苏维埃负责指导责任的人，亦认为不良分子，当然不得分配土地，因此，我们的基本群众雇贫农以及失地的游民无产阶级，都未得到苏维埃的实际利益，这显然是过去富农路线的结果。反富农斗争方法也不当，自从此地接到中央反富农策略以后，他们并不是动员雇农贫农群众与富农实行阶级斗争，而是利用苏维埃权力，对富农实行一种特捐，甚至还有绑票的行为，最出奇的有一飞条子办法，侦知富农有余钱即

由政府下条子征收其半,名为借贷实同夺取。总之以此种办法代替阶级斗争的正确办法。最错误的是土地连中农亦不分与,将中农亦当富农看待,党的出版物公开的指出富农中农均是反革命。以监利来说,中农确占农民之绝大多数,据说占百分之八十,我不相信有此大,因苏维埃政策的害,于是使中农群众由怀疑动摇而跟富农走了。因此我们的同盟群众中农,亦觉苏维埃政权为不当。所有农产品完全禁止出口,以监利来说谷米、黄豆、芝麻、棉花有得出口,现因禁止出口,于是金融异常枯竭,现只发行信用券以度日,信用券人民虽不用,而暗中却有拒用行为,盐与煤油大起恐慌,在现时并非不可与外面交通,如白螺矶可以直通汉口,而是自己封锁,总之苏维埃政府只有防止奸商的消极办法,没有活泼金融的积极政策。财政方面更是无计划,直到现在还未实行革命的累进税,何以尚不执行,他们说有何标准呢,各式各样的捐费如互济捐,少年先锋队之费、鞋袜捐等,如一家子,父亲加入互济会,儿子加入少年先锋队,女儿加入鞋袜缝纫队,则一家人捐费就不少了。而此种捐费并非乐捐,只是强迫征收,在农民看来与国民党苛捐杂税无异,因而又引起群众的不满意。

四,工作人员的腐化,党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造成另一风气,衣履极为整洁,饭食必有鱼肉,手上金指,亦屡见不鲜,并且扯拚伴,即暂时夫妻。再滥用专政权威,对苏维埃表示不满者,则往往加以反革命之罪用非法拷打及逮捕下狱。农民说现在的牢我都有分。党部苏维埃与群众之间,隔着一条深的鸿沟,一般的说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力非常之弱,并不知如何领导如何工作,即不如此则饱食终日。因而竟有党、红军

可爱苏维埃可恶之风,因红军中工作人员皆能刻苦,纪律亦极严肃,亦无骚扰农民行为。上述种种皆造成农民反党的重要原因,现时鄂西确有极大危机,鄂西旧特委已改组,现正派人往各地改组去。但旧特委本身对土地问题、经济政策根本不明了,他们虽从实际教训中知道现状不能继续下去,然而他们并未找到正当的补救方法。关于农民的分析仍是一塌糊涂。土地分配虽提出重分,但又提出没有残废孤寡及革命家属的土地,又提出什么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等幻想的办法。并说要在最近召集监利县委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纠正这些错误。并确定新的政策。汉川红军中央独立师,前些时被敌人截击分为一二部,仍在汉川一部,后至监利之一部共二百余人,枪有百余枝,他们到监利时正当监利反动势力嚣张,监利县委及县苏维埃请其留此镇压反动,该师亦允许,但补给粮食子弹之后,却回汉川去了。他们说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武汉,不应留监,但该师行至沔阳又遭失败而回监利,该县工委当然不满意,甚至有人主张缴该师之械者。我适到此,召集县委苏维埃、中央独立师、军事学校的共合会议,指出该师过去的错误并决定该师暂行留监游击,并将监境内学生军、农民梭标队、少年先锋队与中央独立师组织指挥机关,实行镇压反动并恢复旧有赤色区域。又由学校派人帮助该师整顿,该师士兵中地方观念、极端民主化观念,及浪漫不守纪律等都极深。师长吴同志甚好,政治委员黄同志因能力弱故观念不好。士兵中政治观念错误,多有由黄同志助长者,该师原由他一手造成,而他又是汉川人,因此对从外面派来的人颇有歧视。此点我即当面批评,他已接受。鄂一切重要机关并不集中后方,办事处与学校相隔一日之遥。与特委及鄂西联县政府,更隔三日之程,而且途中

常发生障碍,以致联络上非常困难,似此如何实行统一指挥,我拟候旧特委及前委负责人到后商议一适当地点,把一些机关集中起来。这是以上数日观察所得,先行报告,当然还不详细,容后再述望加以指导。

此致

布礼!

弟中夏

十月十五日

关于整顿红二、六军等 问题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九日)

长江局并转中央：

朱河发一报告，到达。此后因出征，特别是因得虐疾(每日一
次，特别在攻打仙桃镇时最利害，神志昏迷，困苦万状，攻下仙桃
镇后方愈。但回师至监利时又复发一次，现已愈)，以致直到今日
方作报告。兹择其重要者报告于次：

(1)在朱河时，原决定攻打新堤，嗣得报告新堤工事太坚，有
电网，有战壕，有土坑，最苦是战地太小，我们虽然兵多，苦于不
能展开，只能用小部队，而且地形太坏，左江右湖，只能打冲锋，
不能打包围。我们估计，占领新堤虽然绝对有把握，但一定须准
备极大牺牲。再我们攻下新堤，主要目的在解决经济问题(如说
占领新堤为通江口岸，意义虽有，坚守则难)。据侦察，新堤大商
家早已迁移，其收获不会比监利为多，因此前委决定，以不可预
计的牺牲而取得有限的经济，殊为不值，故改变军事行动，转向
仙桃镇，攻下仙桃镇后再攻岳家口，攻下岳家口后分两路出师：
六军取天门、京山，二军取钟祥、荆门，目的不仅在解决经济问
题，而且主要的在扩大赤色范围版图。十月七日很顺利地占领了
仙桃镇。前委临时变更计划，决定不再北进，移师南征。理由主

要的是地方组织太薄弱，譬如红军攻下仙桃收复地域百余里，然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这样即使红军向北冒进，事实上等于太平天国，攻城略地，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猻抓板栗，抓一个丢一个，此与扩大赤色版图意义不合。再则大军冒进，敌情复杂，后方失其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钟、荆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红军及汉水而已，不再北进，移师南征，故占领仙桃镇只两日，便退回峰口。

(2)此次攻打仙桃镇系从两路进攻：二军从西路收复沔阳县城，经过张家沟里仁口消灭敌人前卫，向仙桃进攻；六军从东路经大据彭家场，消灭敌人前卫，向仙桃进攻。两路皆有北极会匪，我军皆须搜索前进。（北极会匪，专门与赤色区域为敌，其性质与红枪会相类似，其信仰杂儒释道三家，亦以“吃灵符炮打不进”的鬼话欺骗群众，其实是出发吃灵符时，每人喝仁砂酒一大瓶，人受此刺激，神昏颠倒，天不怕地不怕，象火牛一样向前直奔，但不到两小时，酒解人醒，便失其效力，于是匪首解嘲说：“灵符过两小时无效”，或用其他鬼话“被打死者心不诚，夜有房事所致”。匪首名“老师”，设佛坛早晚拜佛。征收会费，完全胁迫，不加入者则杀其人，火其居。入会金至少一元，还有不时征发。群众引为大苦，然而无可奈何，不能不在淫威下挨家加入。再则赤区的策略错误，亦为促成群众加入北极会之又一原因，下面再说。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现时无力统治农村，无兵可派，极力利用此种组织，该会匪得反动政府援助，故其势大张，蔓延沔阳一带，监利亦间发展。）六日进攻，二军不战收复沔阳，即到张家沟打破敌人前卫，缴械二连，直追至新里仁口，六军收复大据，直进抵彭家场。七日上午两路会攻仙桃，敌人不战退过汉水（俗称襄河），

夹河相持,仙桃完全为我军占领。当晚召集工人数百开会,成立总工会。要日午召集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宣传颇为普遍,民众亦颇热烈,影响甚好。占领两日,敌人在对岸鸣枪,疏疏密密,昼夜不绝。汉口飞机,七日下午来投炸弹四枚而去,一枚炸毁房屋一栋,死市民一人,伤红军五人,市民数人;一枚伤战马一匹。我们本决定引军渡河,消灭对岸残敌,无奈所有船只尽数为敌人引往对岸,上下数十里,觅不到船只,以致未能渡河,八日晚我军退出仙桃镇,适敌人援军二团亦至,跟踪追击;西路无战事,东路至彭家场,六军给以反攻,打溃敌军,缴获敌械。九日完全安退峰口。

是役也,我军死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敌军死伤七八十人,缴敌械二百余支,子弹数万发,俘虏二百余人,算是一小胜利。敌军系川军郭汝栋一团,敌人援军不大明,闻系谢彬一团及郭汝栋驻汉川之一团,在政治上的胜利,特别是给北极会一大打击。本来当我军进攻,北极会武装队伍皆闻风逃匿,我们的策略是“杀尽老师,保护群众”,我们提出口号是“北极会是豪绅地主的走狗,是我们的敌人;群众受豪绅地主的压迫,是我们的亲兄弟”;“杀尽老师,保护群众”。“北极会的群众与我们联合起来,杀尽欺骗压迫他们的老师”。这一来,的确使北极会群众受了莫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军所过未杀一人未烧一房,将北极会匪首之宣传失其根据,不仅如此,并且连带改正赤色区域群众向来对付白色区域群众策略上的错误。从前是这样的,到白色区域见人杀人,见屋烧屋,于是赤白区域交界之处三十里往往无人烟,赤白区交通,完全断绝。赤色区域的人固然不敢过去,白色区域的人,亦不敢过来,因为一来则杀无赦,造成一个相互仇杀的地带,地方党部

及政府不仅不纠正此种错误,而且造成理论说这是赤白区域对立,他们不了解赤白区的对立,是赤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而不是赤白区两地群众对立,他们把地区的对立代替了阶级的对立,这一策略可以使苏维埃区域陷于灭亡,不仅不能把赤色区域的政治影响扩大出去,而且使白色区域的群众仇视赤色区域。红军此次进攻仙桃,的确影响赤色区域群众,改正比种错误,譬如沔阳暴动队赤卫队三千余人随红军前进,随红军在北极会根据地搜索,他们确未杀人放火,只在一处地方烧佛坛一间,逮捕五六百群众亦全数好言释放,这一来,使北极会群众根本动摇。据我们退出白色区域以后所得的消息,北极会老师回来,群众说:“请莫再来了,你们与共产党有仇,我们与共产党是没仇的,你们如再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向赤色区域跑”。于是北极会的,现时都是白色区域的反水了,这不能不说是此次政治上的大成功(赤白区域群众对立的现象不仅沔阳,其他各处亦有,我们已专函湘鄂委讨论此一问题,成立专门决议案,训令各县严重注意纠正。前时特委亦有委员震于北极会之发展,有用武力肃清倾向,当时弟则说不用害怕,主要原因是北极会不建立在阶级利益上,何能发展。但当时弟还未深切见到赤白区域群众对立之危险)。

(3)自我军退到峰口以后,前委决议留一星期加以整顿,慕禹传达国际所有决议,要中国造成红军铁军,使我们觉得这一任务的重要,二、六两军是不敢自负有必能造成红军铁军的资格,然而国际既有此愿望,那么二、六两军亦不能妄自菲薄不加努力,的确二、六两军的毛病太多太大了,实是难于智度。最主要的是红色军事教育在全军中,只是沧海一粟,军官的教育有保定

的,有黄浦的,有讲武堂的,有行伍的,有游击战争的,五花八色,各师各教,再则战士的成分,当然最多是农民,然而亦有不少投诚的土匪及俘虏的兵士,现时虽然绝对不是乌合之群,然而我们不讳言我军还是以勇气胜人,而不是以战术胜敌,的确打冲锋是我军的天大本事,并且现时还进步到能打几个冲锋,但是说到战术就成问题了。二军“老军务”多些,还有时有几分采取战术,六军多由游击战争产生,对于战术的采用就更少了,前委有决心将军队加以改造,自然此次在峰口一星期之整顿,只是因军队总在战争的状态中,借此一星期,做一小的整顿,还谈不上是改造的开步走(我们在宣传上虽这么说,那是另一回事)。所以这次的整顿,我们仅注意三件事:1. 战斗的教练(择其最感迫切者加以大概的训练,如射击,驻军警戒,行军警戒,攻击,防御,夜战,遭遇战,山地战,攻城,渡河等);2. 政治的教练(择几个基本问题,对全军讲解,相当的作统一全军思想的尝试,题目不录);3. 各级机关的整顿(尽量裁汰冗员,特别尽量裁汰闲杂人,减少行李,减少马匹等)。现整顿期满,其结果如何,还未能做总结,此地不述。现军队已开动渡江向南华安进攻,此后战略以夺取常德为主要目的,至于与一三军团配合行动,我们已另立专门机关与专门人员先行把交通建立起,使双方发生联系,我们已派几个人带信去了。

(4)我与云卿于十五日赶到监利县城,适在湘鄂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夜,的确地方工作有极大进步,虽还不到一个月,举其最著者于下:

(一)上次攻打监利,被我们所击溃散在各地之常练队,现在已完全肃清,只尺八口还有一小股,从前的白色区域及反水区域

亦相当立有基础,我们一路来见农民哨均已设立,苏维埃乡政府及少年先锋队,亦见好几处已有,虽然不如老赤色区域之整齐严肃,但大体已有规模,我们虽未下马考查,但路上所见农民确有新气象。

(二)监利县城甚为安静,工会已组织起来,工人亦颇积极参加工作,特别是学徒及青年农民更为热烈,十六日晚庆祝苏维埃代表大会之提灯巡行,参加者本城工人及四郊农民约近万人,而且热烈高呼口号,革命空气异常紧张,据说为鄂西空前未有的现象,由此足证明群众确已起来。

(三)此次召集之湘鄂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代表八百余人,如到齐约近千人,而且成分极好,工人雇农占绝对多数,次为贫农,再次为中农,知识分子只数人,青年倒不少,但女子只一人,是极大缺点。会场革命空气极高,开会六天,我们只参加二天,第一天开幕,第二天下午政治报告(中夏报告),代表讨论颇为热烈,整个大会报告将来由特委来做。据我观察,此次大会的确是湘鄂西一大成功,此次大会之后,其影响将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现在鄂西群众的确在红军屡胜之余,特别是攻下监利,其革命精神突飞猛进,湘鄂苏维埃县政府的声望必随此次大会而高度增加。

(四)农民银行之建立,亦为一大成功。原先红军发有纸币,滥极了,其币纸亦极不堪,用毛边纸成一小条,而且草书油印,以致用不到数日便破碎了。所谓兑现,亦属空谈,现联县政府成立农民银行,全鄂西只有此银行发行纸币,红军及各县政府一律停止发行纸币,并由此银行将红军及各县政府纸币收回销毁,以后只此一家纸币流行。联县政府并决定于各县及各重要市镇设立

分行,并准备相当基金,实行兑现,又决定以后政府征收公益费(即累进税),只收纸币,不收现金(即以现金去银行换纸币来完成),以增加纸币信用,的确现时人民乐于使用银行纸币了,如果办理得好,红军向外发展现金,再添基金,其前途实未可限量。

(五)地方军事组织,亦开始建立,现名为红色警卫队,原来赤卫队,因从前扩大红军时,将其解散,不便再用赤卫队名称,一时想不到其他适当名称,只得用了红色警卫队,后接中央关于地方的红色军事组织大纲,可以设红色警卫队,其性质等于中央所拟的红色野战军,现既将红色警卫队名义打出,而且各县亦已沿用,似不宜于骤然更换,特委决定仍采用红色警卫队,请中央同意。其他为红色补充队,红色守备队,拟照中央指示进行。地方军事组织详情由特委详报,兹不赘。自然我们已注意地方军事组织,如何帮助红军发展问题,即最近则由红色警卫队准备徒手兵,整个中队的加入红军,将来则由红色守备队吸收自愿兵。关于征兵制名义,特委决定暂不指出,免引起群众怀疑,只按照征兵制精神去做,一俟补充队守备队做到,就告诉群众,这就是征兵制,自然征兵制的思想就须开始宣传。

以上五点举其大概者而言,至于有决定及有决议案而未实行者,概不说及,如平分土地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等。但请中央及长江局严重注意湘鄂西特委之决议案,望迅速审查,是否错误,立予指示,假使有错,不致实行太久,一时改正不来。

此致

布礼!

弟中夏

十月十九日于调弦

附录 邓中夏同志传略

邓中夏同志，一八九四年九月七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他在五四运动时期，正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那时他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开始革命职业家的生活。

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开始，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当时还在北京大学做学生的中夏同志，即已精心研究劳动问题，参加北京的工人小报《劳动音》的工作。一九二一年底，他到长辛店筹划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翌年初，就组成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北方铁路工会组织的雏形。嗣后中夏同志运用长辛店的工作经验，指导和帮助天津、唐山以及北方各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奠定了北方职工运动的基础。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中夏同志是当时积极负责者之一。他南北奔走，策划和布置各地职工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夏同志任书记部主任。在这一时期中，劳动组合书记部起了中国职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积极作用，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中夏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中，参加和指导了多次重大的罢工斗争，如一九二二年八月长辛店罢工，十月开滦煤矿

罢工及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在开滦煤矿罢工中，罢工工人遭受英国水兵及天津警察的残暴镇压，中夏同志破指血书激励他们，领导他们坚持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斗争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夏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之后，中夏同志到上海和几个同志一起创办上海大学；同时秘密地参加工人运动。由于“二七”的失败，当时党内一部分人如陈独秀等，暴露了对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观点，公开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又有人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在只有一个国民运动。”中夏同志坚决与这种取消主义观点作斗争，他曾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的机关报上，严厉斥责这种取消主义观点，并提出陈独秀的名字来加以批评。

一九二四年中国工人运动第二个高潮开始的时候，中夏同志即离开上海大学，而专心于上海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爆发了二十二个日本纱厂四万余人的反日罢工，中夏同志当时是指导罢工的总负责人之一。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工会里，夜以继日的在工人中活动。在他的领导之下，培养出来了象刘华同志那样刻苦忠勇的战士。罢工工人在热烈的反日情绪之下，曾冲入日本租界捣毁工厂直接与军警发生冲突，以至多人被捕。中夏同志因化装参加这次行动的领导也在小沙渡路被捕。两个警察夹着他，用麻绳捆着他的手，但是他却不畏惧地昂头在街

心走着。并对和他一同被捕的工人说：“他们能捉到我们，但是他们打不败我们！”当时上海几万工人群众空前的大罢工，逼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和中国政府，不得不让步，不得不释放中夏同志和其他被捕工人。这次罢工运动震动了全国，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

中夏同志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五卅运动爆发后，他领导了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以轰轰烈烈的罢工响应了五卅运动。

中夏同志是历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最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次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多半是中夏同志参加起草的。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后，他每次都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担负总工会的其他重要职务。

中夏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积极的筹备者和参加者。“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八七”会议之后，中夏同志被任为党的江苏省委员会书记。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一九二八年初，他担任党的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又曾一度被捕。但这并不能丝毫挫折他的坚强的革命意志。经过了三个月之后，党把他营救出来了。

一九二八年复，中夏同志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在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他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留驻莫斯科。他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

一九三一年中夏同志由莫斯科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担任该地党的省委员会的工作和红军

第二军团的政治委员。

一九三一年冬,中夏同志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回到上海,领导革命救济工作(一九三二年任互济总会主任)并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

十三年来,中夏同志始终是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勇敢的战士。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广东、武汉、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中夏同志。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由法租界引渡立即把他解往南京,他们满以为可以从中夏同志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可是久经锻炼的中夏同志,虽然受尽了各种难以形容的严刑拷打,却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反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殃民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派在严刑拷打无效之后,又唆使叛徒施行诱说。中夏同志,见了这些无耻叛徒,更增加了他的仇恨与愤怒,痛骂叛徒的无耻,叛徒们只得抱头鼠窜而逃。国民党反动派见中夏同志不畏威吓,不惧严刑,不为利诱,乃决意加以杀害。中夏同志在临刑的前夜,曾由监狱里写信给党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雨花台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京屠杀共产党员和一切有为青年的刑场)

中夏同志和党的其他先烈一样,以自己的牺牲唤起了千百个新的战士。十六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编 后 记

邓中夏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向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给研究工作者提供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工人运动史的重要资料，我们编选了这部《邓中夏文集》。

这部文集选收了邓中夏同志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的绝大部分著述。全书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编者仅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工作，对于原著内容未作改动。作为附录收进文集的《邓中夏同志传略》，原是《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的附录，这次选用，在史实和文字上略有修改。

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是在五十年代由中夏同志夫人夏明同志和我社共同收集的，这次南京大学历史系姜平同志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王凌云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又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央档案馆、广东、上海等地档案馆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1982年7月